

Peking Press
京報

蔡曉濱著

桂局將急轉關局

黃紹竑昨由滬轉粵

陳濟棠出關後與粵軍中

中國報人

按八五佈發

朱道元昨赴任

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
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
“道义”是否在肩？
“辣手”还能著文吗？
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蔡晓滨

上架建议：文化·阅读

ISBN 978-7-5133-0086-5



9 787513 300865 >

定价：35.00元

蔡曉濱著

中國報人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报人/蔡晓滨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133-0086-5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5802号

中国报人

蔡晓滨 著

责任编辑: 李梓若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申秀燕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86-5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迄今为止我只做过一种职业：办报。从“文革”期间到农村插队时办知青报，到回城后入报社，做记者，当编辑，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

单一的职业履历有不少好处。你可以就这一领域里的诸多问题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你可以用自己长期的实践积累印证社会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种种巨大的进步和变迁；你可以在不经意之间收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料，为你职业领域里的杰出历史人物画下一幅幅生动而丰满的画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报人》，就是这众多“画像”的结集。我选择了十四位中国现代史上的职业报人来讲述和描摹。写作是故事性的，而不是纯理性的评判和分析。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与历史先贤的沟通和神交中，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他们做过什么，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之窗上涂抹下了怎样的或五彩或浓淡的生命印记。

这十四个人物是中国职业报人的杰出代表，至少是星座般熠熠生辉的关键人物。我个人的写作是随意和无序的，哪一个人物最让我感慨，哪一个人物的资料准确充分，抑或说，哪一个人最难写、最具挑战性，我便先去研究他，分析他，描绘他。我清楚地记得，这十四个人当中，我最先完成的是穆青……

写完之后，在整理他们的政治态度、办报方略、历史演进和时代更替时，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一股巨大的悲凉怦然掠过我的心头：十四个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成就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辉煌。

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直接倒在了军阀和特务们喷火的枪口之下；邹韬奋

以“七君子”之一的身份，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所办的刊物、报纸屡遭封门、查禁，为躲避特务的迫害，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之际，化装出走，流离海外，颠沛无常，终生恶疾，英年早逝于战乱的上海；成舍我早年从张宗昌的枪口下侥幸逃脱，后来的办报主张，不见容于当局，汪精卫亲自下令封了他的报馆，成舍我竟然仍不低头：“他汪先生不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而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辗转入台后，国民党的戒严令禁止民间办报，成舍我郁郁寡欢，终了孤岛。

归属新中国的革命的进步报人，命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极“左”路线下，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当年《大公报》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1952年正当壮年，便被迫离开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穿梭于多个闲职，空耗了十五年宝贵时光后，“文革”期间自杀于“五七”干校；解放前殚精竭虑办《观察》、解放后短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崇尚“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反右期间自然难逃罗网，“文革”高潮时期受不了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离家出走，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文汇报》的徐铸成，《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南京人报》的张友鸾，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劳动改造；《大公报》的王芸生幸运地躲过了反右一劫，但是，让这个《大公报》的元老执笔，写为《大公报》抹黑、画丑的《大公报》史，那犹如在向王芸生被撕裂的伤口上撒盐……

难道职业报人真的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吗？现实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当我们景仰的先贤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报人的荆棘之路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复宣示着各自新闻救国的理念和宗旨。他们必须说，必须先说，必须反复说。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更是灾难来临时“立此存照”的泣血宣言。

有论者指出，当下的社会生活已进入“百度”时代，举凡人物生平、历史事

件、名词解释、历史掌故、社会运动等，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查询并获得准确答案。因而，本书所涉及的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报人，我是有意没有作为人物传记铺开陈述的。我注重的是他们的命运轨迹、时代遭际、风云变幻、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命的印痕和行进的脚步。也许对某一位报人生卒年月、生平行止语焉不详，敬请读者见谅，因为我认为，这些基础的认知，“百度”可以告诉你。

邵飘萍在《京报》创刊的当日，亲自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张挂于办公室的墙上。史量才的办报原则掷地有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你有百万军队，我有百万读者”。他认为，办报“非寻常业务，是庄严伟大公共之事业，需要抱大无畏之精神、抱大牺牲之决心”。林白水本一落拓不羁的文人，但他的名士做派却丝毫没有妨碍他《社会日报》的尖锐和泼辣，“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胡政之、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上，公开祭起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中立办报方针，要做民间真正舆论的代表。当然，他们首先做好的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心理预期的。成舍我感叹：“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王芸生的理想，是实现一代知识精英的文章报国之志。“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储安平寄厚望于《观察》，诚心实意地打造一个心平气和地表达各种意见的平台。徐铸成是在意气风发中将《文汇报》推向高峰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将它置于死地，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是《文汇报》再次新生的礼赞。当然，徐铸成绝没有想到，迈上高峰的《文汇报》，之后便是急遽的下坠……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任何高深的理论和定义，在经过丝丝入扣、沉重痛苦的逻辑思考之后，用笔书写在纸上，是相对容易的。

局外人不可能想象，在中国这个因袭了五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土壤里，要长出出现代民主和自由之树，这种子是何等地难以入土、生根，发芽！这稚嫩的小树要顶开结板的土地，掀翻压在身上的石头，顽强地挺立，是多么艰难！

乔治·W·布什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待了八年，乏善可陈。就算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然而，此君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忠诚拥护者和坚定实践者，这倒为他平庸的执政生涯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2008年年底，在小布什卸任之前，他在网络上向美国及全世界的网民讲过一段精彩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很荣幸，也是很不幸，“新闻”是驯服现代统治者的五大绳索之一。风口浪尖，风光无限，同样也是风险无边。一会儿涌上浪峰，一会儿跌下波谷，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青年学者林溪声、张耐冬披沙拣金，完成了中国早期报人邵飘萍的传记《邵飘萍与〈京报〉》。在这本书的卷首，他俩借题发挥，以抒胸臆，写了一篇长长的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有一些普世情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这两位年轻的学者，一个是习新闻的，一个是学历史的，因而，他们的结论，便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纵深感。林溪声、张耐冬指出，中国职业报人的多重身份，令他们既感荣幸，又备尝痛苦，“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

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其实，我们所有后来的新闻从业者，都是沿着先贤血染的路标前行的。我是故意用“新闻从业者”这个中性的、没有比较级的词汇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把“记者”、“编辑”作为稻粱谋的，是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在应付不得不写的奉命文章，在完成了这里车祸、那里命案的应景新闻之后，闲暇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一句：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夤夜发问，当有所思。

蔡晓滨

2010年初夏于青岛浮山南麓

目 录

邵飘萍.....	001
----------	-----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史量才.....	024
----------	-----

史量才不是要做政治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政治权威的批评者和政治失范的整饬者。矛盾和困难的是，极权政治和它的领袖人物不需要他持守这样的姿态……

张季鸾.....	046
----------	-----

张季鸾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财富，是自由主义的报业理想，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努力和实践。

胡政之.....	066
----------	-----

如果说“大公报”三个字无法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的话，那么“胡政之”三个字，就应该与“大公报”共生共存，传诸后世。

林白水.....	092
----------	-----

一支健笔，刺社会丑恶百态，一纸风行，办大众喜爱媒体，享誉京城，名满天下。终于因笔起衅，因文招祸，被军阀忌恨、忌惮，饮弹天桥，暴尸郊外……

成舍我.....	106
----------	-----

成舍我一辈子刚正不阿，不事权贵，不愿拿原则做交易，不愿屈膝以讨巧。他顶撞、拂逆汪精卫、蒋介石父子的故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

王芸生.....	129
----------	-----

躲得过反右，逃不掉“文革”。十年浩劫当中，王芸生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随后便去了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

徐铸成..... 148

他是一个真正的报人，一生除了新闻事业，再没从事过任何其他职业。还未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兼职记者，在新闻这个圈子里蹉跎、辗转、奋斗了一个甲子。

邹韬奋.....172

邹韬奋曾向朋友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奋斗不懈，其中的尺度极难把握。从这笔名当中，足以看出邹韬奋一生中的艰难和矛盾。

陈铭德 邓季惺..... 190

陈铭德、邓季惺是一对半路夫妻。这样两个性格、脾气、禀性完全不同的四川人，却相扶相携，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成就了一段夫妻报人的现代佳话，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范长江.....210

从四十二岁赋闲到六十一岁去世，范长江最富经验、最有创造性的年龄，竟然是在冷漠、歧视、碌碌无为中度过的。

储安平..... 232

无论如何，储安平这个人最终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张友鸾..... 258

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张友鸾新闻界的老熟人、老朋友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们知道，埋头于故纸堆好几年的张友鸾，又要畅快淋漓地说话了。

穆青..... 278

穆青始终没有走出“宣传家”这个角色怪圈。他一辈子都坚信，新闻具有极大的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谁若说新闻作品只是一种客观、公正的事实的反映，穆青是断然想不通的。

后记..... 298

邵飘萍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邵飘萍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和“异数”。

学者张育仁称邵飘萍是走向涅槃之路的“异教徒”。他说，邵飘萍“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境”。

在不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专制中国，无论哪一种“救国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新闻救国，统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公民社会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肥沃土壤。根基不牢，大树难成。邵飘萍与所有的先贤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之人，仅仅同情、扼腕是不够的。我们要厘清前辈们的足迹，昭彰他们的信念理想，承继他们的生命薪火。唯其如此，“邵飘萍”们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一个穷儒之家。

“紫溪”是人名。紫溪村原名黄毛塔。明嘉靖年间，邵氏家族的邵幽出任了朝廷的监察御史，这是邵家从未有过的大官。邵幽字紫溪，族人一经商议，便将村名黄毛塔更名为紫溪村，村外那条自北向南终年流水潺潺的蜿蜒小溪，也就理所当然地叫成了“紫溪”。

邵飘萍家算是书香门第。曾祖父“学窥渊海，蜚声泮沼”，耕读传家，仗义疏财，家里的钱物都资助了肯读书、求上进的邵氏子孙。邵飘萍的祖父没有考

取功名，年轻时在家乡租田而耕。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打下东阳时，他随天军南下福建，从此音讯全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邵飘萍出生不久，父亲邵桂林迫于生计，举家迁往金华谋生。邵桂林别无长技，只会教书。来金华后，还是重操旧业，设馆授徒，当起了私塾先生。三岁的邵飘萍出于好奇，时常到父亲的塾馆玩耍。邵桂林发现，邵飘萍记忆力非凡，学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甚至比那些上学的大孩子还记得牢固。邵桂林欣喜不已，决心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材，将来出人头地，光耀门庭。于是，刚刚五岁的邵飘萍便正式进了父亲的私塾读书，每日读书背书，研习书法，学业和技艺大有长进，很快便声名在外了。

一日，光绪皇帝的表叔、金华知府继良得知年幼的邵飘萍乖巧机灵、才思敏捷，便差人将他叫进府中。继良拿起一个有缺口的铜钱要他打谜。邵飘萍毫无怯态，随口应答：“不成方圆。”继良大喜，称他“奇才”。

1899年，老少童生齐集金华应考秀才，十三岁的邵飘萍也跃跃欲试。开考之日，试院的大门两旁多了一副对联，邵飘萍仰头观看，随口评点起对联书法的优劣高下。恰好主考官途经这里，听到邵飘萍出口不凡，戏之曰：“小少年，蓝布衫拖地。”邵飘萍听罢，立即对答：“大官人，红顶帽朝天。”主考惊讶万分，记住了这个翩翩少年。发榜之日，邵飘萍果然高中，成绩列金华府属八县之首。主考官内心欢喜，又怕他年少气傲，自此懈怠，便有意将他圈至第十名。十三岁考了个第十名，这在金华和东阳也一时传为美谈。

进入20世纪，西风东渐，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的先行者们，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逐渐介绍到了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意识在学子当中相当流行。年少好学的邵飘萍敏锐地感觉到，读经已无出路，科举已走向腐朽。在中了秀才之后，他便拒绝赴举，改学当代自然科学。

1903年，十七岁的邵飘萍进入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教授的课程既有中国古文，也有声光电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两年后的1905年，在国内改革的巨大压力下，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足见邵飘萍当初选择的正确。

1908年，邵飘萍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攻读师范科。同窗有邵元冲、陈布雷、张任天等。高等学堂设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州，毗邻上海，风气较为开放。学校师资上乘，学风自由，邵

飘萍如鱼得水，乐学上进。同学陈训恩长了一个圆圆的娃娃脸，酷似面包，英文面包是“bread”，译音为“布雷”，邵飘萍便以“布雷”称之。后来，“陈布雷”三字越叫越响，甚至取代了他的真名陈训恩。多少年后，陈布雷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第一文章高手。

1908年春天，浙江省的公立、私立各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联合运动会，这实际上是杭州各校的一次体育大联欢。邵飘萍与同学张任天、陈布雷，在美术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办了个《一日报》。因运动会只开一天，他们便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做了分工，陈布雷为编辑，张任天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蜡版油印，十六开大小，一天之内出了二十余期，每期印一百二十多份，分送体育场内的各校师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邵飘萍最早的新闻实践活动。

1909年夏天，邵飘萍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大学毕业了。金华中学堂学监余敏时欣赏他的才华，立即聘他为中学堂教员，并给他分派了国文、历史等重要课程。同年秋天，邵飘萍由父母做主，迎娶了结发妻子沈小仍。沈小仍是旧中国的传统女性，小脚，没有文化，邵飘萍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法与她沟通和交流，但他们却能相敬如宾，平静过活。邵飘萍一生的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都是沈小仍所生。不久后，邵飘萍结识了金华的漂亮姑娘汤修慧，汤家开了个照相馆，小本经营，借以维生。汤修慧聪明灵秀，但读书不多。邵飘萍说服汤家，自己出资送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汤上学期间，二人鸿雁传书，日渐生情，1912年结为连理。多年后，邵飘萍主办《京报》时，又娶报馆女职员祝文秀为妻。一夫而三妻，这既是那个时代的风俗，也是旧中国知识分子倜傥不羁的象征。邵飘萍只是随了大流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在这大变革、大动荡时代，邵飘萍那颗鼓荡的年轻之心，耐不住三尺讲台的寂寞了。他渴望着“以言论政”、“文章报国”，从事他向往已久的新闻事业，在世事大变迁中建功立业。

怀揣着殷殷的新闻梦想，邵飘萍来到杭州拜访杭辛斋。杭辛斋是个老报人，同盟会会员，早年参与创办过《杭州白话报》。杭州光复后，革命党急于办张报纸，宣传主张。邵飘萍此刻投到门下，正中杭辛斋下怀。他们立马以《杭州白话报》人员为班底，着手创办了《汉民日报》，二十五岁的邵飘萍临急受命，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

报纸的要义在旗帜鲜明。邵飘萍全力支持革命，支持共和，“亟亟希望中华民国之完全成立”。对于所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和人物，邵飘萍洞若观火，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袁世凯支使冯国璋疯狂向革命军反扑，攻克了汉口，纵火焚烧街市。邵飘萍在《汉民日报》上撰写评论，猛烈抨击：

冯国璋以奴隶之性，贪残之心，焚掠汉阳，惨杀同胞无算。

呜呼！此非人道主义之毒蛇猛兽，人人得而诛之者乎？乃袁世凯内阁方以其能涂炭生灵，赏给二等男爵，然则袁贼之居心可知矣。

粉冯之骨，碎冯之身，为汉阳人民吐冤气。褫袁之魄，斩袁之头，为中华民国定大局。

呜呼，男儿勉乎哉！

邵飘萍高举反对袁世凯，拥护新共和的旗帜，在《汉民日报》口诛笔伐，煞是热闹。这可惹恼了这个“独夫民贼”，对邵飘萍的迫害随之而来。一天深夜，一群流氓潜入《汉民日报》报馆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被印刷工人及时发现扑灭。还有一次，流氓故意寻衅滋事，把邵飘萍的眼镜撞落在地，想惹恼邵飘萍与之动手。机智的邵飘萍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捡起摔碎了的眼镜抽身离去。最危险的一次是邵飘萍坐轿子去编辑部，遇上两名刺客。坐在轿中的邵飘萍察觉到情况有异，便佯装自言自语，说邵振青啊邵振青（邵飘萍字振青），你可真该死！刺客听到轿内人在骂邵飘萍，一时没了主意，未敢贸然下手，邵飘萍才又一次化险为夷。

1913年8月10日，袁世凯授意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逮捕了邵飘萍。“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反而愈加坚定了邵飘萍投身新闻事业、倡导言论自由的一腔激情。出狱那天，听罢狱吏“今后要安分守己”的无聊训话后，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个大纸包，将自己在狱中闲来无事捉的上百只臭虫洒在案桌上，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割据军阀毕竟大权在握，利刃在手，整死一个文弱报人易如反掌。为性命安全之计，邵飘萍在友人的帮助下，于1914年春天来到东京，入政法大学，一边习日文、学知识，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局势。

1915年1月，在袁世凯孤注一掷，加紧称帝的倒行逆施之中，日本人以为等来了最佳时机，他们以支持袁世凯登基为交换条件，逼迫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五大项共二十一条的《对支那政策文件》。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条：日本拟向德国协定取得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等。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臣民可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各项生意；可获得该地区的开矿权等。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二条：俟将来机会相当，将该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所有属于该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条：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等。

一向亲日的曹汝霖也不无忧虑地说：“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是太想登上皇帝宝座，实现他在清廷时敢想而不敢做的“袁氏”天下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又确实不敢轻易应允这“二十一条”，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就这样在“私欲”与“公利”之间挣扎着、煎熬着……袁世凯毕竟老奸巨猾，他突然想到利用其他列强制约日本，因为“二十一条”一旦签署，日本便成了独霸中国的惟一系列，其他国家在华利益便荡然无存。袁世凯违背了与日本的保密承诺，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了其他国家。

2月，邵飘萍从外电报道中了解到中日正在进行“二十一条”秘密谈判时，立即把这一消息传回了国内。紧接着，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并撰写了《留东我国民之空前大会》等新闻，发给国内的《时报》等报刊发表。

袁世凯登基在即，邵飘萍义愤填膺，他提笔撰文，痛斥这种明目张胆的倒退行径。也许是人在海外的缘故，邵飘萍将袁世凯骂了个痛快：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须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谏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于是，袁世凯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恨不能抓住他将其碎尸万段。邵飘萍则以无畏斗士的姿态，站在了反袁斗争的最前列。他甚至比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态度更坚决、更彻底。邵飘萍早已看透了袁世凯的封建本质，毫不犹豫地认为，袁世凯绝不会把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之路。邵飘萍于1916年2月29日至3月2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了五千多字的长文《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从内政、外交、法律诸多方面，对袁氏不可当国，做了精辟论述。

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袁世凯在国内外的一片唾骂声中，不得不废帝制，退皇位，并在6月6日忧怒而死，一命呜呼了。邵飘萍的“预吊”果然应验了。真是“神奇”得不得了！

袁世凯西逝，邵飘萍东来。学习兼避难两年后，邵飘萍从东京回到上海。

《申报》社长史量才久闻邵飘萍的大名，用优厚的条件聘他为《申报》驻京特派员。自此，《申报》的北京报道立见起色，而邵飘萍也开始了他新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邵飘萍从业热情高涨，新闻神经紧绷，加上他为人乖巧，八面玲珑，在他派驻北京的那几年当中，挖掘、报道了许多重大独家新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力劝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阵线。力主继续保持中立立场的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参战，与总理段祺瑞公开闹翻。狡猾的段祺瑞扔下辞呈，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天津当起了寓公。其实这

是段祺瑞以退为进的阴险一着。果然，黎元洪根本指挥不动以皖系军阀为班底的政府部门，他只好派副总统冯国璋做说客，赴天津将段祺瑞请了回来。这“府院之争”的第一个回合，以段祺瑞获胜而结束。

挣足了面子的段祺瑞乘专列回到北京时，已是3月6日的深夜了。邵飘萍一千记者闻讯去火车站守候，都想在第一时间采访到段祺瑞，可段祺瑞提前下车，躲开了记者，悄悄回家了。各报记者见时间已晚，采访无望，纷纷打道回府了。邵飘萍分析，以段祺瑞的性格，势压总统，得胜回家，必定颐指气使，得意洋洋，极有可能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一抒胸臆。想到这里，邵飘萍立即乘上汽车直奔府学胡同段祺瑞官邸。

段祺瑞果然心情极佳，极愿接受记者采访。他不顾舟车劳顿，时已半夜，从以往的争端到今后的打算，滔滔不绝地与邵飘萍谈了三个小时，直到凌晨三时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走出段府，邵飘萍知道，《申报》是赶不上了，可这样重大的独家新闻，不抢发出去又实在可惜。此时，邵飘萍正替章士钊主持《甲寅》周刊，而今夜正是《甲寅》付印之时。邵飘萍直接赶到印刷所，将这期《甲寅》的要闻撤下，补上与段祺瑞的谈话内容。他一边写，工人便一边拣字排版。天亮后《甲寅》周刊上街售卖，不到半天便被读者抢购一空。

几个月后，“府院之争”的第二个回合爆发了。黎元洪控制的国会否决了参战案，段祺瑞暗中操纵要解散国会，黎元洪一不做二不休，免掉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段祺瑞又躲回了天津。黎大总统拉不下脸面再去求他，便死撑硬挨。此时，辫帅张勋跳了出来，他主动要求进京调停，带着他的辫子军浩浩北上。张勋是怀着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进京的。6月30日夜，他换上清廷朝服和顶戴花翎，闯进紫禁城，拽起睡梦中的溥仪小皇帝复辟了。这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大敌当前，黎、段还算识大体、明大义，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复辟。张勋拒不下台、拒不交权。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整军，进京讨逆。邵飘萍在京城每天忙于采访，将最新消息发往上海，载于《申报》。这一天，被张勋辫子军控制的电报局，禁止记者向外地发送北京时局和战况。邵飘萍无奈，便下决心赶往天津发报。当他走到丰台附近时，突然陷入了段、张两军的交战地带，一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邵飘萍险些就丢了性命。事后，邵飘萍回忆说：“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若果死，则责任性命我不得不死也。”为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他几乎成了宿命论者了。

平定了张勋的复辟闹剧，总统府和国务院还得坐下来谈。段祺瑞逐渐占了上风，黎元洪被迫接受“参战”主张。协议在酝酿当中时，政府各部门深知个中利害，闹了近半年，黎、段几乎剑拔弩张，还让张勋钻了空子，“复辟”了清廷整半月，兹事体大。不小心说漏了嘴，得罪了“府院”哪一方都不好，还是抽身局外来得安全。于是中枢各机关纷纷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邵飘萍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新闻，他要得到最新最快的消息。在这关键时刻，邵飘萍采访新闻的手段和魄力，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邵飘萍想方设法搞到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小汽车，坐上它一直开到了国务院大院。在内传达室，他掏出名片，让卫士长给他通禀一下，他要面见段总理。卫士长头摇得像波浪鼓，大手一挥，将他拒之门外。此刻，只见邵飘萍从口袋里一把掏出了一千元钱，数出五百元递给卫士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那我再送您五百，不知意下如何？”那时，北京的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二百左右。卫士长收起钱，拿着邵飘萍的名片进去了。不多时，卫士长出来说，总理有请。

段祺瑞还记得这个夜闯总理府的年轻记者，自然愿意与他聊聊他是如何在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中获胜的。他甚至还谈到了一旦宣布参战，将调遣正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构筑工事。

段祺瑞说，这可是绝密信息，三天之内决不能在北京城走漏半点消息。邵飘萍愿以全家生命财产做担保，绝不披露此事。

一离开国务院，邵飘萍立即乘车赶到电报局，把消息用密码发到了上海《申报》。上海的报馆接到这条重大新闻，立即印了几十万份“号外”在全上海叫卖。可那时没有其他的通讯、交通工具，北京到上海的铁路也还没有通车，报纸由上海投递到北京要经轮船、汽车，至少需要四天。上海的报纸到北京时，已经过了“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定，段祺瑞也拿邵飘萍无可奈何了。邵飘萍的机智果敢于此可见一斑。

徐铸成当年在中学读书时，就钟情于邵飘萍的文章。他曾经回忆说：

当时上海各报的声音，主要在“北京特约通信”上，《申报》的“飘萍”通信，《新闻报》的“一苇”（即张季鸾）通信，《时报》的“彬彬”（即徐凌霄）通信，最吸引人。报纸来了，我首先找这三位通信（当然，十有八九是抢不到，要第

二天看),看到登着时(他们的通信,大概隔三四天登一篇),总如饥似渴地阅读,有时为他们优美的文风和深刻细致的描述所钦折、赞叹。他们的文笔,各有特色,相同的是于深入描述当时北京政坛的内幕以外,还带有必要的分析和评议。从这里,读者也真正了解到政局的真相和各派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的情势。

邵飘萍在新闻采访上的用心和技巧,令张季鸾赞叹不已:“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功。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蒋梦麟称赞说:“飘萍先生采集新闻也,其手段敏捷,其观察精深,权轻重而定取舍,聚孤立之事实,作系统的报告,明言暗示,富于兴味。”

报人以报纸为阵地。失去阵地的战士,至多是散兵游勇、孤独侠客。邵飘萍创立自己报纸的夙愿,终于在1918年10月5日实现了。他以自己多年的积蓄和朋友的支持为资本,以自己的住家为简陋编辑部,办起了北京的又一张新报纸——《京报》。报纸创刊的当天,邵飘萍就在编辑部里手书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张挂于墙。这无疑是向世人昭告,《京报》是一张不屈服于任何压力,遵循新闻规律,伸张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现代报纸。邵飘萍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阐明了《京报》的使命:“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张育仁指出,《京报》创办时,正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从一开始,邵飘萍就把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建设社会,发表意见”的民间舆论机构当做自己“试验”的重要目标。

邵飘萍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著名大报《朝日新闻》心向往之,《朝日新闻》的办报方针,几乎可以说是邵飘萍孜孜以求的楷模和目标:

立足不偏不党的立场,贯彻言论自由,为建成民主国家和确立世界和平而努力;基于人道主义,献身于国民幸福,排除一切不法与暴力,和腐败进行斗争;公允、迅捷地真实报道,以进步精神保持公正;常怀宽容之心,注重品格及责任,尊重清醒厚重之风……

邵飘萍认为：“报纸精神的表现，全寄之于评论，故评论的好坏，和报纸销路的多寡，其关系甚为密切”。邵飘萍以极大的精力擘划《京报》的言论，体现着“文人议政”的鲜明特色。邵飘萍亲撰的言论，憎爱分明，言语犀利，针砭时局，不留情面。这是《京报》有别于其他报纸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上和舆论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安福系把持国会，胡搅蛮缠，搞得政局一片混乱。邵飘萍提笔抨击这些人的胡作非为：

忽而议场大哄，忽而弹案提出，忽而阁员冲突，忽而财长辞职出京，忽而又一弹案提出，忽而财长回任，忽而陆长请假，忽而弹案各自疏通撤回。此种滑稽之儿戏，究竟与谁开玩笑耶？呜呼，此下流社会苟合苟离之现象耳！此各党各派皆无政治能力之表征耳！此无耻官僚出尔反尔患得患失之面目耳！此北方党派自杀自灭之作用耳！

至如我国，且勿论成功如何，要先在救目前岌岌不可终日之危象，而内交外迫愁叹之声盈于朝野，乃为之元首者，偏有闲情逸韵，提倡风雅，敷衍无赖文人耶，抑神经麻木，真不知有亡国之痛耶，敢问！

注重民间疾苦，多采撷、刊发社会新闻，是一张负责任的报纸应有的道德精神和道义责任。《京报》率先在社会新闻的刊登上有了突破。邵飘萍认为：

“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意义而言，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小孰大。”邵飘萍这番话的意思，主要是针对当时京城里的各类报纸，只注意挖掘、采访中枢机构的政治新闻、时政新闻，而忽略了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和下层民众的衣食起居、酸甜苦辣。邵飘萍在《京报》上扩大了社会新闻的版面，后来干脆将第三版辟为“北京社会”专版，集中报道民间疾苦。1921年5月22日《衣食困人惨象》云：

自行饿死者：西直门内宗帽胡同三号门牌，住户文海，年六十七岁，专以作小本经营为业。乃因市面萧条，本利俱尽。于三月中旬卧病至今，饮食无钱购，用药更无处来。文某痛恨余生，大呼“死了好”三声，吐血斗余而亡。

全家投河者：德胜门内小六条胡同八号门，有金松寿者，为清室被裁侍卫。家有八口，坐吃山空。前年起摆袜摊维生，仅敷日用。乃突然因米粮日贵，将袜摊一并吃尽。在饥饿三日之后，于二十日早前往西直门外白石桥，一齐投入河内自尽。

因债自缢者：东直门内北新桥，天德厚木厂掌柜林少甫，民国四年木厂倒闭。后因债务难以偿还，又家境困难，万般无奈，于十九日晚，至自来水公司后的王宅坟地，自缢身亡。

《京报》的这些社会新闻，有名有姓，事实确凿，读来让人触目惊心，郁结难舒。当然，邵飘萍不仅仅是在搞“有闻必录”的客观报道，他还竭尽全力报道涉及民生的市政管理问题，督促政府部门予以关注，加以解决。《京报》曾刊载的三条社会新闻，表明了邵飘萍的这些主旨和立场：

一、南岗洼尸臭熏天，战血余腥

据云，直奉交绥之阵地，南岗洼一带，连日被大雨冲出尸体甚多，暴露于野，腐臭之气，被风吹出十余里地……请该管者速为掩埋，亦重视民命之一端也。

二、救护投河之奖励尚非治本之道

……年来生活困难，一般人被经济所迫于无可如何中，投河跳井。而只给救护投河者奖励，则“非治本之道也”。

三、阔少爷掠夺车夫白用他们力气岂不等于盗贼

车夫“白拉了好几里地路，上哪儿要钱去？”正含泪诉苦的时候，忽然过来一位警爷，又推又打地说，走，别在这里乱走。那有冤无处诉的苦车夫，哄的东西逃走了。唉，这是甚么现象啊！有钱有势的人，都要白坐车，还有活路吗？

尽管邵飘萍有着现代新闻理念和现代民主意识，立志做“社会公人”，将报纸办成“社会公器”和大众工具，但北洋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是无法实现邵飘萍心目中的理想蓝图的。因而，《京报》上的这些关心民间疾苦的社会报道，仅仅是一个侧面，一个角落而已。既上不了一版二版的要闻位置，也不能形成连篇累牍的浩大声势。当时报人的流行理念，是把报纸办得雅俗共赏、风花雪月，迎合有钱人、有闲人的阅读心态。《京报》和邵飘萍自然不能免俗。邵

飘萍为吸引读者，在《京报》副刊上下了不少功夫，他先后创办了二十几种副刊，或每周轮流刊出，或随报免费奉送。《京报》上较有影响的副刊有：《海外新声》《小京园》《经济新刊》《民众文艺》《图画周刊》《妇女周刊》《显微镜》等。最声名赫赫的当属《京报副刊》了。1924年10月，借鲁迅得意学生孙伏园与《晨报》翻脸之际，邵飘萍亲自登门说项，将孙伏园请到了《京报》，主编《京报副刊》。孙伏园身为名师高徒，又有极强的交际联络特长，在他的组织下，《京报副刊》有了一个高水平的稳定的作者群体，鲁迅、周作人、许钦之、高一涵、孙福熙等，都是《京报副刊》的作者，文章内容涉及文学、经济、哲学、历史、宗教、伦理、自然科学、文艺等广泛的领域。在孙伏园的勤奋约稿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就为《京报副刊》撰写了三十七篇杂文，为《京报》创造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当然，《京报》与鲁迅在《莽原》周刊上的齟齬，只是一次误会而已。只是邵飘萍急于改造报纸副刊，急于抬出鲁迅为《京报》张目，将还在酝酿中的由鲁迅主编《莽原》之事，早早地在报纸上公布了出来，弄得鲁迅措手不及。想想也是，消息发出来时，鲁迅手上除了百来行稿子，什么也没有，两个整版的《莽原》从何编起？换谁谁也着急。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邵飘萍的存在无疑是个奇迹。他曾打算结合自由主义新闻实践，编一套新闻学丛书，以便培养更多具有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人才。遗憾的是，拟议中的五本书，他只完成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的写作，而《广告与发行》和《新闻编辑法》等书的写作，则因他的突然被害而成为永久的遗恨。”张育仁在《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一书中对邵飘萍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邵飘萍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新闻自由的极端重要性的。在他从事新闻事业短短的十几年中，多次被捕下狱，几次报馆遭封，两度被迫避难日本，没有一个严格的法治环境和健全的社会机制，中国的报纸和报人断难生存。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新闻事业又一次大发展的高潮，一年之内，数百家报纸诞生面世，而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又极其匮乏。所谓记者，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都难如人意。因而，当徐宝璜向他提出举办新闻研究会时，邵飘萍举双手赞同。他亲笔给蔡元培校长写信，提议在北京大学率先开始新闻学研究。蔡元培全力支持，新闻研究会很快便开课了。邵飘萍又当仁不让，与徐宝璜分工合作，二人几乎包下了新闻研究会的大部分课程。

邵飘萍人长得精神，口才极佳，又有丰富的新闻从业实践，他的授课，大受学生欢迎。那时的外出采访的记者，叫“外交记者”。邵飘萍对“外交记者”的操守和素养、作风等，有着极精辟的论述：

若以理想言之，新闻社既为社会公共机关，非不应有党派色彩，且目的尤不应在于营利；……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外交记者发挥其社交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名之权威，则种种利俗之诱惑，环伺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故外交记者精神上三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夫交游广则品类不一，上至最高当局国务要人、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资本家、奸人败类，以至卑官小吏、舆夫走卒，皆外交记者所可与接触之人物。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故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问题。世每有绝顶聪明，天方茂美，利用地位，藉便私图，至于责任抛弃，人格扫地。一般无知者惊羨其豪华阔绰之日，正吾人认彼天良丧尽堕入地狱之时。此不过逞其最短时期之欲念，实际上毫无所成，一旦败露，则世人之厌恶非笑，集矢其身，欲挽回而已无术，不仅害及一己，新闻界之前途实受其累，是安可以不慎。此系必然之因果，固不独外交记者为然，惟外交记者之地位尤易流于堕落，愚故郑重为有志诸君告也。

邵飘萍一再强调，“记者之生命，惟在真理与事实之权比”。他认为，最好的记者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记者于可能的范围，避免加入任何名义之团体，以始终立手于真理与事实之上之第三者高垒……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

邵飘萍告诫学生：“最佳之新闻，即为予最大多数人以最大兴趣者”。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

屈服于舆论之制裁”。邵飘萍向来主张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他提醒记者采访时机敏、细密。就机敏而言，邵飘萍认为对被采访者，不论其功过善恶，只问能否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即使是大坏蛋，也要设法让他迅速接见自己。就细密而言，邵飘萍指出新闻不要“粗疏出之”，否则“未有不失败”的。要认真观察，待“周围之情形无一遗漏”，方可“综合参证”，否则必有疏漏。

邵飘萍最为痛恨的是对新闻自由的迫害和压制。他认为，“政府当局压迫言论之政策”，是政府“自私自利之法令”，是“钳制言论的利器”。对于辛亥革命以来，国内舆论环境几无改善，邵飘萍痛心疾首。他曾激愤地说：

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日本）压迫之手段只能以法律为范围；（而在中国）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实际上无一含有保护新闻事业之意味；……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

邵飘萍认为，新闻界应当通过斗争使新闻事业“在基础正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达到法律上相当自由之目的”，并使“最后的胜利归于言论界”，“最后的胜利归于人民”。

邵飘萍坚持认为，新闻自由归根结蒂是民众的言论自由。新闻法制的建立不是要囚系暗害这种自由，而是必须保护和尊重这种自由。毫无疑问，这是邵飘萍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法制关系的杰出思考和逻辑贡献。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理想的艰巨性和光荣性。在回顾西方各国为争取新闻自由而血战的过程时，他说，这“乃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的历史”。

邵飘萍之所以非常了不起，是因为他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只身向专制的北洋政府发起了攻击。他构想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闻法》，并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大声宣读和讲解。邵飘萍认为，中国的《新闻法》至少要包含下列内容：“（一）关于因新闻纸上记载评论所发生之案件，只适新闻纸法（特别法）；（二）创办新闻机关只须呈报备案，无待于批准，且不纳保证金；（三）对于新闻记者不得有体刑，惟记者之个人行为不在此限；（四）不得没收新闻机关之财产；（五）罚金不得过二百元；（六）停止发行不得过一星期；（七）严禁

揭发个人隐私（如有挟嫌诬陷之实据，以个人行为论）；（八）对于记者之传唤须用法律上严格之手续，不得非法逮捕及羁押；（九）非曾要求更正而不更正者，不得告诉新闻纸之责任，因更正而即消灭；（十）对于被雇之记者，与以生活之切实的保障。此外，如邮费、电费之减轻，邮电检查之废止（此法律以外问题），凡足以为新闻事业发达之障碍者，皆当设法解决之。”

邵飘萍的忧急是溢于言表的。尽管他忽略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过多地纠缠在了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处罚、惩治的细微末节之上，尽管他忽略了法律的最根本的两手——保护与惩处并重，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他的拳拳赤子之心表露无遗。拘泥于备案待批、保证金、处罚金额、停刊时间等具体细节上，也实属邵飘萍无奈。那个时代，专制政府就是在这些方面向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大打出手，恣意惩罚，弄得报馆束手无策，搞得记者动辄得咎，人人自危。

在邵飘萍授课的新闻学研究会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学生，他就是毛泽东。

191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走出湖南，奔向了北京。他是与其他青年学生一起，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了，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阶级和中国政治问题。在同乡兼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结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李大钊收留毛泽东并让他当上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秋天，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了，对此早有兴趣的毛泽东立即报名参加，就这样，毛泽东成了邵飘萍的学生。

在邵飘萍遇害十年之后的1936年，在陕北的土窑洞中，具有“诸葛山人”派头的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求学生涯。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

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毛泽东看来是邵飘萍的一个好学生，他不仅在新闻学研究会的课堂上认真听讲，仔细笔记。课余时间，还常到邵飘萍的住处拜访，交流学习体会，探讨时局政治。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回忆：

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为邵师娘。

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也有类似回忆。她说：

飘萍每日工作非常忙碌，经常有人来看他，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毛主席还是个青年学生，飘萍亲切地称他为“小毛”。

我在羊皮市住家时，毛主席来过好几次。来的时间总是在午饭以后，飘萍在午睡，他就在客厅间等候，一个人坐着，不大说话。……当我去接电话或打电话碰见他时，他总是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鞠躬致意。

连毛泽东自己也坦承他是邵飘萍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接见国内新闻界的人士，曾笑谈，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纯属吹牛，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革命离不开宣传和舆论，而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办报和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毛泽东深知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既看重报纸，又身体力行地办报、用报。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目的性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有朝一日，用革命舆论动员群众，反对反革命舆论，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全国政权，实现改朝换代。

毛泽东自京南返长沙不久，就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大声疾呼：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对他的这番评论，自喜自得。五十多年后，直到他逝世前，还对这几句话记忆犹新，倒背如流。

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中国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邵飘萍们遇到的困难和掣肘之多，是可以想象的。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一张发育正常的报纸，主要是靠报纸的发行和刊登的广告谋利，或者说，广告是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邵飘萍作为报馆的当家人，既要在编采业务方面倾尽全力，编新闻、写评论，又要在招揽广告上下一番功夫。他甚至总结了提高广告吸引力的种种办法：“一、图案；二、故意弄错，使看报的人注意，来改正他的错处，于是大家均注目他的报纸；三、用诗歌以广招徕；四、用刺激性强烈的题目或是很危险的话以引人注意；五、新的新闻，就是仿佛是新闻，其实是诱人看广告，不过未看前不知是广告，既及看完后才知是广告。”所有这些，基本上是在“术”的范围之内，有些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看来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邵飘萍也是勉为其难，勉力支撑啊！

于是，便有了“津贴”之说，便有了这种赘附于中国近代各报之上的毒瘤。津贴的分配和发放是这样的，北洋政府参议院、国宪起草委员会、军事善后委员会、财政善后委员会、国民会议筹备处、国政商榷会等六家机构组成“联合办事处”，每月从财政部领取两万元，作为全国一百二十五家报社、通讯社的津贴。津贴按超等、最要、次要、普通四个等级发放，等级越高，津贴越多。其中超等者有《东方时报》《顺天时报》《益世报》《黄报》《社会日报》《京报》等；最要者有《世界日报》《北京日报》《京津时报》《京津晚报》《世界晚报》《甲寅》周刊、《中美晚报》、神州通信社、国闻通信社等；次要者有《大陆晚报》《华晚报》、华英协和通信社等。

在北洋政府看来，我发了津贴，你们就要对政府客气一点，揭露性、批评性报道要尽量控制，政府打了招呼、不宜公开的新闻，报纸和通讯社就应

该扣压、不发，为政府讳、为首脑讳。确实有不少报纸，甘为豢养，领了津贴之后，摇尾乞怜，顺从得很，听话得很。要津贴、争津贴甚至成了一种报界的“潜规则”。

邵飘萍对这种行径可谓深恶痛绝，公开在报纸上揭露拿津贴、做走狗的人和事。1922年8月4日，《京报》就报道了“报界代表”汪立元等十人为“报纸津贴事谒见元首”。报道同时向公众指出，北京竟有二十八家报纸、九家通讯社靠津贴活着！之后，邵飘萍又在其所著的《新闻学总论》中引征了“中国报章类纂社”1925年的调查结果，指出：本年度北京的七十三家新闻机构中，竟有六十余家是靠津贴在讨生活。邵飘萍态度鲜明地予以痛斥：

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我国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即不依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朝秦暮楚，惟以津贴为向背。此则传单印刷物耳，并不能认为新闻纸，与世界新闻事业不啻背道而驰。

邵飘萍这样义愤填膺于津贴事，并不表明《京报》不拿津贴。前文已叙，邵飘萍不但拿津贴，而且拿的是“超等”。在津贴一事上，邵飘萍采取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立场：津贴照拿，新闻照发。一手拿津贴，一手照骂娘。这也许是邵飘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等之策。报纸要生存，没钱不行；办报要以事实为依据，这是报人的职业道德。邵飘萍在这两者之间痛苦挣扎，他的“难言之隐”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邵飘萍不仅收“正常”津贴，也收临时津贴。据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李恩浩回忆，他主持财政部时，每月除送胡政之、林白水的《新社会报》三四百元外，也给邵飘萍送过两笔数目相当大的钱，“因为他是有名的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

邵飘萍不仅收政府的钱，也收其他军阀和官僚的钱。冯玉祥就多次给过他钱。某次长也有“选举费若干”，送到了邵飘萍手中。

招忌于新闻界同行后，有些报纸甚至造谣或暗示，邵飘萍与“苏俄宣传部门有联系”、“接受广东革命政府津贴”、“向孙中山先生亲信索要万元以包办报界”等。自然，这些传言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攻自破、不言自明了。

有学者论曰：真正的自由主义报人，不管出于何种“策略”考虑，都决不

能收受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甚至带有这两种色彩的“朋友”以“个人”名义给予的任何“津贴”！实际上，这种经验教训后来即被《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者所牢牢记取，并订立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

邵飘萍是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邵飘萍与这位“胡子”军阀的过节，要从冯玉祥、郭松龄谈起。

20世纪20年代初，邵飘萍结识冯玉祥后，过从较密，冯玉祥还多次解囊，资助《京报》。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从江苏、福建进攻浙江军阀卢永祥，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借口，率军向热河、山海关挺进，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空虚之际，冯玉祥乘机起事。10月21日，冯玉祥率部昼夜行军，从热河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史称“北京政变”。

政变发生的当天下午，邵飘萍就赶到北苑采访了冯玉祥。对于邵飘萍提出的各类问题，冯玉祥都给予了详细答复，《京报》抢了个独家大新闻。24日，《京报》以第二版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刊出了《冯检阅使与本社邵君谈话》，访问记的标题甚至都是邵飘萍手书的，同时还配发了冯玉祥的大幅照片。第三版还密集刊出了《冯军驻京后之京畿治安》《冯玉祥等主张和平通电》《冯检阅使之布告》等稿件，对冯玉祥的“政变”是持赞赏和肯定态度的。

张作霖可是从内心里恼怒了冯玉祥和邵飘萍。他本意是想借这次直奉大战，杀进关内，占领北京，自己掌权执政。冯玉祥的这一横炮，打得他措手不及，邵飘萍的鼓动，又使冯声誉日隆，张作霖武力攻占北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冯玉祥通电全国，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冯玉祥听从邵飘萍的建议，将自己的部队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邵飘萍在《京报》上撰文，极力赞扬国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称赞他们“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

国家不可一日无人管理。各方无奈，又抬出了段祺瑞，让他充当临时执政。“段执政”、“执政府”之说便由此而来。

邵飘萍看透了段祺瑞的军阀本质，对执政府及段祺瑞冷嘲热讽，毫不留情。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聘邵飘萍为善后会议顾问，邵飘萍回信申明，“顾问名义，责任重大，愧不敢承，应请收回成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

称段氏是“武夫拥戴，授以屠刀”，“善后会议”则“因不无怀疑之点，未敢积极歌颂之”。

最让张作霖耿耿于怀的是，1925年年底，邵飘萍对起兵倒戈的奉系旧部郭松龄的支持。

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功显赫，为奉军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郭松龄是个新派人物，对军阀部队内部一些陈规陋习非常看不惯，多次倡言要进行军队改革，惹得张作霖和他的旧将十分不满。郭松龄也渐生反意。当邵飘萍得知郭松龄有意倒戈反张时，便大力支持，在冯玉祥、郭松龄之间穿针引线，他甚至冒着极大的风险，让自己的夫人祝文秀化装前往京津、东北等地，为冯、郭传递密件。

1925年11月29日，郭松龄率部占领绥中，30日改称东北国民军总司令。12月3日，大败退守于兴城的奉军张作相部，向张作霖的老巢奉天节节逼近。

邵飘萍及《京报》欢欣鼓舞，消息、文章不断，他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这些言论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已经被郭松龄搞得焦头烂额的张作霖，极希望邵飘萍“闭嘴”，不再给剿郭战事节外生枝。他即刻给邵飘萍汇去了三十万元，用意不点自明，封口而已。这笔巨款，比当年袁世凯收买梁启超还多出十万元，创下了军阀收买舆论的新纪录。这笔钱，也足够《京报》十几年的用度。然而，邵飘萍却不买账，当即将三十万元悉数退回。他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后来，张作霖不惜勾结日本关东军，剿杀了郭部的反抗，枪毙了郭松龄。

其实，邵飘萍对张作霖的厌恶由来已久。1918年2月，无法无天的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就撰文《张作霖自由行动》，予以无情抨击：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反复将张作霖如此奚落，张大帅忍无可忍了。1926年3月底，直奉联军进占天津。在张作霖、吴佩孚即刻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攻占北京。进京后，先要逮捕一批进步人士和革命分子，尤其是对邵飘萍，一定要杀掉。

邵飘萍对张作霖的“密杀令”也有耳闻。4月18日，在张作霖的部队打进北京之前，他将《京报》事务托给夫人汤修慧主持，自己则躲进了东交民巷的俄国驻华大使馆，并在租界内的六国饭店开了个房间，暂且栖身。邵飘萍已记不清他这是第几次因言获罪、避走逃难了。但他断没有想到这次真的是一个劫数。

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刊登《飘萍启事》，皮里阳秋、正话反说地为自己开脱和辩解：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时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这是邵飘萍生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的绝笔。两天后，邵飘萍被捕了。

邵飘萍躲在租界内的六国饭店，军阀不敢擅自闯入抓人，着急万分。此时，他们想出了一个阴招。暗中收买了与邵飘萍相识的报人张翰举，答应他只要将邵飘萍找到并骗出租界，就给他两万大洋，外加造币厂厂长一职。在金钱的诱惑下，张翰举甘愿出卖人格和友情。他进入租界内四处寻找，终于在六国

饭店见到了邵飘萍。张翰举对邵飘萍说，张作霖奉系军阀顾虑外人和舆论的力量，并不敢对邵飘萍动手，而且他已与张学良取得默契，只要邵飘萍改弦更张，不仅其人身安全可以保证，《京报》也可以照常出版。

毕竟在六国饭店躲了六七天了，《京报》馆的一大摊子事也的确需要他处理。这天傍晚，他打电话给张翰举，张翰举以“人格”担保邵飘萍不会出事。邵飘萍听信了张翰举的允诺，24日晚上贸然走出六国饭店，打道回府。午夜时分，在处理完报务和家务之后，准备返回六国饭店时，在魏染胡同南口，邵飘萍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北洋侦缉队包围了。邵飘萍就这样遭了暗算。

1926年4月25日，《北京晚报》率先刊登了“京报馆被封”、“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新闻。北京各界八方联络，全力营救。杨度等十三人前往老石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为邵飘萍求情。张学良毫不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害青年，罪在不赦，碍难做主。”

杨度等人又恳请军方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免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4月26日凌晨一时，警察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当场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刑场。临行前，他向监刑官拱手道别，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仰望天空，哈哈大笑。笑声还未停止，刽子手已扣动扳机，邵飘萍匍然扑地，一枪毙命。

邵飘萍的遗体被收敛在一口薄棺材中，浮埋于崇文门外义冢墓地，墓前插着一块长条木牌作记，上书“邵飘萍墓”。4月27日，邵飘萍的亲属、同乡、好友，一起来到崇文门外二郎庙，找到了邵飘萍的墓地。他们打开棺盖，只见邵

飘萍浑身是血，头发蓬乱，双目怒视。子弹从后脑进，从脸部左颊穿出，惨不忍睹。汤修慧和祝文秀见状当即晕厥，众人大恸。

冯玉祥得知邵飘萍遇害，顿时失声痛哭，他大呼“振青是为我而死”。直到1928年7月，他对北平新闻界发表演说，还赞扬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支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民国资深记者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主要参考文献

林溪声、张耐冬：《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年11月第一版。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4月第一版。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2002年6月第一版。

史量才

史量才是被暗枪射杀的。所以，他的死，更具有悲剧意味。

追杀他的流氓必欲置他于死地，打穿了汽车轮胎，从车上追到车下，从公路追到村庄，像猛兽捕杀猎物，将史量才打死在村头干涸的水塘里……

史量才死前几年，独裁军阀处决邵飘萍，还假借公权力的名义，由地方警察厅解到督战执法处，搞了假模假式的宣判。邵飘萍死后百日，轮到戕害林白水时，政府的宣判便免掉了，北京警备司令部一纸命令，便送林白水去了天桥刑场。这一次，居然什么都不用了。雇用了几个杀手，就半道动手，劫杀了一代报人史量才，致使六十年的《申报》自此一蹶不振，终至萧条。

专制一旦走向极端，没有人能阻止手握权柄者由人类变成魔鬼。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杨板桥村，原名史家修。

史量才的父亲中年得子，对这个老生子倍加呵护。

史父在松江泗泾镇做生意，便将史量才带在身边，让他早早入塾发蒙，期待有一天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史量才在松江师从宿儒戴葵臣，学业大进。老师说他聪明伶俐，读过的书过目不忘。松江开童子试，史量才中了秀才。没想到有人揭发他“冒籍”考试，就是江宁的户口跑到松江应试。这可是有违朝廷规例的大事。主考官张榜宣示，取消了史量才的秀才资格。这次羞辱，使史量才深受刺激。自此他对科举功名失去信心，对经世新学心向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也正大肆鼓动变法图存，去科举，育新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在康梁变法思想的鼓动下，

1901年，史量才毅然报考了浙江三大新式学堂之一的杭州蚕学馆。这实际上是一所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职业技术学校，学校设在西湖边上的怡贤亲王祠关帝庙旧址，附有三十亩桑园，课程设有理化、动植物、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象、土壤、养蚕、栽桑、制丝、显微镜检查等十余门，连同实习两年毕业。史量才是杭州蚕学馆的第四届学生。新学堂学以致用的教学方式让他耳目一新，身心得到了极大解放。

1903年，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决心到上海闯荡一番，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价值。很快，他便被南市大东门王氏育才私塾的校长王培孙聘为教习。史量才的出色工作，不胫而走，周围各色学校的校长们，纷纷前来聘他去教书。金山首富、明强小学校长黄公续爱才心切，决心挖走史量才为自己所用，他出手阔绰，一下子赠送给了史量才两千元庄票。史量才用这笔钱盘下了一所旧学校，自办了上海女子蚕业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女子专科职业学校。这一年，史量才只有二十四岁。

张謇，江苏海门人，随祖迁居南通，清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戊戌变法后，他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积极追随者。张謇重教育，重实业，广募社会资金，创办了男女师范学校、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图书馆、博物苑等文化事业，还设立了纱厂、垦牧公司、轮船公司、铁冶公司等企业。史量才这一时期与张謇过从甚密，追随左右。唐才常、郑孝胥、张謇的许多革命活动，如自立会、立宪公会等，史量才都积极参加，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8年，张謇还破例擢拔史量才兼任了保皇党报纸《时报》的主编。包天笑回忆说：“史量才办事有决断，各方咸器重，张謇尤为倚重。史量才有今日，固有其才气志气之足以自展，张四（謇）之功不可磨灭。浙江汤蛰仙二群奉为祭酒，张四对于史量才则倾倒备至。”一次，在有“民国助产婆”之誉的赵竹君家惜阴堂议事时，曾有人问张謇为何如此器重史家修，张謇回答说：“我是量才录用。”史家修闻听此言，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史量才。

史量才口才极佳，思路敏捷。他不甘居人下，不想碌碌无为了此一生。他最想实现的是实业救国，促进中国的文明和富强。史量才胸有韬略，而身无分文，他最缺的是创业的资金。

就在这窘迫之际，史量才意外地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上海四马路上有一个著名妓女叫沈慧芝，与大姐沈灵芝、二姐沈采芝并

称青楼三朵花。三姐妹中，数老小沈慧芝聪慧伶俐，琴技棋艺高超，堪称色艺双绝。最初，丹徒人陶保俊相中了沈慧芝。陶保俊是革命党人，正秘密策划武昌等地的起义。他许诺，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回来重金赎娶沈慧芝。陶保俊走后，沈慧芝又结识了泗泾人钱有石和他的同乡史量才。钱家有良田三千亩，米店若干家，他十分迷恋沈慧芝，也许下了重金赎娶的诺言。可沈慧芝瞩目的却是风流倜傥、腹有诗书的史量才。可碍于情面，两人都没有表白。一日，自京城里来了一个贝勒，他对沈慧芝这样的江南才妓一见钟情，当即买下，带回了京城。合该慧芝命薄，回京不久，贝勒便急病暴亡。沈慧芝忍受不了王府福晋、格格们的指责、辱骂，寻了一个夜晚逃离京城，又回到了上海四马路迎春坊。没多久，武昌首义成功，革命风靡全国。陶保俊也春风得意，荣归上海。一天晚上，上海都督陈其美邀陶保俊赴宴。临行之前，陶保俊将自己秘密携带的巨额军饷交沈慧芝收藏。陶保俊乘马车刚刚驶入都督府小东门海防厅大院，便遭到伏击，陶保俊当场被乱枪打死。闻听噩耗，沈慧芝惊恐不已，惶惶不可终日。可巧，此时史量才来找沈慧芝，慧芝便将陶保俊托她保管巨额军饷一事合盘说出。她说，陶保俊已死，这笔钱如何处置？史量才安慰她：“若有人来问，你就把钱交出去。没人问，你就不要声张。放心好了，我会保护你的安全。”风头过后，沈慧芝带着巨款委身于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早已结婚，夫人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他只好将沈慧芝纳为外室，更名沈秋水，喻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之意。美女、金钱兼而得之，可真让上海人妒羨不已。

辛亥义旗一树，全国纷纷响应。上海立宪派审时度势，迅速由变法转向了革命。史量才甚至将自己的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借给陈其美，作勘察的据点。上海光复后，史量才被革命政府委以重任，出任了上海海关清理处长、松江盐政局长之职。这两个官职都是肥缺，尤其是松江盐政局长，相当于清廷松江盐运副使，属四品官衔。可史量才憎爱分明、是非两清，他特别看不惯官场中尔虞我诈、暗中交易、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这些恶习。每遇此类事情，他都会火冒三丈，拍桌子训斥，说一番嫉恶如仇的刺人话语，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史量才急于抽身而退，去兴办实业，走自己喜欢的实业救国之路，造福百姓，造福桑梓。

《申报》给了他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申报》是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

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初为隔日出一张，自第五号（1872年5月7日）起，改为日出一张。《申报》的创办人是英国人美查兄弟。这英国人美查兄弟是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开放潮，涌进中国做生意的。他们把广袤的中国大地当做了淘金者的乐园，兄弟二人贩茶叶，倒布匹，什么盈利干什么。这一年，美查兄弟倒腾生意赔了钱，血本无还。有人便劝他们投资报纸，伺机翻本。美查兄弟看到了办报的巨大商机，便着手筹备。他们毕竟在中国生活多年，知道这报纸是办给中国人看的，便聘用了大量中国人做主编，做访员，并派出骨干力量赴香港，学习报纸的管理和经营，了解报馆的架构和运行。他们又毕竟是来自工业化的英国，对现代报纸新闻立报的原则了然于心，每逢重大事件，必全力以赴，充分报道。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人杀了琉球人及日本人，出兵大举进攻台湾土著人居住的山寨，酿成突发流血事件。美查听说后，亲自出面探访消息，每天以真实报道载于报章，让读者深知新闻的作用和意义，《申报》由此大受欢迎，日销数千张。创刊一年，《申报》就全面超越了早它十一年出版的《上海新报》。

生意人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办报挣了钱后，美查兄弟便四处出击，茶叶生意照做，还出画报，编图书，办工厂，一时搞得红红火火。1889年，美查兄弟步入老境，虽然财富日隆，事业正兴，两人还是决定回国养老。哥哥安纳斯聪·美查欣慰地说：“我之心力已瘁矣，我之名誉已扬矣。我以申报所获之利，添设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已次第成功。”《申报》初创时，美查兄弟与三个朋友各入股四百两白银，共计一千六百两。回国盘点之际，美查兄弟的四百两已增值为两千两。美查兄弟将在华所有资产整合为“美查有限公司”，以七万五千两的价格，转让给了在《申报》做了二十五年会计的勤恳员工席子眉。1897年12月，席子眉病逝，《申报》资产由其弟席子佩继承。

白驹过隙。民国初定之时，《申报》已走过了四十年历程，席子佩勉强维持，步履艰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有着强烈的人世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入世观的集中体现。体现“有责”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说话，表达思想，所谓“文章报国”是也。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中说话，是要冒极大风险的，说不好，就会“因言获罪”。美查兄弟办《申报》是为了挣钱的，他们可不想因

为报纸的胡言乱语而让自己血本无还，因而，办报之初，他们就在言论上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申报》的历任主笔，尤兢兢于报纸评论的字句之间，凡撰述稍涉激烈的，或报道略触忌讳的，必在审稿、阅版样时一概删除。致使世纪之交，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申报》仍是一副四平八稳、毫无生气的老面孔。而另一方面，受美查兄弟注重异常事件、抢发重大新闻的英国办报原则的影响，又不加分析、不讲立场地搞新闻噱头，抢独家报道。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不断有独立、光复的消息传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各报充分报道，《申报》也刊发了不少此类新闻。然而，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把他视为一根救命的稻草。袁世凯派冯国璋率军南下，攻克汉阳，革命面临严重局面，举国关注。《申报》只抢新闻，不讲道义，居然印发“号外”报道汉口沦陷之事，而且标题字号巨大，并以红色圈之，张贴于申报馆门口及附近大街小巷。正义的群众顿时愤慨无比，冲进报馆大门，质问此举何意。《申报》至此还不明白他们错在哪里，还以为是群众怀疑汉口沦陷消息的真实性，居然拿出电报稿给众人阅看，以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愤怒的群众对《申报》为敌张目，动摇人心，不辨是非的愚蠢行为怒不可遏，懒得理会他们的解释，捣毁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借以泄愤。

这样的《申报》当然不受读者欢迎和市场认可。《申报》的发行量由每日一万份左右，跌至不足七千份，让出了上海报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一跃成为最受上海市民追捧的报纸。

1912年，席子佩下决心抽身而退了。他将《申报》资产和股份作价后抛盘出售，公告转让。史量才当仁不让，联合张謇、赵竹君、应季中等人，与席子佩商谈接盘之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十二万元买断《申报》，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1912年9月23日签订转让合同，1912年10月22日正式移交，史量才走马上任，《申报》历史就此翻开崭新一页。

史量才入主《申报》时只有三十二岁，而这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报纸的历史超过了史量才的年龄，这让他有了一种诚惶诚恐之感，他踌躇满志，欲百废待兴，让《申报》在他手中有一个质的飞跃和发展。然而，上任后的第一个信息，就兜头给史量才泼了一瓢冷水：报馆里居然没有一套完整的《申报》！这让史量才惊慌不已。这无疑于黑瞎子掰棒子，干一张丢一张，《申报》的历史从何说起？《申报》的资料如何查询？这怪不得美查兄

弟。人家本来就是将报纸当产业来经营的，只要挣钱，只要盈利，其他的于他们何干呢？报纸的史料、历史的资料、文化的积淀，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始作俑者美查兄弟开了这样一个坏头，接续的席子眉、席子佩孜孜于会计账簿，勉强维持，于报纸的文化建设和传统竟毫无建树。史量才立即展开抢救工作，他连续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重金收购创刊以来的全套《申报》。史量才的诚心之举，还真打动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沪南的张仲照先生。他自《申报》问世那日起，整整订阅、收藏了四十年的《申报》，仅缺七张。老人对自己的收藏和坚守十分欣慰和自豪，“积四十年之劬，而中外之治忽兴亡、文物之源留迁变胥於焉，如指诸掌，亦可谓大观也已”。张仲照对《申报》有着极高的评价，对自己这份四十年的收藏殷忧在心：“是报记载详备，立说纯正。日月无尽报亦无尽，吾老矣，不幸一旦淹忽，儿孙辈安必持之恒藏之慎，与其遣散放失，贻他日忧，孰若举而归之”，“会申报总理史量才君访求全份申报，久久海内外无应者纂切余殊有所勒，弗忍恕焉……乃慨然诺。”张仲照老先生慷慨捐出了自己的所有《申报》，且分文不取。这让史量才感动不已。在装订这些莘莘大观的《申报》时，在首页特附了张仲照的一篇文章，并印上了张老先生的照片。

史量才非报人出身，于新闻一行起初只是大致了解。但他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却是高人一筹，这种才能和敏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史量才明白，报纸要生存，首先经营要有起色，要能挣得出钱来，离开了这一条，任何高谈阔论都无济于事。因而，网罗经营人才，便是史量才接掌《申报》之后的第二个大动作。

他先是将他在上海女子蚕业学校的老员工王宪钦委任为广告部主任，又提携家中仆人董炎卿为庶务部（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另聘冯子培为会计部主任，许灿庚为发行部主任。报纸经营、管理方面的各方大员基本配齐之后，史量才深知开拓经营领域的战略意义。一个好的经理人才，无疑是他最重要的左膀右臂。史量才经人介绍，又延聘了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太仓籍能人张竹平为经理。张竹平果然不负众望，迅速解决了制约报纸发展的财源问题。他设立了一个广告科，分为内勤外勤。内勤人员要为广告客户出谋划策，设计广告刊登的方式、图案，撰写广告文字说明。所有这些，需做到广告客户最终满意为止。外勤人员则走出报馆，主动上门，到一家家商店、公司、工厂，服务、登记、拉广告。这些举措，不仅开风气之先，也大大改变了《申报》皇帝女儿不愁嫁，

在家守株待兔、坐等广告上门的被动局面，《申报》广告的刊登局面一时大为改观。

夯实了基础，打牢了根基，史量才将眼光转向了办报。史量才深知办报之难不亚于任何行业，当局要钳制，国人要非议。然而，他更认定“此非寻常业务，是庄严伟大公共之事业，需要抱大无畏之精神、抱大牺牲之决心”。

史量才毕竟对办报和新闻略知一二。他明白，一个好的总编辑是报纸成功的一半。他以极大的精力物色《申报》总编辑。

史量才首先想到了辛亥革命前在保皇党报纸《时报》任编辑的陈景韩。陈景韩早年留学日本，骑一辆自行车在日本大街小巷四处狂奔，放浪不羁。辛亥革命前回国后，率先剪了发，着西装，一副特立独行的派头。他性情怪癖，少言寡语，在《时报》任编辑时，业余时间爱写小说，并喜爱摄影、射击这些当年国人还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方式，陈景韩还痴迷于麻将，从报馆下了夜班，可以整夜在牌桌上砌垒长城而不知疲累。正是这样一个怪异之人，却“视新闻恍若第二生命”。他在《时报》上首创“时评”体裁，文章短小精悍，直指时弊，刊登后读者为之欢呼，各报也竞相仿效。史量才接手《申报》之时，陈景韩已是《时报》栋梁，独挡一面，无人可以替代。史量才动了高薪挖墙角的心思，他找到陈景韩说，愿出高于《时报》一倍的薪酬，聘陈景韩为《申报》总编辑。这大大出乎陈景韩的意料。以《申报》第一大报的身份和地位，不要说高薪，就是从《时报》平移过来，也是陈景韩求之不得的好事。陈景韩当即应允，到《申报》上任去了。而《时报》老板狄子平却火冒三丈，大骂史量才不仗义，怨气冲天，几乎要与史量才动拳头。无奈一个愿聘，一个愿走，你狄子平留得住身子留不住心，气哼哼骂了几句之后，也只好认了。

记者是报纸的最大财富，新闻是立报的根本所在。史量才不惜成本，向国内各大主要城市派出了特派记者，进而在各大国首都，如伦敦、巴黎、华盛顿、日内瓦、罗马、柏林、东京等地，聘了特约记者，以提高《申报》新闻的覆盖面和传播范围。在《申报》的特派记者当中，派驻北京的黄远生、邵飘萍，可谓两个佼佼者。

江西人黄远庸（笔名远生），清末进士，后留学日本，推重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竟弃官而去，甘当记者，为采写新闻四处奔走。他是清末民初学历最高的记者，有报业奇才之称，他还是梁启超门下“三少年”之《少年中国

周刊》的创办者之一，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新闻记者的祖师爷”。他先是被《时报》聘为驻京特约记者，1914年，史量才将黄远生揽于《申报》，成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他的“远生通信”专栏成为《申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时局动荡之际，黄远生没有认清袁世凯的本质，认为只有他能够稳定局势，再造共和。后来袁世凯阴谋称帝，黄远生也稀里糊涂地上了“筹安会”的贼船，担任了鼓吹帝制的《亚细亚报》的总撰述（总主笔）。不久之后，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中，黄远生幡然醒悟，他写了一封《致亚细亚报馆书》，公开声明自己“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宣布与《亚细亚报》脱离关系。

《申报》将黄远生脱离《亚细亚报》的启事用大字号在头版位置连登九天，以示声援。黄远生与袁世凯阵营决裂后，斥袁为“在吾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黄远生担心蛇蝎心肠的袁世凯报复他，便在恢复帝制甚嚣尘上的1915年年底，远走美国，暂避风头。躲在万里之外的北美大陆，黄远生也没逃过这一劫。他是被误杀的。林森领导的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只知黄远生拥袁称帝，助纣为虐，不知黄远生已迷途知返，声明退出了袁世凯阵营。他们以为黄远生赴美，是为袁世凯的帝制派奔走呼号的，于是愤恨不已，派出杀手刘北海，追踪黄远生于旧金山，在1915年12月27日，将黄远生误杀于旧金山湾一小餐馆中。一代杰出的记者之星，就这样早早陨落了。黄远生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黄远生之后，史量才又聘邵飘萍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原名邵振青，笔名飘萍。有朋友对他说，“飘萍”不吉利，有轻浮之意。邵飘萍断然回答：“人生如断梗飘萍，有何不可？”他正是一片飘萍，沉浮于人生的大海之中。

《申报》上的“飘萍通信”，很快便打响了牌子，赢得了江南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们说，邵飘萍的通信，不仅有京城重大时事新闻的报道，更有各派各界明争暗斗趋势的分析与预判。而邵飘萍的这些分析和预判，事后往往证明是准确的。这是邵飘萍对京城各政治势力了如指掌、长期研习的结果。邵飘萍在报道国会中研究系、交通系两派之暗潮时，辛辣地说：“竞争者云，岂政见之谓哉！位置而已，饭碗而已！论者以为数年以来之政潮，无一非人的问题所引起，愚以为名词太雅，简而言之，曰‘饭碗’耳。”一语中的，痛快至极。

1918年秋，邵飘萍下决心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京报》，才与史量才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史量才手下的优秀记者，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临危不惧，出色完成“临城劫车案”报道的康通一；有被特务暗杀的进步记者金华亭；有专门采写“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钱华；有《申报》驻日本通讯记者、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等。

史量才是一个不畏风险、不惧挑战，勇于争斗、敢于胜利的豪爽之人。其实，自从他执掌《申报》之后，不是他敢不敢于迎接挑战的问题，而是挑战和风险每每找上门来，逼着他去应对。1915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紧锣密鼓，自然想借助舆论为他推波助澜。他当然看重《申报》的地位和影响，于是派心腹携十五万元巨款赴沪游说史量才。此时，史量才正与《申报》原掌门席子佩打着一场巨额的《申报》财产纠纷官司，手头拮据，急等钱用。可史量才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于第二天，即1915年9月3日，便在《申报》上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丑恶行径。袁世凯一意孤行，八方聒噪，终于圆了他的皇帝梦，并于1916年1月1日改元“洪宪元年”。《申报》不听招呼，不惧淫威，照样用民国年号。上海市政当局下了死命令，不改年号就“禁止发卖，并报纸没收也”。史量才在头版刊发《申报启事》：“接到警察厅通知，如仍沿用民国五年，即照报纸条行严行取缔，停止邮递。”无奈之下，《申报》改用西历，将“洪宪元年”四个小字印在西历之后，这也足以让史量才羞愤难当了。当短命的洪宪皇帝垮台后，史量才长舒了一口气，迅速恢复了报纸的民国年号。

袁世凯倒台之际，史量才做出了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斥巨资修建申报大楼。这不是财富的炫耀，更不是虚荣要面子，而是宣示了史量才做百年报业、创现代企业的决心和信心。

1918年“双十节”，在上海汉口路、望平街拐角处，占地七百三十六平方米，楼高五层，建筑面积三千六百八十平方米的申报大厦投入使用了。

这是一座典雅、庄重的欧式建筑，一楼气派的营业大厅，二楼整洁明亮的编辑部，三楼设备齐全的排字房，以及餐厅、弹子房、卫生间、淋浴间等，都堪称一流，方便舒适。这算得当时世界一流的报馆大楼。一时成了中国报业的门面和代表，各界人士，海内外同行纷纷前来观摩、祝贺。

世界报业泰斗，英国《每日邮报》创办人、《泰晤士报》发行人北岩勋爵，看过申报整幢大楼后，发表观感：“……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百闻不如一见’，此次广观贵国情形，对于

贵馆方面深抱乐观。”被誉为“新闻学者之父”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业大会主席威廉博士则说：“贵馆一切设备皆甚壮观而有精神，引起一种对于报界之荣光……此次游历各国虽多佳处，但报馆能如贵馆者不多觐。”他还说，“新闻之责任至重大，但当以谋人民之幸福为第一要件，鄙人在美即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门前勒石铭之，此愿与中国报界人士共勉之。”美国新闻学家、新闻出版协会主席格拉士侧身报界四十余载，他说：“列邦报纸亦多能有独立精神不受政治潮流之浸润与打击。如是则心力专一，得惟人民之幸福是谋。故深虑贵国报界亦莫不如是……今见贵馆设备完善而富进取之心。”《泰晤士报》记者麦高森参观后感慨地说：“予当敬祝贵报成效卓著，不特在中国堪称第一大报，即于世界似贵报之规模殊不多见。”

1921年10月10日，在申报大厦落成三周年之际，史量才竟然接到了时任美国总统、且做了大半辈子记者的哈定先生的贺电：“《申报》乃中国报纸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于全国”。

史量才对各界的热情赞誉诚恳作答，不断表露心志。他对威廉博士说：“今世界多事之秋，报界之责任日益重大。深愿聆听博士清教，俾吾人更知何以负责而为世界服务也。”他对格拉士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今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在各界专家、学者、朋友们的鼓励下，史量才更加坚定了他“不偏不倚，为民喉舌，言论自由”的办报方针。他接手《申报》的最大贡献，就是一步步地将一张保守、平庸的老派报纸，改造成了独立、自由的，充满着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现代报纸。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所有报纸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史量才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日记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纪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纪载而已也，而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善而相从。盖历史本为人类进化之写真，此则写真之程度，且更超于陈史之上，而其所以纪载行迹，留范后人者，又与陈史相同。且陈史以研究发扬之责，属之

以后人；此则于纪载之际，即同尽研究发扬之能事。故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矣。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在中国访问考察时，曾向中国民间报人提问：“你们中国的报纸除经济因素外，最尴尬的是什么？”史量才当即作答：“编辑方面，以消息为最难抉择，盖今日之新闻界，尚少忠诚之通信员也。”报业先贤们是在怎样一片荒芜的新闻土壤上，建造中国的现代新闻大厦的？他们遇到的艰难困苦，是我们今天的报人和传媒人士无法想象的。试问，对于消息的真伪都无法判断，你该用多大的勇气去取舍稿件啊！正是史量才们的努力，正是他们的披荆斩棘，为我们打通了走向现代新闻事业的康庄大道。

言论是报纸的旗帜。《申报》的“社评”、“时评”在史量才的手中日趋尖锐、鲜明。“五四”运动时期，《申报》是率先而持久报道和支持学生运动的大报之一。它的“时评”和由此阐发的价值观念，已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1919年5月7日，《申报》在《解散大学之无识》的评论中愤然写道：

民气当愤激之时，不能保无越分之举，在位者苟能善用其气，而范围之，则国家兴盛之基，即在于此。若欲消灭，不但横溢而愈盛，且于国家本原大有所损焉。此次北京之事，决非发始者之本意，政府中人苟能平心静气以处置之，断不至因一时之激触，而有解散大学以军法处置学生之说。何则？事有轻重，法有界限，不能径情而直行也。苟其不然，后祸尚有穷期哉？政府其深思之。

发表此番评论的第二天，《申报》又在《北京之示威与教育》中再发激愤之言：

北京政府苟以此示威之举，而摧残教育，是诚政府自杀中国之策。……毁国家之根本，以与一二人报仇泄恨，岂尚得谓有国家观念之政府哉！国人必共弃之矣！

正是这种对新闻真实性的不懈追求，对“言论自由”的一以贯之的崇尚，

令史量才以勇敢无畏的精神，严词拒绝了国民政府向《申报》馆派遣新闻检查员的恶劣之举。这在当时国内报纸中，是惟一一家没有新闻检查员的报馆。当然，以国民政府钳制舆论、限制新闻自由的执政本意，它也不会允许任何一张报纸游离于它的控制之外，《申报》也同样必须在印刷前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机构审查、通过。有几次，某些稿件未获通过，《申报》或因坚持己见，或因时间实在来不及，干脆在报纸上开了“天窗”。一张出版了半个多世纪的顶级大报，经常在报纸上开“天窗”，这种无言的抗议究竟是令谁难堪，读者和明眼人想必是心知肚明的。

招致史量才杀身之祸的，是他与蒋介石的过节。一个是秉持自由精神、独立办报的桀骜不驯的民间报人，一个是穷兵黩武、大权独揽的党国要员。这样两个人的价值观必然发生激烈冲突。谈不到一起，坐不到一块，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蒋介石北伐成功，天下一统后，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对报纸的臧否相当在意。他很想讨好各大民间报纸，与报人们形成精神上的契合与默契，为他的统治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民意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对彼此高度认同的精神盟友。而在史量才身上，蒋介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炎培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和黄炎培去南京谈话，交谈甚洽。临别时，史量才握着蒋介石的手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介石立即变了脸色，甚至不悦。此后，他支使陈立夫、陈果夫多方为难《申报》。“百万大军”与“百万读者”竟成了蒋介石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不快。黄炎培认为，在这次谈话中，史量才独立傲岸，睥睨总裁，这正是招致他被狙杀的直接原因。

上海各界知道史量才与蒋介石话不投机后，纷纷出面转圜，希望史蒋二人捐弃前嫌，同归于好。杜月笙甚至亲自斡旋，拉着史量才去庐山面见蒋介石，据说效果都不好。史量才的一位好友劝他：“蒋先生有几百万军队，可不能得罪啊！”史量才凛然答道：“《申报》有百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报纸产业虽属我个人，吾人宁为玉碎。苟且、巧取是可耻的事，我一向是厌恶的。”这样的话，传到蒋介石耳中，会是什么结果呢？这两个个性鲜明之人，纠缠在“百万大军”和“百万读者”之中一争高下，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应该是史量才人生轨迹上的“分水岭”。从这一刻开始，他由被动抵制专制、独裁，转向主动倡导民主、救亡、自由、独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徐铸成对史量才的评价恰如其分：“他和《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走的是交叉路，都以‘九一八’为转折点。”“在此之前，《大公报》对蒋介石和宁国府（国民党南京政府）还是采取讥弹态度，‘九一八’后却开始转向了，而史量才则由保守趋向同情进步，对高压采取不驯服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国家在风雨飘摇中挣扎，上海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敌，上海立即成了全国关注的抗战焦点。史量才指令《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评论，报消息，向上海及全国读者通报信息、表明观点。史量才亲自撰写的评论，言辞之激烈，令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写道：“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我国至此，万难再忍。”他在社评中居然指责政府“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声称民众“绝无再忍让之余地”。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史量才从更深刻的层面考虑救国之道，他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他认为“一党专政”正是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万恶之源。

这一时期的《申报》，将淞沪战争的报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报纸连续发表时评，鼓舞人民的抗敌斗志，如《严重时期国人应有之觉悟》《国家的军队》《抵抗与同情》《御侮与国之先例》《中国出路何在？》等，《申报》甚至向当局发出呼吁，《为十九路军乞援》，还出版发行了《救国通讯》战地特刊。媒体的舆论鼓动作用，在《申报》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史量才还以“毁家纾难”的高尚情怀，不仅在精神上支援抗战，声援国人及军队，而且以实际行动在经济上予以极大援助。在整个淞沪战争期间，《申报》停登所有收入可观的文艺娱乐广告，一日三刊，滚动报道战事动态，免费发布各种爱国捐助启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救济组通告”，一号到十四号，都是在《申报》上无偿刊发的。

史量才作为社会贤达和精英人士的代表，义无反顾地登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他被上海市民公推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他每天安排好《申

报》的出版事宜，便到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秘书处上班。在史量才的宣传鼓动下，上海市民万众一心，慷慨解囊，箪壶浆食以慰抗战勇士，以至设在四川路六十六号的市地方维持会募捐接待站出现了络绎不绝、空前未有的捐献盛况。此上海人民的爱国抗日热忱，为近百年来所未有。

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是史量才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1月31日，在维持会成立大会上，史量才的动员讲话掷地有声：“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住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向前。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不免失地的人，叫义人。义人之国叫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她，谁能奴她。”

从1月31日至5月31日，一百二十二天的时间里，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共召开了七十一一次大会，平均不足两天便开一次，另有十七次理事会，十五次演讲会。会员大会下面是理事会，理事会下设地方后援、交通、粮食、救济、捐款等十个委员会，共有各类工作人员两千多人。这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组织，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和超越了地方政府。

5月5日，在“国联”的所谓调查调解后，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民和政府蒙羞的屈辱协议。5月31日，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悲愤中结束使命，于6月3日举行了闭会仪式。但是，仅仅四天后，上海各界又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地方协会”，仍旧推举史量才为会长。

史量才“自然领袖”的风头，盖过了党国要员。他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伦形象，让蒋介石心中隐隐不快。

“九一八”事变之前，史量才便着手《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他原计划将这一纪念活动延续半年以上，为《申报》的发展再做社会和舆论的准备。可突然而至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打乱了史量才的周密计划。

1931年9月1日，史量才在《申报》上刊发《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首次系统地、全面地重新确定了这张民间报纸的自由主义立场。史量才在指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民主的匮乏、民生的凋敝等的无秩和落后，与专制和独裁政体有着深刻的勾连之后，明确指出：“今后本报以极诚挚之态度，对政府尽舆论之刍蕘，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

当年的12月20日,《申报》刊发了宋庆龄义正辞严的宣言,声称“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上海各报迫于南京政府的压力,噤若寒蝉,不敢见报。史量才以轮值上海各报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报人会议,他会上发问:“孙夫人是国母,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没有她发表言论的阵地?”各报自知理屈,会后纷纷刊发了宋庆龄的宣言,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总理遗嘱的真实面目。

193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正是淞沪抗战紧张激烈之时,史量才深明大义,将自己报纸的纪念活动主动推后。6月之后,上海停战,《申报》的纪念庆祝活动渐次展开。由史量才同意、陶行知撰写的一组系列论“剿匪”的时评,正是作为《申报》自由主义报纸的鲜明立场,刊于《申报》之上的。在其中的《剿匪与造匪》一文中,陶行知愤然斥责说: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谓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沦地狱,是正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反。民安得不反,既民反,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以他反对民主、自由的灵敏嗅觉,嗅出了史量才和《申报》的进步气息。他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罗列《申报》的种种“倒行逆施”:“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批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时评’;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的登载陶行知等人的文章,聘黄炎培任《申报》设计部部长等,都是不利于党国的做法……”蒋介石接到这一秘报后,十分不悦,怒火中烧,他提笔在报告上批上了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

禁止邮递《申报》的决定是秘密执行的。当局自知理亏,不敢大肆声张。史量才却被蒙在鼓里,不知就里。正当他为《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忙碌的时候,却收到了大量外埠读者的来信,声称近期一直没有收到订阅的《申报》,再这样下去,可就要退报了。史量才惊诧不已,报纸天天照常出版、印刷,交送邮局,外埠读者怎么会收不到报纸呢?他一方面派人了解此事,弄清原委,

一方面不惜成本，加印报纸，发动报馆职工将报纸打成包裹，写上地址、姓名，寄往全国各地。邮寄成本一时大幅度提高。

一天，一位好心、正直的邮局职工，化名“史之名”，给史量才写来一封信，告诉他未被邮递的《申报》，都小山似地堆积在邮局的地下室里，一到夜间，便悄悄送往龙华焚烧。史量才这才明白了事情的根底。他急忙指令《申报》驻南京采访部主任秦墨晒疏通此事。秦利用蒋介石行营秘书处老同学的关系，真的见到了“领袖”。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撤换陈彬和与黄炎培，由张蕴和接替总编辑；二、不可再登载陶行知的文章；三、由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工作。史量才接到秦墨晒的电报后，考虑再三，回电表示，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接受，第三条绝不同意。史量才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一定要派员进馆，宁可将报纸停刊！”史量才的强硬态度传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也有所顾忌。他不敢让《申报》这张国内外皆有重大影响的老牌报纸，葬送在他的手上。他同意了史量才的意见，以《申报》更换总编辑为解除邮递禁令的条件。这样，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申报》禁邮历时三十五天，《申报》在办报和经营两方面均损失惨重。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将史量才拉入自己营垒的努力。他曾指示上海市政府，向史量才封官许愿，让他在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和上海战区复兴委员会委员等职位中任选一职。可史量才竟不买蒋介石的账，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禁邮事件之后，史量才竟公开支持由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表示赞同该组织“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更严厉地谴责政府钳制和绞杀言论自由的专制行径。此刻，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决裂，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

六十年，不仅仅是时间的累积，更是责任的肩荷。史量才决心以《申报》一甲子为转折点，带领报纸日臻完善，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发展。1932年11月30日，史量才对《申报》经过精心筹划、认真研究后，破例在报纸的“时评”专栏内，公布了《申报》新的编辑政策，总共八条：

一、在编排方面，务使新闻与广告两相配合，力求明显、醒目。

二、国外通讯，如欧洲、美国、苏联，以及华侨，尤其是日本，务尽多刊载有系统之通讯。

三、国内通讯，力求普遍，于各地方的民生疾苦，政治、经济情况，务求其能有系统的记载，东北失地现状，尤为注意。

四、每周星期一就商业新闻的篇幅，编经济专刊一种，详志一周内国内外经济上的变动，并编制各种重要统计。商业新闻也逐步加以改良，务使其能为大众阅读。

五、自由谈，虽说只是一种副刊，但为调和读者兴趣，关系也很重大。今后刊载文字，务以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

六、《读者》顾问一栏，凡关于政治、经济、法律、职业、婚姻、家庭、教育、农村、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等问题的质疑，都由专家分别作答。

七、本埠增刊亦添刊长篇小说及店员通讯两栏。每周星期日即就增刊篇幅，出版《业余周刊》一种，以引起一般店员、工友、学徒的读报兴趣，灌输以各种常识，并改善其业余生活。

八、添增各种副刊，除上述的经济、业余外，还有电影、建筑、卫生、教育、国货、科学等，亦将次第出版。都随同本报分赠外埠，或仅限于本埠。务使读者能各就所好，获得其所需求的知识 and 资料。

这八条编辑新政策，涵盖了新闻、副刊、专刊、为读者服务多个领域，是史量才改革《申报》诸多设想的集中显现。特别是读者意识的强化，尤其是面向底层读者，为“店员、工友、学徒”等劳动群众设立专栏、专刊，满足读者业余生活和求知需要的办报方针，至今仍有指导和进步意义。今天的读者诸位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是在蒋介石“禁止邮递”事件仅仅三个月、撤换了《申报》总编辑之后的一次改版尝试。仔细阅读之后，你肯定会认为，蒋介石对《申报》的专制和高压毫无效果，《申报》仍在既定的办报道路上无畏前行。

研究史量才和《申报》，便不能不提到《申报》的著名副刊《自由谈》，它甚至是作为《申报》的标志，在中国现代新闻上镌下深深印痕的。

《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创办于1911年8月24日。最初，“自由”的含义不是思想的，而是形式的，即随便谈，率性谈，想怎么谈就怎么谈。在最初几位主编的主持下，“游戏文章”、“海外奇谈”、“诗词”、“讽刺絮语”等，都是《自由谈》的主打文字。1920年，史量才聘周瘦鹃为《自由谈》第五任主编。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主将，文坛巨子，既能编，又能写，史量才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大

胆聘任周瘦鹃的。周瘦鹃一上任，便带来了他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即文字的功能只在愉情，不在革命，更不在宣传。他声称要将《自由谈》办成同人副刊，宗旨是“茶余酒后消遣的趣味主义”。周瘦鹃主持《自由谈》十二年，用稿偏狭，内容单调，以小圈子划线，非“鸳鸯蝴蝶派”不得入围，以至于“陈腐到不太像样”，与“九一八”后全国救亡图存的大环境十分不协调。1932年底，史量才下决心改革《自由谈》，改聘留洋归来的新派青年黎烈文担任《自由谈》的第六任主编。

黎烈文出生于1904年，湖南湘潭人，他身材较矮，壮硕，方脸阔鼻，头发稀疏，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十五岁中学毕业后来上海闯荡，正逢商务印书馆要招聘几名书记员，经史量才家的琴师黄松奔走，得以加入应聘行列，经过多道严格测试，终被录用。黎烈文先从誊抄、整理、校对等基础工作干起，后被提拔为助理编辑。1926年5月，黎烈文赴日本留学，一年后转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五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入哈瓦斯通讯社做翻译。史量才不以年龄、资历取人，大胆选聘了黎烈文掌《自由谈》副刊。史量才要求黎烈文“不要把自由谈办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录”。黎烈文不折不扣地落实史量才的革新思想，在上任伊始的《幕前致辞》中宣称：要“牢牢站定”“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不肯唱几句……或哼几句‘云淡风轻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来勉强大多数的口味。我们认定生活的要求，文艺是应该需要进步的、近代的”。黎烈文除旧布新的主张难能可贵，可他毕竟去国六年，又归来不久，作家不熟，人脉尚浅。他毫不气馁，向自己过去相识的郁达夫、叶圣陶、施蛰存等反复游说，并通过他们向国内文坛大家约稿。黎烈文的妻子严冰之即将临产，为辅佐丈夫的事业，每天坚持为《自由谈》看稿、翻译，也时常动笔写点短文。年底，在生下儿子五天后，严冰之不幸得了产褥热，半个月后撒手西去。黎烈文含悲忍痛，既当爹又当妈，还要编着《自由谈》，为纪念亡妻，他给儿子取名念慈、念之。

一天，郁达夫见到鲁迅时，动员他为《自由谈》写稿。郁达夫说，《自由谈》新换了主编黎烈文，可黎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鲁迅“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鲁迅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未必当真的。鲁迅曾说：“我到上海之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

《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后来，鲁迅听说了黎烈文妻子严冰之的故事；再后来，鲁迅读到了黎烈文悼念妻子的短文《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深为黎烈文的精神所感动，便开始为《自由谈》写稿，那“投枪匕首”般的犀利杂文，为《自由谈》增色不少。鲁迅写给《自由谈》的第一篇文章《观斗》，直斥当局“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足半年的时间，鲁迅竟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鲁迅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自题书名《伪自由书》，这是对当局的又一次嘲讽和抨击：他们倡言的所有“自由”，都是虚伪的、假装的。因为鲁迅的文章，最终是难以在《自由谈》发表了，黎烈文这个热情炽烈的主编，也不得不黯然去职。

立论鲜明，论说有力，干预现实，轰轰烈烈的《自由谈》，让当局感到了极大的不快和恐惧。他们又登门找茬了，要求撤换具有进步倾向的主编黎烈文，改任帮闲文人章衣萍。史量才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黎烈文绝不辞退，章衣萍绝不聘用。我想诸公不会把‘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私下里，史量才对朋友们说：“《申报》能有今天业绩，都靠朋友相助而来，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自“禁止邮递”事件以来，史量才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宁肯玉碎，绝不苟且偷生”，也许是他早有精神准备，也许是冥冥中心灵的指引，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黎烈文不愿给史量才惹太大的麻烦，在主持《自由谈》一年半后，1934年5月9日，他声明辞去在《申报》的职务，《自由谈》编务由张梓年接手主持。

茅盾先生对《自由谈》评价甚高。他在《回忆录·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写道：“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还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茅盾特别提到了鲁迅：“1933年至1934年他在‘自由谈’上写的杂文，却是数量最多最集中，影响最广的。”“这样说也许不算过分：《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

蒋介石对史量才的忿怒没有丝毫消解，而且与日俱增。“领袖”的愤怒感染了学生。戴笠出手了，他要为“领袖”除掉史量才这个眼中钉、手中刺。一张罩向史量才的死亡之网，悄悄织就了。

史量才多年来忙碌于事业，饮食无常，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晚境以来，他时常去杭州休养，在湖光潋滟之间怡养性情，疗治旧疾。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再次由沪赴杭休养。江南的秋日，丽日清风，天高云淡，轻尘不飞，纤萝不动，史量才时常提笔赋诗，表达自己优雅、散淡的心境。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

晴光旷渺绝尘埃，丽日封窗晓梦回。
禽语泉声通性命，湖光岚翠绕楼台。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
案上横琴温旧操，卷帘人对牡丹开。

诗境恬静飘逸，澄明透澈。既有对世事无常的感悟，又有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从这首意境淡雅的诗中，品不出生命末日的惨烈气息。

11月13日下午，在杭州休养了三十九天的史量才，乘自家的“司蒂倍克”牌防弹轿车启程回沪。当时车内共有六人，司机是黄锦才，副驾驶座上史量才惟一的儿子史咏赓。后排是史量才，二夫人沈秋水和沈秋水的干女儿沈丽娟。中间加座上是搭便车回沪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

下午3点多一点，“司蒂倍克”汽车驶入浙江海宁县翁家埠路段时，被横亘在马路中央的一辆“京字七十二号”别克敞篷车挡住了去路。那别克车似乎是坏了，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修着。史咏赓大声招呼，请他们让开道路。两位修车模样的人向“司蒂倍克”走来。及至近前，这两人突然掏出手枪，向“司蒂倍克”的轮胎急射，立马将轮胎打爆。与此同时，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四个黑衣人，边开枪边向汽车飞奔而来，史量才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大喊一声“咏赓快跑！”便拉开车门，夺路而去。两个黑衣人紧追史量才而去，另外三人朝相反方向追赶史咏赓，一人守住汽车，向车内乱射。追杀者必欲置史量才于死地。史量才跑向翁家埠二十三号农民沈瑞富家的小院，他从前门冲进，后门穿出，追杀者穷追不舍，射中史量才的脚掌，史量才无法再跑，倒在翁家埠村头干涸的水塘内。杀手赶到，一枪从左耳进右耳出，一枪射入口腔，史量才当场毙命。

史咏赓跑进小树林中，三名杀手的二十几枪，居然只伤到了他的小手指头。追杀者子弹打光后，史咏赓回身与他们搏斗，一个被扔下公路，一个被掰断

手臂，一个被打趴在地，最终得以脱身，搭了翁家埠小贩的手推车，直奔附近的航空学校报警。“司蒂倍克”车上，司机黄锦才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被乱枪打死，干女儿沈丽娟被击伤腿部，二夫人沈秋水跳车时扭伤了脚踝。

这是极其专业的谋杀，六人分工相当明确。先是佯装理工的两个杀手打爆轮胎，并打死司机，令汽车无法开动，又将坐在中间加座上的邓祖询毫不留情地射杀于车上，他们误把邓祖询当成保镖了。追杀史量才的两个杀手，枪法精湛，心狠手毒。只是另外那三个杀手太愚笨，三支手枪没能置史咏赓于死地。史咏赓凭他的机智与勇敢，死里逃生。

11月14日，《申报》率先刊出了“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汽车夫及邓祖询君同时遇难”的消息，宛如晴天响雷，举国震惊。各界纷纷声讨这一惨忍的狙杀行径，要求当局迅速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及幕后操纵者。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四次电令浙江省政府限期破案，严缉凶犯。他还致电《申报》馆及史量才家属，以示慰问。

浙江省发出悬赏令，“拿获首要送案者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而破案者赏洋五千元。”对史量才深怀敬意的浙江省长鲁涤平穷追不舍，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了不少线索。正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竟以破案不利、难慰民情的理由，将鲁涤平等人撤职查办。史量才被杀一案，自此成了千古奇冤，是非莫辩。

史量才死后，中国的国学大师、自由主义先驱章太炎先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高度评价了史量才的一生。章太炎尤其赞叹道，以史量才的智慧和才能，他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把自己弄成一个巨富，实现他“实业救国”的理想，但史量才却选择了繁重芜杂、风险与成就同在的民间报业，来作为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他是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的。

史量才高瞻远瞩的办报宗旨和办报方针，为报界树立了“纯以服务社会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非为私而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历史之言论机关”的办报写史宗旨。为忠于职守，史量才坚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三不”原则；为明浩然之志，他秉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三格”精神境界，达到了中国民间报人从未有过的精神高度。

学者张育仁对史量才的评价独到而经典。他认为，史量才不是要做政治

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政治权威的批评者和政治失范的整饬者。这才是他膺守的独立精神的真实涵义。矛盾和困难的是，极权政治和它的领袖人物不需要他持守这样的姿态……终于，在这个不可调和的问题上，他们的对峙最后演变成了僵局。这不是理论上的势均力敌，而是现实中的以弱制强——这个傲岸无惧的“荆轲”，终于倒在了现代“秦王”的卑鄙算计之下。

主要参考文献

庞荣棣：《申报魂》，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8年7月第一版。

杨光辉、熊尚存、吕良海、李仲民：《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北京，1986年9月第一版。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年11月第一版。

张季鸾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诞生于1888年，去世于1941年，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三岁。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注入了巨额资金，拯救了风雨飘摇之中的《大公报》。在吴、胡、张的精心打理下，《大公报》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报纸越办越好，影响日益广大，从天津走向了华北，进而走向了全国，成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政经大报。

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台湾的影响和知名度远远高于大陆。1988年，在张季鸾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台湾方面还专门举行了纪念和研讨活动。而大陆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文化断层还没有接续，意识形态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真的没有多少人知晓张季鸾、了解《大公报》。自张季鸾冥诞百年之后，二十一年过去了，张季鸾不断为大陆知识界、学术界、新闻界所了解，研究张季鸾的专著和文章不断涌现，百年《大公报》的历史也在厘清和匡正。更有学者，从“自由主义历险”的新颖角度分析包括《大公报》在内的上世纪早期中国民间报纸的艰难历程。梁由之说：“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傅国涌更多的是从“文人论政”的立场评价张季鸾，他指出，张季鸾“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百年言论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对张季鸾的评价还可以搜寻出很多。高低优劣，见仁见智。笔者之见，更愿意把张季鸾形容为“士子情怀”、“名士风流”和“国土精神”。

幼年失怙，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儿子发愤苦读，立志成才，终于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这不是旧时戏剧里的传奇故事，而是张季鸾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关中民风，慥悍纯朴。父亲张楚林，立志功名，经世致用。张楚林早年习武，少年时应童子试考的是武秀才，三射二中时，坐骑受惊坠马，手臂受伤，因而弃武学文，仍不舍功名。榆林总兵刘厚基和陕西知府蔡兆槐欣赏张楚林的才气，对他悉心培养。光绪二年（1876），张楚林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是榆林自乾隆以降一百多年来出的第一个进士，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张楚林以进士之身份发山东任知县。他为官清正，不结党营私、巴结逢迎，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山东的几个穷知县任上转悠。1888年3月20日，张季鸾出生于山东邹平。这是张楚林与继室、山东姑娘王氏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张楚林做人耿直，知恩图报。尽管自己仕途不顺，蹉跎于世，但对于刘厚基、蔡兆槐的知遇之恩，未敢丝毫遗忘。他在家中专设刘、蔡二人牌位，年节冥诞之时，必祭祀于前。这给了张季鸾以极大的影响。他成年后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这甚至升华为张季鸾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世界观，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1900年，六十六岁的张楚林在山东济南病故。张季鸾的下边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道中落，苦不堪言。深明大义的山东妇女王氏，坚持要把亡夫的灵柩送回榆林老家。于是，孤儿寡母四人第二年扶柩西行，“一路风雪向榆林”。这也是张季鸾第一次回到故乡。他后来回忆说：“一路的困难不必说了，到家即发生生活问题。全家箱匣中，只有几只元宝。有一处伙开的商业被人吞没，成了讼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担当。”

人生常常就是一个轮回。几十年后，张季鸾走着几乎与他父亲同样的人生道路。母亲在家含辛操持，一定要让张季鸾读书成才。张季鸾的确也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尤其喜欢作文，往往词意超群，一挥而就。父亲在世时就对他的用功学习十分钟爱。母亲决心不辜负先夫的意愿，让张季鸾以学问立天下。

张季鸾的求学之路上，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这就是刘古愚。刘古愚真的是

乡间大儒。此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独处僻壤，放眼世界。他是八百年前宋儒张载所创“关学”的忠实继承人，对横渠四句心有灵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古愚的教育宗旨是“学贵于有用”。他教给张季鸾的，不仅仅是《四书》《五经》、国学根基、文章策论，更包括农事甚至工业、山川形胜、家势国运等。所有这些，给了张季鸾以极大的影响：“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板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如果说刘古愚是张季鸾求学历程中的恩师的话，那么沈卫则是张季鸾年轻生命中的伯乐了。陕西学台沈卫，当年负责考拔秀才。沈卫的侄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沈钧儒此时已中了进士，跟着叔叔沈卫做一些抄抄写写的辅助工作。沈钧儒清楚地记得，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在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考棚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刻，他才手提考篮，跌跌撞撞地来到考场。张季鸾向考官们诉说赶路的艰辛，要求破例准其入围应考。沈卫将张季鸾叫了进去，问他平日读了什么书，有何专长。张季鸾答，对北方山川地貌，曾加以研究。沈卫便让他将长城各口的险要写出个大概来。张季鸾不假思索，提笔便写。沈钧儒忆起，张季鸾瘦弱矮小，坐在条凳上，两只脚还够不着地呢！沈卫看过张季鸾答案后很满意，特准他参加考试。后来阅卷，成绩果然不错。

这一年是公元1905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窘困处境，迫于社会各界的改革压力，决定废止科举，兴办新学，选派留学生出洋，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经沈卫保举，张季鸾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他是陕西省三十四个赴日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还不足十八周岁。

张季鸾勤奋好学，刻苦严谨，留学期间埋头苦读，很快便崭露头角。留学五年，他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的日文水平也相当不错。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的书信、小品。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季鸾还结识了同盟会的诸多骨干、精英，参与创办了《秦陇》《关陇》《夏声》等进步刊物，用“少白”、“一苇”的笔名发表文章，鼓吹革命。这也是张季鸾与新闻的首次牵手。

1911年，张季鸾学业完成，准备启程回国。那时，辛亥革命正在紧锣密鼓

的筹备之中，武昌首义的枪声即将响起。张季鸾对同乡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意先行回沪，协助于佑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早达成目的。”

辛亥功成，共和初行。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在上海协助于佑任办《民立报》的张季鸾，经于佑任推荐，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参与起草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这是一篇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划时代宣言：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龟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民，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

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蹶，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

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平和主义，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可鉴之。

对于这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张季鸾的内心是隐隐地引为自豪的。尽管他嘴上说“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但他知道，作为一篇历史文献，张季鸾的名字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永远地写在一起了。而这一年，张季鸾还不足二十五周岁。以这个年纪，写出如此厚重、全面、持平、干练的文字，实属难能可贵。难怪张季鸾晚年谈到平生三大得意之事时，第一件就是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另外两件是，续办《大公报》并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奖章和五十得子。

二

许多人迷信数字，他们非要挖空心思不可，在这些毫无生命的阿拉伯符号当中找出与自己的人生、命运、事业有某种契合的所谓幸运、吉祥号码。早年的美国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出生于4月10日，他固执地认为“10”就是他的幸运数字。因而他的一些重大决策、决定，往往都选定在10号这一天做出。

如果要给张季鸾确定一个幸运数字的话，那么“15”可能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数字心结。

1926年，是张季鸾跌宕人生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是民国十五年，也是张季鸾自日本学成归国十五周年。这一年，是张季鸾三十年新闻生涯的中分之年。这一年，距张季鸾生命的终点还有十五年……

“15”，既是张季鸾的幸运，又是张季鸾的讖语。命运这东西，还真是不好说。

袁世凯同意执掌民国，孙中山黯然去职之后，张季鸾便立即离开了南京总统府。日本留学的经历，特别是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让张季鸾对办报纸、开民智，存有异乎寻常的热情。

自日本舟楫返国，张季鸾就是冲着于佑任的《民立报》去的。在短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之后，张季鸾又回到了《民立报》，他的勤勉和出众的文字，为《民立报》增色不少。于佑任赞他：“英思卓识，天宇开张”。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谋刺了宋教仁，举国一片声讨之声，张季鸾也在报纸上直言袁世凯难逃干系。6月，张季鸾又在他与曹成甫共同创办的北京《民立报》上披露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列强借款的内幕。这让袁大总统恼羞成怒，下令查封了北京《民立报》，并将张季鸾、曹成甫抓进了大牢。这是张季鸾第一次“因言获罪”，身陷囹圄。三个多月后，张季鸾在好友李根源等人的多方营救下得以解脱，被袁世凯驱逐出京。而曹成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瘐死狱中，未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此后，张季鸾漂泊于上海，为留日同学胡政之任总编辑的《大共和日报》编辑国际版，同时兼为其他诸多报刊，如《申报》《民信日报》等撰写稿件，颠沛流离，聊以谋生。

1916年，袁世凯称帝梦碎，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卒于北京，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张季鸾又回到了北京，主持刚刚创办的《中华新报》。两年后，因刊发了交通通讯社《呜呼三大借款》一稿，抨击段祺瑞政府擅举外债，致使段执政震怒无比，查封了《中华新报》，逮捕了总编辑张季鸾。这是张季鸾第二次“因言获罪”，二度坐牢。半个月后，被社长张耀曾营救出狱。但《中华新报》却一直未获复刊。

在从事这些鼓吹共和、反对独裁的积极报刊的编辑工作时，当年留学日本的“革命同学”，多次动员张季鸾参加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张季鸾思忖再三，都一一婉拒。他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正当张季鸾辗转京沪两地，生活无着之际，河南军务督办、张季鸾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为他谋得了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这可是举世瞩目的“肥缺”。张季

鸾上任不足一个月就转身而去。他不会当官，受不了官场的束缚和阿谀奉承，他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1926年，张季鸾的转机来了。

天津的《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出资人是柴天宠、王郅隆和严复。此三人或为传教士、或为天主教堂总管、或为社会改革家，总之，是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开明人士。主持《大公报》编务的是满族人英敛之。英敛之出身贫苦，后入天主教，具有强烈的革新、改良思想。在《大公报》的发刊词上，英敛之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关于报名，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当下的读者如果对英敛之知之不多的话，对他的后人倒是应该有所耳闻。英敛之的独生子是英千里，孙子是英若诚，曾孙就是英达、英壮。

英敛之是满族人，对清廷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英敛之的“敢言”，是有限度的。他力主还权于光绪帝、反对太后听政也好，他鼓吹变法改良、揭露官场弊政也好，都是取维新而避革命，立君宪而救大清。辛亥首义之枪，震惊全国，不足一月，各行省均宣布独立，清政府名存实亡，继而宣统被迫逊位，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改朝换代。所有这一切，大大出乎英敛之的意料，也大大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不知道他主持的《大公报》还能再说什么。他彻底失去了办报的兴趣。

无奈之下，出资人之王的郅隆接手了《大公报》。王郅隆走的是一条党派报纸的路线，没有几年，便将《大公报》带进了死胡同。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社会局面，也不是办报的理想环境。至1926年年初，《大公报》基本上处于了停刊状态。

《大公报》的窘境，让同为官费日本留学生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心痛不已。尽管《大公报》出版于天津，地理位置不如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逊色于经济、商业、时尚大都会的上海，不及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开风气之先的广州，但天津毕竟是华北名城，地处京畿，历史悠久。只要《大公报》有足够的资金，延揽到国内一流人才，办一张像样的大报，刊布新闻，评论时政，还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吴鼎昌是金融界的巨头，搞钱有办法；胡政之善经营，懂财务，是理财高手；张季鸾痴迷于文字，办报的激情未有丝毫衰竭，是总编辑的不二人选。三人约法五章：

一、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吴鼎昌认为，民国以来，一般报馆办不好，主要是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客的津贴，政局一有变动，报就垮了。所以，办报首先就要自筹足够的资金。吴鼎昌协商于“四行储备会”，从“经济研究经费”中筹措了五万元给《大公报》使用，经营得好，继续扩展事业。经营不好，关门了事，权当五万元打了水漂。

二、待遇。三人专心办报，三年之内不得担任有俸给的公职。既做报人，就要专心办报，把报纸当作事业来做。为保证胡政之、张季鸾专心办报，吴鼎昌提议，自己有资产，不在报馆支薪水。胡、张每人每月领取薪水三百元。

三、企业性质。《大公报》是股份公司性质。吴鼎昌募集资金，胡政之和张季鸾虽不出钱，但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给相当股额的股票。公司的名字叫“《大公报》新记公司”。

四、职责分工。根据各人所长，三人职务分配如下：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五、言论。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担。如有不同意见，服从多数，若三人各不相同，由张季鸾决定。

这“约法五章”言简意赅，将谋划一个报馆的方方面面均包括了进去。胡政之说：“简直就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一直被我们供奉着。”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公司正式开张，复刊后的《大公报》也在这一天与读者见面了。在刊发于一版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张季鸾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

所谓“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有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所谓“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

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谄于盲。

“四不”办报方针，已经有了现代报纸的理念和雏型。对于张季鸾而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即兴之念，而是十几年来记者生涯和办报甘苦的切身体会。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张季鸾这样识见和思考的新闻人，凤毛麟角。新闻史研究学者王润泽指出：“四不主义”的提出，第一次表明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报纸摆脱政党报刊，跳出纯粹商业目的，进入更高的独立报纸阶段的开始；是中国报业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三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价值标准和评判方式迥异于既往。每经历一次政治运动，张季鸾就被涂上一层“非革命”的油彩，做为反面教材和痛殴的靶子供人们批判。

张季鸾及其《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就是扣在张季鸾头上的最大的一顶“政治帽子”。

这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阶级划线，苛求先贤的僵化标准。

其一，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都是生活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超越时代和社会的任何评价，不是苛求，就是不科学和不公正的。张季鸾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他不是某一种独立阶级的成员，只能依附于现有社会安身立命，劳作谋生。这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张季鸾所处的中国社会状况尤为特殊。辛亥革命后，中华大地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之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蒋介石率军北伐，统一了中国，国家终于归元，政令终可畅通，任何负责任的媒体都会欢呼这一崭新局面，张季鸾由此而成为“国家主义者”，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北沦陷，战云密布；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张季鸾在《大公报》上“教战”、“明耻”，主张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全民抗战，坚持到底。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危难之时的惟一正确选择。

其二，报纸是社会公器，是大众的舆论工具，它必须最大限度地代表和满足读者的意愿，如果读者不买账，报纸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办报人只顾自说自话，狂飙突进，逞一时之快，大众读者是不会喜欢它的。张季鸾即便是为报纸生存计，也不会黑着脸想骂谁就骂谁。事实上，新记《大公报》复刊短短几年，就成为中国舆论的重镇，发行量直线攀升，广告收入大幅增加，读者喜爱有加，就在于它的持平之论和客观报道。

《大公报》社评立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应该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张季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现代国家。这就构成了一个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基本原则：凡符合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就赞成，违背的就反对。对国民政府，他一边拥护它的合法性，一边抨击它的一党专权。

其三，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报纸，都是在体制内生存的。它要经过现有合法政府的批准、注册，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办报纸、搞发行。体制的容忍程度是最高标准，是生存的惟一前提。照后世评论者们的说法，张季鸾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骂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难道要像邵飘萍那样在报纸上大骂张作霖，骂到张作霖杀心骤起，打进北京城就立即枪毙了邵飘萍？难道要像林白水那样逞一时之痛快，骂张宗昌是“狗肉将军”，骂张的智囊潘复是辜丸，被张宗昌半夜拘捕，不经审讯，直送北京天桥刑场弹穿后脑？或者张季鸾“骂亦有道”，可免一死，可骂得报纸被查封、报馆被封门，中国近代史上，《大公报》销声匿迹，早早归于沉寂，后世评论各辈便竖起大拇指大加赞扬，心安理得了？

四

后世学者论及张季鸾和《大公报》，往往着眼于“文人议政”和“文章报国”。

不错，言论是报纸的旗帜。旧时中国知识分子，身居陋室，心忧天下，一支纤笔报家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报纸，社评是报纸的重要内容，主持笔政的文人，是报纸的栋梁之材，地位显赫，收入优渥。《大公报》自然也不例外。自它创刊以来，尤其是新记《大公报》复刊以来，每天一篇社评甚至数篇社评，大到国计民生，小到街谈巷议，都是《大公报》社评关注的内容。持平、明晰，或娓娓道来，或条分缕析的《大公报》社评，为张季鸾和《大公报》争得了极大的声誉。

但是，一张报纸，究竟是“言论立报”呢还是“新闻立报”？换句话说，读者购买你的报纸，看重的是你的社评呢，还是你刊发的大量公正客观及时的新闻？

笔者始终认为，“新闻立报”是根本。

报纸，终究是新闻的载体而不是观念的平台。报纸又叫“新闻纸”，所谓“newspaper”。每天采撷、编发大量有价值的新闻载于报纸之上，是所有编辑、记者的第一要务。舍此，便是言不及义，弃本逐末。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获得该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非常看重它的“最佳新闻服务奖”。在《大公报》之前，获得该项大奖的，在英国只有《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在美国只有《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亚洲其他国家，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给《大公报》的获奖评语是：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与魅力。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今无可以颀颀者。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评语里，是把“新闻”列于“社评”之前的。也就是说，它首先肯定的是《大公报》的“充实而精粹”的国内国际新闻报道。报纸是以刊发新闻为已任的。“新闻立报”是惟一准则。

当然，张季鸾的社评的确很有特色。这在他当世及后来，已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评析。新闻评论学者涂光晋，将张季鸾的社评写作总结为如下

几个特点：增强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追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标榜公正性，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

台湾研究《大公报》的陈纪滢，早年就是《大公报》的编辑。他曾明确表示，别人是模仿不来张季鸾的风格。“这种风格代表着简明、理性与具有丰富的感情。这是张季鸾先生一手形成的。他写文章从不用典，不用深奥偏僻的文字、语句，更不以文字气势凌人；他总是以娓娓动人的理性讲话，仿佛当面对人言，有相当礼貌，让人能接受下去。”

张季鸾一生写的社评蔚蔚大观，成百上千篇，但人们津津乐道的也不是太多，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报纸是易碎品。张季鸾自己就打趣地说过，报纸“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笔者尤其欣赏的是张季鸾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的几篇社评。

1936年12月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闻听西安兵变，蒋介石蒙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不上吃”。张季鸾明白，当此国难横空、民族危亡之际，只有稳定人心，一致对外才是正确之途，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自己内部的折腾了。张季鸾曾对徐铸成回忆当时情景：“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表明了张季鸾的理智之见和全局意识。当日，张季鸾赶写了一篇社评，题目就是《西安事变之善后》。张季鸾在社评中明确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第二天，张季鸾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重蒋介石之中心地位，确保其人身安全。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之后，12月18日，张季鸾的第三篇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发表于《大公报》上。这是解决西安事变的发轫之作，也是张季鸾一生中最著名、最有力的社评范文。

社评开宗明义，对东北军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

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剴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这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表达了足够的同情之后，张季鸾笔锋一转，痛斥了东北军的鲁莽行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綏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现，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们，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这样死了，教全国同胞虽可怜而不能见谅。

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东北同胞，他们都替你们悲痛，盼望赶紧悔悟，你们还不悔还不悟吗？

义正辞严、深责痛斥之后，张季鸾又给他们指出了解决陕变的正确道路：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上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痛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辛酸，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焦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几时出西安，是个小问题，谁不是他的部下，谁不能作卫队呢？（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页，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社评的最后，张季鸾没有忘记标榜他的公正立场，以中允的态度，做最后的陈情：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

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华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张先生、杨先生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吧！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的同胞报喜。

国民政府十分赞同和看重张季鸾的这篇社评，立即让《大公报》加印了四十万份，派专机飞往西安上空散发。陈纪滢说：“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改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张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人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张学良），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阅读那上面的文章，他看完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一篇宏文，罢兵息武。准备围困西安、血洗古城的几十万大军停止了前进。蒋介石安全释放，返回南京。中国近代史开始了另一种的写法。谁说书生不济世？如椽巨笔定乾坤。

1988年是张季鸾的百年寿诞，台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由海外专程赴台与会。暮年中的少帅亲自接见张士基，亲和友善，并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这篇社评，一时传为佳话。

另一篇为世人称道的《大公报》社评是抗战时期的《我们在割稻子》。

1941年8月，日军对陪都重庆进行了连续几个月的狂轰滥炸，山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8月18日，《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到长江南岸汪山探望病重的

张季鸾。谈到日本轰炸机的猖狂，王芸生眉头不展。张季鸾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答：“敌机走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问：“敌机走了，老百姓在干什么？”王芸生说：“我来的路上，看到老百姓在田里割稻子。”突然，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你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敌机来袭时，我们的农民在割稻。”于是，第二天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角度新颖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文中说：“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日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以“割稻子”做积极生活的表征，表达了中国人民从容应对、藐视敌人的气概和胆识。这篇社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也是新闻史上一篇难得的佳作。

王芸生说，这是我与张先生合著的一篇社评，也是最值得纪念的。

这篇社评发表十八天后，张季鸾就因肺病与世长辞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割稻子》也是张季鸾的绝笔，是一个报人悲愤的绝响。

张季鸾亲自主持《大公报》笔政凡一十五年，许多人便刻意夸大了“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报纸总是以刊登新闻为最基本的职责，这一点，受过现代开放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是十分清楚，并尊为办报圭臬的。早年胡政之在王郅隆的《大公报》任职之时，就提出了以“改良新闻记事”为基础，重视采访报道，要求尽量少用通讯社的稿件，反对摘抄、转载其他报纸的新闻，主张记者亲历新闻现场，写出精彩报道。胡政之在1917年的元旦寄语《本报之新希望》中说：“顾吾以为，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正确公正之新闻，一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甚，盖新闻不真确、不公正，则稳健切实之舆论无所根据也。”

1917年天津水灾、张勋复辟等重大事件，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都做了详尽报道，在国内各报纸中一枝独秀。

1918年9月，胡政之亲赴东北采访，写出了十三篇系列报道，对关内人民对于具有重要军事政治地位的东北有所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以战胜方身份与会讨论战后世界重建事宜。胡政之

在安福系核心人物王揖唐的资助下，代表《大公报》前往采访，成为巴黎和会上重要的中国新闻记者。

新记《大公报》公司组建、复刊《大公报》后，重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传统丝毫没有改变。

1930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并做了一系列实事求是、有褒有贬的客观报道。

1935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访的历程，历时十个月，行程万余里，在《大公报》上连续刊发了六十九篇通讯，其中有七篇专门报道了共产党、红军的活动，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形。后来，这些通讯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西北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局吃紧。胡政之凑足了巨额经费，派记者萧乾赴欧洲采访。粗枝大叶的萧乾居然将这笔旅费弄丢了。胡政之毫无责怪，立即又准备了一份盘缠，交到萧乾手中，嘱他早日出发，不负读者期待。萧乾感动不已，只身赴欧，写出了大量精彩报道。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亚洲战场的投降协议是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的。到场采访的只有三名中国记者。一个是中央社的，另外两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朱启平和黎秀石。这些独家报道，极大地提升了《大公报》的声望和形象。

“新闻立报”，从来都是《大公报》先贤们抓在手中的第一要务。

五

张季鸾生得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个子不高，也不粗壮，少白头，谦谦君子状。但他眉宇间，总透着一股独特的气质，绵里藏针，柔中带刚，属于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从容淡定。

毛泽东、周恩来都欣赏张季鸾的气度，有一种人才难得的惺惺之叹。1958年，毛泽东向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到：“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也曾对《大公报》记者徐盈

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座上客”也好，“游刃有余”也罢，前提是张季鸾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这是张季鸾一辈子最珍重的精神财富。

1932年“淞沪抗战”之后，国内舆论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日渐增多。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傖准备用“拉”与“打”的两种手段整肃报纸。叶楚傖在国民党中常会一次秘密会议上，就报刊整肃做了陈述，会议认为《大公报》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它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常使政府尴尬、惧怕，会议决定用巨资收买张季鸾和《大公报》，让它归顺和听话。欲出多少钱呢？十五万元！这可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公司复刊《大公报》费用的三倍！足以让《大公报》过上几年好日子。

某日凌晨1时许，《大公报》总务主任到张季鸾办公室，递上了一张十五万元的交通银行汇票，收款人是张季鸾，汇款人是国民政府文官处。张季鸾马上把还没有下班的编辑人员叫到了总编室，他拿着这张汇票侃侃而谈，讲了“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讲了“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写不出来”，在重申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言论报国”的十二字办报方针后，张季鸾命总务主任将汇票退回。

王芸生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门又是给他送聘书，又是给他发津贴，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王芸生以张季鸾为楷模，将这些聘书和津贴一一退回，连蒋介石委托陈布雷送来的聘书也不例外。王芸生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头上已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张季鸾闻之，称赞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的模范。

张季鸾宽厚善良，和颜悦色，为人正直，为文严谨。《百年五牛图》的作者梁由之评论道：“季鸾先生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1940年夏天，四川粮价连续暴涨，老百姓叫苦不迭。6月29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社评《天时人事之雨》，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拍手称快。可张季鸾在读完这篇社评后对王芸生说：“芸生，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

张季鸾也有声色俱厉的时候。《大公报》年轻记者范长江在赴西北采访、刊发了系列通讯之后，在新闻界已是崭露头角。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清样，样样都要精通，不仅要能跑、能采，还要能坐、能熬。他欣赏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磨炼他。张季鸾安排范长江上夜班，做要闻版编辑。没想到范长江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肺病逝世于重庆，享年五十三岁。

生荣死哀。

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殁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张季鸾公祭大会这一天，蒋介石亲笔题写了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书赠挽联：“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财富，是自由主义的报业理想，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努力和实践。他曾论述道：“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胡政之与张季鸾相知几十年，胡对张季鸾的评价，中肯而情深：

他的道德文章，处世技术，一切都在我以上……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采访所得，常可达到问题之症结。尤其生活兴趣极为广泛，无论任何场合，皆能参加深入，然而中有所主，却又绝不轻于动

摇。生活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决没有文人一般毛病……季鸾先生眼中无恶人。他同谁都好，他同谁都谈得来。而且一谈就谈成朋友。

张季鸾五十寿辰时，于佑任曾献诗：

榆林张季子，
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
时时念国仇。

这是对忙碌了一生的张季鸾的最好褒奖。

主要参考文献

-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7月第一版。
-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年11月第一版。
- 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2004年10月第一版。
- 梁由之：《百年五牛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11月第一版。

胡政之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胡政之的贡献是抹煞不了的。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公报》，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打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这艘朦朧巨舰。而一部《大公报》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新闻史、报业史。如果说“大公报”三个字无法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的话，那么“胡政之”三个字，就应该与“大公报”共生共存，传诸后世。

胡政之活了六十岁，算是英年早逝。可胡家后继有人，贤顺可嘉。最近几年，胡政之的孙女、外孙，致力于胡政之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发掘，“打开追忆的门扉”，再现风云际会的历史，让胡政之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重新走进了中国新闻史的殿堂。他们的努力，令人欣慰。

胡政之出生于1889年，祖籍四川成都。胡家是旧时封建家庭，父亲一心功名，志在科举，寒窗苦读。母亲知书识字，能教他诵读唐诗。胡政之发蒙时，入的是家乡的私塾，他感到“童年里并没有多大的快乐”。

1894年，胡政之的父亲胡登崧终于中了“甲午科”举人，外放安徽任知县。胡政之一家便随父亲去了安徽，定居于省会安庆。安庆地处长江下游，靠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开放程度远高于四川和成都。在安庆，胡政之入了安徽省高等学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教授西方社会思潮和自然科学知识。正是在这所学校中，胡政之从严复的《天演论》中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安徽又是古文流派的重要一支。胡政之学习用功，对桐城派文章下过一番功夫，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和文体感觉。

1906年，胡登崧在安徽五河县知县任上病逝，胡政之扶柩回成都，安葬了

父亲。这一年胡政之十七岁，正是风华正茂、海阔天空之时。那时的年轻一代，出洋留学是时尚，而且大多数人首选日本。胡政之也是跃跃欲试，向往着东渡扶桑、海外求学的的生活。贤惠的嫂嫂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1907年，胡政之与姐夫来到了日本。看来胡家是个和睦友好的大家庭，身为小叔子和小舅哥的胡政之，得到了嫂嫂和姐姐、姐夫的细致关照。

胡政之进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律系。在日本期间，他与在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商科的同乡吴鼎昌相识，后来又结识了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张季鸾。三人意气相投，年龄又相仿，很快成了好朋友。

胡政之在日本求学期间，同盟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等，就在日本生活和活动。胡政之约上吴鼎昌，曾经去拜访过孙中山先生。对于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行者，胡政之从内心里敬佩。孙中山逝世后，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别谈到了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吾于先生虽敬仰多年，而亲承颜色则仅在最近三四年间。每一瞻对，辄觉精神上如服兴奋剂，不期然而有懦夫立志之感，盖其坚强的意志，诚实之态度，实足以使人受其感化。吾治新闻事业往来南北垂十数年，所见伟人名士不可数计，求其一见即能予吾人以人格之感化者先生与段合肥（祺瑞）两人而已。”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胡政之学成回国。三个好朋友中，最年长的吴鼎昌最早归国，曾任大清银行的总务科长。武昌首义后，致力于实业救国，担任了中国银行总裁。长胡政之一岁的张季鸾，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赶回国内，他是应于右任的邀请，回国协助他编辑《民立报》的。南京临时总统府成立后，经于右任推荐，张季鸾担任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秘书，并负责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这是足以让后人仰视的壮美之举。

回国之初，胡政之事业上并不太顺。他留学海外学的是法律专业，便在上海联络了几个同人和朋友，挂起了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可政权更迭之际，国内动荡不安，哪有什么法治环境可言。律师事务所揽不到业务，不久就歇业了。随后，胡政之又进了章太炎在上海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做翻译和编辑。业余时间，在唐心孚主持的中国公学讲授法律课程。说来也巧，张季鸾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便离开了南京总统府，来到了上海。他也进了《大共和日报》，业余时间也在中国公学兼课。这两个落拓才子又聚到了一起。这也算是宿命和缘分吧！

早年，胡政之一直没有放弃他的法律治国之梦，一有机会，便想试试身手。他曾经跑到淮阴，当了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手握法柄，亲操法槌，实际主持起了审判事宜。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过于强烈，这庭长干了没多久，胡政之又回到了上海。此刻的章太炎慧眼识珠又用人心切，擢拔年仅二十四岁的胡政之为《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将报纸的日常编辑大权，交给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不久之后，胡政之搭识了革命重臣王揖唐。1915年，北洋政府委派王揖唐为吉林巡按使（相当于省长），胡政之作为王揖唐的秘书长，随同前往。1916年，王揖唐调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胡政之又随之出任内务部参事。胡政之由此与皖系军阀有了较多的接触，就在这一年的9月，英敛之将他的《大公报》盘给了皖系政客王郅隆。

满族人英敛之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本是一张支持光绪帝变法、反对太后干政、鼓吹君主立宪的民间报纸。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倒台，时局大变，军阀各据一方，国事纷攘，政局动荡。英敛之心灰意冷，无意于再刊一家之言。王郅隆接手《大公报》后，四处网罗人才，勉力维持出版。王揖唐向他推荐了胡政之。于是，1916年秋日的一天，胡政之走马《大公报》主笔兼经理。从此刻起，胡政之的一生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政之初掌《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由于英敛之信教，整个报馆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只有胡政之一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所发新闻，捕风捉影，随意揣度、夸大，有些甚至就是主观臆造。胡政之把他们开除了六个，只留下一人。不是因为这留下之人够水平，而是因为他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与此同时，胡政之聘请北京的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大公报》的新闻因此大有改观。

胡政之在这一时期对《大公报》的兴利除弊是全方位的。他首先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同那个时期许多报纸一样，一直是书册式版面，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与栏之间留有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之后即可装订成册。自1916年11月10日起，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后来又逐渐改成六栏、八栏。内文和

标题字号也进行了调整，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字体搭配使用，使报纸版面焕然一新。

胡政之最大气力的，是对报纸内容的革新。他明白，人们读报，读的是内容，读的是新闻。他在报纸上开辟了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他还创造性地开辟了“特别记载”专栏，由他亲自主持采访。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物专访。胡政之在这个栏目中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几乎无所不包。胡政之有意让“特别记载”栏目成为发表不同意见、包容不同见解的园地，体现出一个公正、责任媒体的胸怀和大度。1917年2月1日，“特别记载”采访了北大教授林琴南，发表了他“论古文之不宜废”的观点；2月5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谈话，倡导职业教育，倡导“兼收并蓄”的教育理念。

年纪不大、阅历不算太深的胡政之，对现代新闻理念已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追求。他坚持发表了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赏，才能尽责。胡政之深以此文观点为是。他不仅亲自翻译了这篇文章，还在前面写了几句推荐的话，以告读者。

新闻才是立报之本。在重大新闻事件面前，胡政之是当仁不让，全力以赴。1917年秋天的天津水灾，让《大公报》赚足了读者的眼球。在此之前的辫帅张勋的复辟闹剧，也让《大公报》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前清遗老张勋，拖着那干枯的半截猪尾巴式的辫子，借进京调停府院之争的机会，黎明进宫，拽起小皇帝溥仪，强迫他复辟登基。第二天，《大公报》以“共和果从此告终乎”的大标题，用几个版的篇幅，对复辟的情形、处置黎元洪的传闻、任命官吏的种种、北京的秩序、清室的态度、外交界的反应等，做了详细报道。“传闻大内得复辟消息，世太保、清太妃等均大哭，云每年四百万元恐难保矣”，将复辟闹剧的滑稽一面公诸于世。胡政之还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署名评论《复辟》，寥寥数语，冷静而客观：“吾人读法国革命史，诚知此举为必经之阶段，吾人观袁帝时代之往事，又不难推定其结果。”

此后几天，《大公报》都以主要篇幅报道这一全国关注的重大事件，消息、

评论连篇累牍，言论分析犀利，消息及时准确。在《敬告国人》的社论中，胡政之指出，复辟闹剧使“国家人格扫地几尽，人类价值因此锐减”。在评论《忏悔之机》中，胡政之说：“张勋复辟固死有余辜，然使张勋敢为今日之举者，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逆，胡政之竟约在现场的梁启超为《大公报》撰写新闻，独家刊发。

多年之后，胡政之回忆此事，“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记事，翕合人心，销路大增，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1917年7月5日《大公报》刊载的《本报特别启事》可以为证：“本报日来销路飞涨，工人印刷劳苦异常。”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协约国获胜而烟消云散。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倡议召开巴黎和平会议，以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规划未来的世界和平。中国因为搭上了参战的末班车，才得以有机会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出自己的外交代表共襄盛会。当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

王郅隆不知为何灵光闪现，决定派胡政之远涉重洋，去巴黎和会采访。这是王郅隆在主掌《大公报》期间少有的几个明智决定之一。多年的研究资料都这样表明：胡政之是我国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记者。后来有人找到佐证，说是巴黎和会高潮阶段，胡政之曾聘当地华人与他一同与会采访；还有资料说，张君勱为《时事新报》采访供稿，周太玄为巴黎通信社和《申报》供稿。“惟一”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政之的报道之于《大公报》，那是轰动全国的专电，是冷静观察后的分析，是史料般珍贵的现场记录。

胡政之于1918年12月动身，于1919年1月23日抵达巴黎。从25日和会开幕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他以一个中国记者的独特视角，亲历了巴黎和会的全过程。

胡政之以记者的敏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巴黎和会的虚伪：强国操纵世界，弱国无以立言。他发回的第一篇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指出，国家没有实力，不能自强，“公法固不足恃，即人道正义之说亦欺人之谈”。他告诉国人，巴黎和会实际上是由美英法意日五国操纵的，所有事项都是“五强”代表“先议决一定办法，然后提交大会报告一番而已。二、三等国家固无可否之权也”。

连会议代表的人数都是不对等的。“五强”各有五名代表，二等国家有三名代表，三等国家仅有两人。胡政之感叹：“国之不可不自强也”。

可中国的谈判代表们，还真不给中国人争气，代表着不同派别，不同地域，内部意见就常常不统一，谈何外争国权？胡政之用他的神来之笔，在《外交人物写真》一文中，将中国“专使”描摹得神形兼备：“陆征祥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悒悒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几个人甚至为了争夺代表席位而起了风波。最后，陆征祥无故出走，不知去向，闹得舆论哗然，各国耻笑。胡政之感慨万端：“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山东半岛的归属问题，是巴黎和会的焦点之一。在中国谈判代表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最初决定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兴奋的胡政之于4月29日拍发了《巴黎专电》，称：德国已声明放弃对山东半岛的专属，“28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老谋深算、狡诈阴险的日本，背着中国游说“五强”，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竟开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转于日本，胶州湾又成了日本的租借地。义愤填膺的胡政之，写出了《平和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记》一文，详细披露了其中的内容。

巴黎和会定于6月28日举行签字仪式。在经过一系列奔波、说项、申明，甚至让步，都归无效之后，6月27日夜，中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三人是否在和约上签字举行彻夜会议，最后决定，为“抗拒国际专制主义，”不去参加签字仪式。

6月28日下午，协约国代表与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镜厅签订和平条约。签字仪式盛况空前，出席会议的各国记者就有四百多人，现场的中国人只有胡政之和他临时在法国聘用的助手谢东发。

午后3点了，中国代表的两个席位依旧空着。胡政之确认中国代表不会来了，他和谢东发将这一消息分别告知了各国记者，“一时争相传告，遍于全场，有嗟叹者，有错愕者，亦有冷笑者”。法国人和美国人多有“惊诧叹服之感”，“英国人多露轻蔑之色”。威尔逊的笑容、乔治的蛮横都和平日一样，只有克里蒙梭很不高兴。日本记者见中国代表不到，有故作镇静的，有找胡政之打探消息的，“大抵是绝对想不到而已”。一位美国人大呼：“今日之中国真中国也。”一位法国人对胡政之说：“此日本人之切腹也。”

胡政之让谢东发在现场发出了简短新闻，消息用法语写成：“中国之不签字，得保其国家之尊严与名誉”。胡政之仔细记录现场状况，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写出了感人通讯《1919年6月28日与中国》。胡政之明白，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的珍贵记录，是时代的风云际会。胡政之说，我国外交向来讲屈服，“今日之举，真是开外交新纪元”。

当然，拒绝和约签字，也只是逞一时之快，泄一时之愤。山东半岛问题不会因为你的拒绝签字而变化。胶州湾终究落入了日本人手中。问题的实质在于国家积贫积弱，无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巴黎之行，让胡政之深深明白：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外交无新闻。这是他极力避开的一处难以愈合的心灵疮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谈到巴黎和会和那次欧洲之行，胡政之往往以趣闻轶事搪塞，决不愿再谈及北洋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决不愿再忆起那丧权辱国的羞耻一幕。

巴黎和会之后，胡政之没有马上回国，而是游历了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为《大公报》发回了不少游记式的报道，直到1920年7月才回到天津。

去国一年半的胡政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回到《大公报》后，他踌躇满志，着手对《大公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8月，胡政之即在报上发表了《本报改造之旨趣》一文，“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知识。自来报纸所载世界消息，或传之机关作用之通信，或译自辗转传闻之外国报，东鳞西爪，模糊不清，以至读者意趣索然。本报今后于世界潮流，国际形势，当编成系统、记叙本原，以其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这不能不说是胡政之出国采访、考察的最大收获。

而此时的《大公报》，安福系的背景越来越浓厚。胡政之本是倡导公正新闻的，他指出：“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派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利益。”然而，这种现代新闻意识，只能是胡政之的一厢情愿。8月上旬，直皖大战爆发。皖系迅速败退，战局不容乐观。王郅隆仓皇逃出天津，前往日本避难，并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在夹缝中生存的胡政之，自然也无法继续他的报纸改造了，“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到北京谋新的发展去了。

在北京，胡政之加入了《新社会报》，任该报的总编辑。《新社会报》的社

长是林白水，是一个清朝末年即活跃于新闻界的老报人。没过多久，胡政之就与林白水分道扬镳了。外界评论说是两人意见不和。其实是胡政之感到，以林白水的名士做派和落拓不羁、为所欲为的办报方针、言论风格，早晚有一天要出事。还真是被胡政之言中了。林白水嬉笑怒骂的辛辣社论，招忌于直、奉、鲁各路军阀。1926年夏天，他又在社论中影射潘复是张督办宗昌的肾囊，潘复哭诉于张宗昌，张宗昌便派警备司令部司令王琦，半夜1点前往报社抓人，凌晨4点，未经任何审讯、判决，便将林白水枪杀于北京天桥，上演了一出现代文明史上的惨剧。

离开林白水，胡政之南下上海，创办了国闻通信社。这种现代、便捷的新闻通信社，在西方国家已成气候，而中国竟还没有一家。胡政之想模仿美联社，创建自己的新闻发布机构，建立中国的新闻发布网络。当然，胡政之是没有资金来运作这一切的，出钱的是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卢永祥的本意可不是做新闻，他只是想为重新集结于上海的皖系反对直系打造一个宣传机构。可胡政之一旦接手，却是当作一项新闻事业认真去做的。未几，他便以上海为总部，逐渐在北京、汉口、天津、长沙、广州、重庆、贵阳等地开设了国闻通信社的分支机构，每日发布新闻，影响日隆。1924年9月，卢永祥在江浙迎战齐燮元，卢大败。卢部人员退出了上海，也退出了国闻通信社，胡政之便实质控制了这家机构。胡政之毕竟是报人出身，传递新闻、刊播言论，是中国报人永远不能回避的两大主题。胡政之觉得国闻通信社只能向各报发稿，不能发言，做得规模再大，也终究是个遗憾。因而，他积极筹划，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国闻周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了。

胡政之亲自给《国闻周报》撰写发刊辞，抒发他的抱负。他认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实之发现，与忠实的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摒除百务以从事通信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构成真正舆论的资料。”

《国闻周报》是当时办得非常成功、非常有影响的一份新闻刊物，它刊发了许多独家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就是《国闻周报》大约在1936年首发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就是从《国闻周报》上了解到了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他说：“……天津的《国闻周

报》连续刊载了几期‘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说明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土匪’、‘流寇’。”后来叱咤中国新闻界的几位风云人物，出道之初，也都是得到了《国闻周报》的提携，在《国闻周报》上刊发了最初的习作，如王芸生、徐铸成等。胡政之本人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言论、游记、见闻等，为《国闻周报》的发展壮大费尽了心机。

《国闻周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时事周刊，设有一周简评、时事论文、外论介绍、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文艺、书评、新闻图片、国际讽刺画、时人汇志等栏目。1937年出到第十四卷，每卷五十期。发行数量最高时曾到一万五千多份，是当时出版时间最久、发行数量最多的周刊。1926年夏天，因胡政之到天津续办《大公报》，《国闻周报》也随迁天津出版。1936年因《大公报》出上海版，又再次迁回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改出《战时增刊》，直到1937年底上海沦陷之后，《国闻周报》休刊。

世事无常。1920年跑到日本避难的王郅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死于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王郅隆死后，他的儿子王景杭接管了《大公报》。但王景杭志不在此，加上安福系的日趋没落，《大公报》失去了政治背景和官僚支撑，报纸逐渐沉沦，销售无人问津，以至于每天只印几十份，仅仅张贴于街头的阅报栏。1925年11月27日，再也无力维持的王景杭，终于宣布了《大公报》停刊。

此时的胡政之，因为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的业务需要，常常光顾津门。张季鸾也在几经颠沛流离，遭受军阀迫害，数度办报失败之后，闲赋在天津。两位老朋友，路经关门停刊的《大公报》馆，不禁感慨良多，惋惜不已。

胡政之设想，利用《大公报》的报名和旧有人员、传统，办一张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纯粹民间的报纸。张季鸾极力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他们找到了老相识、老朋友吴鼎昌，请他出资。吴此时担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的总经理，他从“四行”经济研究会的经费中拨出五万元，投资于《大公报》，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吴鼎昌出资本，胡政之抓管理，张季鸾管文字，各展所长，各负其责，相得益彰。王芸生多年后曾指出：“可以说，新记公司《大公报》是由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者构成的。”

新记大公报的大量基础工作是胡政之完成的。他亲自制定了公司管理的初期章程：“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

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责整理修正之责,意见有不同,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

吴鼎昌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是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我计划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完事,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然后请一个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

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主办的《大公报》复刊。张季鸾亲撰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宣布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被国人称为“四不主义”。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组合。

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工作,晚间到报馆同胡政之、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评。在报馆业务方面,他主要掌握经营方针和购买纸张。当时印报都用进口纸,价格随外汇行情起落,一时算计不到,辛辛苦苦办报赚来的钱就会贴进去。幸而吴鼎昌是金融专家、理财高手,善于筹划,资金运用得当,使《大公报》免遭经营风险。方便、及时的银行结汇,也让《大公报》节省了大量成本,资金周转十分有效率。

胡政之每天清早七八点钟便到报馆,着重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阅读报纸。中午和经理部同人一同就餐。午间稍事休息,便督促白班和采访人员工作,到下午四时,规定夜班编辑集中阅报,了解各报动态。他习惯把好的新闻用红笔圈出,供编辑记者参考。晚上与吴鼎昌、张季鸾研究社务、言论以及分担社评写作。他每周写两篇社评,有时还写新闻。周末,他返回北京的家中,还要去指导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北京站的工作。

张季鸾主要忙于编辑业务。他每晚都到编辑部当班,签发大样,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要熬到天亮。他到班后,首先评点京津各报短长,对本报的好稿给予表扬,漏掉的重要消息或较他报逊色的稿件,提醒当事人注意。他把各地发来的电稿分门别类,关照编辑如何处理,重要的新闻留待他自己制作标题。

胡政之后来回忆说：

中国人向来最不容易合作，而“文人相轻”，尤为“自古已然”；吴、张两位同我都是各有个性，都可说是文人，当结合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水乳，但是我们合作了多年，精诚友爱，出乎通常交谊，所以然者，各人都能尊重个性，也能发挥个性。吴先生长于计画，我们每有重大兴革，一定要尽量地问他的意见。我是负责经营，张先生绝对地信赖我，让我能够事权统一，放手办事。张先生长于交际，思想与文字都好，我们也都是尽量让他发挥他的能力。这样在互相尊重的中间，所以在二十年间，才能够由一个地方报办成一个全国性的报，而且在国际上多少得到一点地位。这都不是偶然侥幸的。

吴鼎昌没有赔进去那五万元。在经历了最初几个月的艰难运行后，第二年5月，《大公报》的发行量和广告都有了较大提高，达到了收支平衡。一年后，报纸就有了盈余。1936年，新记《大公报》公司创办十年的时候，公司资本已达五十万元，是1926年吴鼎昌投资的十倍。《大公报》站在了中国报业之巅。

胡政之对《大公报》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提携、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编辑记者，使《大公报》能在二十多年的办报实践和市场竞争中，生机勃勃，长盛不衰。

胡政之亲自培养的年轻后生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一道来，那将是一串很长的名单和极大的篇幅。择其要而述之，徐铸成、范长江、萧乾则各具特色，各有故事。

徐铸成192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急于找份零工挣钱，以补贴学费和生活用度。他的舅舅朱幼珊介绍他去国闻通信社北京分社当抄写员，每天下午四时上班，誊抄几篇稿子，工作三四个小时即可。国闻社管一顿晚餐，还有二十元的工钱。徐铸成求之不得，欣然前往。

在国闻社当抄写员期间，徐铸成仔细阅读了《国闻周报》和《大公报》，读出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徐铸成觉得，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别市。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北平的重要时政新闻越来越少。但作为文化古城，大学和文化机关荟萃，仍旧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闻社、《国闻周报》《大公报》应把在北平的采访重点由政治新闻转移到文化新闻方面。徐铸

成后生无畏，不揣冒昧，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成了一封信，径直寄给了胡政之。

没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徐铸成接到通知，胡先生要亲自找他谈话。胡政之是利用周末返家之际，约徐铸成面谈的。徐铸成忐忑不安地走进胡政之的办公室。胡政之面带笑容地请他坐下，说：“徐先生，你的建议很有见地，确实现在政治中心南移，应该做适当的转变，这关系国闻社的前途，我也曾考虑及此，只是一时间无从着手，既缺这方面的经验，又无适合的人选来尝试。”他问徐铸成在北师大课程是否紧张，能否脱出身来，为国闻社的文化报道做些探索。徐铸成回答，北平的大学正在学法国的管理体制，搞大学区制，许多学校要合并，各校人心惶惶，下午基本不上课了，他有时间为国闻社做些事情。胡政之听罢，连声说好。胡政之提出，“晏阳初在定县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很有成绩，我想请你去参观一趟，为期三五天，回来写一篇报道，以作为你设想的尝试。”胡政之办事立说立行。他吩咐庶务曹凤池，立即为徐铸成办好了《大公报》记者的名片、介绍信、旅差费等，第二天，徐铸成便出发采访去了。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早年受洗入基督教会，成年后入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倡导平民教育，组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作为试点之地，企望由村到区，由区到县，一步步形成以县为单位的平民教育试验区。徐铸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赴定县采访的。

不巧的是，晏阳初出访美国不在国内。平教会副会长汤茂如、陈筑山热情接待了徐铸成，带领他到各个场地参观。采访的最后一天，徐铸成来到一个穷山沟里，访问正在此进行村庄建设的米迪岗兄弟。村民们听说来了远客，热情招待，各家凑白面，包饺子，可情急之下却找不到猪肉，因为农村半月才杀一次猪，眼下不是杀猪的日子。忽听说邻村死了一匹马，赶忙去买来马肉作馅，吃了一顿热闹饭。这顿饭，给徐铸成留下了极深印象。

结束定县之行后，徐铸成赶写了《定县平教会参观记》，寄给胡政之。胡政之立即安排发表在《大公报》上，分四五天才刊完。胡政之还亲自配发了一篇社评，向读者推荐这篇报道，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学成后，大多把目光放在城市，而中国的前途在农村，知识必须普及，知识分子应该把眼光放在农村。

1929年，华北运动会在沈阳召开，徐铸成再次领銜出征。这次，《大公报》还破例给他配了个助手，是本市新闻编辑何心冷。精明的徐铸成为搞好这次采访做了充分准备。从天津出发前，他将预计能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按竞赛姿

势拍好照片，放在编辑部备用。来到沈阳，他与何心冷先到电报局了解情况。原来，沈阳与天津间的电报线路十分紧张，下午自沈阳拍发的电报，很难在当天到达天津。好在沈阳与天津刚刚架设了长途电话，又在试运行阶段。徐铸成便决定用长途电话发稿。

那时的长途电话费用高，而且信号不好，很容易中断，必须迅速、快捷地发出报道。徐铸成找来三份运动员名单，给每个运动员编了号，一份寄《大公报》编辑部，一份给何心冷，一份他自用。他让何心冷每天守在电话机旁，他去比赛场地采访。每一个项目一结束，他便通知何心冷，几号获得了第一名，几号获得了第二名……何心冷便立即电话告知天津。《大公报》每天刊出一个整版的华北运动会特刊，不仅有头一天全天的比赛情况，还配发运动员的照片。而其他报纸只有头天上午的赛况，没有运动员照片。向来以体育新闻见长的天津《庸报》，被初出茅庐的徐铸成打得一败涂地，相形见绌。《庸报》总编辑气急败坏地要撤回前方采访记者：“用你们的来电，不如转载《大公报》的了！”

徐铸成完成采访任务，由沈阳返回北平，在天津转车时，胡政之专门派人去火车站等候：“胡先生请您下车，在天津住几天。”

徐铸成早期在《大公报》的最为得意之作，是三下太原，搞清了冯玉祥的行踪之谜。

北伐胜利后，国内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他们貌合神离，争权夺利，没有一刻消停。果然，北伐后不久，就爆发了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冯大战中，冯玉祥本有望获胜，可蒋介石暗中收买了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韩、石阵前倒戈，冯玉祥大败，只得宣布下野。阎锡山与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借此机会，阎锡山将冯玉祥请到了山西。可冯玉祥此去之后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下太原，二下太原，徐铸成都想方设法，采访到了戒备森严中的冯玉祥，在《大公报》上发出了报道，国内为之轰动。张季鸾专函徐铸成：“自兄到并（即太原）后，所盼消息、电讯应有尽有，殊深佩慰，足见贤能。希继续努力，并盼珍重。”

1930年暮春，交游甚广、消息灵通的张季鸾，预感太原政局将有重大变化，立即派徐铸成三下太原，务必采访到真实消息和第一手材料。

冯玉祥被阎锡山扣在山西后，冯的部下愤愤不平，蒋介石趁机做冯玉祥部

下的工作，提出联冯反阎。冯的旧部密谋后同意，三路大军开始行动，计划分别攻击阎锡山控制的河北、北平、天津。阎锡山闻讯后慌了手脚，求救于冯玉祥。冯玉祥答：“只有让我自己出马。让我带五百万元，还有军械，一到潼关就下令和你一起讨蒋。”阎锡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冯玉祥化装后，于4月11日晚极其秘密地离开了太原。

冯玉祥走后的第二天，毫无头绪的徐铸成来到山西大饭店冯玉祥留守处打探消息。只见冯的秘书们正在围桌打麻将，其中居然有冯的机要秘书雷嗣尚。徐铸成知道冯玉祥治军甚严，如果他在太原，他的属下是不敢如此放肆游戏的。记者的敏感让他嗅到了异常。他立即赶到能参与冯玉祥内幕策划的刘志洲府上，寒暄过后，徐铸成貌似不经意地问：“冯先生已离开太原了？”刘志洲脸色大变：“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千万不能发表的。”

摸到了真实消息的徐铸成，急于将信息传回编辑部。到电报局一打听，这几天控制得特别严，就是一般的商业性电报，也得检查官盖章方可拍发。徐铸成忽然想到，电报局一姓杨的发报员与他是老乡，他便约他出来吃饭。席间谈到，有位亲戚新遭丧事，要通知天津亲属，可否发个电报。这位老乡想了一下说，可以，乘检查官每一小时出去抽鸦片时，就立即发出。徐铸成立马拟了电文：“天津四面钟对面胡霖表兄鉴：‘二舅真晚西逝，但请勿告外祖，以免过悲。寿。’”天津四面钟对面就是《大公报》报馆，胡霖是胡政之的本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二舅”即指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真”是11日的韵日代号；“西逝”即是西去；“勿告外祖”是指不要公开。

胡政之、张季鸾接电后，自然心领神会。第二天《大公报》头版头条旁，用五号字发了一条消息：“北平电话，据太原来人谈，冯玉祥于十一日起不见客。”消息发表后，张季鸾走访第二集团军驻津代表林叔言，谈及冯玉祥已离开太原，林叔言绝不相信。三天后，冯玉祥现身潼关，下达了进攻令，林叔言才恍然大悟，不禁对张季鸾感叹：“你们的记者真是神通广大啊！”

徐铸成，是胡政之慧眼发现的最得意的人才。

范长江也是在胡政之的调教下，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1930年代初期，颠沛流离的范长江来到北京大学读书。此时的范长江身无长物，一贫如洗，过着“东斋洗脸，西斋吃饭”的乞讨般日子。冬日北京的夜晚寒彻骨髓，范长江衣单被薄，半夜常常被冻醒，他就爬起来在屋里蹦

跳，活动热了身子躺下再睡。为解决衣食温饱，范长江给北平的《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当起了通讯员，报道一些北大校园里的文化消息，挣点稿费，聊补困顿。胡政之很快发现了范长江的新闻潜质，他让《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的杨世焯、洪大中找到范长江，聘他为《大公报》通讯员，每月固定津贴十五元，不再按稿计酬，条件只有一个，范长江必须独家为《大公报》供稿，不再为其他报纸采写稿件。每月能挣十五元，这是范长江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他立即答应了，并且努力为《大公报》撰写稿件，文化报道的题材越来越广泛，报道的角度也越来越新颖。他甚至为《大公报》采写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见闻式连续报道，使这个冷僻的领域第一次在读者面前展现它多彩的容颜。

范长江一直有去中国西北部采访的念头。这种想法也是来自《大公报》的启发。“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就在社评中公开主张：“中国屈无可屈，和无可和，只有陷于长期的顽强的斗争。而积极经营西北，则长期斗争必要之条件也。”

范长江起初联络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报纸上发广告，招募赞助和支持者，以完成西北考察之壮举。无人响应。国难当头，人心惶惶，人们无暇顾及于此。此路不通，只好借助媒体了。

范长江拟定了详细的考察采访计划，交给了《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贺逸文。范长江觉得，《世界日报》就在北平，沟通交流起来方便一些。再者，《世界日报》在北平乃至全国有相当的影响，会需要这种大气度的采访。《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对计划本身挑不出毛病，可他吝啬成性，对采访需要的几十至上百元钱，真是舍不得拿出来，犹豫再三，他将计划书退给了范长江，找个借口说：“《世界日报》不需要这类报道。”

范长江转投了《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洪大中。洪大中兴奋不已，立即交给了天津总部的胡政之。胡政之阅后，第一时间约见了范长江，同意范长江的采访计划，聘他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提供路费，出具介绍信，稿费从优，并预支了部分稿费。起初，范长江担心《大公报》不同意，开出的条件很低，没想到《大公报》全盘接受，还给予了许多优惠。范长江说：“《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

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他克服重重困难，马不停蹄，舟车劳顿，历时十个月，行程六千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报道，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范长江在这些报道中，第一次披露了红军长征的消息，客观报道了西北战局。他采写的军事题材的报道有：《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长安之警》《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等。他还考察了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写出了《弱水三千之“河西”》。还对刘志丹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论，认为刘不是绿林好汉，刘的活动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大公报》出版部根据胡政之的指示，于1936年8月将范长江的通讯结集成册，取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在全国发行，“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九次，发行十几万册，一时风行全国，脍炙人口。

“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局势骤然紧张，绥远成了抗战最前沿。胡政之立即电告正在外地采访的范长江，火速赶往事发第一线。他在指令中说：“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失最后机会了。”范长江日夜兼程，公共汽车、军用飞机、牛车马车，能够用得上的交通工具，他几乎都用遍了。在过日军占领区时，他甚至化装成商人，随着骆驼马帮队勇闯封锁线，终于赶到了绥远抗日最前线，报道了我军将士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壮烈行为。

西安事变是一次严重的危机，对抗战走向事关重大。胡政之又指示范长江前去采访。范长江遂又成为第一个进入西安市区的新闻记者。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提出了去延安采访的请求。没想到第二天毛泽东便批准了这一请求。六天后，范长江便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做了多次竟夜长谈，并采访了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

1937年2月14日傍晚，范长江回到上海大公报社。他谁也没见，一头扎进了胡政之的办公室，详细汇报了西安和延安之行的情况。胡政之让他立即动笔写稿，第二天见报。就在胡政之的办公室里，范长江写一段，胡政之审一段。当晚10时，稿子完成，胡政之加了个中性标题“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并即刻派人送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审稿。没想到，稿子未获通过。胡政之略加修改，决定

“抗检”，冒险发表，并指示天津《大公报》同时刊发。第二天的《大公报》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争相传阅。从《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的前前后后，足见胡政之的胆识。范长江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做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范长江后来还回忆：“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差旅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

正是胡政之、范长江二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和相互信任，才造就了范长江这个著名记者，成就了《大公报》的新闻事业。

萧乾自己说：“我进《大公报》，一点也不偶然。”萧乾少有文名，风流倜傥，聪慧过人，自然人见人爱。1933年10月，他的第一篇小说《蚕》，就是发表在由沈从文任编辑的《大公报·文艺》上。以后沈从文约他每月写一篇旅行通讯，这样，萧乾便与《大公报》有了更直接的联系。

1935年春天，胡政之想物色一个《大公报》文艺编辑，主编“小公园”专栏，杨振声、沈从文便向胡政之推荐了萧乾。从这时起，萧乾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萧乾接过“小公园”编务后，发现了一个矛盾。原来这“小公园”是个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的副刊，版面下半部拼的是五花八门的广告，什么彩券、性药、火车时刻表等，还有一些跑马、回力球、围棋等杂七杂八的小稿件。待用的稿件如“七夕考证”等陈词滥调。胡政之不久后问起萧乾接编“小公园”的情况时，萧乾皱着眉头据实相告：我觉得由我来编这样的副刊恐怕不对头。

胡政之反倒兴奋起来。他说：“你觉得不对头，这就对头了。我就是嫌这个副刊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萧乾领了这尚方宝剑，真就大干了起来，很快就让“小公园”变了大模样，文章清新、时尚，艺术品位也有了明显提高。

1939年，伦敦大学寄给萧乾一封邀请函，请他去当访问学者，可条件过于苛刻，经济上实在是不够宽裕，萧乾犹豫不决。此事不知怎么让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的胡政之知道了。他借回内陆公干之机，将萧乾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笑吟吟地朝萧乾眨眨眼说：“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马上回他们一封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

见萧乾还在迟疑，胡政之便帮他分析开了：“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哪。他这么一点点地蚕食，列强就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起来不可了。从咱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我就是出钱想派个记者过去，英国也未必肯让入境。如今，他们请上门来了，你还二乎什么？我通知会计科给你买船票，叫庶务科老徐给你办护照！”胡政之就这样拍板了。不几天，护照、船票都办好了。胡政之还特别吩咐，为萧乾准备了几十英镑的生活费和过境法国时使用的法郎。

萧乾打点好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这一切被对面楼上的“梁上君子”窥到了。萧乾一觉醒来，惊了一身冷汗，护照、入境证明等散了一地，床下的皮箱已被撬开，里面花花绿绿的外币，一张也不见了。这可愁坏了萧乾。

又是胡政之发话了：证件丢了没有？没丢就好。他宽慰萧乾：“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照样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都有啦。”有了这第二笔盘缠，萧乾的英国之行才得以顺利出发。

1943年年底，萧乾正在剑桥大学动手准备硕士论文时，胡政之随中国友好代表团来到了英国。在剑桥访问的那个周末，胡政之约见了萧乾。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的，我就是要把你从这个古老的学院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去显一显记者的身手。”

他摊开那双厚实的手掌，眯着高度近视的眼睛对萧乾说：“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给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得落花流水。我看西线不会沉寂多久了。盟军非反攻不可，把纳粹德国夹在中间打。”胡政之的眼中，充满着希望的光辉，“从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问题是：你还迷信什么学位，当个无声无臭的学者呢，还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干它一场？”

胡政之向萧乾谈了他的具体设想：“前两三年你只是咱们报的兼任驻英特派员。因为你还在教书，随后又读起书来。现在我要求你拿出全副精力，成为咱们报正式的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胡政之的劝告太有鼓动性了。学期一终了，萧乾就脱去黑袍，走上了战地记者的岗位。

一年多后，胡政之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电告正在伦敦的萧乾赶往旧金山报道此一轰动世界的重要新闻。在美国，萧乾既是记者，又是助手，协助胡政之做了许多工作。一天，胡政之对萧乾说，今晚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要宴请中国代表团，你就不必参加了。也就是说，萧乾有了一个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

优哉游哉的萧乾，吃罢晚饭，休息了一会儿便上床了。还未睡着，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拿起听筒一听，是胡政之的声音。他急急地说：“你务必马上来一趟，一切见面再说。”

萧乾匆匆穿上衣服，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苏联代表团驻地。只见胡政之已经焦急地等在旅馆大厅了。他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碰杯敬酒时说的话给我听到了。翻译出来就是：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胡政之得意地说：“我赶紧装作解小手就溜出来给你打了那个电话。”

说完，胡政之挥挥手向电梯走去。他要赶回去照旧参加宴会。萧乾一个箭步蹿上人行道，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向大西洋海底电报局疾驰而去。他给《大公报》发了一个特急电报。第二天，这消息加上花边，在《大公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出来。胡政之与萧乾，用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技巧，联手接力，抓到了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

胡政之培养和提携的新闻记者当然不止上述三位。陈纪滢、梁厚甫、朱启平、李侠文、曾敏芝、查良镛（金庸）等，其发现、引进和录用，都出于胡政之的慧眼和决策。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在胡政之的首肯和支持下，用另一种方式，与我们后来之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945年春天，太平洋战争已逼近日本本土，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大公报》重庆版编辑朱启平，被新闻记者的使命鼓动着，提笔给胡政之写信，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采访。朱启平通晓英语，身体又好，足以胜任这项工作。胡政之慨然允诺，并帮助联系相关事宜。朱启平跟随美军，转战于太平洋和亚洲战场，写出了许多出色的战地通讯。9月2日，日本将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向盟军和联合国签字投降。朱启平是距这一历史性事件最近的记者。胡政之立即电令朱启平想尽一切办法登舰采访，目睹这一庄严而伟大的一刻。朱启平完美

地完成采访，写下了载入史册的现场通讯《落日》。

《落日》是一篇经典的新闻通讯。在那一个特殊而庄重的场合，记者只能靠眼睛去观察、去采访，去捕捉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瞬间。朱启平的《落日》主题鲜明，条理清晰。背景的运用，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刻画，都十分精到、准确、生动，这件难得的纪实作品，是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经典，更是新闻作品的范式和模本。

朱启平开门见山，在《落日》的第一段便点出了新闻的主题和意义：

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10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朱启平用他那细致的笔触，舒缓有致地为读者娓娓道来，从军服整洁笔挺的士兵，到云集的各国记者；从签字现场的布置，到各国代表的到来，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面。“仪式开始”这部分，则是全篇的精华：

9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日本外相）重光葵挣扎上前（他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朝鲜志士尹奉吉炸断一条腿）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9时10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用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悠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点18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歟！

记者的最大功力在于观察的细微和采访的深入。朱启平不放过现场的任何一个疑点。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与麦克阿瑟商量过。这是为什么呢？仪式一结束，朱启平追踪询问。原来，加拿大代表在签署交给日本的那份投降书时，签低了一格，占据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顺延，占了下一个签字国的位置。荷兰代表签字时发现了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日本代表不愿意拿回去这份签错了位置的投降书。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板着脸与日本代表交涉了半天，最后当机立断，掏出笔将签错的国家划回原处，并附上说明和自己的签字为证。弄清了原委，朱启平在通讯中不幸灾乐祸地写道：“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干干净净的。”

甲板上，一个满脸稚气、不足二十岁的美国水兵，郑重其事地对同伴说：

“今天这一幕，我将来要讲给我的孙子孙女们听。”

朱启平深以为然。“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代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于是，朱启平用《落日》向我们讲述这一切了。

于是，胡政之用《大公报》向我们讲述这一切了。

一个报人，一个记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此生足矣！

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他的统计表明：《大公报》仅列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的就有六十多人，列入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有十二人，占全卷一百零八人的九分之一。胡政之于此功不可没。

胡政之早年的敬业精神，在《大公报》是有目共睹的。《大公报》的曹世瑛回忆道：

胡经理是个矮胖子，五短身材，大近视眼，声音洪亮，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表情严肃，但不难接近。他是一位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当机立断，决不可模棱两可，拖泥带水。尽管夜间下班都在午夜之后，他还是每天早晨就到报社来。他先到经理部坐一坐，然后就上楼到编辑部。报架上有几十种报纸……他都要翻看一遍。当时报社没有星期日，也没有轮休，只要他在天津，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外出也要写通讯。由于经理如此，别人也很积极。每天编辑工作结束时，要写几张大字新闻提要，贴在临街的窗子上，原由副刊编辑何心冷负责，后来由我执笔，写完时总在早晨两三点钟。

据徐铸成回忆，每天下午，胡政之都仔细阅读本市和外埠的各家报纸，与《大公报》作比较，从中找出新闻线索，发电指示驻外记者采访要点。较小的地方报，胡政之也要看，找出可以改写本报通信的素材，交给地方版编辑。每天下午的四时到六时，是各版编辑集中看报的时间。有一次，徐铸成迟到了，看

到胡政之就坐在他的座位上看报。徐铸成非常尴尬，默默地站在胡政之背后。胡政之读一段落，回头看了徐铸成一眼，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了。徐铸成觉得，这比申斥他一番还难受。

胡政之对员工的生活和福利待遇非常重视，想方设法凝聚人心，增强向心力。天津时代，《大公报》员工的工资比较稳定，一般职员月工资三十元左右，编辑一般一百元左右，这在北方的报馆中是高的。此外，胡政之还规定，凡是职员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及子女婚嫁，报馆都要赠送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工资的增金，并言明其中一个月的增金是代报馆同人赠送，免得彼此酬酢造成负担。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情况属实，胡政之从不拒绝。那一年，徐铸成回江苏宜兴老家结婚，因手头拮据写信向胡政之告急，胡政之立即汇去一百元钱，只是在汇款单上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会物力之艰难。”

1938年，香港《大公报》创刊，李侠文入报馆工作。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港版《大公报》人员将转移到桂林《大公报》社。离港前，李侠文与女同事林慧洁结婚，偕同赴桂。胡政之关心员工，询问结婚筹办事宜。李侠文生性不愿欠下人情，婚礼从简，所费不多。但他还是认真地感谢了胡政之的好意。时隔十年，抗战胜利，香港《大公报》于1948年复刊。李侠文与夫人双双回到香港工作。一日，胡政之单独约李侠文夫妇在中环的一家法国餐厅聚餐。坐定之后，胡政之说：“我记得你们新婚的晚上就在这家餐厅进餐，被我遇见了。所以我今晚特意请你们到这里来。”对于胡政之的细致和有心，李侠文、林慧洁感慨不已。

胡政之对《大公报》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大公报》战略发展的思考与布局。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初胡政之是十分不清醒和幼稚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决不仅在满州，报社应未雨绸缪，早做打算，做好南迁建馆的准备。而胡政之则觉得新记《大公报》公司章程没有几年，事业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经不起折腾。二人意见不合。张季鸾拔腿去了成都，找四川军阀刘湘出资，商议能否另起炉灶，再办一张报纸。张季鸾的出走，给了胡政之很大的触动。他仔细分析了张季鸾的建议和对时局的把握，认为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便急忙请回了张季鸾，共商南迁事宜。这倒让张季鸾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了。因为刘湘已答应了张季鸾的请求，同意为他出资办报。张季鸾内心是舍不得《大公报》的，毕竟旧情难忘。他见胡政

之回心转意，便辞了刘湘，重回《大公报》了。

胡政之一旦看准了的事情，便不惜气力舍命以赴。《大公报》立即筹备上海版，很快便于1936年4月1日创刊出版，《大公报》形成了南北共有之势。“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入北平，不久天津也沦陷了，天津《大公报》于当年8月停刊。就在天津停刊的当月，胡政之指示曹谷冰等人，立即着手筹办汉口《大公报》。胡政之明白，上海也不知能守到多久。汉口《大公报》未及创刊，日军铁蹄已践踏了大半个中国。胡政之与张季鸾兵分两路，胡带一部分人直奔香港，创办香港《大公报》，张带另一部分人西进桂、渝，创办桂林《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此后几年，胡政之在艰难中维持，艰辛备尝。吴鼎昌入阁为官，辞去了《大公报》社长之职，张季鸾积劳成疾，于1941年9月因肺病去世。胡政之在奔波中维持，在维持中发展，由汉口而香港，由香港而桂林，由桂林而重庆，战乱让《大公报》的事业四分五裂，人员分和无序，胡政之要像当家的婆婆一样，协调各方关系，避免逞强争大、义气用事。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大公报》得以复员津、沪，载誉重建。他兴奋地对李侠文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

胡政之这一时期的最大荣耀，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在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在联合国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许是胡政之知道兹事体大，他用毛笔公公正正地写下的是他的本名：胡霖。

胡政之的经营才能，常常掩盖了他文章高手的真实身份。李侠文形容他：“一生有为有守，见识广博，洞明世事，积行内满，文辞外发，自能议论周匝，绕有气势。”胡政之如有所思，常常抓一个编辑到他办公室坐下，他站在一旁口授社评，由编辑笔录。他说一句，编辑记一句，中间没有思考、停顿，段落分明，条理清晰。记完之后，送交编辑部发排就行了。真的是“出口成章”，“倚马可待”。

1948年年初，胡政之再赴香港，恢复港版《大公报》。他呕心沥血，亲历亲为，忙碌了几个月，终于使香港《大公报》于3月15日正式复刊。

此时的《大公报》，沪、津、渝、港四版同时发行，总销量为二十余万份，总资产达六十多万美元。四地的简称都带“三点水”，是否预示着《大公报》的事业江河湖海般奔涌不息？

4月24日夜間，胡政之在香港《大公报》伏案工作，审发大样时，突然晕倒。

医生救治后，疑为肝硬化。27日，在同仁的劝说下，胡政之飞沪就医，此后缱绻病榻，一蹶不起，维持了整整一年之后，于1949年4月14日逝世于上海。

人说“生不逢时”，可胡政之却是“死不逢时”。

当年张季鸾逝世时，国共正在合作抗日，政局尚且稳定。社会各界为张季鸾举行了盛大的公祭仪式。蒋介石在张季鸾去世时，即发唁函，云：“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殒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张季鸾的灵堂，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上写着：“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蒋介石、周恩来都参加了张季鸾的公祭大会，足见国共两党对张季鸾的尊重。

胡政之去世时，据上海解放只差四十三天，时局十分动荡，前程正未可预料。失败的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大陆，避急于孤岛，胜利的共产党，正大步流星踏遍祖国大地，将红色的旗帜插遍四面八方。一个报人的弃世，有何说道呢！

胡政之原配夫人去世后，1938年续娶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为妻，育有一子。顾俊琦“出身望族，幼受庭训，受过高等教育，气质不凡，而端庄蕴藉，备受人尊敬”。胡政之逝世，上海解放，顾俊琦作为异类，受到里弄组织的严密监视。1951年春天的一日，顾俊琦佯装街头散步，跳上电车赶到南市火车站，购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硬座车票（那时购卧铺票要预订，并要接受询问），只身来到广州，后又设法去了香港。顾俊琦不仅身无长物，没有带走胡政之的任何财产、资料，甚至连她与胡政之生育的八岁的儿子也未能带走。后托朋友辗转将儿子带到香港，母子二人远涉重洋去美国谋生，胡政之在大陆的纽带就这样断绝了。

近几年状况有了极大改善，我们才有了谈论胡政之的空间和资料。这已是胡先生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了。个中滋味，实在无法言表。

徐铸成晚年对胡政之有过一段精到的评价：“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

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主要参考文献

- 胡玖、王瑾：《回忆胡政之》，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09年6月第一版。
- 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 梁由之：《百年五牛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11月第一版。
- 李伟：《徐铸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7月第一版。
-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7月第一版。
-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年11月第一版。

林白水

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林白水的一生。

他是在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时代，被“狗肉将军”张宗昌野蛮枪杀的新闻工作者，“喋血记者”似乎成了对林白水的专用定语。

其实，林白水的一生复杂曲折。在他五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可以清晰地分成三个阶段。早年的名士阶段，自别于清廷，蔑视科举，开坛讲学，倡导新文化；辛亥首义后，大浪裹沙，乘势而进，成了一名政客，投奔在袁世凯门下，依附于“筹安会”，跳了一场拥袁称帝的滑稽戏，最后大梦始醒，心灰意冷地别了政坛；最后十几年，一心投在新闻事业上，创办了现代意义的报纸。一支健笔，刺社会丑恶百态，一纸风行，办大众喜爱媒体，享誉京城，名满天下，终于因笔起衅，因文招祸，被军阀忌恨、忌惮，饮弹天桥，暴尸郊外……

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专门有一文章谈及林白水，他说：“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我们应该建议在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适当予以应有的评价。”在以阶级划线、以革命与否为评判标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能做这样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邓拓的话起了作用，1986年，在林白水被害整整六十年后，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会让九泉之下的林白水惊诧不已。被枪杀于民国还未统一的1926年，居然会被追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烈士。

林白水生于1874年，祖籍福建闽县青圃村。林白水本名林獬。獬是一种传说中的独角异兽，善辨曲直是非。见人争斗，就用角去冲顶坏人。这倒很符合林白水成年后的性格。林白水幼承家学，弱冠之年在福州书院就读，诗词、书

法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很得老师高凤岐的赏识。

书院不同于私塾。私塾是发蒙教育，是初级阶段，而且教学的目的只有一个，考取功名。书院往往是大儒和名士创办的更高层次的学府，创立学派与博取功名兼而有之。朱熹、王阳明、李贽、王闿运，甚至康有为，都曾设坛讲学，传播自己的学问和思想。康有为本无心功名，他在南海书院的“传道授业解惑”已名震一方，后深感于国家不改革无以希望，更无出路，四十岁时，才北上京师，借考试之机，联络诸子，“公车上书”。

林白水也颇有名士风范。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室割地赔款、开放门户，福州被辟为与西洋通商之埠。林白水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他不屑与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为伍，因而下定了不考功名、不事清廷的决心。二十几岁时，林白水已是文名远播。福建同乡、杭州富商林伯颖延揽他来杭州，在家塾中任教。这样，林伯颖的儿子林长民、林尹民等便成了他的亲授弟子。杭州知府、福建人林启更是爱才心切，力邀林白水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这种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全新的现代学堂，给了林白水很大的触动。1899年春天，他返回家乡，与方声涛、黄展云等在福州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后来参加黄花冈起义英勇牺牲的陈更新、陈可钧、林觉民等烈士，都是他的学生。

1901年6月，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邀请林白水主持笔政，林白水欣然前往，亲撰了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这是林白水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那时，报、刊不分家。名义上是叫《杭州白话报》，实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期刊。《杭州白话报》最初就是月刊，后来逐渐变成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成了日报。发行量从两千份，一步步增加到三千份，直至五千份，是杭州及周边地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

在《杭州白话报》上，林白水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用白话写了大量文章，鼓吹新政。他攻击女子裹脚、迷信、吸食鸦片等陈规陋习，文章尖锐泼辣，文笔流畅，很受读者欢迎。

1903年春，林白水第一次留学日本。本想去研讨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的改革之路，可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日渐显露，林白水毅然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秘密发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几个月后，他便与黄兴一起回到了国内。这一年的12月9日，林白水在上海独自创办了《中国白话报》，在更大的舞台

上宣示着他鼎立革新的政治主张。在第一期的“论说”专栏中，他写道：

……这些官吏，他本是替我们百姓办事的。……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件，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件。……倘使把我们这血汗换来的钱粮拿去三七二十一大家分去瞎用……又没有开个清账给我们百姓看看，做百姓的还是拼命的供给他们快活，那就万万不行的！

在第七期的“论说”专栏中，林白水又发表了《国民的意见》，他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种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一百多年以前，林白水的这些言论和思想，不啻晴天响炸雷，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作用。今天，在我们共和国的百姓当中，在那些缺乏“公民社会”意识的官僚当中，对这些最基本的人权，仍懵懂未名。林白水的先见之明、先人之言，的确令人敬佩。

《中国白话报》几乎就是林白水一人独撑，所有的栏目，都是他以“白话道人”的笔名撰写的。他写的许多文章，已经具备了现代新闻的基本特征。如：重视标题的提炼与制作，使文章先声夺人，抢人眼目；注重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充分运用了对话，令文章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舒缓有致；交待了事情的结局或结果，使读者了然于心，阅读的欲望得到满足……

在《中国白话报》上，林白水较有特色的文章是《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等，读者一见标题，便有读而知之的强烈愿望。

张之洞看见俄人占了奉天，也着了忙，就跑到俄国钦差衙门里面去求见他……俄钦差冷笑道：不行也要行了！张之洞还乱嚷道：万万不行，万万不行！那俄钦差卷着胡子，抬头看着天，拿一条纸烟只管一上一下地吃，不去睬他……（《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

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佬，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

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了一本奏折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的骂了几句！（《商部尚书吃花酒》）

这种新奇的文章表现手法，介乎于新闻纪实和说书艺人的戏谑之间，让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

《中国白话报》坚持出版了二十四期，将近十个月，在1904年10月8日停刊了。这是林白水在中国报刊史上写下的浓重一笔。

《中国白话报》停刊一个多月后，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临近，清廷大肆筹办了万寿庆典，为慈禧祝寿。林白水愤而写下了一副对联，在蔡元培创办的《警钟日报》上发表：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一联既出，国人拍案叫绝。上海各报乃至全国各地报纸争相转载，一时口耳相传，诵遍大江南北。

林白水的身上，深深遗留着那个时代的“名士”风格，风流倜傥，落拓不羁。林白水成名之后，以卖文为生，足以糊口，且还能过得不错。他的文章，每篇索价五元，这已是时价的一倍以上。即便如此，林白水也绝不多写，写完一篇，得钱五元，非得花完了这五元钱，才动手写下一篇。一日，一位朋友来看他，林白水留朋友吃饭，一摸口袋，竟分文没有。他对朋友说了声“你稍等片刻”，便伏案疾书。“一盏茶的工夫”，一篇千字文就搞定了。他吩咐仆人：“赶快送到报馆去，要现钱。”不一会儿，仆人带着五元稿酬回来了。林白水于是请朋友到饭馆饱餐了一顿。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多年后，林白水回忆他两办白话报的光荣历史，不无骄傲地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语体的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1905年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于是成为“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有了两办“白话报”的实务经验，林白水学起新闻学想必是得心应手，他当年办报时采用的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语、编后记等新闻形式，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模仿，在上升为理论和学术的概括之后，便统统化为了他的自觉行动，在他创办现代报纸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和发挥。这是后话。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这次，他是为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而来的。留学期间，他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的老师高凤岐之弟高梦旦之约，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经典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编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六本西方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传记，被商务印书馆编为“少年丛书”发行，自1909年至1930年，长销不衰，共印行了十三版，其中《大彼得》发行了十九版之多。

1910年，林白水学成，与大革命家黄兴一同回国。以林白水对清廷的不屑和对革命的青睐，他结交这些同盟会的志士仁人，也是水到渠成之事。在日本时，他就与宋教仁、孙中山过从甚密，孙中山曾手书“博爱”条幅相赠。同盟会成立时，他也欣然参加。第二次留学日本期间，正是因为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林白水愤然退学，半途而归。他的革命激情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无功摘桃，坐享其成。林白水不知哪一根神经犯了糊涂，迅速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这也符合他的“名士”脾性。蔑视科举，不屑在清廷为官，并不是不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是清廷腐败、颓唐，不愿与它共同沉入历史的深渊而已。革命成功，社稷更生。有明主治国，名士们还是愿意一展雄才大略，贡献于家国江山的。

1913年春天，在模仿西方的议会选举中，林白水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北上进京任职，从此活跃于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

1914年1月，袁世凯对国会的种种掣肘终于忍无可忍，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搞了一个袁记的“政治会议”，接着又召开“约法会议”，林白水因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被任命为“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还做了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督军府秘书长。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成立了“筹

安会”。所谓“筹安会”，是“筹一国之治安”。杨度等人认为，只有再行帝制，大权归一，才能结束军阀割据、天下纷争的混乱局面，而他们心目中堪当大任的新皇帝，便是袁世凯。

林白水的旧识刘师培，拉他进了“筹安会”，在薛大可主办的《亚细亚报》上，他发表了不少文章，撰表纪，写劝进书，为袁大总统向洪宪皇帝过渡大造舆论。袁世凯论功行赏，林白水捞了个参政院的参政。

蔡锷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全国各界、包括拥兵割据的军阀，都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大加挞伐，前清旧臣冯国璋等人也是极力反袁。历史只能正向前进，迈出了共和艰难一步的中国人民，怎么会容忍再有一个皇帝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呢？怎么会将国计民生的大权交给一个人去滥施号令呢？短命的洪宪皇帝仅仅当了八十三天便被迫退位。第二年春天，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更何况这袁世凯早已病入膏肓，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民国之初的袁世凯，以早年支持变法，训练新军的姿态，的确蒙蔽了不少人，就连孙中山、黄兴也对他大加赞扬，认为是革命成果的值得托付之人、再造共和的时代先驱。但袁世凯一旦露出称帝野心、小丑嘴脸，孙中山便立即与之决裂，强烈反对，率军讨伐。这是事关革命成败、事关民族复兴的大是大非问题。林白水为什么就看不清呢？为什么就能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执迷不悟、铁心追随，在“筹安会”里鞍前马后地紧着忙活呢？他的革命志向哪里去了？他的报人信仰哪里去了？他倡导的人权、民本思想和英美的法治理念，统统不知哪里去了！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是林白水身上永远洗不净的污点。三年迷途，令时人扼腕，更让后世之人匪夷所思。

袁世凯一命呜呼，林白水大梦方醒。1916年8月1日，他毅然辞去议员之职，决心全力以赴投身新闻事业，创办中国现代意义的报纸。仅仅一个月后，9月1日，《公言报》便创刊了。从报名便可看出，林白水是想将报纸作为社会的公器，大众的代言，发公众、公正之声，而不是哪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的应声虫。林白水的初衷是好的，但在那个时代，办报纸，要有社会名流扶持，要有巨额资金支撑，林白水一无权，二无钱，所有的仅仅是对新闻事业的一腔热情和新闻技巧的娴熟运用。以他一己之力，显然办不成报纸。《公言报》得到了林白水的同乡、早年白话报同事林纾的帮助。林纾因用章回体、文言文意译西方名

著（《黑奴吁天录》等），已是社会名流。办报资金就是林纾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提供的。《公言报》的确算不上—张独立的报纸，林白水在“公言”和“私利”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让林白水在有限的空间和舞台上，唱响了一出大戏。包括向他的后台老板开炮和发难。

1917年春，《公言报》创刊半年多一点，林白水就首先披露了政客陈锦涛贿选议员的丑闻。紧接着，又揭露了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铁路租车案中的贪赃舞弊行为，京城舆论一片哗然。

这许世英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拜把兄弟，又入了国民党籍，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在他主持的津浦铁路租借国外机车、车辆事宜中大肆收贿。没想到，这件密不示人的齷齪之事，竟被林白水知道了。他想尽办法搞到了租车合同，在《公言报》上发表了。事情—公开，许世英无以遁形。在第二天的国务会议上，他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并请段总理派人调查、处理。以段祺瑞那样强势的军阀，“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证据确凿，无可狡辩，他只有暗地里劝他这个把兄弟辞职以平事态。

那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元钱的贿赂选举，被《公言报》揭穿，不仅自请查办，引咎辞职，还依当时的法律羁押、审判，定罪服刑。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被大总统特赦出狱。

事后谈到这段历史，林白水不无得意：“《公言报》出版—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赃案，一时有刽子手之称，可谓甚矣。”

1917年7月，辫帅张勋上演了一场复辟闹剧，蜚回天津的段祺瑞不得不马厂誓师，率军讨伐。不足半月，辫子军灰飞烟灭。张勋躲入荷兰驻华使馆避难，溥仪又乖乖地滚下龙椅，回他的紫禁深院中当“寓公”去了。平定复辟几天后，政府竟发政令赦免了溥仪、张勋等人的罪过。毕竟段祺瑞、徐世昌都是前清旧臣，与张勋又曾同朝为官。这种暧昧态度让林白水怒不可遏，他立即在《公言报》发评论《便宜不得》，声称不能便宜了上演复辟丑剧的前清小朝廷和遗老遗少们。这让徐树铮和林纾大为不满。

许世英被迫辞职下野后，京官做不成了。他四处活动，打通关节，谋到了福建省省长—职。没想到林白水竟穷追不舍。他不愿让这个大贪官去他的家乡主政，贻害父老乡亲。他写了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的时评，将即将赴任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亲信的老底抖了个底朝天，许世英的省长梦就此破灭。徐树

铮又是大为不满。

1918年，徐树铮、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了俱乐部，贿买选票，包办选举，“安福”国会随即诞生。“安福系”便成了段祺瑞政府的代名词。尽管徐树铮是《公言报》的大老板、真正的出资人，掌控着报社的经济大权，可林白水还是敢不买账。《公言报》的确不时为安福派说话，但一有机会，林白水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的著名对联，就出自林白水之手，“见者莫不哄堂拍案”。林白水自知与徐树铮、林纾渐行渐远，“道不同，不相与谋”，1919年5月，他与《公言报》分道扬镳了。

林白水一生中最辉煌的新闻生涯，是在他办社会报的五年当中。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与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他俩制定的办报理念是，“树改造报业之先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改造”、“革新”谈何容易？林白水深知，报纸本身的发行和广告收入，都不足以维持报纸的正常生存，没有津贴，难以为继。而依附于某一政治集团讨来的津贴，又丧失了报纸随意发表议论的话语权。万般无奈之下，林白水取乎下策，将犀利的笔触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和富商大贾，利用新闻内幕和丑闻敲竹杠、敛钱财。他打算向谁要钱，就在报上指名道姓大骂一顿。被骂之人想息事宁人，只有赶紧送钱过来。甚至连他的亲朋好友，也不放过。权贵们既怕他、又恨他。当时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就说，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所谓“资助”，实则“封口费”而已，是花钱买平安。胡政之对这一套甚为不满，感到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与公正。他觉得“北京办报易受压迫”，担心被牵连进去，便离开了《新社会报》，南下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了。还真被胡政之不幸言中了。1922年2月，创刊不到一年的《新社会报》就因揭露吴佩孚挪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了。

两个多月后，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凤凰涅槃，横空出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

林白水似乎得了英美报纸的真传。实际上，自创办《社会日报》起，林白水就将自己置于了政府和权贵们的对立面，专事揭露政府黑幕，抨击权贵劣迹，为百姓代言，为社会求真。在中国那样一个法制和舆论环境极不完善的时代，林白水坚持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干涉司法独立，要求逮捕北大兼课教师、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辞呈指出：“元培目击时难，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这哪里是辞呈，分明是战斗的动员令。18日起，北京学界掀起了驱彭风潮，政府动用军警镇压，一时风声鹤唳、剑拔弩张。《社会日报》旗帜鲜明，支持蔡元培及学生运动。

1月27日，林白水在评论《否认》中盛赞蔡元培的为人，“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是以比拟蔡氏于万一”。他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月28日，他在《告知识界》的评论中说：

就眼前的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即引退……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相信政府一定担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2月22日，新春伊始。在一片“祝福”声中，林白水发表评论《恭喜，张内阁，快点倒下去》。接着他连续发表《缓急倒置》《请看某部之大拍卖》等文，“今之北京政府，可谓完全不懂事家伙凑在一堆，自名曰政府，自号曰中央，犹复不知羞耻地自谥‘合法’。”其实，从议会到政府，大小官吏都有定价，卖官鬻爵，明目张胆。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发动政变，占领了北京。当了一年多贿选总统的曹锟黯然下台。前清小朝廷也被赶出了紫禁城。11月4日，林白水发表评论《哭与笑》，将那些窃据要位、贪得无厌的军阀、政客戏弄了一番。11月10日，在《请大家回忆今年双十节》中，他从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曹锞惨败的事实出发，得出了“武力靠不住，骄横暴乱贪黷之可危”的结论，警告“继曹吴而起的军事当局”，“尽可以就拿曹吴这一幕电影写真，来当教科书念罢了。”“孙中山所以敢只身北来……就是他抱个三民的主义，能得一部分的信仰罢了。……要是没有主义，单靠兵多地盘广，那末曹吴的兵，曹吴的地盘，何曾不多不广，为什么不

及三礼拜，会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新闻评论。

林白水的《社会日报》不仅评论观点尖锐，文笔犀利，它的新闻报道也独具特色。前面已经说过，林白水深得英美报纸之真传，对现代报纸的三昧也体会得到位、深刻。市井人情、街谈巷议、生活疾苦，都是《社会日报》关注的报道热点，“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林白水亲自采写的一篇人力车夫的报道，“都门中下社会胥为震动，报纸销路飞涨，日以数百份计”。

林白水的敢于直言，《社会日报》的公正客观，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无私无党，直言不讳者，白水一人而已。观其时评，无任何军阀、任何政客、任何士民，有好坏处，莫不良心驱使，力加戒勉，且聪明绝顶，料事如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污吏寒心，贪官打齿”，“对一般恶官僚，当头棒喝；对一般新青年，痛下针砭”。人称“透骨见血、铁肩辣手”。当时京城的《东方》杂志称赞《社会日报》深受读者欢迎：“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持报纸而诵者，皆《社会日报》也。”

林白水身上，新闻记者的侠肝义胆愈挫愈甚，而文人雅士的风流倜傥也日甚一日。他酷爱收藏砚台，尤其对端砚，更是钟爱有加。有一年，他曾耗资千金购买了一方名为“生春红”的端砚，喜爱之极，索性也将《社会日报》的副刊更名为“生春红”，既透出了对这方端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又显现了名士不拘一格的孟浪超然。1925年7月3日起，林白水突然在“生春红”副刊上登载了《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而且期期必登，连续刊出：

《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艰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抒发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出，唯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藉资全活。

广告之后，他紧跟着“润例启事”，煞有介事一般。当然，林白水很大程度上说的是实情，但噱头的成份大大高于他“筹资”的意愿。他无非是借此举扩大《社会日报》的影响，抓人眼球、引人注目而已。

1925年12月1日，北京《晨报》馆被暴徒捣毁，《社会日报》报馆也险些被砸，林白水也收到了穷凶极恶的威胁信。他以退为进，在《社会日报》上刊出“白水启事”：“今则年逾五十，家徒四壁，一子一女，学业未成，外对社会，内顾家庭，犹多未尽之责，迭承亲友劝告，勿以言论招祸。自今日起，不再执笔为文……”当天《社会日报》的评论署名，即由“白水”改为“记者”。

读者闻听“白水启事”，纷纷致信询问、安慰。期待林白水不畏权势，笔耕不辍。其中一位青年学生的来信，读之令人动容：“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来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自12月6日到27日，二十二天中，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每日一栏，连续刊登了五十七封支持他的读者来信，可见舆情之所系，民意之所向。林白水以他以退为进的高超新闻手法，为《社会日报》大大地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1926年4月16日，直奉联军进入北京。十天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就以“通赤”之名枪杀了《京报》社长邵飘萍。林白水不为所惧，在5月17日的《社会日报》上撰文批评直奉军阀：

树讨赤之旗……但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近畿之民，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彼身罹兵祸之愚民，固不知讨赤者有许多好处在后，而但觉目前之所遭之惨祸，虽不赤亦何可乐也！……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呜呼，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今之讨赤者，念之哉。

将枪刺在手、生杀予夺皆一念之间的直奉联军，直斥为“洪水猛兽”，林白水的胆子可真够大的。是的，林白水毫不顾忌，5月26日的评论，他又向吴佩孚、张作霖开炮了：“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作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不替百姓说话，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好在没几日，张作霖撤出京城，回了东北。山东军阀张宗昌迤迤然统兵前来。早几年林白水就叹过：“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现如今，各派军阀轮番进京，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乱象亦可见一斑。

林白水还是那副脾气，还是那支健笔，他又向山东军阀张宗昌和他的幕僚

潘复发难了。其实，林白水与张宗昌、潘复的芥蒂，几年前就结下了。他曾讥讽张宗昌为“长腿将军”，意为遇到敌人撒腿就跑，让张宗昌忌恨不已。三年多以前，林白水还在《社会日报》刊发消息“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师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了潘复贪污敛财的种种劣迹，让他做山东省长的美梦化作了泡影。这官运被阻之恨，潘复自然记在了林白水和《社会日报》头上。

潘复字馨航。用林白水的福建普通话念之，尤如“肾囊”。而“肾囊”又谐“智囊”。林白水便拿潘复开涮了。8月5日，《社会日报》刊发了他的评论《官僚之运气》：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可见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于剜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在林白水那尖刻的笔下，智囊就是馨航，馨航就是肾囊，肾囊就是辜丸。潘复受此奇耻大辱，岂能善罢甘休。他当天指示手下给林白水打电话，要求《社会日报》就此文刊登更正声明，并公开道歉。林白水的答复是，“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恼羞成怒的潘复，连夜跑去找张宗昌，哭诉着要张宗昌为他做主，将林白水处以极刑以解心头之恨。张宗昌正愁找不到茬子加害林白水呢，乐于送个顺水人情。于是张、潘当下密谋，给林白水安了个“通敌有证”的罪名，指示宪兵队连夜捕人，连夜处决。林白水所通之“敌”，便是刚刚撤出北京不久的冯玉祥，因为冯玉祥在京期间，《社会日报》刊发了好几篇赞扬冯玉祥的文章。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8月6日凌晨1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乘车来到《社会日报》报馆，说是张宗昌将军请林白水前去谈话，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押解而去。报馆编辑见状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助。

杨度、薛大可、叶公绰等人匆匆赶到潘复住宅，找到了正在此处打牌的张宗昌、潘复等人，苦苦为林白水求情，薛大可竟长跪不起，情真意切。潘复

叫过王琦，耳语几句，王琦颌首而去。少顷，张宗昌才开口说话，同意将“立即枪决”的命令，改为“暂缓执行”。可传令兵找到王琦时，林白水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8月6日凌晨4时10分，林白水被宪兵押到北京天桥刑场执行枪决。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遇难之时，林白水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双目未瞑，陈尸道旁，见者无不骇然伤心。这一天，离邵飘萍遇害相距百日左右。这无疑是中国新闻史上最痛楚、最悲怆的记忆。两年后，北京《自立晚报》在谈及此事时拟的新闻标题是“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的遗嘱写于8月6日凌晨4时：

我绝命于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丙寅8月7日夜四时万里绝笔

林白水字万里，“白水”只是他1916年起在报纸上发文章时用的笔名。后笔名大誉，盖过真名。

林白水的遗书，是在匆忙中写下的，日期都写错了。凌晨1时突然被抓，不足三个小时后突然宣布执行死刑，生命危在旦夕、分秒之间，谁也无法神闲气定，从容不迫。“丙寅”是农历纪年，丙寅后边应写为六月二十八日，而不是公历的时间。公历时间也写错了，不是8月7日凌晨，而是8月6日凌晨。“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九个字，也是后来加上的。可见，“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纤纤文弱书生，面对凶神恶煞、荷枪实弹的兵痞，是何等的痛苦！正如林白水女儿林慰君成年后在所撰《林白水传》中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

当年，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将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悲惋痛悼之情立现。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林白水的从业箴言，千古不朽。

主要参考文献

- 刘东黎：《北京的红尘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1月第一版。
- 王开林：《大变局与狂书生》，中华书局，北京，2006年11月第一版。
-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2004年10月第一版。
- 张鸣：《历史的空白处》，珠海出版社，珠海，2007年9月第一版。

成舍我

1924年4月，成舍我以二百大洋起步，创办自己的《世界晚报》的时候，美国“世界”报系的创始人、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已经去世十三个年头了。而成舍我本人也在中国的新闻圈子里闯荡了十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成舍我是刻意模仿普利策，白手起家，艰苦打拼，一砖一瓦建筑自己的报业大厦。但从后来的发展看，由《世界晚报》到《世界日报》再到《世界画报》，由单纯办媒体到涉足新闻教育、创立新闻学体系、培养中国的新闻专业人才，成舍我的奋斗经历，与普利策何其相似乃尔。称他为“中国的普利策”，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

取名“世界”晚报大有深意。它揭示的是成舍我的眼界、志向和辽远的打造中国传媒“帝国大厦”的宏大目标。

而这一切，发轫于《世界晚报》创刊的十几年之前。确切地说，源于他父亲的不白之冤。成舍我是因为家庭的变故而走上新闻之路的。

成舍我本名成平，“舍我”是他用过的一个笔名，取自《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豪气干云，不可一世。这响亮的笔名，最终盖过了他的本名，“成舍我”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笔名取代了本名的大牌记者不胜枚数，如邹韬奋、范长江、穆青、一苇、彬彬、林白水、殷海光、杨刚等。

成舍我祖籍湖南湘乡。这些地处穷乡僻壤，老实巴交，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生活的庄稼汉们，本来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洪秀全的农民起义荡涤了这一切。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扯旗造反，一路席卷江南诸省，占领了南京，立号“太平天国”，南京亦更名为天京。咸丰皇帝派出了

几路大军阻击洪秀全，都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一败涂地，清廷江山大有不保之虞。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启用汉人文臣，回乡练勇，对抗“长毛”。此刻，朝中大臣、湖南人曾国藩领命回乡，组建湘军。曾国藩此行，改变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湖南人的命运，让他们的生命轨迹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曲线。这当中，自然包括成舍我的祖先。

成舍我的祖父成春池，也就在这个时候，抛却祖业，背井离乡，来到了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门下。作战有功，朝廷封赏，成春池便辗转于江浙一带为官。到成舍我父亲这一辈，家族身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自耕自给、略有薄产的农民，变成了既无房产也无地产的城市居民。这是伴随着社会大动荡而产生的民众大迁徙：无钱的农民进城落户，有钱的城里人逃到乡下。

成舍我的父亲成心白上过几年学，粗通文墨。此时成家定居南京，成心白靠给人起草信札、文书、契约等勉强维持生活。1898年，成舍我出生于南京下关。1900年，成心白因平定地方土匪有功，由乡人保举，朝廷封了一个九品候补官位，分发到安徽候缺。成心白便带着全家迁往安徽省府安庆，在湖南会馆暂且栖身。直到1906年，成心白才被实任为舒县监狱典史，也就是监狱长。然而，没过两年，舒县监狱数十名犯人暴动越狱，成心白在追赶逃犯时被打成重伤。此事余波所及，让成家饱受坎坷。

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犯人乘隙逃脱，称为“越狱”，看守人员要负疏于防范的责任。囚犯集体闹事，暴动逃跑，称为“反狱”，属狱政管理问题，知县要负责任。数十囚犯暴动造反，知县显然难脱干系。舒城陆知县为逃避责任，私下里找成心白商议，愿出两千两纹银买成心白同意，在上报的呈文中将“反狱”写成“越狱”，也就是说，让成心白顶缸，保他知县安全无虞。成心白还真的是个性格耿直的湖南汉子，宁可不要知县的银子，也不肯替他顶罪。陆知县恼羞成怒，在呈文中硬说是先有囚犯挖洞跑了几个人，后来才群殴打架，反狱出逃。陆知县还深谙舆论之道，他跑到安庆，买通了上海各报驻安徽的访员，编造发布了对成心白不利的报道。成心白一时有口难辩。后来朝廷裁决下来，知县撤职，成心白也被撤职。

舆论竟有这么大的作用。能将白的说成黑的，能让无辜之人蒙受不白之冤。成心白郁结难平，小小年纪的成舍我也是刻骨铭心。

成心白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舒城“反狱”，责任在知县而不在典史。知

县不但应撤职，还要治罪，而他典史不该受此牵连，丢掉饭碗。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认死理的劲头上来了。成心白带领全家赶到安庆，住在湖南人聚集的大杂院“曾公祠”内，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艰苦“上访”。就在此时，成心白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神州日报》派驻安庆的访员方石荪。方石荪也是湖南人，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听了成心白的叙述，方石荪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写了一篇长篇报道，详细讲述了舒城监狱暴动的真相。文章刊登后，成心白终于平反。当然，再回舒城做典史是不可能了。为前途、生活计，成心白考入了安徽省安庆高等巡警学堂。两年毕业后，又被派到了凤台县任警察局长。

同是一支笔，秉公直书，仗义执言，能将冤案平反昭雪。成舍我对记者职业崇羨不已。从他家的亲身经历中，他深深感受到了新闻的强大力量，从个人福祸到社会正义，无不有所作用和裨益。从这时起，成舍我对记者一职、对新闻事业心向往之，至死不渝。

成舍我家境平平。一个小小的九品候补之官、县城的监狱典史，所得俸禄，仅够糊口而已。成舍我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都是在家跟着父亲读书、认字，直到宣统元年（1909），十二岁时才入安庆湖南旅皖第四公学读书。由于成舍我天资聪颖，又加上随父亲读书多年，有点基础，入学不到一年，便自初小跳至高小，由高小升至初中了。谁知好景不长。这个旅皖第四公学是一帮在安徽做官的湖南人挪用公款建立的。虽说为子女教育，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朝廷还是解散了这所学校，成舍我又失学在家了。

又过了没多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了。各地纷纷通电，响应革命，宣布独立。安徽是闹得比较凶的一个省，许多县令被杀。成心白虽为警察局长，但处事还算公道，人缘较好，得以从凤台全身而退，带领全家几经水陆周折，返回了省城安庆。

此时，安徽已经光复，新政府业已成立。成心白是前朝旧官，不可能再被录用，只得闲赋在家。成舍我正是壮怀激烈之年，一心向往革命，便跑去投考青年军。安庆的青年军招三个队，每队五百人。成舍我考入了第一队。军监韩衍将成舍我等几人叫到跟前，说：“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各送你们一本书吧。”于是，就拿来几本《华盛顿传》分给他们。“你们很不错，希望你们做未来的华盛顿。”华盛顿是辛亥革命时革命派崇拜的偶像。这本书，应当也是由当时的著名报人林白水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舍我开始给报刊投稿。说来也巧，引领他走上新闻之路的，就是当年为他父亲申冤的《神州日报》访员方石荪的儿子方竞舟。方竞舟时年二十出头，素有继承父业、投身新闻工作的愿望。结识了成舍我后，引为同道，共同学习、切磋。他指导成舍我就亲见亲历之事，写成新闻，帮他修改润色后，向报馆投稿，并常常被采用。1913年秋，成舍我刚刚十五岁的时候，便被《民晷报》聘为外勤记者。《民晷报》1912年创刊于安庆，是安徽最早鼓吹革命的报纸之一。“晷”，意为参差不齐的岩石，取名“民晷”喻民意的多元。

袁世凯窃国后，复辟帝制的野心日益暴露。《民晷报》大力声讨，口诛笔伐。袁世凯大为光火，指示亲信以“乱党报纸”罪名查封各地国民党报纸。成舍我在青年军时已入国民党，是安庆城中的活跃分子，又在《民晷报》上积极撰稿，讨论时局。此番政局波动，成舍我情知不妙，于1915年夏天，由安庆躲到了沈阳，经亲戚介绍，在王新命办的《健报》任校对。王新命见他擅诗能文，于新闻也有一定的基础，又提升他为副刊编辑。从此，他与王新命的友谊延续了四十多年。成舍我曾说，王新命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第一个上司。

1916年初，大局日趋明朗，洪宪皇帝风雨飘摇，讨袁声势日益高涨。成舍我由沈阳来到上海，被《民国日报》主持人叶楚傖揽入报馆做校对和助理编辑。成舍我的文笔，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高梦旦的赏识，高便不时向他约稿。业余时间，成舍我便卖文为生。此时成舍我结识的文友包括刘半农、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章石屏等。他还给《新青年》杂志投稿，不时有稿件被采用，与陈独秀、李大钊都有书信往还。

成舍我在上海时，干了一件“英雄壮举”，让时人对他刮目相看。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成舍我加入了柳亚子的“南社”，并积极参加南社的“雅集”活动，诗词唱和，好不快活。1917年春天，南社负责人柳亚子因唐宋诗地位问题与社员朱鸳雏“诗见”不和，发生争执，柳亚子立即写了一个开除朱鸳雏的启事，送《民国日报》刊登。成舍我不满于柳亚子的粗暴和武断，力劝叶楚傖不要刊登启事。可叶碍于情面，还是登了出去，这令成舍我大为不满。柳亚子索性将成舍我一并开除出社。成舍我愤而从《民国日报》辞职，典当了衣物，花钱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披露南社论诗纷争的内幕，指责柳亚子狂妄欺人，批评叶楚傖趋炎附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人们说，成舍我是侠肝义胆，丢了工作，扬了名声。

上海又呆不住了，成舍我不知何去何从。他记起了李大钊来沪之时，曾对他当面说起过，如有机会，仍应进入正规学校深造，以求将来的发展。成舍我便动了投考北京大学的念头。他托好友刘半农给陈独秀、李大钊带口信，征询他们对自己投考北大、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计划可行与否。此时，陈独秀已是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他们二人很快复函，愿意为成舍我提供各种帮助，助他完成学业。成舍我决心已定，北上求学，可盘缠又成了大问题。当了衣物用于《申报》的广告后，成舍我已是身无长物。无奈之下，他用自己自学的英语，翻译了三篇西洋短篇小说，投到胡政之主编的《大共和日报》，得到一百元稿费，才于1918年初离沪赴京。这一年，成舍我刚好二十岁。

陈独秀、李大钊，本为青年领袖、时代俊杰，不遗余力地鼓励、扶持有志青年。成舍我抵京后，陈独秀安排他在北大学生第六宿舍暂住，入国文系旁听。李大钊也托人在北京《益世报》给他找了份工作，以解燃眉之急。入学北大一事，还是遇到了一些周折。北大规定，即便是入学旁听，也得须有中学毕业证书。而且在旁听的第一学年当中，只有所有的功课成绩均在八十分以上，才能转为正式学生。成舍我只读过一年旅皖第四公学，自学至今，再无读书经历，更无毕业文凭。无奈之下，他提笔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叙述动荡坎坷的家境，表述殷殷好学之情。求校长予以通融。蔡元培宽容大度，从来都是爱才心切。他看成舍我文笔流畅，言之有理，怜其情况，准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旁听生。这才有了成舍我的柳暗花明，时来运转。

成舍我在北大旁听和读书期间，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益世报》的这份差事了。他无论如何也要抓住不放，坚持做下去。《益世报》总部在天津，是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神甫雷鸣远创办的，本意是传播教义，介绍西方思想，捎带着刊登时事新闻。天津《益世报》初步成功后，雷鸣远又在北京投资办了北京《益世报》。当然，北京《益世报》的规模和形制都比天津差多了。成舍我刚入北京《益世报》打工，就被委以总编辑，写社论、编副刊、看大样，他一个人全包了，这也足见《益世报》的窘迫和促狭。

成舍我艰苦的半工半读生活开始了。《益世报》在城南，北京大学在城东北方向的沙滩。在报馆忙到看完大样之后，一般是凌晨4点左右了。报馆到学校距离很远，稍微打个盹后，就要赶到学校上课，累得成舍我几乎就吃不消了。熬了一个学期下来，成绩还不错，看来升“正式生”问题不大。成舍我找到了

《益世报》社长杜竹玄，提出辞掉总编辑，改任主笔，除写社论外，兼跑新闻，了却熬夜编稿之苦，以期完成学业。杜社长体谅成舍我的苦衷，答应了他的要求，改聘中学教师潘云超来做总编辑。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派系林立，报纸的言论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军阀不满，或打砸报馆，或封门停刊。那时候，因言罹祸的报纸实在不少。

1919年春“五四”运动后的一天，成舍我由北大学生宿舍来到报馆，征询当日社论的主题。恰巧杜社长不在。代理他的人就说：“老板不在，你就随便写吧。”成舍我平日里甚是看不惯北洋政府安福系的霸道和骄横，“安福与强盗”的社论题目便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就着这个题目，成舍我铺陈开来：

北京城里，强盗的窟宅非常的多，这几年来，又发生了一个最大的窟宅，弄得兵戈扰攘，鸡犬不宁，诸君知道这个窟宅在哪里呢？就是太平湖的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成立以来，试问他们替人民安了什么，福了什么，他们所做所为，那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只有饭碗，只要自己那一窝子有金钱、有饭碗，他们便不问国亡也好，种灭也好，这种行动，简直是强盗的行动，所以我说他是强盗窟宅。

他们得意的时候，便是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生平最大得意的时候，那么便是我们宣告死刑的时候了，我现在且把他们得意的事情写出请大家看看。

军事协约成功，他们有了参战借款，每个人都分了若干卖国钱，这是他们第一件得意事；新国会成功造就了几百个饭碗，他们可以帮着政府为所欲为，这是他们第二件得意事。现在他们又有了两件得意的事：（一）就是南北合约快要决裂，他们在那里拼命运动，从前眼巴巴的在那里盼望决裂，如今快达目的了。从此南北还是打仗，他们还是可以多吃饭抢钱卖国；（二）就是这一次学生爱国运动，政府不但不能发现半点儿天良，也去爱下国子，却反把一班有名望的志士一网打尽，他们安福部都趁着这个机会，要去把那从前没有插入的地方去极力钻迎占据，你看这几天外间所盛传的什么教育总长哩！大学校长哩！他们安福不都在那里打主意，想把这两把交椅抢夺过来，做成他们完全的强盗政治。

我可怜的国民呀！安福部最大得意的时候快要到了，我们便听他得意么，我们若不叫他得意，我们便应该大家起来，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窟宅，我们就有了光明和幸福，若是大家放弃了扫除的责任，叫他们大肆活动，那么，恐怕我们宣告死刑的日子就在目前了。

这一篇社论，惹得段祺瑞的北洋政府火冒三丈。报纸出版的当天，警察就来到报馆，抓走了总编辑，封了报馆的门。若不是《益世报》老板的外国人背景，报纸非被永久停刊不可。最终，总编辑潘云超被转交地检厅起诉、审判，判刑一年。报纸经整顿后恢复出版。

成舍我战战兢兢，以为闯了大祸。而社长杜竹玄却眉开眼笑，丝毫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原来，北京《益世报》因祸得福。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自我宣传”。报纸被查之前，《益世报》日销量只不过两千份左右，“安福与强盗”之事一出，《益世报》名声大振，恢复出版后，日销量猛增至两万份。杜竹玄立即让成舍我代理总编辑，新闻、言论一手抓，直到潘云超刑满出狱为止。

这是成舍我在北京新闻圈子里制造的第一个轰动效应。当然，“轰动”只能传诵于一时，不能持久地解决生计问题。《益世报》经常拖欠、克扣他的工资。他的半工半读的求学之路仍是那么难熬，“缺觉”成了他基本的生存状态。北方数九寒天，成舍我竟因为衣衫单薄而不能出门，只好猫在宿舍大骂资本家心黑，叹社会之不公。成舍我是个个人奋斗主义者，他越发强烈地希望办一张自己说了算的报纸，打造自己的报纸帝国。他为此积蓄着，努力着，准备着……

“资本家拿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说话。”这是成舍我早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认为，这是最佳的办报模式。他自认为是新闻的“专门家”，干办报纸体会颇多，志向远大，办一张为老百姓说话、扬善抑恶的民间报纸，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惟一缺少的就是资金。搞到足以办报的钱财，几乎成了那个时期成舍我的一块心病。

他动用各种关系，为自己寻找在政府部门兼职的机会，拿干薪，筹资金；他四处游说，八方化缘，动员资本家接受他的计划，出钱办报……

所有这些，收效不大。

1924年，成舍我从北京《益世报》辞职了。报馆念他多年的贡献，一次性给了他二百大洋的辞职费。成舍我下定决心，就用这二百大洋办报创业。

成舍我认真研究、考察了北京的报纸市场，他觉得晨报市场竞争激烈，晚报市场还有空间。他打算从办一张晚报入手，着手打造他的报业帝国。他把自己筹办的报纸起名为《世界晚报》。正在这时，沈阳《健报》的王新命遭军阀迫害，避难来北京。成舍我便想拉王新命入伙。他说：“现在办一张有当日新闻的晚报，是相当出色的。因为北京的日报虽多，晚报却只有《北京晚报》一家还像样子。这《北京晚报》上的新闻，却几乎全是隔日早报上剪下来的，决不采用隔日旧闻的《世界晚报》出版之后，便一定有其光明的前途。”

这种分析十分正确，也足见成舍我的专业眼光和职业素养。但王新命是老报人，厮混于这个圈子也非一年，他不会仅仅被成舍我的“光明前途”鼓动晕的。他问成舍我资金如何，二百大洋用在了何处？成舍我只好老实承认，四开四版的《世界晚报》，登记、租房、招揽人员、添置办公用品，已花得不剩一子。若明天出报，今天连买白报纸的钱也没有了。王新命笑他是“叫花子过日子”，说了声“恕不奉陪”，转身走了。

成舍我后来承认：

二百元的开办费用光了。譬如说预定创刊的日期就是明天，但今天此时，却还连买纸的钱都没有。

那时，购买印报用的纸张，不仅不能像现在报馆，几十几百吨的整批购进，而是向纸行多则三五令，少则一两令零星购买。送纸的工人，将纸背在肩上，走进大门，先将纸款拿到手，才肯把肩上的纸卸下，如果你说一句待明天来取钱，他连头也不回，就背着纸走了。

1924年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了。成舍我确立了“言论公正，消息灵确”的办报宗旨，并分述了报纸的五大特色：

(一) 本报新闻，力求灵确。而对当日之国务会议，国会纪事及政局上之重要消息，尤能尽先掲載。各部院均有专员采访，京外要埠并有专电，绝不向早报、沪报抄袭片纸只字。

(二) 国外新闻关系重要，本报为引进国人世界观念起见，特聘专人担任各国通讯，并与外国通讯社特约，凡本日下午二时以前拍发到京之电报，本

报均能尽先译载，不但不抄袭早报，而且比早报先登一日。

(三) 本报为发展教育起见，特辟专栏，揭载关于教育界之种种消息，以引起国民注意。

(四) 本报特辟“夜光”一版，揭载各种富于兴趣之文字，均聘有专员，分类担任撰述。而《春明外史》描写北京各级社会之状况，淋漓尽致，尤为不可多得之作。

(五) 本报对于政治上各种问题，均时有公正之批评，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并特请专家担任撰述。

《世界晚报》创刊时，北京已有多家晚报。成舍我不惧强手，独辟蹊径，强调时效性、独家性和趣味性，一下子就同各家晚报拉开了距离。对于现代报纸的传播之道，成舍我体会深刻，践行坚决。

草创之初，《世界晚报》的报馆就设在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一间办公室，几张办公桌，一间放置杂物的仓库，报纸排版、印刷都由社会印刷所代干代印，成舍我社长兼外勤记者，龚德柏总编辑兼国际新闻编辑，张恨水编副刊，成舍我的太太杨璠直接掌管财务。这就是《世界晚报》的全部家当和全班人员。

就是这样三个能人，将《世界晚报》办得红红火火，搅得北京晚报市场热热闹闹。

成舍我每天清晨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甚至去鸦片馆、饭店、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的重要新闻被他访到，迅速成章，下午就能见报发行。

龚德柏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对于国际问题也颇有研究。他每日去东郊民巷访问英、美、法等国使馆，采访国际新闻。龚德柏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中有不少旧识和朋友。日本人做事严谨，每天都将各地动态和重大事件汇总于大使馆，这正是龚德柏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这为《世界晚报》提供了大量的独家新闻。

张恨水原名张天培，早年在上海滩演文明戏，文笔凄婉，善讲故事。成舍我聘他主持《世界晚报》副刊“夜光”，连载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竟让众多读者爱不释手，先睹为快。常常有这种情况，傍晚时分，《世界晚报》尚未印完、上市，读者就在报馆门前排起了长队，就是为了买报读《春明外史》。

成舍我对《世界晚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为办好报纸、卖好报纸，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尽了一切手段。

他提出了“每日一人”的口号，即每天上午至少采访一个军政要人，从谈话中探索时局消息，编成特讯，在报上发表。

他特别重视社会新闻的采访和刊发。在其他报纸往往不能上头版头条的示威、游行、战乱、民生等新闻，成舍我大胆拿来登在《世界晚报》头版头条，吸引读者，增加卖点。如5月7日，《世界晚报》创刊不足一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廿一条国耻日，被军警打伤几十人。《世界晚报》头版头条刊登惨案详情，并发表评论，指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指出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是惨案的指使人，应当惩办。这一下，又提高了报纸身价，增加了销路。报业壮大之后，成舍我经常对手下的编辑、记者们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成舍我办报时的老搭档、世界报系经理吴范寰回忆：“在办《世界晚报》初期，成舍我除自己出动采访新闻以外，每天下午晚报出版后，一面携带报纸若干份，雇汽车到城南游艺园一带去卖；一面他自己又杂在人丛中争着买自己的晚报，以吸引购者。他还想出打笔墨官司的办法来引起读者的注意，有一时期他以那时的《北京晚报》作对象，指责对方哪些新闻如何失实，甚至诋为造谣，并揭发对方同某派某系有关系。对方不免照样回敬，于是造成对骂的热闹场面，引起不少读者看晚报打架的兴趣。后来有一个时期，他和《大同晚报》的龚德柏又照演了一场。因成、龚二人原是办《世界晚报》的伙伴，在这场笔墨官司中，双方互揭隐私，更显得热闹。以后成又另想花招，有意识地找一些权贵，如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和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等为对象加以攻击，一方面可以哗众取宠，博取敢言的名声；一方面引起权贵干涉，借此提高声价，扩充报纸的销路。”

有意为之的促销之举，想得辛苦，用着吃力，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效果并不显著。而无意为之的飞来横祸，逢凶化吉之后，似是神来之笔，犹如灵佑庇护，却收功倍而事半之效。《世界晚报》的因“祸”得“福”，便是成舍我的造化所至。

1924年秋天，拥兵关外的张作霖终于耐不住等待，急于想率军入京，主掌朝纲。交火的借口是随时可以找到的。几次零星战斗过后，引爆了第二次“直

奉大战”。贿选总统曹锟，舍不得他花大把银子买来的总统宝座就此坍塌。他指示吴佩孚立即出兵，将奉军阻在北京城外。

这吴佩孚满脑子迷信思想，行军打仗都要以黄历行事，以扶乩取舍。他专门从开封调来了一个叫“张福来”的大将，由他领兵出征，以期旗开得胜，祸尽福来。

这可是各报争抢的头条新闻。《世界晚报》也不例外，拿到稿子，做了这样一个新闻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那天中午，外交部有个记者招待会，并邀记者午餐。但中午时分是晚报最忙的时候，因为下午两点左右报纸就要印完上街。中午定稿子、改标题、看大样，各晚报编辑部内通常忙碌异常。《世界晚报》的各版也正在排版当中，大样还没出来。龚德柏说：“外交部开会的时候快到了，可能有重要报告，你赶快去开会，今天的大样由我来看，有什么关系呢？”成舍我嘱咐了一句：“你要当心啊！不可错字。”便匆匆往外交部赶去。

会议结束，午餐过后，成舍我乘人力车回报馆。街头，报贩们已经在叫卖《世界晚报》了。成舍我买了一份浏览起来。第一眼他便如五雷轰顶，两眼发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头题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福”字竟误植为“祸”字，那头题便成了“前敌总指挥张祸来今早出发”。那吴佩孚还不气得火冒三丈、杀人泄愤？！成舍我急忙赶回报馆，那龚德柏还在桌前阅稿，浑然不觉呢！成舍我把那个错字指给他看，龚德柏顿时“吓得呆若木鸡，久久不能自语”。成舍我当机立断，吩咐龚德柏赶紧整理贵重物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立即雇车，赶往东交民巷，躲到六国饭店里，才算喘了口气。

果然，成舍我、龚德柏逃掉不久，傍晚时分，报馆就被宪兵和警察包围。由于没有抓到当事人，警察便将大门贴了封条，以待处理。

成、龚二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六国饭店急得团团乱转。一来不知此事如何收场，报纸是否还有生路；二来长此住下去，这六国饭店一天好几个大洋的房费也出不起呀！

真是吉人天相。天无绝人之路。风云突变，幸运之门洞开。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趁吴佩孚、张作霖大战于石门寨、山海关一带时，率军倒戈，回师北京，发动了政变，软禁了总统曹锟，驱赶了溥仪小朝廷，自己掌起了国印大玺。《世界晚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仅仅停了五天便复刊了。复刊之日的10

月23日，报纸销路大增，由原来的两三千份一跃而为上万份。成舍我名声大噪，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当然，成舍我还是一阵阵后怕。这种“因祸得福”揽声誉的游戏，风险太大。那是在悬崖上走钢丝，一旦掌握不好平衡，便会坠下深渊，粉身碎骨。

《世界晚报》创刊不足一年，还远未到赢利的程度，成舍我已经急不可耐，要兴办新的报纸了。晨报市场是报纸竞争的主战场。人才、资金、人脉、网络尚不充沛时，成舍我只好剑走偏锋，先办张晚报小试身手。以成舍我的冒险个性和才大志高的自视，他是一定要杀进主战场拼个高下、见个输赢的。

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创刊。报馆设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一所租来的大房子中。办报经费，是以《世界晚报》做抵押，由财政总长贺得霖斡旋，从东陆银行贷出的三千元钱。成舍我的精明可见一斑。办了两张报纸，总共的实有投资只是二百元。他近似于空手套白狼了。

《世界日报》是对开八版，第五版是每月一期的石印“世界画报”。半年多后，成舍我又将这画报单独出版。至此，不足两年时间，《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相继出版，“世界”报系渐成格局。成舍我的报业帝国还真被他建成了。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个人奋斗终至成功的一个典范。王新命那句“叫花子过日子”的断语，还真是下错了！

《世界日报》的新闻采编，略似于《世界晚报》，但由于是早晨出版，竞争更为激烈，因而《世界日报》的新闻完全以吸引读者为出发点。重点新闻突出处理，大字刊出；标题制作一语惊人、抓人眼球；内容不拘一格，生动活泼等，都是《世界日报》的办报特色。

那时各报的头版头条，依惯例都是军事、政治新闻。军阀混战，政府走马灯般的交替，成为报纸头题也情有可原。而《世界日报》却打破常规，有些地方或社会新闻，如女师学生被军警殴打、教育部强行接收女师大、银行被窃巨款等，也都编为头条新闻刊发。九六公债行情暴涨暴落，引起社会很大波动。其他报纸都在“经济界”里处理此类稿件，《世界日报》却把它拿到了要闻版上。1925年8月2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司长刘百昭带人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紧闭校门抗议，刘百昭竟越墙进去。《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刘百昭爬墙而入》。1925年11月29日的新闻标题是《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世界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

及死难者照片，画刊和副刊都出了专刊。报纸上发表了署名“舍我”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的社评，严正提出了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亡者三项要求。当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等五人，企图转移视线、推卸责任时，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政府卫队犯有杀人罪行时，《世界日报》《世界晚报》都及时发表了社评，严加谴责。

创办《世界日报》时，成舍我做出了一个重大而正确的决定，斥巨资购买印刷机。以前印报，都是社会印刷厂承印。这些印刷厂，毫无新闻观念，只知唯利是图。校样多改几遍，他便牢骚满腹，甚至有些错用标点、文字，他连改都不改，你催得急了，他便找借口拖延，急得你六神无主、抓耳挠腮。有时报纸正印着呢，工人们就高喊饿了，不给加餐就躺倒不干了。报纸是新闻纸，时效就是生命，早半个小时上市，就能占领市场，反之，再好的新闻也无人问津。要想出好报、出早报，必不能受制于人，必得有自己的印刷厂不可。成舍我的两台新式印刷机，让《世界日报》如虎添翼。清晨，在印刷机的有节奏的声响中入睡，是成舍我最幸福的事情。有时，机器偶有故障，停机检修，他竟能一个激灵醒来，睡不着了。

正当北京的报人们客观办报，公正言论，为再造共和，统一中国摇旗呐喊的时候，北京城头不断变幻的大王旗，却杀机四伏，磨刀霍霍。直奉大战还没打出个眉目，冯玉祥的政变却让这两路军阀联起手来。“直奉联军”打进北京，赶跑了冯玉祥，北洋政府的段祺瑞重新执政，张作霖、张宗昌以“讨赤”之名，向曾经攻击过他们的报纸和报人下手了。1926年4月24日，以“勾结苏俄”罪名逮捕了《京报》社长邵飘萍，两天后，邵飘萍在天桥刑场惨遭杀害。8月6日深夜，又以“通赤”之名逮捕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不经审判，三个小时后随即枪决于天桥刑场。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第三个，轮到成舍我了。8月7日凌晨，处决林白水不足二十四小时之后，宪兵包围了《世界日报》报馆。那是半夜一点多钟（林白水也是在这个时间被抓的），成舍我看完了报纸大样刚刚睡下，“来了一屋子枪兵”，传令“宪兵司令部王司令请你谈话”。成舍我情知“大事不好”，但又不能反抗，只好老老实实跟着走。临走之前，他抓过一张纸，匆匆写下了一句“找孙宝琦求救”，留给了家人。

成舍我被抓后，宪兵司令部宣布了他三大罪状：恶毒反奉；和冯玉祥有密

切勾结；替国民党广为宣传，最近还接受广州方面十万大洋之宣传费等。成舍我听这些罪名，寒从脚起，冷彻全身。他知道，凭这些罪名，极刑是躲不过去的了。其实，从上了卡车押往宪兵司令部的路上，他就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只觉得一颗子弹从后脑打进去，前脑穿出来，凉飕飕的。

成舍我被捕当夜，夫人杨璠便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孙景阳，由孙景阳带着去见其父、前国务总理孙宝琦。杨璠一见孙宝琦，便双膝跪地，哭诉情由，请求孙宝琦设法营救。孙宝琦与张宗昌是旧交，见事态严重，天一亮就赶到石老娘胡同张公馆，就宪兵司令部所列三大罪状，一一为成舍我解释、开脱，商请缓颊行事。张宗昌碍于孙宝琦北方政界元老的身份，应允手下留情，绝不重办，保成舍我一条性命。孙宝琦辞出后，张宗昌当晚复信，说：“本应立予枪决，此承尊嘱，已改处无期徒刑”。孙宝琦明白，这仅仅是给了他一点点面子，若要成舍我全身而出，还得去求张宗昌。无奈，孙宝琦二次登门，再次申明成舍我决无接受国民党宣传经费之事。此事不能坐实，便应立即放人。张宗昌见此情形，料定孙宝琦与成舍我关系非同一般，乐得送个顺水人情，于是答应对判刑一事再做考虑。

狱中的成舍我，度日如年。释放回家后，他回顾了那段大悲大喜又颇带滑稽色彩的生命历程：

第四天下午，一位副官来叫我，说王司令（王琦）等我说话，这个王司令是张宗昌亲信，在张宗昌的极盛时期，他真算红得发紫，无恶不作。当我进到他办公室时，竟出我意料，他一变其骄横凶恶的态度，很客气的向我说明：这次很对不住，委屈了你好几天，现在督办（张宗昌）已有命令，叫我将你送交孙慕老，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说完，他就派一名副官，让我回屋收拾随身杂物，陪我乘车，到永康胡同，孙正在借来避暑的一个私人花园。副官拿出一张大卡片，上面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副官交待完毕，我十分感激，叩谢了孙慕老，于是我回到《世界日报》，结束了四天以来的我毕生未有的一幕惊险怪剧。

将人像货物一般送来交去，签发收条，大约只有中国军阀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在他们眼中，人与物无异，都是棋子、筹码而已，生杀予夺，就凭一句话。

成舍我的四天牢狱，惊煞了亲朋好友。许多人都认为他生还无望，一些朋友还在天桥刑场守候，以期与他最后诀别呢！路透社驻京记者更是抢先发了消息，“成舍我氏已被处决”。

那么，孙宝琦为什么要全力救助成舍我呢？这里面有个成、孙神交的渊源和故事。

孙宝琦是浙江杭州人，在清朝任过督抚。辛亥起义时，孙宝琦在山东为官，因响应独立，被任为都督。民国成立后，历任外交总长、审计局长等。1924年1月曹锟贿选上台任大总统时，孙宝琦年逾六旬，仍受邀出任国务总理。因大力提倡“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等施政纲领，很快得罪了曹锟，并同财政总长王克敏水火不相融。孙宝琦主持行政不久即遭到多方掣肘与排斥，反对派还收买一些报馆主笔写文章对孙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年老昏聩、神智不清等。孙宝琦在位仅半年，便称病辞职，从此不问政事。当各报围攻孙宝琦时，《世界晚报》认为有失言论公正，“抱打不平”，发了不少文章为孙宝琦说话。1924年夏，有一批德发债票要发行。这是人人眼热的事情。债票归财政部管理，王克敏又是曹锟的红人，孙宝琦插不上手。便假意通电全国，此款已由国务会议决定，由财政部开列分配清单，提请国会两院议决，才能分发。孙宝琦故意将通电内容透露给了成舍我，成立即在《世界晚报》全文照登，造成木已成舟之势，让王克敏独揽债票分配大权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孙宝琦下野后，他的大儿子孙景阳有一天突然去拜访了成舍我，在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之后，临走时拿出二百大洋的支票，对《世界晚报》的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再表谢意。说“端午节到了，这是家父的一点小意思。”成舍我连忙阻止：“你这是做什么？我支持孙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块钱，不是就失掉我的原意了吗？何况我一向不要人家的钱，假如我向王克敏要钱，一定会比你这两百块钱多十倍、百倍。这实在不可以，请你赶快收起来。”

孙景阳见成舍我十分坚决，就把支票拿了回去。之后，孙景阳给成舍我写来一信，说他父亲认为像成舍我这样的人很少了，值得做一个换谱的朋友，所谓“义结金兰”。成舍我回信，这倒很好，做个好朋友吗！不过后来，成舍我、孙景阳并没有真正换帖拜把。

成舍我无意中交下的这个忘年之交，关键时刻还真救了他一命。这也是定数。

阴差阳错也的确是命中注定。据说，抓到成舍我的那天夜里，王琦本该立

即报告张宗昌执行枪决。可那天晚上，张宗昌娶了第十房姨太太，王琦不敢搅了张宗昌的好事，心想天亮秉报也不迟。谁知天一亮，孙宝琦就登门张府求情来了。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伐胜利，全国统一之后，各地军阀势力土崩瓦解。张宗昌流亡日本躲了几年，后被张学良召回北平，寓居铁狮子胡同，郁郁寡欢，常独自到公园散心。成舍我也有个习惯，每天“一俟《世界晚报》出版，总多半赶到中山公园，步行一周，并在来今雨轩作短暂的休息”。一天，成舍我、张宗昌竟然在公园里相遇了。成舍我提起往事，张宗昌依然记得，颇为尴尬地说：“那次真对不起，以后请你多帮忙。”两人“狂笑”了一阵，在笑声中告辞了。成舍我说，这一次的笑，是其“生命史上出自心坎最真诚和永不会忘记之一笑”。何也？权力与政客已是过眼烟云，公正的媒体才长久不衰。

那毕竟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成舍我心有余悸。八个月后，张作霖又绞杀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白色恐怖越发强烈。成舍我离开北京，到南方躲避去了。不久，北伐胜利，民国底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舍我盘桓于宁，与友人合作创办了《民生报》。这权宜之计没想到收到了意想不到之效。成舍我的首都专电，让《世界日报》的报道视野大大开拓；来自北平的文化、教育新闻，又让《民生报》及时传播了历史文化之城的讯息。两张报纸，南北呼应，互通有无，一时呈共同繁荣之徵。

北平的报业市场，此时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与变革。久负盛名的《晨报》，是研究系政客的言论机关，北洋政府垮台后，这些政客失去依附，于1928年6月5日首先自动停刊。由日本外务省支持、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自1902年在北京创刊以来，一直是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顺天时报》越来越被大众所不齿。由过去每天销售一万四千多份，降至连四千份也销不上去了。在赔进去十几万元之后，于1930年3月27日宣布停刊。《社会日报》本是林白水一人独撑。白水先生命丧黄泉后，《社会日报》随即销声。素有读者的《京报》，在邵飘萍遇害后停刊整伤。后飘萍夫人撑起门面，恢复出刊，但因失了邵飘萍这样的英才，《京报》未能恢复往日声誉。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中华大地总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张学良在北京成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自任行营主任。他招集《晨报》旧有人员，网罗了其他报纸编辑记者，出版了《北平晨报》。军政机关背景太重、干涉太多，

《北平晨报》实难有大的发展。一度销售甚广的北京《益世报》，也在动荡中消沉，很难守住教会报纸的传教功能和底线，已是一蹶不振。这一番分化、动荡过后，倒成就了《世界日报》北平市场报纸老大的龙头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成舍我和《世界日报》，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强烈反对不抵抗主义，积极主张抗日，热情支持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公正报人的情操。9月19日《世界晚报》要闻版、9月20日《世界日报》要闻版，分别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日报头条大字标题《国难至矣，速起御侮！日军昨陷沈阳！》使读者触目惊心，激起国人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决心。

成舍我奋笔疾书，以“百忧”的笔名发表社论《国人抗日应有的认识》。他说：“国人于不抵抗方略下，应有一最后之防线，否则不抵抗三字，直可为民族崩溃之别解。”他主张“立止内争，协力御侮，实为今日最迫切之惟一要务。否则国亡无日，异日既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成舍我在社论中痛陈：“关外数千里膏腴之地，势将为日军暂时割据，非复我有，稍有人心，安得不锥心泣血，誓死奋起？惟举国对外，事贵有济，于此生死存亡之交，一心畏避，任人宰割固非二十世纪自主民族所应有，然若专恃浮躁愤激之词，挑拨感情，恐不足震慑强敌，反而貽前途无穷之纷扰。”“应始终坚持，宁使狰狞凶恶之日军，长此袭据，而城下之盟决不可屈。苟所谓国际公法及公理，尚有丝毫存在，则此种强盗行为之占领，我终有得直之一日。”

10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称“为维持国家人格计，将不惜一切牺牲。”他说，“抵抗失败，固足致国家危亡，然拱手退让，其危亡亦必相等。”《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响应，呼吁国人一致督促政府对日宣战，进一步主张宣布对日绝交，“今日惟一要图惟有一战，养兵百万，非侮临头，不能一战，本已莫大可耻。国土任人占领，国人任人屠杀，乃犹不出一战，并世各国未尝有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界日报》北平报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已被日本侵略者覬覦良久。“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兵临城下之际，便唆使日本特务、汉奸威逼利诱，企图使成舍我屈服，使《世界日报》为其所用。日军入城之前，北平城内汉奸已是弹冠相庆，招摇过市，大肆活动。著名大汉奸潘毓桂出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组织地方维持会。为把持舆论计，潘毓桂将成舍我也列入

了维持会的委员名单之内。潘厚颜无耻地对成舍我说：“我是铁筋洋灰做成的大汉奸，说干就干，决不含糊。你如若畏首畏尾，怕脱裤子，不但是事业维持不住，连安全都可能有问题。”面对赤裸裸的敲诈和威胁，成舍我怒不可遏，他通宵不寐，思忖再三，痛下决心，决不事敌，决不当汉奸。日军进城第二天，他毅然停掉《世界日报》，潜往天津。日军派宪兵和特务去报馆搜查，劫走无线电收报机，逮捕了部分职工。8月15日，潘毓桂派宋介、魏诚斋等汉奸喽啰率大批警察接收了《世界日报》，并用原名复刊。成舍我十几年奋斗的心血和财产，就这样落入了敌伪手中。

国破身亡，家仇国恨，成舍我五内俱焚。他由天津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香港，一路逃难，一路谋划着重新出版《世界日报》，终因时局动荡、资金不足，一次次努力化作泡影，一次次希望复归破灭，报人之心，肝肠寸断。

直到1944年，成舍我由桂林避战火而入重庆。国民党在桂林的《扫荡报》也退到重庆，无心再办。成舍我联络了几个同人，出资买下了《扫荡报》的设备，终于在重庆复刊了合资经营的《世界日报》，七年的奔波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成舍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他的报纸。他将重庆的《世界日报》托人代管，9月便搭上飞机飞往上海，收回了早年在沪创办的《立报》后，立即北飞北平，接收了《世界日报》的房屋和资产。值得庆幸的是，除了一部轮转印刷机和十六部平版印刷机，还多了一台凹印机，抢到了大量白报纸。成舍我马上着手组建编辑部，力争早日复刊。

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同日复刊。成舍我心潮难平，激荡于胸，提笔写下了充满感情的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我以及世界日报同人心坎上的一些杂感，写出献给我们今日的读者，尤其我们这时代的报人”：

我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踞，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残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

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我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现在我只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的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报人！

接下来，成舍我从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分析了抗战胜利之后，报纸应担负的重建国家、改造社会的艰巨任务。他认为，报纸的超然态度、自由的思想，是引导舆论的基本前提。成舍我看重人民的选择和力量。他说“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有力量，任何党派，应该听主人的话。”文章的最后，成舍我满怀深情地说：

归根结底，我们真不能否认这一时代的报人，确太幸运。国内军阀，摧毁不了我们；外国帝国主义者，也消灭不了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挺起腰杆，替四万万五千万国民说话，我们要发挥舆论权威，一方面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

一方面改造封建腐恶的社会。我们的任务是何等伟大；我们的前途是何等光明。眼前若干错综复杂的危机，只是黎明前暂时的昏晦。大家努力！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将为国家奠下富强康乐的基石，将为后世留下灿烂丰厚的资产。我们何幸而为这一时代的报人！在万千报人奋斗的行列中，我及每一世界日报同仁，都愿发愤淬砺，将永远追随先进，成为这一行列中的一员！

成舍我一辈子刚正不阿，不事权贵，不愿拿原则做交易，不愿屈膝以讨巧。他顶撞、拂逆汪精卫、蒋介石父子的故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佳话。

1934年，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时，记者采访到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的贪污渎职劣迹。当时有人劝成舍我别与汪精卫过不去，而且彭学沛又是成太太萧宗让的姑父。成舍我认为，主持公道，揭露贪腐是报纸的职责所在。他义无反顾地在《民生报》上公开披露。汪精卫恼羞成怒，指使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侵犯名誉权。开庭之日，成舍我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两个小时，据理力争，迫使对方撤诉。汪精卫怀恨在心，找了个借口将成舍我逮捕并关押了四十多天，还责令《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出狱后，汪精卫的属下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你不如与汪先生妥协，给他写一封道歉信，民生报便可恢复。”成舍我严词拒绝，说出了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大陆解放，成舍我到台湾后，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1959年的一天，当时的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找到成舍我说：“上面有意要让一些过去在大陆有声望的报纸在台湾出版，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成舍我却回答：“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能给蒋公写信。”陶希圣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

成舍我早年加入辛亥青年军时，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后来他以办报为职业，以中立为标榜，宣布退出国民党。蒋经国上台执政后，曾对成舍我的好朋友、国民党中常委黄少谷说：“成舍我是我党的老党员，你可劝他归队，也不必

办什么手续，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成舍我听说后回答，“我今年已八十二岁了，当了多年的‘社会贤达’，我想就不必再归队了吧！”回了蒋经国一个软钉子。据说蒋经国知道成舍我的态度后，甚为不快。

成舍我的节俭和吝啬，也是出了名的。他把报纸，真的是当成了自家的事业，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能省一点是一点。《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记者、职员、练习生，都是采取招聘招考的办法。那时就业状况并不好，成舍我每次招聘时，总有大大超过录取量的人数报名，他便极力提高标准、降低工资，人们为生活计，也只好勉强应聘。成舍我用人，算得上用人不疑，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出错误，他便放手大胆用人去做。可论到薪金报酬，他却抠门得很，无论经营状况如何好转、回升，他的职工的薪酬，比起北平的其他报纸来，都是低的。

成舍我的报馆，没有福利待遇。早期年节休刊时，还能放几天假。后来报纸越办越红火，发行、广告都不断攀升时，成舍我便以国难当头为借口，年节也不休刊了，对外以“每年发行三百六十五份”为标榜。编辑因病因事请假，须自行托人代编，否则报馆找人代替，由请假人付工资。《世界晚报》某编辑结婚时，是编完了当天的报纸才去做新郎的，一时传为笑柄。职工按工作性质，分别规定上班时间，并要求严格遵守。迟到三次为请假一天，旷工一天为请假三天，月底结算，照扣工资。在大家一再要求下，到1936年，成舍我才同意每人每周轮休半天。而且，在轮休的前一天晚上，必须上个夜班。

成舍我的奖励都是动态的。作为记者，你上个月做得好，写了许多独家新闻，轰动一时，他会给你加薪几十元。如果你下个月没有这么多好稿子，成舍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的薪水减下来。

成舍我还制定严格的差错扣罚办法。无论是编辑、记者、校对、拣字、排版，谁的差错就扣罚谁。有时一月下来，被七扣八扣之后，所得没有几元，连吃饭都成问题。抗战胜利后，南京玄武湖展出了一只活的大玳瑁，《世界日报》记者发稿时，误写为“大乌龟”。第二天翻阅了各报的报道后，成舍我去电报质询，为省电报费，他的电文是：“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闻者无不笑破肚皮。

重庆《世界日报》时期，成舍我惨淡经营，勉强维持。他对职工实行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职工食堂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舍我始终不许。1945

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消息在中午传到重庆，职工们正在食堂吃午饭，成舍我借题发挥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满堂哄笑。

艰苦出人才。《世界日报》的工作条件一向是艰苦的，在那“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环境中，的确为新闻界造就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世界日报》开的是流水席，一批人进去了，一批人出来了；又一批人进去了，又一批人出来了。进去时是生手，出来的都是行家。成舍我没有延揽、留下大牌的、享有声望的编辑、记者，这也许是他的失败，也许正是他的成功。人员的极大流动，才造就了世界报系的欣欣向荣，较少拘泥。可能由于人事流动太大，成舍我提拔干部是很放手的。只要你肯出力，不计较钱的多少，而又稍具才干，往往能受重用。因而，在新陈代谢之中，锻炼了人的工作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那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其他的报馆都乐于接纳。当时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这话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它从侧面反衬了“成舍我是刻薄起家”的说法。

当然，成舍我也为他的“小器”付出了代价。当年，范长江打算进行西部长途跋涉采访时，先是把报道计划交给了《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贺逸文。范长江只要求提供一点路费，刊用的稿子发稿酬即可。贺逸文将计划转呈成舍我，成舍我思忖再三，表示《世界日报》不需要此类稿件，将计划退回了范长江。其实，是成舍我舍不得那几十块钱的采访费用。《大公报》的胡政之拿到这个采访计划后，如获至宝，立即约见范长江，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采访活动。见让《大公报》得了个大便宜，成舍我后悔不已。

大陆易手之际，成舍我左右摇摆，不知何去何从。北平和平解放之时，成舍我正在南京，奔波在“国民参政员”的职务之上。共产党立即宣布没收了《世界日报》的所有财产，这让成舍我下定了离去的决心。《世界日报》是他的心头之肉，是他全部情感的寄托，时隔十二年后再度被“没收”，他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但是，他对国民党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不想随它去台湾。成舍我先去了香港，暂且安身，以观时局。三年后，他还是携妇将雏，去了台湾。此后几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1955年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现已发展成为“世界新闻大学”。1987年，九十高龄之

际，成舍我迎来了台湾戒严令的取消，党禁、报禁为之放开。他不顾年事已高，申请创办了《中国立报》。《世界日报》已羽化为他的新闻教学基地，早年在上海创办的《立报》，在台湾借木重生，办报、办学两翼重新振翅，成舍我老当益壮，老来逢时，所有的理想正逐步走向现实。只是三年之后，还未见《中国立报》的根基扎好，成舍我便驾鹤西去，走完了多彩而漫长的一生。

成舍我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他终身以记者自许。直到晚年，病中口不能言时，仍以笔书写“我要说话”四字。这恰是成舍我毕生事业的写照。

2009年10月17日，成舍我之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经济学家成思危在重庆参加一个媒体论坛。在论及对中国新闻媒体的期望时，成思危放言：一是振聋发聩，二是推陈出新，三是抑恶扬善，四是求真务实。真有乃父风采！

主要参考文献

- 张友鸾：《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重庆，1982年12月第一版。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2004年10月第一版。
刘瑞琳：《温故（十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9年8月第一版。
刘瑞琳：《温故（十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0年1月第一版。
成思危：《成舍我的四种精神》，载于1998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王芸生

王芸生不是新记《大公报》公司的发起人，但却是《大公报》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是张季鸾一手发现、一手培养、一手使用的《大公报》重要干部之一。好多年之后，人们淡忘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公报》功臣，而仅仅记住了王芸生。甚至有了“《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之说。研究《大公报》，真的不能不充分涉及王芸生。

王芸生（早年名王德鹏），年轻时曾经相当激进过一阵子。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在华北大地的反帝、反封建的滚滚革命洪流，让这个茶叶店、布店、木匠铺的小学徒，风光地实现了一次自我价值。波推峰举，王芸生担任了天津洋务华工会的宣传部长，还主编着工会的一份报纸《民力报》，激扬文字，纵论时局，写了大量反帝、反军阀，支持革命军北伐的评论。1925年底，他加入了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总是像潮汐一样，此消彼长，变幻莫测。1926年3月22日清晨，支持北伐的冯玉祥国民军退出了天津，直鲁联军进袭津门。王芸生匆忙之中登上了招商局的一艘轮船，在最后关头逃离天津，流亡上海。

在上海，经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秦邦宪和另一名共产党员彭述之介绍，王芸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王芸生的情绪也十分低落。1927年春节前后，因母亲病重，王芸生潜回天津照看母亲，并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所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4月12日，蒋介石突然举起了屠刀，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上海宝山路上已血流成河，武汉、长沙也相继大开杀戒。王芸生被这血腥的场面完全吓呆了。他不知道，冥冥之中是

否有神灵召唤他提早两个月离开上海那血雨腥风的是非之地。他有一个朋友，比他晚去上海几个月，也晚走了几个月，结局便有了天壤之别。“当我在北方惊悉南方恶潮时，这位朋友的热血已与许多人的血流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女孩子，为革命的情绪所鼓舞，要到武汉去投军，我曾帮助她取得了一个资格，并确知她已登上了长江轮。两天后，报纸上登出一段新闻，说一只轮船由上海驶到南京时，一大批去武汉投军的学生被扣留，且给孙传芳杀掉了。这段新闻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现在，我还担心着那个女孩子是否尚在人间。”

王芸生决心彻底退缩了。缺少理论素养和远见卓识的他，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何以要如此相互杀戮。他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怎么又成了“叛徒”？党内纷争令他十分失望。1927年6月2日，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唯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

在临阵易帜这一点上，《新民报》的邓季惺与王芸生可谓殊途同归。早年的邓季惺也是一个进步学生，向往革命，十六七岁时，便与女同学结伴出川，云游江南，寻找能实现她革命理想的地方和学校。可恋爱、结婚之后，丈夫吴竹似生生将她拉回家中，相夫理家，平安度日。大女儿出生后，邓季惺激情复萌。1927年春天，经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吴玉章介绍，邓季惺去四川巴县女中担任训育员。上任的那天，正是3月31日。年轻的邓季惺心中揣着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和憧憬，披着一身春光来到这个离重庆市不到十公里的县城。可是，巴县已经被浸在血泊之中了。就在这一天，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三·三一”屠杀，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邓季惺被深深惊悚了。想想病中的丈夫，看看身边幼小的女儿，她想，“我既然没有决死的心，又不跟反动派同流合污，那么，不必要参加革命组织，只孤立地终身服务于社会，争取社会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当正义的了。”

王芸生志在新闻。尤其是政论新闻。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纤纤儒夫，摇一管鹅毛细笔，纵论天下，开启民智，评点时局，臧否朝野，以一己之力，助社会进步。

英敛之1902年参与创办的《大公报》，一路艰辛地走着，几经停刊，至1925年已是风雨飘摇，难以为继了。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出资接

手了《大公报》，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大公报》的新生开始了。温文尔雅、淡定从容的新闻才子张季鸾，为《大公报》制定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

王芸生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报纸《华北新闻》写社论时，曾与张季鸾有过一场笔墨“官司”。

1927年3月，北伐军打进南京，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城，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击，并捣毁了南京的一些外国领事馆。一腔爱国热情、支持北伐的王芸生，在《华北新闻》上撰写社论，抗议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之举。而此一时期的《大公报》，却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躬自厚》。社评说：“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于责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今之中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张季鸾的论说的确是过于圆滑。貌似公允，实则是各打五十大板。

张季鸾的社评在《大公报》上见报的第二天，4月1日，王芸生又在《华北新闻》发表了他写的反驳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他满腔热忱地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这显然超出了张季鸾论题的范围。他对年轻人的冲动和激情一笑置之，没有再做回应。但是他特别打听了《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并托人传话，希望与王芸生面晤。王芸生为此专程去《大公报》拜访了张季鸾。这是他们最初的相见与相识。

王芸生对于《大公报》的“四不”办报原则，在精神上是相当契合的。新记《大公报》人才荟萃，资金宽余，步履稳健，发展迅速，短短几年，已是天津数一数二的舆论重镇。王芸生对于《大公报》，真可谓是景仰仰之，景行行之。1929年，在坎坷跌宕了多年之后，王芸生提笔给张季鸾写了一封信，希望在《大公报》谋一职位。张季鸾没有忘记这位1927年4月初在《华北新闻》上与他打笔墨之仗的好学的年轻人，他冰释龃龉，不计前嫌，将王芸生招至《大公报》社。

有了《大公报》这个广阔的平台，有了张季鸾这样心智俱佳、循循善诱的师长，王芸生在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中大施身手，一展宏图。

王芸生初入《大公报》时，做的是地方新闻编辑，第二年又参与编辑《大公报》的姊妹刊《国闻周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国震惊。《大公报》确定了“教战”、“明耻”的应对策略。所谓“明耻”即尽快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就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指定由王芸生全力负责。王芸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艰难的工作。自1931年10月开始，他入图书馆，跑资料室，甚至多次往询北平故宫博物馆，在浩如烟海的清史档案中细细披阅，仔细查找。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王芸生初步理出了头绪，形成了专栏的纲目、结构。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正式推出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刊登一篇，连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这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长时间、大跨度连载文章。每日的连载文章之前，王芸生都不忘写下这样十六个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锵有声。

日寇步步紧逼，北方局势吃紧。新记《大公报》公司未雨绸缪，于1936年4月出刊了《大公报》上海版。当年9月，王芸生奉命南下，出任上海《大公报》编辑部主任。

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夜，华北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于学潮，王芸生历来有自己的看法。1936年12月，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寄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引来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当时二十二岁的青年革命者顾准，也写来商榷的信函。王芸生一鼓作气，在五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了《再寄北方青年》《三寄北方青年》……共六篇文章。这“六寄北方青年”集中表现的是王芸生“读书第一”论和“学生不党”论两个基本观点。

王芸生在文章中写道：我曾亲眼看见你们自“一·二·九”以来的苦斗，你们在北方局势最震荡时喊出拥护国家的口号，你们在北方大局要崩溃时阻止了国家的分裂，这些情形都曾使我感动得流泪。在以后的救亡运动中，虽然你们的步骤稍有凌乱，把敌气的怒潮一部分转成内讧的意气，但我总以为这种缺憾是可以由理智来弥补的。王芸生说，“读书与救国”的问题，人们对于它

的答案好像鸡生蛋或蛋生鸡那样费踌躇，我的答案却很简单，便是“读书第一”。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在像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像今年纪念五四时，北平新旧学联竟大动其武，无论如何，是使人万分伤心的。王芸生继续分析道，学生党争之风，自军事告一段落，似已稍杀，然事实上之斗争，仍俯拾即是。北平学潮之波澜重叠，及各种复杂现象，任何人皆不能断定无党派背影。……在近代立宪国家，多行军人不党制，所以防军人供党争也。然此非一党专政之事，尚不必据此以论中国问题，而学生不党，则为万分切要之事。愿各党各派认清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学生诸君自加觉悟，勿以歧途自误，自害且害国也。王芸生还“现身说法”地写道，学生参加党派之争，我是深知其况味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许多朋友为党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数人供党派做撒豆成兵的资料，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王芸生的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说这些话难免有些不合时宜。

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报纸，自15日起须送报纸小样接受日方新闻检查。总经理胡政之召集王芸生、张琴南、李子宽等主要人物商量对策，一致决定，宁肯停版，决不接受新闻检查。胡政之当即拍板：《大公报》上海版次日停刊。

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少有的一天同时刊发了两篇社评，而且这两篇社评都是王芸生写的。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一篇是《不投降论》。《暂别上海读者》说：“本报津版已随国权的中断而自动停版，今天又到了本报沪版与读者告别的时候。国军是上月12日完全退出了上海，摆在我们报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随国军的退却而停版，另一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撑持下去，尽可能地为我们上海的三百万同胞服务一天算一天，一直尽了我们最后的力量为止。但是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不容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国军退出的上

海完全成了孤岛，我们在这孤岛上又支撑了三十多天。在这三十多天内，我们继续记载南北各战场的战迹，继续鼓舞国人抗战的决心，关于上海的一切，尤充满了沉痛的篇幅。特殊势力的气焰一天天增高，租界内中国人的生命财产也一再受到非常的侵犯，我们这个中国人办的中国报，自然也渐渐地不能与特殊势力并存了。特殊势力先接收了我们的新闻检查所，成立了他们的新闻检查机关。这个机关要求我们送报，我们未送；昨天又来‘通告’，说：‘自12月15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检查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

另一篇社评《不投降论》写得慷慨激昂：“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的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保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国必不亡。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强敌，这两个虽都被奸佞陷害，赍志以歿，然忠烈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涕，播下复仇种子。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祸及身家？凛然的历史教训，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牢记心头。”“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两篇社评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张一腔之忿懣，获一时之好评！

自1926年至1941年，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十数年。《大公报》这个时期的社论，绝大多数是张季鸾亲自撰写或参与起草的，这给《大公报》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笔政传统。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王芸生评价张季鸾的文章说：“我觉得极难得的是他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

而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从个性上分析了张季鸾、王芸生文章的不同风格。他说，同样是激情文字，张是“含而不露”，王是“江河直泻”。张季鸾向以“老

谋深虑”著称。他写的社评没有深奥的道理，能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文章常有对仗的警句，读起来琅琅上口。而王芸生的文章则如江河奔泻，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张、王相互辉映，蔚成《大公报》社评的特有风格。

其实，个人秉性和文字风格，不是评判文章高下的惟一标准，信念和理想的不同追求，往往造就了文章的大俗大雅、大开大阖。张季鸾是个国家主义者，他认可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极力维护他的合法权利。蒋介石如同找到知音一般，与张季鸾神交既深且久。张季鸾病逝，蒋介石前往吊唁，并亲撰挽联一副：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而王芸生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崇尚新闻自由，追寻媒体的公器、公正地位。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在参与《大公报》笔政之初，不断给他带来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张季鸾告诫他的为文的两句话：“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也就无所适用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第二天的《大公报》第四版，整版都是鲁迅逝世的消息、通讯及新闻照片等。竖排的报纸排到最后，在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空白，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无奈亲自动手，补了一个短评，题为《悼鲁迅先生》，全文一共三段：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少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王芸生的本意，也许是想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他在进行这个“补白”时，可能记起了鲁迅的那句名言：左翼之中，只有革命，没有文学。但是，这个短评一见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界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大公报》副刊编辑萧乾，愤然找到胡政之，坚决要求辞职。他说他感到好像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

1940年夏天，四川粮价连续暴涨，老百姓叫苦不迭。6月29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天时人事之雨》，他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拍手称快。可张季鸾在读完这篇社评后却对王芸生说：“芸生，我们的报纸怎么能主张杀人呢！”

1941年8月，敌人对重庆进行了连续几个月的狂轰滥炸，山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8月18日，王芸生到长江南岸汪山探望病重的张季鸾。谈到日本轰炸机的猖狂，王芸生眉头不展。张季鸾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答：“敌机走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问：“敌机走了，老百姓在干什么？”王芸生说：“我来的路上，看到老百姓在田里割稻子。”突然，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你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敌机来袭时，我们的农民在割稻子。’”于是，第二天的《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文中说：“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日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这是一篇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时评，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王芸生说，这是我与张先生合作的一篇社评，也是最值得纪念的。

如果硬要在《大公报》内分什么派别的话，那么，徐铸成曾经是胡政之的得意门生，而王芸生则可称之为张季鸾的精神传人。1941年9月6日凌晨4时，久困于肺病的折磨，《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享年仅五十三岁。王芸生称“此在本报为塌天之祸事，在国家亦为巨大之损失。”

9月8日，由王芸生亲自撰写的社评《敬悼季鸾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

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

人则以国士自许。先生为十足之文人，而其言论行谊，则有国士风。先生之学问见识，高人一等；而热情忠悃，常流笔端。先生尝言：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勇则勇于发表。忠勇二字，本做人行事之本，先生引为报人天职，故先生之主张能忠贞不惑，发表亦少所禁忌。先生文章之影响大，感人深，胥由忠勇二字得来……

先生尝对同人言：新闻记者不为威胁易，不为利诱亦易，惟不为名惑最难。先生言论终身，初期仅署别号，接办本报后文章概不署名。然先生不求名，而名满天下，此殆非躁急之士所能解矣。先生不为名惑之训，不仅不出风头、不骛浮誉之谓，尤有与流俗作战而准备失败之积极精神。先生尝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八个字为报纸之秘诀……

先生以一身系国家三十年舆论之重，继往开来，堪当中国报界之一代大师。于右任先生谓：“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先生何以能达此境界？同人以为其最高兴趣与最低享受实造成之。报人生活，原极辛苦，而先生乐此不疲，实靠其最高兴趣维持。先生于新闻事业永远兴趣盎然，环境之艰，生活之苦，皆不足以阻之。先生三十年做报，无时不在奋斗……

先生成就之大，不徒文章名世，而其人格性情实为基本。先生性和易潇洒，有蔼然仁者之风；而所守不渝，故贞亮冠世。先生交友遍天下，上至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乐与先生为友，而深契生死者，更仆难数。先生不求名而名至，但从其成就自骄，时时以扶弱小同业为念，而尤以奖掖后进为乐……

先生一生，做人无缺陷，成就迈前贤，今日瞑目，毫无遗憾；惟国家尚须此老发言，本报同人尤须先生领导，而先生竟撒手归去矣！先生近年主持抗战言论，而不及见胜利之完成，此真千古恨！……同人不敏，愿绍先生之遗志，效忠言论报国之事，而不坠《大公报》之令誉。呜呼！同人之所以慰先生报先生者，亦唯此矣！亦唯此矣！

文章写得既恣肆汪洋，又缠绵悱恻，情真意切，言从心出。一方面是王芸生从内心深处感佩张季鸾，痛悼他的英年早逝；另一方面，又是惺惺相惜，英雄相怜。很大程度上，是王芸生自我心声的表达。千古文章事，唯“真”最动人。

张季鸾逝世后，王芸生还写了一篇十分得意的社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于香港，情况危急。王芸生找到陈布雷，请陈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告诉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大公报》随即派人去珊瑚坝机场接机。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人西装、戴着墨镜的孔二小姐接走。王芸生闻讯，十分生气。当然，他知道，这样的新闻是通不过审查的。恰巧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惹起了一场俗称“飞机洋狗”的事件。

社评说：“说到修明政治……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却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五十六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另闻此君子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遍传重庆，乃一不见监察院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真是是非模糊，正义泯灭。”

文中所举的“某部长”是指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蒋介石读到社评后雷霆震怒，当天就将郭泰祺撤职了。

王芸生性格耿直、狷介，憎爱分明，嫉恶如仇，道德文章，春秋贤者。王芸生一生把金钱和官职看得很轻。抗战初期，《大公报》盘桓汉口期间，正值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陈诚亲自邀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部长，王芸生当即婉言谢绝了。陈诚连忙补充说：“不要你去办公，你可推荐一个副手帮你就是了。”王芸生仍没接受。不久，陈诚又送来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聘书，每月支取三百元津贴，也被他退了回去。陈诚有一次与王芸生晤面时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芸生听后一笑置之。事后他对朋友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头上已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大公报》迁到重庆后，王芸生又收到

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来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可到了月底，军委会竟送来了数目可观的薪水。王芸生立即把聘书和薪水一并退了回去。张季鸾闻之，称赞王芸生是执行《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的模范。

1947年，中统特务在上海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王芸生亲自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回迁上海。有一次报馆开社务会议，胡政之总经理在会上批评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从来不过问报馆财务状况的王芸生，却一时冲动起来，走过去给了那个经理一记耳光。王芸生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大公报》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

王芸生的狷介，是个性使然，更是那个时代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他一生孜孜以行的，是他为之献身的新闻自由的伟大事业。

王芸生对“新闻自由”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所谓新闻自由，据一般解释，其中包括新闻采访的自由、新闻的传递自由及新闻发布的自由。”“新闻就是客观事实的写照，为美为瑕，事实是顶好的说明。苟根据事实所写的新闻自由发表，自由交换，一任其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则真相毕露，丑恶者无处藏身，也就无从矫造欺瞒，偷天换日。”王芸生的“新闻自由”的观念，是美国新闻观的延续和发展，是对权力的监督和挑战。

王芸生对报纸的功能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报纸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反映现实。如果现实是丑恶的，怎样控制，镜子也无从把它照美了。镜子可以摔碎，却不能借挖掉后面几块水银来光鲜面容，那只是把镜子本身弄得破烂而已。”他说，“向世界夸耀国家如何光荣地尊重新闻自由，不管那光荣真实到怎样程度，能够把新闻自由认做光荣，这趋向总是极其可喜的。”“如果把新闻言路严密堵塞起来，我们敢说沾光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升斗小民，却必然是胆大包天的贪污腐败的一群。”

王芸生告诫各位同人：“新闻自由，是新闻记者的本分要求，这等于要求一种权利。但权利不应该是片面享受的，我们还应该忠实地尽到我们的义务……新闻记者怎样执行这种实际、庄严而有意义的职务呢？我们认为只有‘真’与‘勇’两个字。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

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新闻自由应该如此求，也应该如此用。”王芸生曾经对初涉新闻的年轻记者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王芸生对“新闻自由”的梦想，集中体现在他1948年记者节的社评《九一之梦》中。中华民国政府决定每年的9月1日为记者节。每到此日，记者们和各类报刊，便借“节”言事，借物抒怀，畅想一番新闻自由的“美好”梦想。在《九一之梦》中，王芸生写道：

报是五颜六色的。这不是说报纸的颜色，而是说报纸的内容。种种样样的报纸，数不清的种类，有的属于政府党，有的属于在野各党派，有的代表大企业家的利益，也有的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这许多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了触犯了刑法上的诽谤，要防被侵害者控诉而被法庭刑讯外，此外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就因为这样，记者们不必服膺中国圣人的三讳主义。他们不必“为尊者讳”，国家元首也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可以随便批评或指责；他们不必“为亲者讳”，那倒无所谓“大义灭亲”，因为真理面前，只论是非，不管亲疏，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一点也不算稀奇；他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举国皆曰好人，他若一旦做了糊涂事，报纸照样群起而攻之。

今天是记者节。这节日，不仅记者们高兴，成千上万的读者更高兴。在记者举行纪念会时，广大的读者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参加……“谁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们今天给他加冕！”读者们一倡万应，于是把手上的报纸折叠成王冠模样，给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记者们每人戴上一顶王冠，冠上并排写上“真”“正”二字。这“真”“正”二字，用意很好，给记者戴上，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记者，不是掺假的记者或打了折扣的记者，而且更代表的是“真理”与“正义”。加冕既毕，万众欢呼。

王芸生确实是沉浸在了他的“南柯”之梦当中。他也只好自嘲：“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的。”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经历了八年外族欺侮和战乱的中国人民，的确需要

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人到中年的王芸生，自由主义思想日臻成熟，“文人论政”的幼稚和执着更加凸显。他固执地认为，只要是有利于和平建国的方针，都是正确的，只要是有悖于统一和稳定的政策，都是反动的。他抡圆了双臂，左一下扇共产党，右一下掴国民党，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王芸生欣喜若狂，他以为国共合作，息兵罢战，就在眼前。他写道：“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以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王芸生也真是太天真了。

1945年11月20日，内战之火日见炽热，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评《质中共》，奉劝中共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特殊政权，以争全国政权。”11月21日，中共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立即发表了反驳的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这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一篇社论，把王芸生比做“好一个妙舌生花的说客呀！”“《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

1946年4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长春之战。4月17日，王芸生撰写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了，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由长春起，整个停止东北之乱；更由东北起，放出全国和平统一的光明。”4月18日，《新华日报》立即反击，发表的社论题目就是《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谁不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谁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国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这就是由于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作祟。《大公报》不但不敢说出这种浅显的真理，反借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

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在《新民报》上发表了他的旧作《沁园春·雪》，说古论今，畅意抒怀。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芸生读罢，很不以为然。他拿出了自己早年写的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在《大公报》上分四次连载。在文前，他写了一段“补识”，“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永久查封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南京《新民报》。王芸生得到消息后十分气愤，当即就写了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文章说：“溽暑炎天之际，中国新闻界又出了不幸事件，南京《新民报》于前天奉命永久停刊。读内政部发言人的谈话，《新民报》受到如此严重的处分，全是为了报道与刊载军事新闻失检之故。这可见在国家不安定的时期做报之困难。我们既属同业，实不胜关切与惶悚之情。”文章还说：“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其以推翻政权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抓住“特权”二字大做文章，向王芸生猛烈攻击，说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怒不可遏，以个人署名文章反驳，竟招来了《中央日报》的连篇炮轰，“三查王芸生”。

《中央日报》1948年7月19日的社论《王芸生先生之第三查》写得饶有风趣：

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的第一查，查出自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经过了《大公报》九个月的准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议苏美英三国共同干涉中国。

我们的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3月以后到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

于反美扶日运动。是他首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指责麦克阿瑟将军扶植日本，必将利用日本军队到中国来，一面攻苏，一面剿共。是他继续不断响应共匪新华社的广播，为共产国际策动的反美扶日运动努力。马路政客，残余保守党和职业学生，反美扶日宣言，都是他王芸生作为宝贵的资料而提供《大公报》的篇幅。他这一贡献大了。这一贡献大可以孤立美国，破坏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誉，为苏联在北太平洋和我们东北的扩展战略开路。

今天我们等待着第三查。本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命令匪党徒“热烈研究”共产国际情报局这一决议，加强教育一般党徒克服民族主义，为共产国际效忠。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狄托（即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

世界上的“机关报”怎么都是这种德性呢？色厉内荏，语言空洞，棍子手中握，帽子满天飞，从主观臆断出发，下骇人听闻结论。民间报纸那种以理服人，条分缕析，委婉柔和，实事求是的言论风格，“机关报”永远学不来，也不屑去学。是的，抡起棒子就可以打人，谁还有说理的耐心啊！

那个时期的王芸生，是在“一连串的烦闷”中过活的。他说：“国大在侃侃议宪，战场在狼狼厮杀。其事极其矛盾，却正并行不悖，真烦闷煞人！”“今天事，大多人民对议宪不甚感兴趣，虽渴望和平安定，而亦无可奈何；甚至对打仗双方无所爱憎，或只有憎，然亦无可奈何。就算打下去吧！何时打完？是一大烦闷。打完了，国家能好吗？又是一大烦闷。”

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迅速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没有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民主建国的平台也垮塌殆尽，蒋介石再也不需要“民主宪政”这块遮羞布了。王芸生“和平建国”的幻想一直没有放弃。这是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曾抱定这样的政治见解，全力推进他们的“第三条道路”。既不主张国民党一党专权，也不希望共产党夺取天下。他们倡议国共两大党精诚合作，整顿党务，整合军队，联合其他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将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之路，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历史宏愿。王芸生们的愿望，真的是“书生之见”，尽管他们在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鼓噪和宣示，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国

共双方，已经没有了任何转圜的余地。眼见战火再起，硝烟弥漫，王芸生绝望至极，提笔写下了《和平无望》的社评后，南避香港，继而，亡命东南亚。直到《大公报》女记者、地下共产党员杨刚策划他发表了“起义”声明后，王芸生才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全国解放后，王芸生海外归来。几经整合，《大公报》只保留了北京版一张报纸。王芸生名为社长，实则已无任何对报纸的控制权和发言权。有人说，解放后的王芸生是“座上宾”，有人说他是“死老虎”，还有人说他作了许多“违心之论”。所有这些评价都是有欠公允和不全面的。在那样一个极左观念横行的年代里，要想保持自己的个性，保留那么一点“文人论政”的自由和姿态，岂非天方夜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芸生在《大公报》奋斗了几十年，功劳、苦劳自不待说。他引起《大公报》内外诟病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主持渝版《大公报》期间，不够宽容，不够大度，对因战火涂炭、汇聚于重庆的《大公报》港版、桂林版的同人防之戒之，水油两分。二是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不少《大公报》的老员工，迎合了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需要。

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后，胡政之日渐忙于他“国民参政员”的事务，重庆《大公报》的日常工作，完全掌握在王芸生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迅速沦陷，港版《大公报》停刊，徐铸成历尽千辛万苦逃回国内，水陆兼程，几经辗转，向大西南进发。战火蔓延，兵临城下，《大公报》桂林版也难以继了，金诚夫带着桂林版的员工，经贵州入川，也往重庆赶去。

对于港、桂两版职工的安置，重庆《大公报》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他们租借了三江村的土地，面向嘉陵江，依山势层层而上，建了七幢平房，竹片外涂抹黄泥，门面也堂皇壮观，让逃难中的职工有了“归家”的感觉。但是说到工作，王芸生却不愿意让港、桂两版的人员到重庆版来搅和。他说服胡政之，新创办了个《大公晚报》，让徐铸成去当主编，让桂林版的郭根去当要闻版编辑。王芸生不愧是办报行家，连《大公晚报》的编辑方针都做了详细要求，不发社评，少登时事新闻，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而已。徐铸成忽然觉得，他过上了“生平最闲散的生活”，有时又感觉是“半冻结的日子”。莫名其妙的规定接踵而至。如，《大公晚报》不发社评，却要求徐铸成每周为《大公报》写一篇言论，至于《大公报》何时用，如何用，那就不关徐铸成的事了。

工作中的摩擦和矛盾很快就表面化了。《大公晚报》的清样送上去审核，拿回来后，要闻版编辑郭根细细看来，发现改动的标题文不对题，词不达意，又“擅自”改了回去。这可不得了了，如此蔑视权威，冒犯权力，真是大逆不道。王芸生便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为由，立即开除了郭根。又过了不久，原桂林版的广告部主任戚家祥与其兄弟戚家柱，因“撤退时利用职务私做生意”，被开除出社。而这二人，皆是金诚夫的亲戚。这就有点“杀鸡儆猴”的意味了。

《大公晚报》那几个版，哪里够徐铸成看的呀。每天两个小时，审完大样就算完事。回到三江村的集体宿舍，徐铸成闲来无事，或埋头读书，或蒙头大睡，实在无聊了，就凭窗望江，数来往于江上的大船小舟。

无奈之下，胡政之出面做工作了。他找来徐铸成和金诚夫，做了一次敞开心扉的交谈。胡政之说：“重庆桂林两馆，好比同根连枝，现在桂林馆以兵灾而停止，这正像倾家荡产的二手房，要来依靠长房，就要‘以小事大’，什么事都要忍让，还要忍气吞声。”说起重庆版的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胡政之说：“他们两位是很有心机的，比如谷冰有事来见我，我虽满腹心事，必整容含笑接谈，以免引起多心。此意，望你们两位，好好体会。”

多年后，有人评论和猜测说，是王芸生嫉妒徐铸成的才华，怕徐抢了他的风头，才不让徐铸成插手重庆《大公报》的编务。这样说，未免太小瞧王芸生了。王芸生不至于那么小肚鸡肠。这只是习惯使然，是权力使然。试想，《大公报》重庆版在王芸生的一手掌管下运行了那么多年（张季鸾在去世几年前已经撒手了），机制、制度、人员，甚至思维方式已成定势，怎么愿意外人来改变它呢？

全国解放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让王芸生战战兢兢。他努力适应着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地批判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1953年9月的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在批驳梁漱溟时话锋一转：“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毛泽东话音刚落，王芸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实承认：“这话是我说的。”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芸生坐下，一顿猛批和炮轰。王芸生事后说：“这时毛主席才是真正对我‘怒斥’！当时心情十分紧张，还不知毛对我将如何‘发落’呢。”

反右运动中，王芸生竟阴差阳错地躲过了“右派分子”的头衔。当然，也没让他轻易过关，逼他交代与《大公报》地下党员李纯青的关系。这个交代，让王芸生后悔了一辈子。“反右时，没有经验，太轻信上面说的话。他们一再让我

交代与李纯青的关系，并说他们已经很清楚，主要考验你是否向党交心。”“他们保证只是组织知道一下就行了，不会扩散，对李纯青不会有影响。”“至于这些话是骗人的话，还是‘策略’的话，只有天知道。”现实的情况是，王芸生交代过后，李纯青被控制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1959年，周恩来亲自找到王芸生，让他撰写《大公报》史，王芸生以各种借口推托，不想揽下这个棘手的难题。当周恩来第三次找王芸生谈此事时，终于挑明让王芸生写《大公报》史，是毛泽东的意思。无奈，王芸生只好应命。他与曹谷冰一起花了大量时间，重新翻阅了几十年的旧《大公报》，并查阅有关资料，两年后，写出了《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篇长文。文章的史实是详尽的，但“纲”和“线”也上得够高的。王、曹在文章中反复申明：“《大公报》是属于大资产阶级的报纸。”

这两篇长文，分期登载在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变成了铅字的正式出版物，王芸生的心中惴惴不安，他不由自主地感叹道：“想不到《大公报》还是由我盖棺定论。”他私下里多次表示：“《大公报》史将来仍需重新写过。”临终前，已大彻大悟的王芸生痛悔不已。他觉得，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都不应该写那篇“自我讨伐”的长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篇文章，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使用了极为刻薄、污秽的语言。他万分痛恨自己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他是蘸着自己的鲜血，研磨着自己的青春生命在给《大公报》抹黑啊！

躲得过反右，逃不掉“文革”。十年浩劫当中，王芸生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随后便去了北京车公庄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

1972年夏天，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田中抵京前，毛泽东让人找来了当年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

6月26日，毛泽东与田中角荣会谈时，两次提到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套书。毛泽东还突然转头向周恩来说，应当让王芸生来参加接待活动。而此时此刻，周恩来根本不知道王芸生在哪里，是死是活也不清楚。会见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一是安排王芸生参加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二是适当安排王芸生参加中日友好交往活动。

指示被层层落实，王芸生被逐级解放。待王芸生回到北京城里的家中时，当日就收到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请柬。9月30日，王芸生手持请柬，诚惶诚恐地步行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宴会。挨斗多年，家被屡“抄”，一身布衣装束，虽手持请柬，却还是被警卫挡在大门之外。因为警卫人员无论如何不相信，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来宾，居然会自己步行而来。经警卫与有关部门多次联系，反复“盘查”，王芸生才被放行。王芸生没有计较这一切，他被巨大的幸福感、安全感包围着。直到看到招待会那隆重、庄严的场面时，王芸生说：“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1980年4月，王芸生的生命进入了最后阶段，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清醒时他说过：“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有必要写了。我那四十年一天都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不写了。但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此时王芸生流下了热泪，情绪也立时激动起来：“我多少次动念头，多少次又都放弃了。他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机敏。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地还一个张季鸾给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事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笔如何下？这么该写的人，我都没写，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都愧对他……”王芸生手抖着拿出一张白纸喃喃道：“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

主要参考文献

- 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7月第一版。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04年9月第一版。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4月第一版。
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4年6月第一版。

徐铸成

晚年徐铸成，因为戒烟，身体有些发福，圆圆的脸庞，慈眉善目，加上那副老式的黑框深度近视眼镜，不笑自喜，其乐陶陶。不谙之人很难把徐铸成与饱经风霜，叱咤风云，三寸毛锥动天下、一支健笔写华章的知名报人联系在一起。

其实，徐铸成心意辽远，自视甚高。他曾经说过，在中国，真正称得上报人的并没有几个人。徐铸成去世后，赵超构先生写文章怀念他，称徐铸成“是个报界有名的全才，能访，能编，能写，而且样样都干得很出色”。被业内人士如此激赏，被新闻同仁高度夸赞，徐铸成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赵超构赞誉的最高标准是在“全才”这一点上。能访，是说能到一线、在新闻现场采访、写稿；能编，是指能主持版面，选稿、编稿、制做标题、文章组合，都能做，而且做得精到；能写，特指能写社评，能写言论。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办报之人以能组织言论写作为很高的境界。因而，旧时的报纸有总编辑与总主笔两个高管职位。总编辑只管新闻，只管版面；总主笔只管社评。每天评此论彼，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总主笔说了算。报纸的总主笔，有时地位高过总编辑。总编辑易求，总主笔难得。而且常常是主持笔政之人，能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的陈独秀、张季鸾、储安平、殷海光，美国的李普曼、赖斯顿，日本的福泽喻吉等，就是这类“总主笔”式的新闻人，他们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再回过头来说“全才”。徐铸成就是这种难得的“能访，能编，能写”之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报人，一生除了新闻事业，再没从事过任何其他职业。还

未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为兼职记者，在新闻这个圈子里蹉跎、辗转、奋斗了一个甲子。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徐铸成应该留下重重的一笔。

1907年，徐铸成的曾祖父七十八岁了。早在几年前，老爷子就放出话来，一定要有一个重孙子。他说，对于四世同堂的老人，阎王爷格外照顾，到阴曹地府报到时，不用向阎王爷下跪。就在这一年，徐铸成来到了人间。这真是天遂人愿，老爷子喜不自胜，自然视徐铸成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两年后，八十高龄的曾祖父无疾而终，驾鹤西去。至于是否不用给阎王爷下跪了，还真是无法考证。

徐铸成的家乡是江苏宜兴。由于出产一种独特的陶土，宜兴以南泥和紫砂制品闻名天下。近现代之人，是由著名的紫砂茶壶而认识宜兴的。其实，明清以降，苏锡常一带读书风气甚隆，饱学之士大有人在，不仅及第进士、金榜状元出了不少，就是帝师、太傅、宰辅、大学士也是不乏其人。无锡县城里有一条“状元巷”，这条不起眼的小巷当中，几百年来出了好几个状元。

徐家原是宜兴的大户人家，在县城东珠巷、狮子巷口，有一处挺大的院落。到20世纪初叶，已是家道颓败，可祖上传下的几进房屋还在，徐氏各支就在这大院落中分室而居。这院落的厅堂是明代建筑，四根大立柱直立挺拔，油漆剥落了，更显出纯正楠木的高贵。地上铺的大方砖虽然残破，可揭去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这院子的隔壁就是县衙。徐铸成小时候听家人说，早年，家里人常常架梯子爬上墙头，或看县太爷升堂，打犯人屁股；或看县太爷的眷属在县衙后花园玩耍。能与县衙比邻而居，可以看出徐家当年也确曾显赫过。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宜兴自古重学重教的民风十分醇厚而悠长。徐铸成七岁时，也被家人送去城里的小学读书。徐铸成自嘲，他生性愚钝，开初几年，读书一直不开窍，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学不会，只知贪玩，与小伙伴们下河捉鱼，上树逮鸟，漫山遍野地疯跑。初小（初级小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四年级）毕业时，居然考了个全校最末一名，气得母亲没少数落他。

徐铸成父亲也是一名小学教师，由于为人木讷老实，除教书之外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城里的好学校自然没有他的位置。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偏远山区的几个小学转来转去。这一年，父亲又被派到了山区的广善小学。暑假回家后，

母亲忧虑地说：“这孩子大概读不出书了，你把他带你那儿去再读一年四年级，如再无起色，我也就断了他读书的念头了。”

秋天，徐铸成随父亲去了广善小学，寄居在姑奶奶家中，吃“嗟来之食”的滋味让他深受刺激。白天插班读书，晚上父亲辅导。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父亲娓娓道来，讲解条理，注释准确，而且父亲温和慈祥，无论徐铸成学得怎样，父亲从不呵斥他，这让他对学习有了极大的兴趣。一年后，徐铸成回到城里，仍入原来的敦本小学，读高小（高级小学）一年级（现在的小学五年级），门门功课都是第一，让老师和同学们大吃一惊。

1922年，十五岁的徐铸成高小毕业了，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走出校园，趾高气扬，自不待说。

去哪里读中学呢？徐铸成选择了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和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作为投考目标。常州的省立五中先考。徐铸成从宜兴赶去，考了两天，不觉吃力，各门功课答卷顺利，感觉良好。考完之后在常州盘桓两日，听一位族叔说，已看过录取榜，徐铸成榜上有名。于是，高高兴兴地回家报喜，静候录取通知。谁知半月之后，别人都已拿到录取通知了，徐铸成的却迟迟不见。母亲怨他消息不实，他也不得其解，只好匆匆准备，再去无锡赶考。徐铸成心想，报考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只此一路，别无选择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笔试两天，他不敢稍有差池，认真答好每一道题。面试之日，也是精心准备，从容应答。发榜时，共招收五十名学生，徐铸成居然考了个第二名！回到宜兴，常州省立中学的通知书也已到家，在录取的八十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十四名。八十多岁的曾祖母喜形于色，逢人便夸，“鸿生（徐铸成的乳名）小小年纪，两榜都高中，等于是秀才了。”

权衡去哪里读书，倒是费了父母和徐铸成一番周折。无锡毕竟繁华，有“小上海”之称，而且师范学校，学费与食宿费用全免，毕业后即当小学老师，工作有保障。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徐铸成决定，去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无锡省立三师学养深厚，学源流长。徐铸成入学时，学校荟萃了一批呈一时之选的优秀教师。国文教师中就有被张謇誉为“大江南北一人而已”的钱基博（钱锺书之父），有与柳亚子一同创办“南社”的沈颖若，还有名噪国内国文讲坛的钱宾四。

对于徐铸成来说，在无锡省立三师，最大的收获是养成了读报的良好习惯。学校阅览室里，除了当地的《无锡报》《新无锡报》之外，还有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课余时间，徐铸成总是在阅览室里读报。读得久了，他便有了偏好和倾向。这诸多报纸中，他最喜欢《申报》的“飘萍北京特约通信”，《时报》的“彬彬特约通信”，《新闻报》的“一苇特约通信”。飘萍就是邵飘萍，彬彬是徐凌霄的笔名，一苇是张季鸾的笔名。这三人都当时国内数得着的大牌记者，他们写的“通信”的共同特点是，文笔优美，描述细致，剖析时局见解独到，鞭辟入里，很为年轻的徐铸成敬佩。后来，徐铸成投到张季鸾门下学写新闻、评论，与徐凌霄成为同事，共同服务于《大公报》社。他与邵飘萍缘慳一面。他进京读书时，邵飘萍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杀，但徐铸成与邵飘萍死后主掌《京报》的邵的夫人汤修慧有过新闻报道方面的交往。儿时崇拜的三大“名记”，后来都有友情往还，也算是风云际会吧！

1926年，徐铸成就要升入无锡省立三师的三年级了，再读一年就毕业了，前程已经注定，那就是去小学当老师。按照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师范毕业生只有去学校教书两年之后，才被允许考大学。随着徐铸成年龄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囿于乡村小天地，做一个碌碌的小学教师。他渴望着考大学，考一流大学，去更宽广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也是人小胆大，徐铸成仔细研究了教育部门的规则，发现被学校开除的师范学生不受教学两年方能考大学的限制。人都被学校开除了，没有毕业证书，如何能教书呢？！徐铸成这是硬钻空子，自找理由。为了能上大学，年轻人也是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毅然放弃了两门主课的期末考试，依学校的规定，他被开除学籍。他又借了高他几级的一位远亲的师范毕业证书，打算冒名顶替考大学。

1926年的夏天，是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学生的培养方向也不仅仅是留美预科生了。这一年，清华大学在南方的考点设于上海。徐铸成央告母亲凑足了五元路费赶去应试。被无锡省立三师开除之事他没敢告诉家人，但他心里明白，他已是华山一条路了，必须考中，别无他途。由于准备充分，又是志在必得，徐铸成考得非常顺利。考完之后便匆匆返回宜兴，静待发榜了。

清华大学录取了他！徐铸成兴奋异常。这也是徐氏家族的荣耀和骄傲，是轰动乡间的一大喜讯。徐铸成的母亲四处告贷，八方筹措，好不容易为他凑足

了路费和学费。他说：“大概因为将来有留学的希望吧，亲戚们也敢于冒险投资。不管怎样，我总算负笈到了当时的首善之区——北京。”

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徐铸成，被京城皇家建筑的巍峨壮丽和气宇轩昂震慑得心旌难平。清华大学庄重的教学楼，典雅的图书馆，舒适的学生宿舍，甚或那丰盛而略显奢华的早餐，都让这个南方乡下来的孩子新奇不已、感佩良多。他好像进了天堂，愉快地生活了一个学期。

麻烦还是来了。学期将尽之时，徐铸成突然接到教务长办公室通知，说是教务长约他谈话，地点就在教务长寓所。徐铸成忐忑不安地登门赴约，和蔼可亲的梅贻琦把他让进屋内，略一寒暄便直奔主题，“你和你的母校有什么芥蒂吗？”徐铸成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梅贻琦介绍说，无锡三师对徐铸成故意罢考，借故“被开除”，冒用他人毕业证书考取清华大学之事忌恨在心，几次三番写信给清华大学，要求处理徐铸成。清华惜才爱才，未予理会。这次无锡三师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开除，将向教育部控告。清华也是无奈。当然，梅贻琦表示，学校决不做开除的决定。他拿出一封私人介绍信给徐铸成：“人生难免挫折，你不要灰心。这样吧，我出身南开，我已写好一封给张伯苓校长的介绍信，你去借读半年，再回来插入二年级。”徐铸成明白，这只是除名的委婉说法，一则南开大学高昂的学费他就负担不起，二则谁能保证半年后他准能回清华读二年级呢？徐铸成心意阑珊地去了保定。他父母正投靠亲戚在保定铁路当局做小职员谋生。徐铸成铁了心要上大学。他先是在河北大学插班旁听。第二年夏天，再赴北京。还是借用远亲徐锡华的毕业证书报名投考。先考北京大学，名落孙山。再考北京师范大学，金榜题名。那时的北师大，也是英才荟萃，一时名盛。徐铸成入校时，鲁迅已经南行，但仍有吴承仕、钱玄同、朱希祖、高步瀛、刘文典等国学大师。徐铸成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心旷神怡。

那一年，北伐既定，北京改名北平，各项改革举措纷纷出台，一时思想激荡，社会活跃，盛况空前。有人提出大学教育学法国，实行大学区制，全北平联合成一所大学。这主意还真就试行了起来。李石曾担任了联合起来的北平大学的校长，著名报人、《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也出山担任了学校的秘书长。统成一体谈何容易。各校博弈、争论、等待、观望，教育教学大受影响。徐铸成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那段时间基本上就不上课了。

徐铸成的舅舅朱幼珊当时在国闻通讯社北平分社做编辑。他看到外甥生

活困厄，学校又不怎么上课，便介绍他到国闻通信社当抄写员，每天下午4时到通信社工作两小时，刻蜡板，抄新闻，每月补贴二十元，外加一顿免费晚餐。徐铸成求之不得，立即应允。这个信手而来的机遇，彻底改变了徐铸成的一生。

国闻通信社是报业奇才胡政之一手创办的。1920年，胡政之离开王郅隆主政的老《大公报》、又与林白水合作办了《新社会报》后，在上海创办了这个国闻通信社，自任总编辑，机构迅速由上海辐射各地，先后在汉口和北京成立了分社。1924年，在发布新闻、资讯日益成熟、丰富的前提下，在北京创办了《国闻周报》。《国闻周报》是综合性的时事周刊，内容有一周简评、时事评论、国内外大事述要、书评、新闻图片等。《国闻周报》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刊发过许多有划时代意义的稿件。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就是首发于《国闻周报》的。1926年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联合，改组成立新记《大公报》公司后，国闻通信社这一社一刊，仍在胡政之名下继续运行。胡政之家安在北平，《大公报》总社在天津，他便北平、天津两头跑，互相兼顾。当然，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靠在《大公报》上。

徐铸成是个爱动脑筋，爱思考之人。在国闻通信社帮工期间，他仔细阅读了《国闻周报》。他发现，北伐之后，国民政府设都于南京，政治中心已经南移，北平的时政新闻越来越少。但在这文化古城中，大学和文化机关云集，北平依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闻周报》应该适应这个变化，把采访报道的重点移到文化和教育方面。他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了一封信，径直寄给了胡政之先生。

没想到，几天后，胡政之借回北平小住之际，亲自约见了。胡政之客气地说：“徐先生，你的建议很有见地，确实在政治中心南移，应该作适当的转变，这关系国闻社的前途，我也曾考虑及此，只是一时间无从着手，既缺这方面的经验，又无合适的人选来作尝试。”当得知徐铸成在北师大的课程不太紧张，有较充裕的课外时间时，胡政之便邀请他为《大公报》做一些采访，写一点专题报道。他当即提出，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很有成绩，他让徐铸成去跑一趟，回来写一报道，以验证一下他关注文化教育报道的设想。

徐铸成毫不犹豫地领受了任务。他没觉得有什么为难之处。的确，他没学过新闻，对新闻采访之道也丝毫没有接触。但徐铸成自我感觉，他好像是对新闻一行无师自通。自小学起，他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尤其是对一些著名记者，

如邵飘萍、徐凌霄、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报道，更是每篇必读，字字用心。久而久之，他对新闻体例、文体、语言、结构了然于心。这次定县采访，晏阳初公出在外，由副会长陪同参观考察，几天时间，收获颇丰。从定县县城，访到穷乡僻壤，看了多处“平教会”农场。回到北平后，赶写了一长篇报道《定县平教会参观记》。胡政之立即安排在《大公报》上刊载，分四五天才刊完。徐铸成在《大公报》上的头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后来，报社又安排他去太原采访华北地区篮球赛，去沈阳采访华北运动会，甚至指派他三下太原，去探听阎锡山、冯玉祥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去揭开冯玉祥行踪之谜。所有这一些采访活动，都完成得圆满、独到，《大公报》那一时期轰动四方的独家新闻，许多就出自徐铸成之手，而那时，他还是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呢！

徐铸成是幸运的。在他迈上新闻之路的最初几步时，不时有“贵人”相助。胡政之可以说是他的伯乐。而张季鸾则称得上是他的恩师。那一年他采访华北运动会大获成功后，从沈阳回北平，在天津转车。没想到张季鸾专门派人到车站，将他截了下来，在天津小住几日，以示奖励。正是此次中途遇截，徐铸成才第一次见到了张季鸾。在张府的客厅门口，徐铸成见到了一位面目清癯，两眼炯炯，留着小髭的蔼蔼长者。这定是张季鸾无疑。张季鸾握着徐铸成的手，端详了一会道：“你是铸成吧。这次工作很出色，你很有新闻头脑，年轻有为。”

大学一毕业，徐铸成立即进入了《大公报》天津总部的编辑部工作。他对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的勤奋工作精神亲眼所见，感触良多。胡政之一清早就在经理部了解有关经营方面的情况，亲自动手处理问题，如报纸的发行数、广告收入、新闻纸的行情和库存等。下午，他详细阅读本市和外埠的各家报纸，与自家报纸作比较，从中找出差距和新闻线索，发电指示驻外记者采访报道。较小的地方报纸，他也要看，找出可以改写本报通讯的素材，交给地方编辑处理。下午四时到六时，是各版编辑集中看报时间，这是编前会之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有时徐铸成迟到了，看到胡政之就坐在他的座位上读报，他颇觉尴尬，又不敢招呼，只得立在背后等待。胡政之读得告一段落，回头看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起身走了。徐铸成觉得，这比申斥他一番还难受。

张季鸾更多地是在新闻业务上手把手地教他，对于自己多年体会到的经

验和诀窍，从不吝啬，悉数相传给徐铸成。他说：“写报纸评论，千万别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读者面就缩小了。”“千万勿写过长的句子，如果一句话讲不完，宁可拆开两句，甚至用几句话来说明。”“在遣词造句用成语的地方，凡别人已用滥了的，千万勿抄袭，应另外找一相同或类似的字或句子。”他告诫徐铸成，对于拿不准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他形象比喻说：“凡根据现状，无论如何看不透的问题，应该学学孙行者，跳到半空中向下鸟瞰，也许会看清楚，弄明白的。”

徐铸成在《大公报》很快成了行家里手，1932年，报社派他去汉口，任特派记者兼汉口办事处主任，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开疆拓土了。

三年后，徐铸成奉调去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将报纸逐步南迁，这是张季鸾、胡政之的先见之明。“九一八”之后，特别是华北局面动荡以来，张季鸾深感日本的野心绝不仅在东北，华北必有事变。1935年1月，张季鸾在《国闻周报》上发了篇评论《我们有什么面子》，沉痛自责：“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各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北方有句俗语：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

上海版《大公报》于1936年4月1日创刊。王芸生自津南下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徐铸成等一大批编辑记者荟萃沪上。张季鸾又是亲自捉刀，为沪版《大公报》创刊撰写社评《今后之大公报》，他说：“本报津沪两地同刊之计划，既非扩张事业，亦非避北就南，徒迫于时势迫切之需要，欲更沟通南北新闻，便利全国读者。”

“七七”事变令《大公报》的所有计划被全盘打乱。天津沦陷后，《大公报》总部全部南迁，集中于上海。喘息未定，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国军将士英勇杀敌，损失惨重，血染浦江。《大公报》登高振臂，呐喊助威，鼓舞斗志，逞一时之雄，誉响上海。11月间，上海失守，沦为“孤岛”。12月12日，占领军宣布上海出版的所有华商报纸，须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后方能出版。各报负责人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如此侮辱和歧视断不能接受，《申报》《大公报》《时

事新报》《民报》《立报》等均决定自动停刊，以示抗议。而《新闻报》《时报》则屈膝受检，继续出版。

《大公报》气节诚可贵，可停刊举措却大伤人心。胡政之宣布，除留下工厂工人与李子宽等少数管理人员外，其余编辑记者，包括徐铸成、许君远、杨历樵、王文彬、萧乾等一律遣散。

徐铸成在《大公报》已干了十年，胡政之要他把《大公报》作为终身事业的话言犹在耳，动乱当头，就这样一脚被踢了出来，徐铸成一时竟蒙了。他的心凉透了。在品尝到失业的痛苦滋味的同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办一张自己说了算的报纸。

《文汇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破茧而出了。失业之后，寓居在家，徐铸成百无聊赖，一大家子人生活无着，也令他心慌。好友严宝礼拉到一笔资金，登门动员他一起办报，为避免占领军的检查和纠缠，他们拉上了一个不相干的英国人克明，以赠送干股的形式成为股东之一。外国人在租界登记办的报纸，日本当局是不限制的。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沦陷的上海与读者见面了。起初，徐铸成只是每天为《文汇报》写一篇社评。一个月后，他便正式就任总编辑了。从这一刻开始，徐铸成几乎为《文汇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把《文汇报》办成一张真正的民间独立报纸。《大公报》的中立是难以“不偏不倚”的，没有自己的态度更不是一张负责任的报纸应有的办报方针；接受任何政府部门任何形式的津贴、补助，都会使报纸丧失独立的表达权和报道权。

《文汇报》创刊不久，还滞留上海的胡政之派汽车接徐铸成去胡府叙谈。

胡政之问：“我看了这几天《文汇报》的社论，它的风格、笔调都很像《大公报》，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徐铸成坦然回答：“是我写的。胡先生看还可以吗？”

“很好，流畅得很，只是措辞激烈些，怕会出事。”胡政之说。

《文汇报》还真就出事了。创刊第十七天的傍晚，《文汇报》楼下营业部里闯进一人，拉开木柄手榴弹的引信后转身就跑。“轰”的一声巨响后，室内硝烟弥漫，一片狼藉。三名员工受伤。伤势最重的陈桐轩几天后去世。3月22日深夜11时左右，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到报馆门前，车中跳下三个暴徒，开枪打伤门

卫，然后向报馆内投掷了两颗手榴弹。所幸营业部门员工已下班，无人伤亡，而无辜路人却被弹片炸伤。3月29日，两个日本特务和一个汉奸指使一宾馆服务员送三篮水果去《文汇报》，并附了一封假惺惺的慰问信。报馆已有警觉，扣下来人，化验了水果，结果，每只水果都有致命毒液。

《文汇报》是以鲜明的社评和客观的报道激怒了日本占领当局和沪上黑社会的。愈挫愈奋，愈压愈扬。这些卑劣伎俩，反而使《文汇报》赢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发行量稳步上升，很快就成为上海滩上一张有影响的大报。此时，英国人克明的贪婪之心暴露了出来，他见到报纸发展势头良好，前途一片光明，已不满足于干股部分的红利了，他要实际控制报纸，攫取更大的利润。否则，他以及他拉来的英国朋友将退出董事会。这是克明的撒手锏。显然，没有外国人加盟合办的报纸，都是要接受日本当局的新闻检查的。徐铸成、严宝礼等商议，《文汇报》暂时停刊，与克明谈判交涉。

1939年5月18日，抗战时期的《文汇报》出版完这一天的报纸后，暂别读者了。从创刊到被迫停刊，仅仅十七个月。这张创办一年多一点就一举冲上上海发行量前茅的报纸，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夭折了。因为克明的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CC派又趁火打劫，欲以五万元法币收购报纸，甚至孔祥熙也掺合进来，想以二十万投资控制《文汇报》。徐铸成、严宝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索性将报纸无限期地停了下去。“它也真像经天的彗星一样，曾有声有色，闪亮在孤岛上空，而霎时就熄灭了！”徐铸成这样惋惜地说。

徐铸成在《文汇报》不足两年的精彩表现，让胡政之对他更是刮目相看。胡政之心里明白，徐铸成人才难得，不揽入《大公报》门下实在是可惜。他可能隐隐感觉到了上海就地遣散徐铸成的鲁莽之举了，因而力邀他重回《大公报》，去香港参加港版《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徐铸成对被《大公报》一脚踢出门外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是否去香港，犹豫不决。胡政之多次电催，力表诚意。其中一封电报说：“弟及季鸾先生，日夜盼速来港，主持编务。”

1939年盛夏时节，徐铸成到达香港。欢迎之情之殷殷，出乎他的意料，除了报馆举办欢迎宴会外，胡政之、张季鸾还分别办了家宴，为徐铸成接风洗尘，这让徐铸成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又回到了曾经工作过十年的《大公报》，担任了香港版的编辑部主任。

徐铸成莅港之时，正是“八一三”两周年之际。他翻阅那几天的《大公

报》，为尽早临事做案头准备。有一天的头版头条是《可歌可泣“八一三”，人山人海献金台》，这十四个字铿锵有力的标题让徐铸成眼睛一亮。经打听得知，主持渝版《大公报》的张季鸾，时常来港治疗肺病。那时张季鸾正在香港，晚上到报馆视事，看到原标题不够简洁有力，便信手改了这样的标题。徐铸成暗自佩服。

战乱时期办报，逃难和动荡是永恒的主题。来港两年多，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日军必须拿下香港，作为进军东南亚的桥头堡。这天下了夜班刚刚睡着，徐铸成便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港英当局及军队毫无抵抗能力，日军几天之内便南渡维多利亚湾，占领了全港。

九龙沦陷之日，新闻纸的供应已经中断，香港岛上的《大公报》，也只能在12月13日出版最后一期了。徐铸成沉痛地提起笔来，写下他不知第几次的“告别感言”：

九龙昨已沦陷，本报存纸用尽，不得不暂时停刊，明日起将与读者小别矣！这一别，也许十天半月，也许数月半年，但我们相信，这期间决不会很久远。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对大局抱乐观，每一个有常识的人，也必认为太平洋的暗流，终将澄清，黎明决不在远。

徐铸成用刚刚学会的几句广东话，化装成难民，挤上破旧不堪、拥挤万分的驳船，回到广东，混进闸口，一路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好不容易到达桂林，主持《大公报》桂林版的出版。

那时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各界精英荟萃，《大公报》倒也办得有声有色。正是在桂林，徐铸成结识了蒋经国先生。那次是蒋经国先生主动拜访，希望《大公报》刊发他亲自撰写的纪念亡友王后安的一篇文章。王后安是赣南地区南康县县长，积劳成疾死在任上。文章事迹感人，文笔也不错，看得出是蒋经国的用心之作。蒋经国不愿登在国民党在赣南的《正气日报》上，足见他对《大公报》的器重和高看一眼。

桂林又守不住了。徐铸成一行又向大后方重庆转移。此时，张季鸾已因病逝世，重庆《大公报》由王芸生主持，两个山头的人凑在一起，龃龉在所难免。为安置桂林过来的大批人员，重庆《大公报》又出版了《大公晚报》，徐铸成任

主编。但他这个主编，只是“编”而已，每天两三个小时看完大样就算完事，因为王芸生规定，《大公晚报》上不发评论，只刊风花雪月的休闲新闻。

胡政之也是两头为难，他找徐铸成做推心置腹的交谈：“重庆桂林两馆，好比同根连枝，现在桂林馆以兵灾而停业，这正像倾家荡产了的二房，要来依靠长房，就要‘以小事大’，什么事都要忍让，还要忍气吞声。”话说到这份上，徐铸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觉得，在重庆那段时光，是“生平最闲散的生活”，是“半冻结的日子”。当然，王芸生是不会让他彻底冻结的。他要徐铸成每周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评。自己没有版面，没有发稿权，稿子送到人家手中，任意“宰割”、“削除”，那滋味可真是不好受。

抗战终于胜利了！徐铸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矛盾立即摆到了面前。一方面是胡政之令他全力恢复沪版《大公报》的出版，重振当年《大公报》的雄风。另一方面，严宝礼等老朋友拉着他再办《文汇报》，重温当年自主办报、自主创业的欣喜和艰难。徐铸成两头为难，难下决断。最后，他对严宝礼说，《大公报》是他新闻事业的启蒙老师和出发点，《大公报》有恩于他，不宜在它用人之时拂袖而去。他先去《大公报》恢复上海版，《文汇报》的复刊也应抓紧进行，到时视情况再做定夺。

1945年11月1日，沪版《大公报》复刊了。这是上海最早复刊的抗战前的报纸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阅读。徐铸成满怀深情地提笔为《大公报》的复刊撰写了社评。握笔之时的心态，的确与写“告别”之语大相径庭：

上海是《大公报》的第二故乡。今天我们在上海复刊，自然有说不尽的欣慰。同时也有诉不尽的感喟。……

这八年中，我们无时不关切上海和东南的同胞，我们相信上海和东南的同胞也一定关切我们。当我们告别时，上海已成孤岛，我们曾殷殷期望不得已陷身这孤岛的同胞，大家学持汉节、吞冷雪的苏武，以待祖国的胜利复兴。八年来，上海同胞受尽了磨折苦难，而大家都咬牙苦守，坚贞自持；失节堕落的只是极少数，其他绝大多数的同胞，都不断对敌伪作积极和消极的奋斗……

我们抗战必胜的目标，终于贯彻了。建国能不能完成呢？这个信念绝对不许动摇，但过程之艰苦磨折，必更甚于抗战之时……只要我们把握住几个原则，去推动建国的巨轮，相信眼前的磨折障碍，都不难克服，不难粉碎。

徐铸成接着在社评中论述了他的建国原则：第一，建国必须团结，而巩固团结之道，首在政治的进步与民主；第二，经济建设是我们立国、建国的根本；第三，全力拥护联合国，创建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第四，建国风气的建立。徐铸成认为，建国风气就是民主。“今后的世界大势是民主潮，人民世纪。一切违反这民主潮的国家，都要遭时代的无情淘汰。但民主的基础在民而不在政府……”

六十五年后的今天，再看徐铸成的这些建国原则，丝毫不错，而且，仍具现实意义！

国难家颓事业受阻，一连串的磨难深深教育了徐铸成。在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广袤土地上，实现不了真正的民主，一切都是空谈。徐铸成的思想急遽左倾，他主持的上海版《大公报》言论激烈，新闻鲜明。他率先刊发了《昆明发生屠杀惨案》的当日新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镇压西南联大师生的消息，并配发了一篇短评。报纸到达重庆后，重庆的《大公报》竟然不敢转载。

上海《大公报》的进步倾向，终于引起了当局高层的关注。蒋介石巡视各地到上海后，专门读了几天的《大公报》，读后勃然大怒。国民党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进言道：“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是徐铸成，总裁是否要他来谈谈？”“不！我回重庆找胡政之算账。”蒋介石气哼哼地说。

此时的胡政之，已当上参议员，与官方往来密切，《大公报》最初的“四不”办报原则，早已被他忘在了脑后。1946年2月，胡政之从美国考察刚刚回来，就立即约徐铸成谈话。胡政之说：“重庆方面，有你的朋友，也有芸生的朋友。芸生的朋友都说你有政治野心，一面拉着《文汇报》不放手，一面极力推着《大公报》向左转。他们说这是你有政治企图证明。”

徐铸成气愤地回答：“别人的风言风语我不管，你胡先生对我有什么看法？”

胡政之迟疑了一下说：“我对你自然是相信的，但觉得你的言论态度太激烈些。要知道，我们有职工四百多人，一旦把当局逼急了，把报馆封了，几百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

徐铸成说：“以《大公报》的声望，我谅当局不敢出此下策。他不能没有顾忌。再说，我主持上海版的言论态度，并没有超出民间报的范围。我来到上海，体会到曾是沦陷区的广大人民，都对后方回来复刊的报纸，作再认识的辩认。看哪一家是真民间报，哪一家是假民间报？我们回沪复刊后，发行数迅速突破

十万，排着队订报，而《时事新报》原是上海老报，复刊后门庭冷落，听说销数不过数千。此中消长，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胡政之仍然强调：“万一被封门，几百职工的生活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徐铸成急了，“办报只为吃饭，如果这样，卖油条大饼不也可以吃饭吗？”

胡政之默然。他有点不高兴了，说：“等芸生来了，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徐铸成明白，他在《大公报》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上海沦陷之际的被遣散，一直是徐铸成心头解不开的疙瘩。“自问总是勤勤恳恳，尽力而为的”，“想不到一觉醒来，就被铁面的老板一脚踢出了‘家’的大门”。“政之先生后来虽竭力想弥补这一失着，但这一伤疤终究是难以彻底平复的。1946年我终于最后辞别《大公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文汇报》终于等来了徐铸成的回归。

严宝礼是个厚道之人。抗战期间，徐铸成四处漂泊，老父母滞留上海，生活全靠严宝礼照拂，柴米无缺，安度黑暗岁月。这与《大公报》的无情恰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徐铸成舍“大公”而入“文汇”的一个原因。有人说，是严宝礼的“管鲍遗风”感动了徐铸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徐铸成的回归，打造了《文汇报》的“黄金时代”。

复刊之初的《文汇报》，日销只有五千份，虽然副刊很受欢迎，但言论和新闻却离“独立的民间报纸”相去甚远，几乎和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同一模式。

《文汇报》一度大力揄扬国民党上海市的党政显要人物，有两天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吴绍澍的活动，所谓“宣布市府施政方针，力谋安定社会及解除民众痛苦。”

杜月笙回到上海，《文汇报》竟发表《迎杜月笙先生》的社评，说：“上海市民引领等待杜月笙先生来沪主持地方事业，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对于杜先生过去的贡献，没有一个不加倍感激。”听来让人不免起一身鸡皮疙瘩。

严宝礼每每感叹所托非能人。徐铸成主持《文汇报》后，立即着手进行大改组。他自己亲自主抓社评，又从《大公报》和社会上新引进了郭根、王坪、金慎夫、李肇基、张锡昌、秦柳方、杨培新、钦本立等编辑记者，柯灵推荐了副刊编辑高手唐弢、以群、黄裳、梅朵、陈钦源等，可谓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徐铸成特别强调了新的编辑方针是反内战、争民主，反对依违两可的假中立，坚持明辨是非黑白的独立立场。

1946年5月1日，改版后的《文汇报》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文汇报》烙上了鲜明的徐氏印记，徐铸成成了这张民间报纸的真正的主人。在徐铸成亲自撰写的《我们的自勉》社评中，他郑重宣示：“复刊以来，艰苦支撑，而兢兢业业，牢牢守住民间报的立场；我们的新闻记载不够充实，说话也不免幼稚，但我们的态度是透明的，每一个读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求民主，拥护经济建设，扶植民族工业，反对一切独裁、垄断、剥削及违反自由、民主的现象……今后，我们将追随全国同业之后，加紧努力，为民众的喉舌，作民众的前驱，在这建国的大时代中，尽我们应尽的责任。”

《文汇报》以战斗的姿态挺进了。

改版不足一月，上海警方推出“警员警区制”，每个警察管八十户到一百二十户，或四百人到六百人，警察可以在任何时间随意进入居民私宅或商店。《文汇报》率先反对，起而责诘，又是发评论，又是发读者来信，对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指名道姓地批评。宣铁吾恼羞成怒，终于找了个借口，在7月18日责令《文汇报》停刊一周。

复刊之日，徐铸成不畏权势，不惧淫威，以如椽之笔亲撰社评，名为向读者致歉，实则表明报纸的严正立场和决心：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报，所谓民间报决不是中立的，而是独立的报纸，有一贯的主张，而决无私见偏见。我们当然难免有无心的错误，但绝不许昧着良心，不分黑白，不辨是非，一味歌功颂德，或者哗众取宠。今后，我们或者还会遭遇困难挫折，但这一点基本的立场，我们绝对牢牢记住，决不改变。

遭遇停刊风波的《文汇报》复刊后高扬着民主的旗帜，又高调出击了。它先是准确及时地报道了南京下关事件，为在南京被打的民主人士雷洁琼、马叙伦等人鸣不平，支持民主党派的和平请愿活动。过后不久，他们又站在摊贩一边，反对上海警方以整顿市容之名，驱赶、殴打、拘禁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对上海警方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这个时期《文汇报》的最闪亮之点，是全力支持了进步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四城市的学生代表约六千人，齐集南京进行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呼吁增加教育经费，

提高教职工待遇。这样一场和平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许多学生被皮鞭、棍棒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些学生遭到拘捕。事情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发出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并软硬兼施，逼迫全国各地报纸刊发他们的所谓新闻。《文汇报》拒不理睬，以本报记者的亲眼见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大字刊出新闻《首都学生游行被阻珠江路口发生惨案学生受伤者逾二十人》。同时配发了评论。与《文汇报》同样采取公正、谴责立场的还有上海的《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

国民党高层雷霆震怒，立即决定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封杀这三张报纸。

5月24日下午，当局勒令《文汇报》停刊的命令送到了报馆：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天下午，收到同样取缔令的还有《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

又是不足两年，又是无限期停刊。命运多舛的《文汇报》，在那个独裁、专制的时代里，是难有出头之日的。

忽一日，严宝礼听说中央政府有复刊《文汇报》的意图，便催徐铸成去首都打探消息。徐铸成来到南京，拜访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宣部新闻检查处处长邓友德。私谊归私谊，公事归公事。邓友德热情接待了徐铸成。谈到《文汇报》的复刊，邓友德的条件毫不含糊：一、由政府出资，送具有共产党背景的《文汇报》总编辑宦乡出国，政府派一人到《文汇报》任副编辑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亿，并派一会计主任入《文汇报》监督。徐铸成的答复也斩钉截铁：

“复刊应该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

复刊无望，徐铸成决定返回上海。邓友德劝他去见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陈布雷与张季鸾是故交，也是新闻界的不世之才，见见也应该。

陈布雷问：“铸成兄，你已决定不复刊了？”

“您是报界前辈，设身处地，这有条件的复刊如何复得？”徐铸成径直回答。

陈布雷又问：“阁下今年几岁了？”

“虚度四十一岁。”

陈布雷沉吟良久道：“我们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党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即使再腐败，看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二十年后，阁下想必双鬓斑白了，你就这样等下去吗？”

徐铸成答：“只愿此后有太平岁月，做一个太平之民，闭门读书。”

陈布雷和徐铸成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国民党大厦倾圮，兵败台湾。也许现实与心理的巨大反差令陈布雷无法适应，这个学富五车的文章高手选择了自杀殉义，没有跟着国民党流窜至弹丸小岛上。

再说徐铸成。大陆政治气候恶劣，没有他民间报纸的生存之地，他就到香港去办。1948年，徐铸成辗转来到香港，在李济深等人的资助下，在香港登记注册，成功创办了香港《文汇报》。全国解放后，中共邀请滞留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北上，参加新政协，共谋新中国建国大业。徐铸成也在被邀请之列，与第三批北上人员一起，乘海轮赴山东烟台，然后转道天津到达北平。

甫回国内的徐铸成，对新中国的一切不甚了了。他是个书生，是个报人，满脑子就是办报发新闻，此刻他最关心的就是上海《文汇报》何日能复刊，而且他想趁此机会，创办北京《文汇报》、武汉《文汇报》，使《文汇报》形成南北共有之势，做成中国民间报的龙头老大。

有关部门负责人郑重告诉他，新中国不允许私人办报。各地《文汇报》的创办断不可能。复刊上海《文汇报》也是权宜之计，总有一天它要改变性质，由民间报纸转为政府主办的报纸。这让徐铸成十分愕然，一时也想不明白。能复刊上海《文汇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是该当庆幸之事。

当然，新的办报环境完全迥异于解放之前。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报纸是一个宣传阵地，是传达政令的工具，是统一思想的武器。社评和短评之类的言论是不能再写了，也写不好了，因为要求舆论一律，那些标准的表述，早在政府的公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阐释清楚了，主笔们还有什么自己的话可说呢？至于刊载新闻，这些老报人似乎也不会了，无所适从，动辄得咎。例如，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沙，《文汇报》从无线电报中已收到确讯，第二天新闻刊出，却受到主管部门的批评，说是《文汇报》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办报作风，因为新华社未正式发布消息，各报就不许抢发自己的报道。再如毛泽东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文汇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文章的段落做了分题，一来内容醒目，便于阅读，二来版面也显得活泼，避免了黑压压一整版文字，让人有不胜窒息之感。这更被批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献，只能作经典般郑重排版，怎能擅自加题，自由处理？

让徐铸成们不适应的问题接踵而至。某夜，副总编辑郭根值夜班，版面已经拼好，大样也已看过，正准备付印，郭根也已回宿舍呼呼大睡。忽然上面传来指示，某稿不得刊用。副总主笔兼总编辑柯灵让人去叫郭根速来换稿。睡意正浓的郭根被人叫醒，听了原委后，认为此稿并无不妥，撤换不合情理，一气之下，断然说了三个字“开天窗！”柯灵听了大吃一惊。这种旧社会新闻界用来对付反动政府新闻检查的手段，怎能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呢？柯灵只好自己动手，找了篇合适的稿子换上。尽管耽搁了出报时间，但却使《文汇报》避免了一场祸事。

1949年9月29日，正在北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徐铸成，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和苦恼：

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余之不善应付欤！

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而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也不甘也。

这就是徐铸成的幼稚了。

徐铸成的不合时宜，还引出了一段掌故。

1950年某日，周恩来来到上海，于马思南路的周公馆里，召见并宴请在上海的党外知名人士。徐铸成也在被邀请之列。

酒酣耳热之际，周恩来突然对徐铸成说：“铸成先生，你可以参加我们共产党。”

这话来得太突然了。无党无派，独立办报，是徐铸成的做人原则。可周恩来的问题又不得不回答。略一思忖，徐铸成说：“如果我们都参加中共，中国岂不就没有民主人士了吗？”

周恩来莞尔一笑：“这也好，您说得有道理。”

贵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纡尊降贵，请你来入党你都不入，竟当面驳回，

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后来，民盟上海市委转告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徐铸成加入民盟。经过反复动员，“恭敬不如从命”，徐铸成入盟了。

此后几年，《文汇报》的身份十分尴尬。它不是党报，民间报的名头也徒有其表。经过几次“救报”运动，报纸发行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每况愈下。后来，他们尝试着走专业报纸的道路，办成一张为教育界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试了几年之后，效果不错。正在这时，教育部筹划着办一张《教师报》，有人提出就用《文汇报》改名迁京办报即可。此事1955年开始商谈、筹划、报批，至1956年3月，基本建设完成，《教师报》在京的报馆及宿舍、印厂等皆已就绪。这年的4月28日，《文汇报》再次停刊，5月1日起，迁京的《教师报》正式出版发行。

《教师报》只是周三刊的报纸，内容专业、单一，作为总编辑的徐铸成实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优哉游哉，每周两次编前会，审定大样，四个工作日足以应付，其余时间在家读书、赏花、饮酒。工作不用尽全力，发行更不是问题，有教育部的通知要求，《教师报》出刊不久就发行了五十万份。

这种悠闲的日子过了刚刚一个月，就有小道消息不断传来，说是中央有意恢复《文汇报》。徐铸成心神不宁，四处打探，不得要领。从他的本意讲，他是不舍得一手创办的《文汇报》就此消亡的。几周后，确切消息传来，中共中央重新考虑了《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三报的归属问题，认为应该确立三报民间报和民主党派报纸的性质，甚至有意让王芸生去办自己的《大公报》，让民盟去办《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文汇报》班底的老报人们四处游说，八方动员，终于使中共高层同意《文汇报》仍回上海，调整办报思路，办成一张具有民主党派风格的综合性日报。

迁进迁出的决定竟这样草率和多变。刚刚进京不久的《文汇报》又张罗着迁回上海。而徐铸成则带着他的得意助手浦熙修、钦本立等人，在京城访问专家、学者，制订《文汇报》的复刊方案。

迁出的积极性毕竟高于迁入的积极性。当年的10月1日，停刊五个月的《文汇报》，以全新的面貌在上海第三次复刊了。当日的销数即突破十万份。十几年来，三起三落。徐铸成、严宝礼这些当年的创始人，绝对想不到会有如许波折，如此的波诡云谲。

沉浸在《文汇报》再次复刊的巨大喜悦之中，沉浸在中共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而热情的调整之中，徐铸成毫不设防，倾心以赴，轻易掉进了“阳谋”的彀中，成为“引蛇出洞”战略的最大受害人之一。

1957年3月上旬的一天，徐铸成忽然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电话，速去科学礼堂开会。赶到会场后得知，中共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今天到会的都将赴京，今晚7点就出发，在火车站统一登车。

徐铸成匆匆交待了编务工作，准备了行装，晚7时登上了火车。同车三十多人，都是各界精英。新闻界有金仲华、赵超构、陆诒、杨永真、徐铸成；教育界有陈望道、廖世承等；文艺界有巴金、孔罗荪、傅雷等；影剧界有石挥、吴永刚、吴茵等；出版界有舒新城、孔另境等。上海市委宣传部派了一个随行干部，名叫姚文元。

3月10日下午1时左右，徐铸成在灯市口《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附近的饭店用过午餐，一边散步，一边回办事处。

办事处已然在望，遥见大门口有人着急地向他招手。定睛一看，是《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你到哪里去了？找得你好苦。接中南海通知，毛主席接见上海新闻界代表，他们已先走了，我们是最后了。赶快上车。”杨永真着急地说。

徐铸成急忙上车，一颗心扑扑地跳着，向毛泽东住处急驶而去。

客厅前，毛泽东和康生站在门口迎接，康生一一介绍。“这是徐铸成。”毛泽东伸出大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的目光望着他：“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多翻翻其他报纸。”这巨大的肯定和表扬，让徐铸成几乎不能自持，他“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座谈会由康生主持，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主席回答，就请提出来。”

大概是都没有思想准备，冷场了。少顷，邓拓目视徐铸成：“铸成同志，请你开个头。”

徐铸成不好推辞了。他说：“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对报纸上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又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掌握？”

毛泽东轻松地回答：“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学就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两天后，3月12日，徐铸成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特别鼓励人们消除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

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会上讲了另外一番话。当然，这番讲话，徐铸成是听不到的：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对整治阶级敌人言犹未尽。他接着说：

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他们现在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自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

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向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未结束，徐铸成就突然接到通知，由他担任团长，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3月27日自北京出发，5月9日回国，历时四十四天，访问了苏联十多个加盟共和国，一路上受到热情接待。访问的高潮，是回国的前一天，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

回到北京做完访问总结之后，5月13日，徐铸成回到了上海的家中。此时他无暇顾及鸣放和整风，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写访苏见闻，准备在《文汇报》上一天一篇连载，连载之后结集出版。

徐铸成在家写他的访苏见闻，毛泽东也在5月中旬连续给党内高级干部写指示，其中《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右派”的概念。当然，毛泽东还是讲究策略的，5月20日的第四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一张大网正在悄悄张开，徐铸成对此毫无所知。

大约是5月17日，徐铸成家中的房门被叩响。来人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他邀请徐铸成去出席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帮助党整风。

徐铸成为难地说：“我正在赶写《访苏见闻》，再说《文汇报》内非党同志和党员的关系融洽，合作得很好，我哪有什么意见可提呢？”

第二天，白彦再度登门，还是诚邀与会，说是会议快结束了，一定得去听听。“不给你办出席证了，你就拿我的去吧。”

盛情难却。当天下午徐铸成去会场听讨论。会场确实非常热闹，发言争先恐后。内容都围绕着消除党群隔阂，即拆墙问题。一位大专校长谈到，他作为一校之长毫无职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这位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竟贴出公告说，他不在校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

这触发了徐铸成要作不平之“鸣”，他要求在第二天上午发言。

第二天徐铸成的发言大意是，“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员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当然，领导在调派党员干部时，“应该注意是否恰当，最好委派的同志能够对这个事业有感情有联系的，至少他该对这一行有起码知识的，否则就没有法子工作，更不用说领导了。”《文汇报》的记者整理了徐铸成的讲话。副总编辑钦本立问他，这发言是否要见报？徐铸成回答，当然可以见报。他的发言全文登在1957年5月19日的《文汇报》上。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刊发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同日发出内部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举世瞩目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严厉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这篇编辑部文章，实则出自毛泽东之手。

7月1日，毛泽东再挥巨笔，亲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毫不隐讳地表示，前一段的大鸣大放，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现在搞不明白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触怒了“天庭”，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由对《文汇报》的褒奖有嘉，到必欲置于死地？

“最高指示”两度严厉批判，徐铸成的右派分子是跑不掉了。据说有关部门在上报将徐铸成、王芸生打成右派的报告时，毛泽东说，这两张民间报纸，徐铸成已划成右派了，王芸生就算了吧，无一幸免，影响不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创办《文汇报》后急速左倾，支持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遭致勒令停刊的“左派”徐铸成，倒被共产党打成了右派。而一贯思想偏右，内战期间大骂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和平、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王芸生，居然不是右派。

世事无常，匪夷所思。

好在徐铸成“天可怜之”。他熬过了二十三年可怕而暗淡的岁月，经受了无数的皮肉与心灵的折磨，等来了1980年年底的平反昭雪。从七十多岁平反到八十五岁逝世，徐铸成勤奋笔耕了十几年，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宝贵回忆、文章、传记，出版了十九本独具特色的珍贵史料般的书籍，创下了人生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样的人生经历，令人羡慕，令人敬佩，令人感慨。

主要参考文献

- 李伟：《徐铸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7月第一版。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4月北京第一版。
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0年9月第一版。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年2月第一版。

邹韬奋

邹韬奋原名叫邹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的笔名。邹韬奋曾向朋友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奋斗不懈，其中的尺度极难把握。从这笔名当中，足以看出邹韬奋一生中的艰难和矛盾。

用今天的标准评判，邹韬奋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愤青”。他一辈子只钟情于一件事：办好他的《生活》周刊，以及与他的周刊有关联的《新生》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生活系列书店。为了这个目标，他不畏权势，不惧黑恶，针锋相对地与国民政府抗争，几度流亡海外，经年身陷囹圄，但他痴心未改，斗志不减，终于积劳成疾，正当壮年之时撒手西归。他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满腔热忱和不懈追求，至今无出其右者。

中日甲午海战的第二年（1895），邹韬奋出生于福建永安。邹家祖籍江西余江，迁到福建后，重新修订了族谱用字，以“满玉隆有，文泗律宇，国恩嘉庆，人寿年丰”二十字为序逐代传递。如此算来，邹韬奋是邹家迁到福建的第十代了。

甲午海战的失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举国上下震惊无比。国人原以为，西洋船坚炮利，穷兵黩武，打不过他倒也罢了。没想到一直被视为倭寇的蕞尔小国日本，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敢与大清国分庭抗礼了。失败、不解、羞耻、痛恨，种种复杂的情绪杂陈在几万万中国人的心头。于是，一边是有识之士“变法图强”的奔走呼号，一边是清政府顽固坚持“闭关锁国”，在旧有的轨道上蹒跚前行。

邹韬奋发蒙之时，父亲也还是要把他送入私塾，去读“四书五经”。九岁

那年，邹韬奋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到了年底，“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了。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宽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小邹韬奋的右手掌已被打得有半寸厚了，偷偷向灯光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

这种野蛮、愚昧的教学方式让邹韬奋痛恨万分，因而，当有机会转入新式学堂时，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而去。

邹韬奋入的是南洋公学，那是我国最早的理工科学院之一，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南洋公学学费昂贵，而且要读四年才能毕业。第一学年还未结束，邹韬奋的父亲就失业在家，无力供养他读书了。邹韬奋便想尽一切办法自力更生，坚持读书。

要想获得学校豁免学费的奖励，必须考出学校前三名的优良成绩，成为“优行生”。为了争取当上这“优行生”，邹韬奋全力以赴，日夜苦读，经常是黎明即起，深夜方睡，手捧书本，孜孜以学。他自幼读的是私塾，经史子集尚有接触，可数学一科，对邹韬奋来说无异于天书，他一无兴趣、一窍不通。而南洋公学又是个高度重视数学成绩的学校，无奈，逼得邹韬奋下定决心，攻下数学一科。有几次劳累过度，竟熬到咯血。学校慌了，写信通知家庭，要家长去信劝告邹韬奋注意保重身体，劳逸结合。校监和老师也到宿舍劝他，不可过度拼命。邹韬奋心里明白，不这样刻苦读书，下学期的学费哪里来呢？

学费只是邹韬奋读书费用的一部分，除学费外，还有吃饭、买书、文具、洗理等无法省却的费用。这于殷实人家的子弟本不是问题，在邹韬奋这里却是天大的难题。他先是“节流”，除了基本的生活学习费用，其他的一概不花。

星期天，同学们娱乐去了，或逛街，或看电影，或郊游，邹韬奋手捧书本，闷在宿舍里、校园内，苦读度日。此时的校园，如同“静寂的寺院”，手不释卷者大约只有邹韬奋一人。那时，从学校所在地徐家汇到市区已有电车，邹韬奋万不得已要去闹市时，从不舍得乘车，而是来回步行。那二十多里路，权当锻炼身体了。

当然，“节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开源”才是治本之策。邹韬奋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自食其力。一天，在学校阅览室读报时，邹韬奋读到了《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的催领稿费启事。他颇为心动，心想，若能挣些稿费，岂不是“不无小补”。于是，他用“谷僧”的笔名，连写带翻译，给《申报》投起稿来。最初的稿子石沉大海，毫无消息。邹韬奋不气馁，继续努力，终于有稿子见报了。累积一个月，《申报》居然也登出了催他领稿费的启事了。邹韬奋拉着弟弟，去小地摊上刻了一枚图章，兴高采烈地去申报馆领出了六个大洋。哥俩当时“喜出望外”，真不知如何支配这笔“资金”。他们连蹦带跳地出了申报馆，并一口气跑回了徐家汇的学校。有了钱了，也还是舍不得乘电车。

求学的道路虽然坎坷，但邹韬奋在艰辛中磨炼着意志。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邹韬奋决心转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当然，他知道，圣约翰大学是所贵族学校，各种费用贵得惊人。他只好辍学几个月，经同学介绍，到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去当家庭教师，每月工资四十元。

邹韬奋教的这个家塾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要数学、英文、历史、地理和作文。邹韬奋是吃过私塾的苦头的，他不强求学生死记硬背，注意理解力的训练，教学效果良好，学生进步很快。几个月后，三个学生都考入了上海的中学，邹韬奋也揣着一百多元的工资回来考上了圣约翰大学。他的确低估了这所大学的高昂的费用，尽管他省吃俭用到了极点，在衣着光鲜、出手阔绰的同学们面前像个叫花子般另类和寒酸，但他那辛苦几个月挣来的钱，还是一个学期便花光了。有一次，做了整整一个暑假的零工，学费还是凑不够。开学的前一天，邹韬奋将行李暂时搬进学校，独自一人在房间内愁眉不展，束手无策。这时，一位毕新生先生敲门走了进来。毕先生是邹韬奋在朋友家中见过几次面的相识。毕先生不知怎么辗转听说了邹韬奋的窘境，专程来送钱的。邹韬奋碍于情面，坚辞不收。后来两人商定，权且借用。毕先生走了，邹韬奋回身关上房门，感时伤怀，竟独自一人哭了一顿。

拼命做家教、兼职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同学好友的不时接济，邹韬奋终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了。教会学校，毕业典礼须穿西装。这在别人那里不是问题的小事，邹韬奋这里都比登天还难。他哪里有西装啊！买不起，也做不起，只好租一套来应付。典礼之上，他也流泪了。不是喜极而泣，而是酸楚难耐。他觉得，能熬到毕业，真是太不容易了。当然，这段艰难的求学经历，也是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大学毕业的邹韬奋，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抨击黑暗，开启民智。然而，事情开始并不遂愿。邹韬奋谋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到民族资本家穆藕初的厚生纱厂做事。工作没几天后，又转到穆氏创办的上海纱布交易所去担任英文秘书。这个简单的每天只是译几页纱布英文电讯的工作，月薪竟有一百二十元，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算是十分丰厚的了。可邹韬奋并不快乐。他志不在此。他看重的不是收入的多少，而是工作的性质。他的新闻之梦从来没有破灭过，总是想找机会厕身于此。

还真让他觅到了“缝隙”。

借助一个老同学的关系，邹韬奋找到了一个在申报馆里“帮忙”兼办三个星期英文信件的杂活。这是一个毫无创意、十分没意思，且与新闻工作一点不搭界的工作。可想到能迈进报馆的大门，与他神交的报馆编辑、记者距离能近一点，邹韬奋就心满意足了。

每天下午6点，从交易所下班后，邹韬奋就匆匆赶到申报馆。申报的英文信件，主要是两项业务，一是广告方面向外国公司兜揽生意的，二是进口新闻纸与外国生产厂家办交涉的。主管这些事务的经理是个吹毛求疵的秃头，他的挑剔和严谨，让邹韬奋大吃苦头。

你替他写英文信件，必须精益求精，谴词造句、表述口吻，必须尽善尽美，稍有不如意，他便让你重写一稿。有时候，你按照他口述的意思打印信件，打着打着，在一旁踱方步的经理灵感突发，重新构思，你那里便前功尽弃，了无用处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屡次是在你打完了信件之后，他才全部推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就好像故意的一般。其实，据邹韬奋观察，这正是这位经理的不同凡响之处，无论做什么，总是要一丝不苟，分毫不差。这让邹韬奋有了条件反射，每天打印英文信件，打到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单词的时候，总要怯怯地望着这位踱着方位、摩挲着光头的经理，不知他又会有什么突发之奇想，下令重来。

这短暂的报馆工作经历，让邹韬奋受益良多。他觉得，这让他克服了年轻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眼高手低的坏脾气。经理的鸡零狗碎，经理的反反复复，其实都是在教导他做事要踏实、认真、严谨、细致，来不得丝毫的马虎和疏漏。扎扎实实地多做几遍，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到头来，邹韬奋有点感激这位苛刻的经理了，“好像做了三个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

邹韬奋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青年，他热心公益事业，愿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1920年代，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广募人才，推行大众教育计划。邹韬奋不辞辛苦，热情参与其中。又是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做英文教员，又是帮忙编刊物，出书报，忙得不亦乐乎。他喜欢这种忙碌。他觉得，不是他在指导别人，而是他自己在这些社会活动中经受了锻炼，学到了许多在学校、书本上学不到的实际生活经验。邹韬奋说：“说句好笑的话，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使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是《生活》周刊，1925年10月创刊，起初是由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志莘主编。仅仅一年之后，王志莘另谋他职，《生活》周刊一时无人接手。理事长黄炎培提名，其他同仁附议，决定由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

这于邹韬奋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一生的志向就是从事新闻事业，与民众同呼吸，与社会同进步。他立即辞去了英文教员和在其他报馆的兼职，全力以赴投入到《生活》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这一段时间，邹韬奋也是事事顺遂，安居乐业。几年前，元配夫人去世后，朋友撮合他与沈粹缜女士结婚。婚后，共生育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嘉骅（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邹家华）、二儿子嘉骝（即后来的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小女嘉骊。沈女士勤俭持家，相夫教子，邹韬奋无后顾之忧，无琐事相扰，《生活》周刊成了他的全部精神寄托。

《生活》周刊最早的办刊主旨是“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言论”。以邹韬奋的“愤青”性格，他是不会自甘囿于这个狭小的天地中的。他要干预生活，他要针砭时弊，他要激浊扬清，鼓动进步。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不久，就调整了刊物的文风：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他的本能告诉他，一个刊物、一张报纸，没有读者，没有社会的关注，那都是空中楼阁，孤芳自赏，没有任何影响和意义。邹韬奋理想的《生活》周刊应该是这样的：“你逢星期日收到这一个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阅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你有问题要想商榷的时候，握起笔来写几行寄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意见，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可以这样说，没有哪一个报纸或刊物，如此重视与读者的联系，如此重视读者来信，如此认真地回复读者的问题。以读者为师、视读者为上帝，这大约是《生活》周刊成功的全部秘诀。至1932年的时候，《生活》周刊每天收到读者来信千封以上，每天回复读者的信件也在五百封左右。邹韬奋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便雇了四人专门拆阅、回复读者来信。但这每一封信在寄发前，邹韬奋都要过目，亲笔签名。复信写得合意，他还要苦苦思索，重新起草，认真回复。

与读者的密切联系，让邹韬奋能随时感知社会的脉搏。“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存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交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与读者的密切联系，也让邹韬奋能真切地感知刊物的不足和疵瑕，尽力修正，以期完美。“时觉本刊缺点之多，对社会贡献之浅，惭疚殊深，故对于偶有‘不虞之誉’，则汗颜无地，不欲听闻，对于指摘之语则愿安承教，虽丑诋极毁的文字或信札，亦必平心静气仔细一读，因为百句中尽管有九十九句是无的放矢，若有一句搔着痒处，此一句即吾药石，即吾导师，为我所渴求而不得者，敢不拜嘉。”

自1925年创刊以来，《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一直在两千份左右徘徊，而且主要以赠送为主。邹韬奋接手后，情形大变。至1929年，期发数增至八万份，“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十二万份，到1933年，更是突破了创纪录的十五万五千份，成为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变化不仅仅是量的激增，而是内容的蜕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邹

韬奋思想观念的转折点，也是《生活》周刊办刊方略的大调整。

“九一八”之前，《生活》周刊是改良的，个体的，是“前途怎样辽远，我们不管”。“九一八”之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自觉地站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沿。

邹韬奋的想法简单而明了，凡是阻碍抗战的，无论个人、团体、政党、政府，一概反对之；反之，就支持，就拥护。“九一八”之后，邹韬奋慷慨激昂的血性文字，大量出现在《生活》周刊上了。

1931年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邹韬奋抑制不住激愤的情绪，一口气写了四篇小言论。他说，“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做积极的挣扎与苦斗”。他编写的“本周要闻”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10月17日的《生活》周刊，邹韬奋又写了四篇小言论：《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决死之心和怯懦自杀之区别》。四篇短文，篇篇的题目带一“死”字，邹韬奋似乎已经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他在鼓动浴血抗战的民族气节。针对政府抗战态度的暧昧和模糊，他大声疾呼：“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应战，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

鼓动抗战和反对腐败是一柄双刃剑。邹韬奋挥舞着这把锋利的宝剑，一骑突进，绝尘而去。

“九一八”事变前后，坊间盛传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有重大贪污嫌疑。他用十万元娶了上海大厦大学校花做小老婆，在上海愚园路三百一十号花五十万元巨资建造新屋，婚礼奢华世所仅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邹韬奋提笔痛斥：“当此民穷财尽的中国，应以救国为己任的党员而复身处高等地位，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家罪人。”

王伯群对《生活》周刊的批评十分不满，写来信函，百般辩解。邹韬奋一不做二不休，派出记者认真调查，将王伯群假公济私建造私宅的内幕一一曝光，并拍了五张豪华私宅的照片，与王伯群的来信一并发表。这一下，王伯群欲盖弥彰，自食了苦果。

这一组稿件正在发排过程时，王伯群得到了消息。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他竟派出两个心腹，想以十万元巨款的赞助费，迫《生

活》周刊就范。以邹韬奋的个性，他是愈挫愈强，愈压愈刚。他义正辞严，痛斥了收买者。王伯群们不但碰了一鼻子灰，还为下一期的《生活》周刊增添了评论的题目。邹韬奋愤然写道：“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生活》周刊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它的畅所欲言的仗义文字，在考验着当权者的耐心和雅量。1933年热河失守后，邹韬奋义愤填膺。他觉得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拱手让出东北三省和汤玉麟不战而退逃出热河，中央政府罪不可逭。他在《惩汤声中的推究》中写道：“热河之失，固然是‘深堪痛恨’，但沈阳之失，锦州之失是什么？老汤搬运私财固是踉跄已极，但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老汤的‘逃’固然太不高明，但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老汤用鸦片毒害热河，大发其财，诚属重要罪状，但是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诚然，‘割须毁容，化装难民’，在日暮途穷中的老汤固把滑稽剧演得淋漓尽致，但这也不过军阀末路的暴露而已。可是如果一定要袖手旁观地恭候军阀们一个一个踱大步的暴露出来，恐怕这个已经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就受不了！”

蒋介石火冒三丈了。中华民国颁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国民党中宣部制定的《宣传品审查标准》，在邹韬奋和《生活》周刊那儿居然都不管用。邹韬奋那支无所顾忌的笔，越写越尖锐，越写越义愤，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人不能保卫国土，反而奉送国土，官吏不能整顿国政，反而腐化国政，使青年不能得到可以‘安心求学’的环境，这是谁的责任？”

蒋介石要拿《生活》周刊祭刀了。他两次下令《生活》周刊禁止埠外邮寄。发行十几万份的《生活》周刊，上海市区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外埠各省，甚至南洋海外订户广大。禁止邮寄，离实际查封《生活》已经相去不远了。蔡元培等各界名流几次找蒋介石疏通、求情，蒋介石搬出厚厚的《生活》周刊合订本，上面用红笔划了不少杠杠，标注出了《生活》诋毁政府、鼓吹革命的证据。蒋介石愤愤地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生活》周刊在出版七年之后第一次被封，也是明眼人可以理解的了。与政府作对，怎么会有它的好果子吃呢？更何况这是一个独裁政府、专制政府，是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

邹韬奋在社会理想上也许偏颇，过激有余、公允不足。但在个人修行上，他堪称楷模。邹韬奋敬业、认真，公德至上，律己甚严。刚刚接手《生活》周刊之时，几乎就他一个光杆司令，他写稿、编稿、复信、接待、跑印厂、看校样等，无所不包，亲躬于事，毫无怨言。有一段时间，因日夜工作，伏案过久，他得了胸痛病，发作起来，胸部剧痛，满床打滚，而医生查不出原因，束手无策。发病频繁时，数日一痛或一日数痛，缠绵了好几年。邹韬奋忍着病魔的折磨，稍有好转，便聚精会神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报刊、杂志，发行本身极少挣钱，完全要靠广告维持经营。《生活》周刊也不例外，卖刊物的钱不足以支撑出版成本，发行量越大，亏本越大。广告便是填补亏空、支持运营的惟一法宝。邹韬奋深知广告对于《生活》周刊的生命线意义，他也时常亲自出马，拜访广告大户，探讨合作，承揽广告。有一次，邹韬奋谈成一笔在华投资外企的大广告，竟兴奋得不能自己，冒着倾盆大雨赶回《生活》编辑部。即便是如此仰仗广告，邹韬奋也有他不可动摇的做人与办刊的标准。在广告的刊登上，他就有著名的“五不登”原则。邹韬奋规定：“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这真让我们有时空倒错之感。邹韬奋当年的“五不登”，今日却几乎充斥于我们众多的小报小刊之上。违规和虚假广告，竟然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公害。

在邹韬奋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有着两条清晰的前行路线：政治上主张民主救国；事业上推崇新闻自由。

1933年，《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这是邹韬奋一生中多次流亡中的第一次。他去了英国、法国、苏联等欧洲国家，既感受到了西欧各国反对军国主义的不懈努力，也亲身体会了苏维埃崭新社会制度的创造力。中国的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家国前途未卜，游子邹韬奋归心似箭。他本是一个极爱旅游之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是他追求的最佳记者生存状态。可被迫出走，毕竟心境难以从容，事业所系的《生活》周刊以及在《生活》之后创办的《新生》，屡遭坎坷，邹韬奋心急如焚，袖手不得。一年后，他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不久，邹韬奋便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著名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民主救国会。起初也仅仅是一种聚会性质，没有完整的纲领

和目标，热心推动者是沈钧儒和周新民，一般每一、二周聚会一次，叙餐结束分手前，确定下一次的时间和地点。

渐渐的，救国会的主张和思想逐步清晰。1935年12月12日，邹韬奋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二百八十多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面前而领导救国运动！”《宣言》中透的咄咄豪言，令人民振奋，却也使政府极度不满。第二年的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联合会的章程态度鲜明，政治指向明确，她已经大踏步地走到台前，与国民政府在抗日领导权问题上分庭抗礼了。

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主张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人民以言论和行动的充分自由。这戳到了蒋介石最忌讳的那根软肋，大约是压垮蒋介石容忍度的最后一根稻草。

恐怖的逮捕行动开始了。夜半砸门，手铐解人，秘密逮捕，突击搜查，这些过去只在小说和故事中看到的情节，活生生地演变在了邹韬奋身上。

1936年11月22日。这天下午6点，邹韬奋赶到功德林参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座谈会，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1点。回到复兴中路六百零一弄四号的家中，已是子夜时分了。“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到凌晨1点左右邹韬奋才渐渐睡去。2点半，邹韬奋家后门的敲门声骤然响起。邹韬奋夫妇从睡梦中惊醒，“咚咚”的砸门声令人惊悚万分。

夫人担心是强盗打劫，有些害怕。打开后窗问话，来人并不回答，只是拼命拍打，大叫“开门！开门！”邹韬奋明白了，巡捕房的人上门拿人了。他穿衣下楼，打开了后门。几个人一拥而进。领头的法国巡捕举着手枪，如临大敌。通过翻译问过邹韬奋的姓名、身份后，法国巡捕一脸诧异，这个文弱书生不像扯旗造反的绿林好汉啊。他收起手枪，让邹韬奋跟他到巡捕房走一趟。邹韬奋提出上楼加件衣服，这些人毫无礼貌地跟进卧室，看着邹韬奋更衣加衫。一同前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探，已溜进邹韬奋书房，搜出了一些印刷品和来往信件……

这前后几天，一共抓了救国会的七个人，他们是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史称“七君子”案件。

蒋介石倒是直言不讳：“我对他们是很客气的，谈了话还请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反而闹得更凶了，所以只好逮捕了。”

1936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成立已近十年，在世界汹涌的民主潮流的裹挟下，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意识也在觉醒。蒋介石可以下令抓人，但最终的处理，要靠当时的法律和审判、定罪程序。这看起来像一出戏，但真要按照程序演好也不容易。蒋介石和他的军阀同僚们耐着性子，静待法院的裁决。

案子经过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取证，《起诉书》在四个月羁押期的最后一天送到“被告”手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国人高度关注，目不转睛。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司法不独立，当权者主宰一切，这些逼真的“演出”只能愚弄百姓。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在法庭上与检察院的诉讼人吵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操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木偶提线者们，也在幕后紧张交易和磋商。蒋介石公然打压抗日救国运动，箝制不同言论，在国民党内也颇有微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等人曾联名致电蒋介石，请他“郑重处理”。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无条件释放救国会“七君子”。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只身去见蒋介石：“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百般狡辩：“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以革命的名义，行专制、独裁之实，这在中国是最有心得的事情。

“七君子”事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的国内舆论重镇《大公报》，全文刊登了检察院的《起诉书》，洋洋数千言，列举了救国会的十大罪状。沈钧儒等人的《答辩状》完成后，《大公报》竟然拒绝刊登。救国会的胡子婴前去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交涉。

一见面，胡子婴单刀直入：“江苏高等检察院对‘七君子’的《起诉书》，《大公报》是不是刊登了？”

张季鸾轻松答道：“是的。”

“既然刊登了《起诉书》，那么‘七君子’的《答辩状》是不是也应该发表？”胡子婴追问。

“不发表。”张季鸾回答得直截了当。

“为什么？”

张季鸾冷笑一声，不置可否。那神态分明在说，报纸上刊登什么，不刊登什么，应该由报馆说了算。任何势力都无权压制和干涉。

胡子婴料到了张季鸾的态度和借口，他大声说：“你们的报纸号称大公，但是你们只登官方一面之辞，算得上什么大公？今后你们报社的招牌应该摘掉，不配再叫大公报了……”

张季鸾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大公报》客观公正报道新闻的非议和质疑。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就是《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胡子婴言之有理，切中要害，他无法反驳。张季鸾当着胡子婴的面拿起电话，打给编辑部，指示“七君子”的《答辩状》即刻发排，明天见报。当然，绝对的不偏不倚是不存在的。张季鸾自然有他的政治倾向。《答辩状》发表后，6月11日，张季鸾亲自撰写《大公报》社评“沈钧儒等一案公判”，影射了救国会的反政府行为。

“七君子”中史良为女性，逮捕后不久就保释出狱了，真正在监狱中坐大牢的是六位男士。那时的法庭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将同案的六人关在一起，让他们有了充分的讨论案情的机会和时间。时局艰险，高峰叵测，他们是做好了“不幸”的准备的。六个人的“家长”是沈钧儒，入狱之初，他就指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患难相共，“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羈押大家羈押，释放大家释放。”六个人皆为学有专长之士，甚至就有律师和法学者，他们一致商定了三个原则：一、关于团体的事情，应由团体去解决；二、关于六个人的共同事情，应由六个人的共同决议去解决；三、关于各个人的事情，应由各个人自己负责。尽可能在合法的范围争取案件的最佳审判结果，是他们的冷静之措。

牢狱之苦，倒是反激了邹韬奋的革命热情，他在狱中慷慨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作用。我要握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七君子”案旷日持久，僵持不下。轻易论罪，舆论哗然；无罪释放，政府颜面尽失。江苏高等法院出了个折衷之策，以被告等家庭困难为由，裁定停止

羁押，具保释放。张一鹏具结保全了邹韬奋。这场历经了二百四十三天的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告一段落。

邹韬奋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期期艾艾，艰辛备尝。他曾同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当面探讨过中国的政党制度设想。

陈布雷说：“蒋公所提的组织，是指党的组织。委员长十余年来有个理想，要集中中国一切人才组织一个伟大的政党，由他领导起来。”

邹韬奋问：“据你看来，中国共产党肯毁党加入吗？”

陈布雷说：“这确是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就不赞成。”

“那怎么办呢？”

陈布雷答：“那就希望除中国共产党外，其他一致集合起来组织一个政党。”

邹韬奋告诉他：“中国是否能够只有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38年，迫于全国一致抗战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组建了国民参政会，聘请社会各界二百名志士仁人为“国民参政员”。这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并无实权。可邹韬奋却不放过这个合法行使职责的机会。他说过，“别人请客，我是把自己当做主人的”。他在参政会上力陈己见，雄辩滔滔，于民主、于救国都有不少真知灼见。邹韬奋提出：一、立即结束训政，开始宪政，实行无限制的普选制度。二、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团体合法存在。三、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五、立即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六、立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之自由。七、立即释放爱国政治犯。八、在抗战时期内宪政开始之前，各党派先行参政，并罗致全国无党无派人士组织举国一致的国防政府。

作为一个新闻人、出版家，邹韬奋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国民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

中国历代的专制政府，都把箝制思想、禁绝异见作为统治的重要手段强化实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惧怕“一言丧邦”可怕局面的出现。

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天下甫定，便急匆匆地制定意在扼杀自由言论的种种法规。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出版法》。

1931年1月，紧接着出台了《出版法实行细则》二十五条，把出版法的原则和办法加以具体规定。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制定《宣传品审查标准》。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又有《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出台，规定一切图书杂志付印前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

1934年8月，国民政府制定《检查新闻办法大纲》。大纲规定，“新闻原稿必须送检”。

193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战时”为借口，全面强化了对新闻出版物的严厉审查。

以上这一些，仅仅是公开颁布、昭告于天下的规定、办法、条例、法令，国民党及其中央宣传部内部制定的言论出版方面的清规戒律，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这左一道绳索，右一道铁链，捆得邹韬奋动辄得咎，无法举措。他办的杂志、报纸、书店，步履艰涩，勉强维持。

邹韬奋在陪都出版《全民抗战》周刊。一次出版前送重庆的审查委员会报批，退回送审稿时，有一篇文章被整个的撤下了，理由是文中几句话不妥当。时已傍晚，这期刊物当晚就要印刷，撤稿、换稿、重新编辑排版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而审查机关已经下班，锁了办公室扬长而去，再去论理已无可能。邹韬奋一气之下，直接去了重庆审查委员会主任刘百闵家，而刘百闵也正巧在外应酬，尚未归家。邹韬奋就在刘家的客厅中坐等，从晚上8点一直等到半夜12点，终于让夙夜归来的刘百闵开了绿灯，印厂机器启动，周刊如期印刷、装订，邹韬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让邹韬奋最为气愤的是，这些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不学无术又蛮横无理，等因奉此，僵化无比。他们删改的稿子，不允许你注明“被略”或以“□”代替，还非得让你重新润色，上下连贯。仅仅是删节倒也罢了，最不自量力的是他们居然捉刀代笔地修改稿件。不知出处，不知警句，不知名人名言，甚至是总理著作，他们也不知就里，大刀阔斧修正，其中的笑话，令人捧腹。新闻检查官还机械地规定，凡是“解放”、“前进”、“光明”、“翻身”、“阶级”等词语，一律不得在文章中使用。一旦出现这样的字样，要用他们规定的字词替换。于是，“农民阶级”就改成了“农民社会集团”。“民族解放”就变成了“民族复兴”。

“妇女解放”便也生硬地被替换为“妇女复兴”了。只要避开了敏感词句，他们才不管你句子通不通，语气顺不顺呢！

1940年7月的一天，邹韬奋与新闻检查官的一番较量，颇有戏剧色彩。

这一年的6月，希特勒德国攻克巴黎，法国资产阶级立即投降，组建了傀儡政府，英国赖以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屏障，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邹韬奋编辑的《全民抗战》，特约一位作家撰写了《论法国战败速降 变更国体》一文。文章中的精彩部分有：“法国投降是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自救，也正是一国资产阶级在处境困难时必然达到的逻辑。法国既在战场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了，但资产者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如果能够保住这些，那比起空洞的国家光荣，是更有利的。何况法国人民已放出革命的信号了，首先结束对外战争，是比什么都重要。”文章分析得中肯、精到，批驳了国民政府的御用文人所谓民主导致法国失败、独裁助长德国胜利的谬论。这种论调实际上是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张目，竭力鼓吹和坚持它的专制统治。检查官大笔一挥，删掉了这段精彩论述。检查官还删掉了文章引述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一则报道：“据6月2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所载，法国在投降前几星期，是在极端危机中，法国已进入革命的边缘，那些日子中，有大批人民，及所谓左翼分子，并包括国会议员的被捕，就反映了时局的严重。同时法国统治者已和希特勒取得谅解，希氏已允诺法国资产阶级保有重工业，并包括军火托拉斯，我们同时也还听到，希特勒已允不占领里昂等几个重工业城市，这是现实利益呀！为了镇压国内革命，为了保有自己的财产，这些法国资产者便采取了速降政策。”

这样精彩的两段被删除之后，文章便没有了灵魂和精气神。邹韬奋下决心要与新闻审查委员会较量一番。

那时的审查机关一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二是为了故意刁难各报刊、杂志，已由城里搬到了南岸的真武山上，往返一次要走几十里山路。邹韬奋不顾一切，叫上一位年轻的编辑打上门去。

邹韬奋已有过几次被要求“应予免登”，也几次去审查机关交涉论理，那些审查大员们知道他“难缠”，都有意躲着他。这次，邹韬奋跨江而来，缘山而至，他们便打发一个小秘书出面应付。

邹韬奋开门见山，要求对方说明删掉那两部分的理由。

秘书答：文章里面有“阶级”的字样，“很不妥当”。

邹韬奋压住火气说：“法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他们国内有资产阶级，是全世界公认的事，这篇是研究法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的字样？”

秘书无话可说，只是不断嘟囔，“最好不要用。”

邹韬奋说：“就是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也不讳言外国有‘资本家’，资本家不是资产阶级中人是什么？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更明白说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为什么三民主义的中国发展到今天，作家研究法国的事情，提到法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人发抖，这是什么道理？”

这显然超出了一个小秘书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范围，他理屈词穷，无以应对，“一溜烟地跑进去”，向头头们请示去了。出来后，他说，“那篇文章里指出法国的迅速投降是由于要镇压国内革命，是由于资产者要保全自己的财产，很不妥当。”

邹韬奋质问：“这是法国的事实，有什么不妥当？”他告诉这个小秘书，“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办的刊物，美国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国家，该报编者至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怕据实指出关于法国投降的这些事实，作为研究法国迅速投降的根据，为什么三民主义的中国一定要替法国的资产阶级做保镖？为什么三民主义中国的作家一定要对国际上这类铁的事实闭拢眼睛说瞎话，以自欺而欺国人，硬说法国的投降是由于民主的失败，以打击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

小秘书又被问倒了，第二次“一溜烟跑进去”请示，然后鹦鹉学舌地对邹韬奋说：“这篇文章说法国资产者镇压国内革命，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便采取了速降的政策，这实有意暗射中国的情形，所以很不妥当！”

邹韬奋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声色俱厉地大声说道：“法国投降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是在领导全国坚持抗战，为什么我们分析法国的投降就是暗射中国情形，你的话实在是侮辱政府，侮辱整个中国的人民！”

小秘书被吼得吓坏了，放在桌上的十个手指头都在发抖，他第三次“一溜烟跑进去”……这次出来，他明显底气不足了，嗫嚅着说：“我们对于法国的失败，实在是应该同情的。”

邹韬奋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对于法国的失败应该同情，对于法国的投降却绝对不应该同情，只有中国的汉奸对于法国的投降才表示同情！”

小秘书黔驴技穷了。他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

邹韬奋严正指出：“你们的理由既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成立，那篇文章非全部恢复原状不可。”

小秘书沉吟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把文章往桌上一掷说：“你要登就登罢。”

邹韬奋一把抓住那篇“从棺材里救出来”的稿子，与年轻编辑一起兴奋地赶回编辑部，虽然十几里的山路，跑得汗流浹背，但邹韬奋欣欣然兴奋不已，并不觉得疲劳。

当然，每一次的论理不一定都这样幸运。一天下午，天正下着雨，《全民抗战》已经排好，正要打纸型制版印刷，一篇重要的国际时事评论突然被扣下了。邹韬奋抓起一把雨伞火速赶往审查机关。在会客室等了很久，那个审查总干事才极不情愿地走了出来，他对邹韬奋冷冷地说：“扣了就扣了，没有什么理由可说。”

邹韬奋耐着性子向他讲理，那一大通书生之见竟惹恼了总干事，他竟放出这样的豪言：“你和我讲理没有用。只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彼此才可以讲理，我是主管机关，我说怎么办就要怎么办。你和我是不平等的，你不能和我讲理！”

面对如此顽冥之辈，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邹韬奋悻悻离去，铩羽而归。

性格即人。邹韬奋这种激愤的个性，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与国民党政府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地斗着，有四次不得不流亡海外，以避风险。他主办的刊物，《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等，办办停停，生生死死，历尽坎坷。

《大众生活》创刊之初，影响力迅速提升，大有当年《生活》周刊的风范。读者欣喜之余，也纷纷写来至诚之信，劝邹韬奋在文字上慎重，立场上公允，不要使《大众生活》中途夭折，徒生悲伤。可邹韬奋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直知识分子，他公开答复读者：“万一虽‘格外注意’而仍出乎拯救力以外的‘夭折’，我们却不因此灰心，却不因此停止工作，换句话说，‘解放运动’的进行并不因此而停止或消灭，时代的巨轮还是朝前迈进的，而且这里被压下去，那里要奋发起来；今天被压下去，明天要奋发起来。”

1944年7月24日，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邹韬奋先生，因病逝于上海医院，享年四十九岁。他仅仅差一年，没有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邹韬奋逝世后，一首诗这样悼念他：

黑雾笼罩了人间，寒风呼呼地令人发抖，那和暴风雨苦斗的大树，枝儿折了，叶儿落了。但是它播下了千千万万的种子，静默地埋在地的深处。当春天再来到，它们会发芽，它们会抽条，它们会长大。会长大，会长大，会长大，长成参天的森林，结成民主之果；长成参天的森林，开放自由之花。黑暗占据了宇宙，虎狼汹汹地阻人去路，那照耀着大众长征的火炬，烧成灰了，火儿熄了。但是被点着了的一个个的火把，耐心而又耐心地燃着。当大风再来到，它们会燎原，它们会怒吼，它们会狂烧。会狂烧，会狂烧，会狂烧，烧起熊熊火海，铸成民主中华；烧起熊熊火海，创造自由世界。

这是对邹韬奋精神世界的最好怀念。

主要参考文献

- 穆欣：《邹韬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10月第一版。
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重庆，1997年9月第一版。
严如平、宗志文：《民国人物传（第九卷）》，中华书局，北京，1997年3月第一版。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2004年10月第一版。
关东生：《韬奋〈读者信箱〉》，中国城市出版社，北京，1998年2月第一版。

陈铭德 邓季惺

陈铭德、邓季惺是一对半路夫妻。这样两个性格、脾气、禀性完全不同的四川人，却相扶相携，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成就了一段夫妻报人的现代佳话，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这段佳话和奇迹的源头，是从《新民报》的创刊开始的……

1929年。南京。

初秋时节，太阳显得高远而又淡雅，照耀着的山形城郭因宁静而愈显寥廓。清风微拂，十里秦淮即便是市声喧闹，亦自有一种澹定的气氛。

是个好季节。

夫子庙的奎光阁茶馆，临水的窗前，坐着三个年轻人。他们不像一些老人那样，一边慢慢品茗，一边目光淡淡地闲看着茶馆粉墙外的粼粼碧波。他们谈笑来自有年轻人特有的生气，手握茶盏的姿态更像把酒豪饮的样子。

有报童走到他们跟前卖报。“民生报”——他们摇头；“立报”——他们摇头；“申报”——他们摇头，一直等报童叫到“新民报”时，他们才点头买了一份。

看到他们备受茶馆中人注目，并且有人好奇地也跟着买了这份南京市面上刚刚出现的《新民报》，这几个年轻人相视而笑。

他们其实就是《新民报》的创办人。方才的举动是他们有意为之，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做个广告吧……

这是蒋丽萍、林伟平合著的《民间的回声》一书中的精彩描写。

这三个年轻人便是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当时都是三十岁左右，同为四川人，又一同在南京中央社里做编辑。这三个年轻人崇尚孙中山，赞同民主革命。他们一定是厌倦了在中央社里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做奉命文章，编发统一口径稿件的沉闷生活，渴望着办一张独立于政府和党派之外，说真话、讲实情的民间报纸。

陈铭德回了一趟四川，利用他八面玲珑、能言善辩的个性特点，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关系，多方游说，终于从四川军阀刘湘那儿筹到了两千元的办报经费。几个年轻人兴奋地将自己的报纸定名为《新民报》，一来是为了承继同盟会《民报》的衣钵，二来也蕴含着“作育新民”之意。忙碌、紧张、艰辛、劳累的一番筹备之后，1929年9月9日，《新民报》在南京面世了。

刘湘是不会做蚀本买卖的。这个四川军阀深知，他偏安西南，远离揆阁，需要有一张南京的报纸，不断地传达着他的信息。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的陈铭德，毫无置喙之处，只能勉强从之。

惨淡经营两年之后，尽管时常亏损，有时入不敷出，但《新民报》还是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基础。在《新民报》创刊两周年的纪念增刊上，陈铭德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他的纪念感言：“新闻记者之清苦，早为社会所共知，本报同人，感情意志，两皆融洽，虽外侮频来，经济屡厄，而同人精神上尚能互相慰安，不为外诱，日常互励，辄有数语，‘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自己心安。’”办报两年来，陈铭德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示他的办报理念，在这篇感言中他一如既往地写道：“今之报纸，大都仅谋增加收入，以至商业尖锐化，仰鼻息于资本家，奔走于银行及百货洋行之门，分润彼等榨取劳工血汗之唾余，沾沾自喜，故不惜丧心病狂，为特殊阶级做喉舌，造成了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忘却重榨下之劳苦工人；或办报者优然高官贵爵，席丰履厚，但求个人享乐，忽视事业之革新，其结果刊为诱惑，即系煽动，是何能安定目前社会之人心，而促进世界求久之大同。本报不敏，决不官报化，传单化，此则又可为社会告者之一。”在这期间，陈铭德逐渐明确了他的办报宗旨：一、传达正确消息，二、造成健全舆论，三、促进社会文化，四、救济智识贫乏。

正当《新民报》走过最初的崎岖坎坷，逐渐迈上坦途的时候，它的奋斗团队却发生了重大变故。《新民报》创办人之一的吴竹似，罹患肺结核，病势日

沉。1931年，吴竹似的妻子邓季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潮湿闷热的南京，陪同丈夫前往北平求医。没想到吴竹似竟一病不起，病逝于北平。二十四岁的邓季惺没有被生活的不幸压垮。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她毅然报考了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继续她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大学学业。陈铭德深深敬慕着这位坚强的女性，由敬慕而生爱。1931年8月，陈铭德与自己的原配妻子离婚。经过近两年的鸿雁传书，两地情思，1933年1月，两个飘零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自此，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诞生了一对传奇的报人夫妻。

1933年夏天，邓季惺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回到南京，先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司法部民、刑两司做科员。“衙门”里等因奉此的枯燥生活，十分不适合刚毅、果决的邓季惺。1935年秋天，因《新民报》刊登了一则不利于司法部的消息，夫祸妻受，邓季惺遭到了部长的训斥。一气之下，她索性辞去了司法部的职务，在南京做了挂牌律师。她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就设在《新民报》的楼上，并在《新民报》上开设了法律专栏，亲自主持、亲自解答读者有关法律方面的疑惑与问题。

1937年6月，邓季惺正式加入《新民报》，任副经理。也许是上苍格外眷顾《新民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让邓季惺掌管《新民报》的经营大权，使这艘民间报系的航船，过险滩，劈激浪，一帆高悬，顺利远航。

邓季惺出生于四川一民族资产阶级之家，小有家产。家庭环境的熏染，令她眼界开阔，看重经营。法律专业的学科背景，让她重规矩、守方圆，强调规范的约束作用。女性果敢与细腻的完美结合，又使她在经营中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既要抓西瓜，又不丢芝麻。

邓季惺掌管《新民报》的经营管理之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逐步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譬如，过去每天刊登的广告没有登记，广告费的收缴就没有严格的要求。邓季惺规定，《新民报》每天刊登的广告由专人一条一条剪贴起来，每天做一张报表，财务科据此报表收钱。现金支付的，全部入账；集中结算广告的，拖欠的款项就记债权。一个月下来，广告部门就把清欠的钱拿来对账。发行，每天也有日报表，现金回笼是天天要做的功课。邓季惺对原材料供应和物资储备有着特殊的敏感。当时，面临全面抗战，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销路激增，纸张消耗非常大。她就委派了四五个年轻人，专司纸张采购之职，以保证

报纸的正常出版。邓季惺运筹帷幄，调度从容，总是能够及时购进报纸出版所必需的纸张、木材等物品，并把所赚的钱迅速兑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货币贬值。当时，《新民报》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报馆里用多少根大头针邓季惺都有数。正是这种严密、精细的管理和充裕的物质准备，才能令《新民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迁陪都重庆之际，依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成为继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后，第一个在重庆恢复出版的报纸。

《新民报》留给中国新闻界一份厚重而多元的遗产。你可以研究它的经营之道；你可以分析它的社会新闻特色；你可以评价它的辛辣的杂文和小品文；你还可以欣赏它的副刊的结构和特点……然而，最让人敬佩和感动的是，《新民报》在几十年的办报实践中始终不渝坚持的“不官报化，不传单化”、“传达正确消息，报道事实真相”的勇气和胆识。

陈铭德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胸怀、雅量、宽容和那颗妇人般的菩萨心肠。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的新闻史上，陈铭德决不是最杰出的。他没有《大公报》张季鸾那样过人的才气，一字千钧，羽扇纶巾，一支毛锥胜千军万马；他没有《文汇报》徐铸成那样的灵气，新意迭出，热情高涨，把报纸办得生龙活虎，独具一格；他没有《申报》史量才那样的胆识，敢跟蒋介石面对面一较高下，特立独行，一副傲骨；他也没有“世界报系”成舍我的开拓精神，二百大洋办报纸，两年三报动京城。陈铭德是靠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聚拢了一批优秀人才，成就了《新民报》五社八版的大报格局。

陈铭德在办报最困难时期得到的第一员大将是张友鸾。张友鸾是安徽安庆人，就读于北京的平民大学新闻系，是难得的受过正规教育的报人，深得邵飘萍、成舍我赏识，曾在《京报》编文学周刊，在《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担任总编辑。张友鸾对民间报纸情有独钟，誓言要做一个“超政治的新闻记者”。张友鸾代替吴竹似任《新民报》总编辑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明确报纸的读者对象。他与陈铭德商议，报纸应该以青年学生、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多刊登一些青年喜欢阅读的东西，宣传民主思想，提倡爱国主义，为平民百姓讲话，批评社会弊端。在编辑方面，他提出文章要短小，标题既要讲究文学性，又要通俗易懂，诗词曲赋、谚语民谣均可入题。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编排版面，要疏落有致，灵巧活泼。这些观点便成为《新民报》最初的风格。

1935年，罗承烈加盟《新民报》，这让陈铭德喜出望外。罗承烈是四川涪陵人，与很多四川籍名人都有交情，曾任北京《实话报》编辑。1928年他还在重庆创办过《新社会日报》，任社长及总编辑。《新社会日报》以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敢于批评地方恶势力，很受重庆市民欢迎。加入《新民报》一年之后，罗承烈升任主笔，继而任总主笔。他与陈铭德一起参加了报社大政方针的制定，经常一起协调各方关系、延揽人才，是陈铭德十分依赖和信任的重要助手。

草创之初，陈铭德感慨于《新民报》副刊没有新意，文章老调，内容陈旧，与时代脱节。徐悲鸿便向陈铭德推荐了田汉、阳翰笙二人。陈铭德立刻诚心诚意地去请田、阳二位，两人很快答应了，到《新民报》来编副刊《新园地》。且看他们写的《新园地》发刊词：“我们不称赞牡丹，因为它太富贵了；我们也不种植古槐，因为它长得太老朽了；我们更不要栽培玫瑰，因为它的刺太多了。我们需要种植健丽蓬勃的花草，我们更要栽培能够经得起雷雨风霜的大树。”南京的读者耳目一新，《新园地》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避战重庆，《新民报》西迁陪都。为了把张恨水从《世界日报》挖过来，陈铭德做了该做的一切。张恨水抵达重庆时，陈铭德专门派人到码头迎接。张恨水加盟《新民报》后，住在重庆郊外南温泉桃子沟，陈铭德特许他不必每日来报社上班，只要派人将副刊所需的稿子拿来即可。而且只要张恨水进城，陈铭德必请他到家中吃饭，改善生活。逢年过节，陈铭德总不忘给张恨水送些薄礼。张恨水五十岁生日时，陈铭德派人将张恨水全家接到城里吃西餐。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民报》要出北平版，请张恨水担任总编辑。张恨水八年没有回家看望老母亲了，陈铭德就让他去北平打前站的邓季惺，在选好了报社的房子、购买了印报的机器后，替张恨水买了一处全家安居的大院子，等待张恨水的到来。正是这样的礼遇，使张恨水在《新民报》踏踏实实地待了十年，也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年，他后期著名的小说和散文，大多刊登在《新民报》上。

当年重庆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浦熙修，也是陈铭德在一次偶然的会议中发现的。浦熙修开始只是在《新民报》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了广告科，业余时间给报纸的副刊投稿，发过几篇东西。1937年4月29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记者都已经出去了，无人可派。陈铭德没有办法，只好让浦

熙修去“救场”。浦熙修不辱使命，所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5月2日的《新民报》上，“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陈铭德当机立断，将浦熙修从广告科调进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个女记者，后来又被提拔为采访部主任，在多次重大报道中表现突出，成为《新民报》的一张王牌。

……

人们往往感觉《大公报》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可不经意间，《新民报》也拉起了一支蔚为壮观的人才队伍：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三张一赵”聚于一报，成为战时大后方新闻界的美谈；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在重庆新闻界独树一帜，经常能采访到重大独家新闻；夏衍、谢冰莹、沈起予、施白芜、碧野、黄苗子、郁风、吴祖光、陈白尘、聂绀弩、陈迺冬、孙伏园、秦瘦鸥等，都先后担任过《新民报》的主笔或副刊主编……一时瑜亮，群星璀璨。

陈铭德更多地是将报纸作为事业来经营的。办报之初，他没有特别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他只期望他的《新民报》能为读者认可，为市场认可。陈铭德经常说：“一个办报的人，他不是为了办报而办报，他是为了有人读报而办报。若果这报纸是得不到读者的，或者读的人太少了，这报馆是终归要关门的。”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要说富于商业性的报纸，或含有某种政治作用的报纸，是要希望有多数的读者，他才可以赚钱，或达到宣传煽惑的目的。便是专为某一个人所办之机关报，不一定以赚钱或推销为目的，若果他的内容真正不堪一读，其结果也只是只有寿终正寝一途。”

这些简洁而明了的道理，我们似乎到今天也还是没搞明白。

当然，那种标榜自由主义、社会公器，不做任何党派代言人、传声筒的同人办报方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之处。时代激荡，民族危亡，反映社会和人民心声的报纸，想超然物外，不是有意逃避，就是自欺欺人。

《新民报》本想保持中间立场，至少不表现得那么激进。他们几个高层管理人员凑出了八个字的应对时局的办报方略：中间偏左，遇礁即避。这是陈铭德“八面玲珑、多方讨巧”做人原则的准确体现。《新民报》总编辑罗承烈曾这样解释这一方针：中间偏左，要左到不致封门；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有时会偏右，但右也不能右到与国民党一个鼻子出气，甚至骂共产党。

新闻媒体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登记准入制，都是在现有体制下运作。没有哪一个报纸以公开反对、推翻现政府为号召而平安无事。《新民报》的谨小慎微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在办报实践中，在社会潮流的裹挟下，在年轻编辑记者的激情冲击下，“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就很难把握得那么恰如其分了。实际上，在旧中国办报的整整二十年中，《新民报》是被新闻良知和社会共识推着向前走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新民报》的头条新闻是：“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城，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均被占领，我军毫无抵抗，完全缴械。”报纸配发的社论是《东北全非我有，国亡无日，请对日宣战！》，态度十分鲜明。

1931年12月5日，北大学生赴京示威团在南京街上游行，沿途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等口号，当即与军警发生冲突，一百八十五人被捕。被捕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就是后来以敢于直言而闻名的千家驹。12月6日，《新民报》即发表社论《北大学生被拘事件》，声援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呼吁“不必对学生用武力。”

1932年元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敌，使萎靡多时的国运民情大大振奋，《新民报》即在1月31日发表《救国之最后一着》的社论，竭力为抗日军民打气。《新民报》还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学生赴京请愿的消息。

所有这一切，激怒了国民党中宣部。3月初，接连两个晚上，国民党中宣部秘书方治，直接打电话到《新民报》编辑部，威胁道：“叫你们不要再登学生请愿的消息，你们一直不听话。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下令抓人，查封你们的报馆了！”

陈铭德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愕然了！难道报道学生请求抗日、请愿出兵错了吗？《新民报》创刊两周年纪念刚刚过去，纪念增刊上的铮铮誓言，言犹在耳：“号称民众喉舌者，对于民众之所欲言之所不能言之所不敢言者，应即大声疾呼，方无愧此喉舌，若竟不为民众说话，而反为民众公敌散布其麻醉剂，宣扬其赞美诗，以欺骗民众，则其人格之卑污较雉兔而尤甚，更何论乎社会导师？”“人民喉舌须尊重，我辈头颅须看轻”，“世无公道全凭我，舌不自由枉有头”。陈铭德个性柔弱，逆来顺受，他是从不出恶声的，面对方治的大发雷霆，他也只有唯唯诺诺。但对他手下的编辑记者，他却实在是无法约束，无以启齿。

《新民报》的抗日报道照样红红火火。终于，1932年6月19日，创刊两年多一点

的《新民报》第一次受到了首都警备司令部停刊一日的处分，罪名是有两天的三条新闻未送检查便擅自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每月给《新民报》的八百元津贴也从此停发了。

1935年的华北事变，让风雨飘摇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这一年的5月31日，国民党华北当局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侵华重点开始向华北转移。它的战略意图就是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州国。于是，有关“华北自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而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有力的反击措施，还与日方陆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万多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前往北平政府请愿。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了爱国学生，他们指使军警用大刀和高压水龙头对付学生，许多学生被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学生的爱国壮举真是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他们奋不顾身的呼喊，会在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回荡！对于沉闷多时的《新民报》来说，“一二·九”学生运动就像久阴不开的天空上响起了一声炸雷，那一个个文字又开始活动了。12月11日，《新民报》就发表了题为《北平市学生万岁》的社论。12月16日，北平市民和学生三万多人，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反对成立企图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又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受伤和被捕的学生有数十人。第二天，12月17日的《新民报》头版头条大字刊登了16日北平总示威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一封北平学生的来信：

……悲惨的壮烈的学生运动正在进行着。我们拿人和血来反对自治运动而示威，为国家争一点国格。这种运动，北方报纸不准登载，南方报纸很简单。而且许多未登。告诉你们吧！一位女同学已伤重逝世，有几十位受伤的睡在医院里，有大批坐在牢里，现在还继续逮捕学生，各学校均已罢课。在严密监视下，我们在预备作一次大规模示威。虽然他们说要用大刀和手枪来阻止我们。在请愿那天，军警手握机关枪守着城门。这样，我们已经没有救国和祖国的自由了。那天我们请愿的情形是可歌可泣的，城里是流血和冲突，城外冒着

零度以下的朔风，从早上七时由学校步行出发，饿着肚子，直到五点多钟才回学校。城外有千多人，城内是六千人。我们急切需要各地学生援助，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的代表已经南下，好友，援助我们！援助我们！我们忍受着一切要同我们的敌人斗争。

就在这同一天的《新民报》上，还刊登着一则寻人启事：

首都妇女救国会、南京学术团体救国会联合会筹备处寻找华北来京学生代表启事：据北平来讯，华北学生反对辱国自治，推派代表进京请愿，敝会等极欲与代表诸君晤面，连日四处探访，迄无下落，特此登报访问。希来京代表或其他人士，见报即以地址见示，不胜感激企盼之至。

这个特殊的寻人启事是由曹孟君、邓季惺、谭惕吾送到《新民报》要求刊登的。“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学生纷纷来南京请愿。坊间盛传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反而暗中逮捕了一部分请愿学生。这个寻人启事就是暗示有学生失踪了。这些妇女活动家的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反映了她们爱护和支持学生的急迫心情。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了。国民党中宣部给予了《新民报》仅次于“封门”的严厉处罚——勒令停刊三天。陈铭德则被南京警察厅调查课传讯，拘留了半夜。调查课课长赵世瑞对陈铭德说：“《新民报》刊登这个启事，暗示学生群众，政府扣留了他们的代表，故意造谣，煽动学潮。你老婆邓季惺在妇女救国会，叫她当心点！”

12月26日、27日、28日，《新民报》停刊三天。

三天过后，复刊之时，《新民报》主笔罗承烈专门写了《三日杂感》的社论。社论说：“本报不与读者相见，忽忽三日，停刊原因，具见各报启事，当蒙共鉴。在此停刊期间，固知凡关心本报之人，无不悬念非常。本报除感激之外，内心之难过和痛苦情形，更较读者为尤甚！窃思本报自发刊以至今日，六易寒暑，始终一贯的在党政机关领导之下，以纯正民众之立场，发抒正义，爱护国家民族，艰苦备尝，未渝此志。际兹困难严重，举国惶急之时，本报同人激于爱国热忱，自惭无状，至有停刊之事，深觉愧对读者。今后惟当益加奋勉，兢业从

事，在一切方法上，力求妥慎，仍本初衷，次期无负社会人士与党政机关之厚望，此则本报同人理当为国人告者也。”社论写得沉痛悲恸。貌似自责，其实是对时局的深深忧虑。

当年重庆《新民报》总编辑陈理源先生回忆，1941年12月11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发给他一则“孔夫人爱犬飞渝”的新闻。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遭日军铁蹄践踏，居留香港的许多著名文化工作者因缺乏交通工具而不能尽快撤离，而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却从香港飞到了重庆！这条新闻理所当然地被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了。浦熙修并不气馁，思索片刻，她就把这条消息像夹三明治一样混在一堆花絮里：一、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展望》座谈会；二、日来停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往迎，三次失望；三、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条，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四、社会局昨日午后召集市商会各业商人开会，商讨平抑物价对策，市长亲自出席指示；五、昨香港电讯仍旧可通，上海电讯已断。

在这一堆看上去五光十色的花絮中，编辑做了这样一个标题：

伫候天外飞机来
喝牛奶的洋狗
又增多七八头

良苦用心，何其难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这样容易地蒙混过关，幸运见报。1943年3月2日晚上，浦熙修发给编辑部一组稿件。其中有两消息是她写的。一条是女公务员因为生活困难，要求增发平价米，推选代表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请愿。孔祥熙说：“国难期间，应该刻苦自励，不可要求过奢。”当即予以拒绝。另一条是“孔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报道说，婚礼将由蒋夫人主持。先前运往美国的六箱嫁衣，因飞机失事，嫁妆污有水渍，已全部报废，现正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数十人日夜赶工重制，做好后再运美国等。

这两条消息送往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检查之后，“女公务员请愿”一稿被盖上“免登”的印戳，而“孔大小姐赴美结婚”一稿被盖上“删登”的印戳。很显然，关于嫁妆的内容都是在删除的范围之内。

当时的《新民报》总编辑陈理源拿到审查后的报纸大样后，十分气愤。新闻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个不许登，那个要删改，读者还有什么可看的？多年来集聚的怒火在陈理源心中瞬间爆发，这个热血青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理睬审查结果，全文照登，“一个字不动。坐牢打板子让他去！”

报纸甫出，舆论大哗。读者拍手叫好，同行钦佩仰慕，而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却暴跳如雷。它岂能容忍对权力的蔑视，非要将《新民报》封门不可。“惹祸”的两个当事人却不认账。浦熙修说：“这个稿子由我负责，不能怪理源。如果我不写，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没有带政治性，如果是事实，那就不可说得那么吓人，封门啰什么的。”陈理源接过话来说：“哪里怪你吆，当编辑就是要把关。这件事情当然是我负责。……请总经理去对孔副院长说，几百个人与此事无关，错是我一个人的错。但稿子写的是事实，如果新闻纸没有新闻自由，我也没有办法。我保证绝对不跑，我等着。”

这些拍胸脯的豪言壮语是救不了《新民报》的。陈铭德四处磕头，八方作揖，人前说软话，人后暗垂泪，终于在刊登了几次澄清启事和道歉声明、又当面挨了孔祥熙的一顿恶狠狠的抢白后，才勉强过关。

在国共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的1944年5月中旬，《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陕南、晋西访问，一路曲折于6月3日到达延安，7月25日返回重庆。赵超构经过几天的梳理和写作，7月30日起，《延安一月》同时在《新民报》重庆、成都两版刊出。《延安一月》报道了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多方面的真实情况，还介绍了从国统区到延安的众多著名文化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成就，为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延安解放区打开了一扇窗子。开始，报纸只是每天登载几百字的《延安一月》，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多用些版面每天多登一点。报社只好满足读者的要求，压缩其他内容，每天刊登两千字的《延安一月》，在10月18日登完全文。11月，《新民报》出版了《延安一月》单行本，很快便销售一空。只好连续重印了三版，才满足了读者需要。毛泽东后来也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毛泽东记住了《延安一月》，也就记住了赵超构。自此，最高领袖与新闻记者之间，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与交往。

1945年8月底，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曾邀请赵超构、张恨水到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谈话，毛泽东说赵超构“是个自由主义者”。赵超构没有听出毛的隐舍批评的话外之音，还以为是对自己的最好褒奖，很是自喜了一阵子。

十二年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赵超构又见面了。毛泽东说：“你们的报纸，别具一格，我喜欢看。”赵超构在《新民报》内倡导新闻改革，提出“短些，再短些；广些，再广些；软些，再软些”三句口号。毛泽东首肯了前两句，对后一句表示要考虑一下。他说：“软些，再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反右狂飙中，毛泽东力保赵超构过关，没有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实，凭赵超构在鸣放当中的言论，戴上十顶右派帽子也不为多。6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赵超构，谈到了杂文写作之事。毛泽东笑道：“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临别时，毛泽东叮嘱赵超构：“听说你在上海平日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不反对，但是总不能整日泡在茶馆里吧，希望你有空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8年1月6日夜，身在西湖刘庄的毛泽东忽发雅兴，派他的专机去上海接来了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三人。他们与毛泽东各握一杯香茗，做竟夜之谈，话题涉及生物学、遗传学、逻辑学、哲学、文学、新闻学等。毛泽东又一次告诫赵超构要“走出书斋到工农群众当中去，看看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看你可以回自己家乡去走走，一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对比出新旧两个社会的变化。”

最高领袖对利用报纸，做好宣传，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满怀一腔热忱，念之系之的。赵超构只有遵命。当年5、6月间，他回到家乡温州参观考察了两个月，在《新民晚报》上刊出了连载十三天的《吾自故乡来》长篇通讯，讲述家乡解放前后的翻天巨变。据说，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首肯。

“文革”结束，狂潮退去。许多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赵超构又恢复了泡茶馆的老习惯。他在这个他熟悉的环境中，听街谈巷议，析百姓牢骚，用“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和评论，让《新民晚报》与上海市民的生活贴得更近了一些。这些豆腐干大小的“街谈巷议”，比起空话连篇、言不由衷的长篇连载通讯，更令人感觉亲切。

1947年5月20日，国民参政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京、沪、苏、杭四市学

生几万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蒋介石出动了全南京的警察、宪兵、青年军和马队围堵学生。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进至国府路（今南京长江路）、中山北路一带时，即用水龙、皮鞭打伤学生百余人，逮捕二十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这一天，《新民报》南京社记者金光群、邵琼、唐志镛、赵莱辛等人都在现场采访，亲眼目睹警察宪兵特务将学生打得血肉横飞的惨状。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生病在家，也被叫到报社，一同安排报道。

经过血腥的一天，记者、编辑的情绪都很激动。记者们有的奋笔疾书，有的边写边抹眼泪。陈铭德在编辑部内来回踱步，心情十分沉重。学生示威游行遭到镇压已是铁定的事实。记者邵琼从现场回到报社，一边哭泣一边诉说，她亲眼看见一个特务拧住一个女学生的头发，另一个特务挥起皮鞭猛抽，当场血沫迸溅！其他记者的叙述也证明是军警有预谋的镇压。然而，陈铭德已经接到了来自官方的报道口径：军警和学生互殴。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也来过报社，当面告诫他，此事干系重大，不可造次，应当以当局的报道口径为准。

这就是陈铭德人生的艰难之处。别人是可以对事实直抒胸臆地做出判断的，而他，总是要在事实与谎言之间做出抉择。这也是一个与旧中国报人终生相随的尴尬。生活因了这样层出不穷的考验而变得酷烈了。陈铭德凝重地听着记者们的叙述，看着他们义愤地写稿，想说什么，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临去之前，他对总编辑曹仲英讲了一句：“今天的报道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要当心啊……”

曹仲英自然会意。这一晚，《新民报》编辑部里两派意见泾渭分明。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态度相当激进，而曹仲英则字斟句酌，把可能让当局抓到辫子的地方统统删去。大部分编辑与总编辑一起，就有关稿件逐字逐句地推敲，一改再改，仔细到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直到5月21日黎明，才弄齐稿子拼成大样。有关“五·二〇”事件的报道、言论和图片，占了一个整版又半个版。

同一个夜晚，就在《新民报》同人殚思竭虑，做着既要据实报道，又要防患于未然的努力的时候，南京《大刚报》编辑部却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此时的《大刚报》已被国民党控制，陈立夫亲自跑到《大刚报》编辑部督阵，说是只能写学生暴乱，学生打警察。采访记者不干，僵持到夜里一点多，《大刚报》的头头们才松了口，说“可以写互殴”。采访记者仍不干，说：“我看到的是警察打学生。”最后，双方无法妥协，决定不用“本报讯”，只用中央社的稿子。

《新民报》关于“五·二〇”事件的报道，鼓励了学生的士气，仅中央大学的学生就买去三千份报纸，作为扩大宣传和向全国介绍之用。但首都卫戍司令部却说《新民报》报道失实，天天派士兵和特务到报社纠缠，以致影响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这些抗命不从，据实报道，旁敲侧击，影射政治的新闻报道和副刊文章，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新民报》的各地各版上，其中吴祖光主编的上海版副刊《夜光杯》刊发的《冥国国歌》一稿，聂绀弩主编的重庆版日刊《呼吸》专栏上刊登的杂文《无题》，都让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吃尽了苦头。好在邓季惺不像陈铭德那样怯懦，气头上，她也会说几句火上浇油的话，什么新闻自由啊，法制社会啊，一副居高临下、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这份家业与她无关似的。这就叫性格使然，别人是奈何不得的。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新民报》的光辉斗争历史，实在是因为争取“新闻自由”是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永恒的、无法回避的严肃话题；实在是因为为了争取这办报、办刊、办广播的最基本的自由，我国新闻界的志士仁人付出了太多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当然，这些“斗争故事”比起抗战胜利前后邓季惺的传奇经历，少了更多的悬念和惊奇。

抗战八年，《新民报》回到故乡四川，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很快便建立了重庆、成都两家报社，各出日、晚两刊。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人心不定、百废待举之时，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只身出川，先飞南京接收《新民报》旧产，10月份，便复刊了南京《新民报》日刊，很快，晚刊也创刊面世。随后，她马不停蹄奔上海，以一千四百两黄金买下了瑞金大楼作为报社社址，上海社的筹建有条不紊。最后，她冒着严寒赴北平，每天奔走于大街小巷，选社址，订设备，物色住房，延揽人才，短短二十几天，竟然都被她搞定了。看看邓季惺出川不足一年的成就吧：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创刊，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创刊。重庆、成都、南京的《新民报》均为日、晚两刊。至此，《新民报》五社八版的格局正式形成，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那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喜悦的时代。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使四万万中国人民有拨开浓雾见青天般的欣喜和轻松。此时的邓季惺，同样被乐观的情绪左右着，她没有认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她以为采取民主和法制的手段，中国就会走上宪政之路。她积极竞选立法委员，希图在立

法院里实现她的民主理想。《新民报》的五社八版，也真的以为“新闻自由”的春天来到了，甩开膀子，全力采访，报道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的消息和通讯，撰写了许多春秋手法、意直笔曲的社论和评论，直戳国民党的痛处……事到如今，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了。

1948年6月30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

为了替蒋介石的决定鸣锣开道，《中央日报》自7月1日起，连续发表社论，给《新民报》罗织罪名，呐喊制裁。

“官邸决定”迅速在南京传开了。陈铭德夫妇自知凶多吉少，在劫难逃。陈铭德对地方新闻版编辑蒋文杰说：“我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你蒋文杰，一个是宣谛之。我有两间房子，让你们来开店，一个开面馆，一个开饭馆。结果呢？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从不出恶声的陈铭德，在南京《新民报》行将被停刊之际，也禁不住对导致这一灾难的两个中心人物恶语相向了。

蒋介石判决《新民报》永久停刊的手令，7月8日下午终于发出了。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报社接到了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的宣传指示——国民党中宣部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要对各报负责人发布指示，内容说：“某匪报之被查处，不应以同业立场采取支持态度，并应揭发此匪报真相。”陈铭德一接到这张指示，立即明白《新民报》的最后时刻到了。他连忙托请胡子昂找张群打探消息，希望能够从中斡旋。张群知道这判决来自蒋介石后，只得无奈地对胡子昂说：“已经决定了，算了，何必找麻烦。”晚上9点多钟，由首都警察局会同南京社会局人员，将这份标以“内政部（三十七）安肆一〇二五六号代电”的公文，正式送到了陈铭德、邓季惺家中。陈铭德出门接收，来人却十分顶真地说：邓季惺是南京《新民报》的直接负责人，这个命令一定要她亲自签收。邓季惺放下半碗饭，出来接过公文，只见上面写着：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及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

他们问来人，这个命令什么时候执行？答曰：“立即执行。明天早上就不得再行出版。”他们打发走了来人之后，马上赶回中山东路报社，约集全社人员开会，告诉大家，命令终于下来了。

正在写稿的记者放下了笔，编辑放下了手中的版样，排字工人放下了正在拣排的铅字，几个女记者和女职员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更多的人则是怀着一腔悲愤，含着热泪沉默着——报社周围此时已经布满了特务，高声怒骂是不可能的了。

后来，得知自己上了国民党抓捕进步人士的黑名单，邓季惺、陈铭德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2月逃亡香港。

后来，全国解放后陈铭德夫妇回到了祖国大陆。

后来，各地的《新民报》陆续公私合营，南京的《新民报》始终没有复刊，上海的《新民报》于1952年更名《新民晚报》继续出版。陈铭德夫妇加入全国政协，闲赋北京。

不平则鸣，久压必爆。大鸣大放之际，陈铭德、邓季惺敞开心扉，就办报纸和搞新闻，提出了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也许是这许多年来，他们作为局外人，看了许多，听了许多，思考了许多，所谓“旁观者清”者也。

陈铭德说：“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群众所需要所喜爱的，就应当予以满足。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正和厨师做菜一样，如果单纯讲营养价值，而不顾色、香、味，那是不能令食家满意的。”

他甚至大谈起旧时报纸的优点：“旧中国的报纸多数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也有一些进步的，或是比较进步的报纸，它们都是一些民间报纸，它们对民主革命，有过多少贡献也不去谈它。只谈谈它们在编辑、采访、经营管理方面，似乎也还有可以取法之处，似乎不能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研究它们的经验与优点，加以承认，予以发扬。最好的报纸要和读者打成一片，替读者说出要说的话，不单是板着脸孔训读者。这样，读者也爱护报纸，把报纸看作知心朋友……现在全国有几百家党报，但是非党的报纸仅有光明、大公、文汇、新闻、新民五家，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报纸作为

百花齐放的园地和百家争鸣的讲坛来说，多一片园地就能开出更多的花朵，多一个讲坛就能多明辨一些是非。”陈铭德在举出了许多人的实际遭遇之后，强调了尊重老报人的问题。他说“人力大可发掘，应加以利用”。

邓季惺心直口快，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鸣放中她主张多办同人报纸，应该把同人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她对党报和非党报的待遇不同很有意见。她说，有人说党报是亲儿子，非党报是义子，不但记者采访时受到不同的待遇，就是纸张的分配也有区别……机器也是这样，党报有高速轮转机，非党报一直用着旧机器。

邓季惺的牢骚是多方面的。她说：“我来北京九年了，我由《新民报》调《北京日报》当顾问，实际上好久没有事情可做；连报纸发行多少也不让知道，后来还是从黑板报上知道的。以后调到民政局任副局长，对局内好多事情也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会议不让参加……我提出意见，党员局长也不听。久而久之，有些话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说的不算，党员局长说的才算，我要再说不是自讨没趣吗……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当过太太、小姐，这几年在新社会里我反而好像成了个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了。”

邓季惺不忘她的法律专业，不忘她一直都在追求的法制化国家。她说：“我认为应该把党的方针政策，缜密地规定到法律、法令和一切规章制度中去，然后由党来监督执行。这样，执行中也可以减少偏差。但是，现在还没有树立起法治精神，而是‘人治’。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采用‘心口相传，面授机宜’的办法。”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的党大还是法大？党和国家的关系，党和法律的关系，早在1957年，邓季惺用几句话就讲明白了。

鸣放过后，在劫难逃。陈铭德、邓季惺双双被打成右派。声音一致了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陈铭德、邓季惺这样的历史老人发出的铮铮逆耳之言了。没有了明眼人的建议和指点，我们在寻找和探索正确路径的过程中，绕行了数不清的冤枉路。

1979年，陈、邓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1982年，“文革”期间停刊十六年的《新民晚报》复刊，陈铭德、邓季惺做为《新民晚报》创始人前往祝贺。然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办报的话语权了。

邓季惺被打成右派之后，被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全国政协小餐厅的顾问。对于这个明显带有惩罚性、侮辱性的“闲差”，邓季惺却当了真，恪尽职守，甘之若饴。这个勤勉的女人，发挥四川人节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竟在小餐厅里做起了四川泡菜，引得众人趋之若鹜，据说连江青都慕名前来品尝。邓季惺的节俭，或者说是吝啬，也是出了名的。她的孙女回忆说，她几乎就从来没有见过奶奶用过一张新纸写字。只要邓季惺看到的旧信封、旧文件的背面、商品包装纸，甚至是纸盒子的背面，只要还是能写上字的，她都把它们展平、叠好，用曲别针一摞一摞地别好，仔细收起来，以备再用。陈铭德去世，邓季惺写信告知远在美国的孙女，竟也是一张用过的旧信封的背面。1993年，借孙女从美国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家里人为她祝贺八十六岁寿诞。那一天可真是热闹，全家十几口人，忙进忙出地做菜、端菜、拉桌、摆椅，就在大家围桌就席、举杯庆贺的时候，孙女看到邓季惺面带几分落寞，在热闹中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小声说了一句：“做这么多的菜做啥子嘛，哪里吃得了？”邓季惺不止一次地表白过，“我这个人一辈子有钱，一辈子不乱花钱。”

1989年2月11日，陈铭德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二岁。新华社破格发出了评价陈铭德的电讯稿：

出生于四川省长寿县的陈铭德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便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29年他发起创办的《新民报》以版面新颖、文章富有特色和鲜明的对日抗战的态度，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此期间，陈先生不断追求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周恩来同志为《新民报》亲笔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陈铭德先生和夫人邓季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艰苦创业。一批优秀的人才，一批著名的进步作家，成了《新民报》的长期撰稿人和版面主编。在他的主持下，《新民报》以反映民间疾苦，争取民主为己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用很多篇幅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使《新民报》成为大后方有较大影响的报纸。

评价如此之高。这应该是中共方面对于长期以来对陈铭德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

知夫有妻。在为陈铭德举行的追思会上，邓季惺说出了压抑了多年的心里话，对与自己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老伴，谈出了自己最真切感受：

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到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坚持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是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铭德为了《新民报》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有些人便误以为看不出铭德这个人内心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报纸去做敲门砖，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在经济上，他没有借办报敛财，蓄积私产，两袖清风……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直到现在其残余影响还未清除的社会里，办什么民间报，就必然是坎坷一生。在国民党时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半夜三更还经常来电话训斥责问，直到最后并未瓦全，南京《新民报》还是被封了门，还要逮捕我们送“特刑庭”。解放后这四十年环境比国民党时期好多了，但加给我们俩的两顶帽子也是够人受的，第一顶叫“报业资本家”……在那时“左”的思想的指导下，这顶帽子是不好受的。第二顶帽子，就是57年了，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也是不好受的。所以这四十年处境也是坎坷的。铭德选择了办民间报这个职业，注定了在坎坷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这些话，听起来真有些悲凉。

1995年8月29日，邓季惺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

邓季惺的一生，做了两件别人无法企及的伟大事业：一是参与创办、经营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新民报》；二是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吴敬琏培养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年，邓季惺就是抱着刚满周岁的吴敬琏赴北平陪丈夫治病的。吴竹似病逝后，有人要小小的吴敬琏跪榻柩、穿孝服、捧瓦盆，邓季惺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让体弱多病的幼小儿子遭此折磨。晚年的邓季惺严

重重听，可又十分关心时事政治，看新闻联播时，电视开到山响，吵得家里人恨不能耳朵里塞棉花。宝贝儿子吴敬琏回家在餐桌上谈论国家大事之时，是邓季惺最幸福的时刻，她将助听器开到最大，有时还是听不清儿子的高谈阔论，她向孙女抱怨，你爸是故意说得又快又轻，成心让我听不明白。邓季惺最得意的是，她让经济学家的儿子最终弄明白了什么是股份制企业。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吴敬琏还在进行有关股份制的案头研究的时候，五十多年前，邓季惺已经在《新民报》里付诸实施了。

陈铭德、邓季惺逝世后，他们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在他们的墓碑上，亲朋好友们刻下了这样一段话：陈邓两人毕生追求新闻自由、民主法治和民族富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保持坚定执著的信念，相濡以沫，共度艰难岁月……

主要参考文献

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4年8月第一版。

吴晓莲：《我和爸爸吴敬琏》，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一版。

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年11月第一版。

杨雪梅：《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范长江

“范长江同志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这是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对范长江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长江在新中国新闻界的地位日臻隆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长江新闻奖”是对中国记者的最高奖赏。以另一位历史名人命名的“韬奋新闻奖”，是所有编辑向往的最高层次的奖励。

范长江出生于1909年，逝世于1970年。他死得很惨。“文革”期间，他在中国科协设在河南确山的“五七”干校中遭受残酷迫害，终于耐受不住身心俱裂的罕见折磨，自杀身亡。

在范长江六十一年不算长久的生命历程中，可以分为明显的前后两个生命时段。

前一阶段自出生、求学、奋斗，满腔热忱、义无反顾地投身新闻事业，直到离开《大公报》，于1939年组建“国际新闻社”，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这是范长江个性充分张扬，才能尽情显现的辉煌时期。刚刚三十周岁，他就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诸多壮举，深入西南、西北不毛之地艰苦采访，追随抗战将士直达前沿阵地距日军仅咫尺之遥，帐篷内、战壕中，亲见国军抗战勇士们浴血沙场、视死如归、淡定从容、家国至上的英雄气概。《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作品集堪称佳作，风靡全国。《中国的西北角》出版三年，加印八版，一时呈洛阳纸贵之势。这是范长江个性充分展示的辉煌时期。

以1939年底范长江入党为标志，范长江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1941年初，他奉命赴香港创办的《华商报》，作为中共在香港的一个言论阵地，

范长江在此力挺中共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范长江乔装改扮，逃出香港，赴桂林，经武汉、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范长江入了党，做了官，鲜明的个性淹没在了党的事业的共性之中，他的脚无法远足，他的笔不再犀利，几乎再没有好的作品问世。

1949年翻天覆地之后，范长江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长。

《人民日报》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新闻机构，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政治机关。范长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短短的两年半，就因为他个人性格方面的缺陷黯然离职了。他对新闻真实性和时效性一往情深的眷顾，他独行侠般的记者作风，是无法适应高度机关化、高度政治化的最高机关报的环境和氛围的。

1952年之后，范长江竟完全脱离了新闻工作。他敏感的新闻嗅觉、深厚的新闻素养、倚马可待的“快枪”之笔，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他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科协几个无足轻重的部门间转来转去。最终在“文革”风暴中枝萎叶枯。

对范长江生命历程的这样分段，完全不符合主流舆论，也不符合当下的政治评判标准。笔者无意纠缠在高深莫测的阶级纷争当中。就新闻记者这一特殊职业而言，什么时候他采访的天地无限广大，采访的自由充分保障，个性尽情张扬，那就是他的作品高质量、大丰收，一稿扬名、一炮走红的黄金时期。反之，以党性要求，以共性束之，无论多么优秀的记者的个人才华，都湮没在了宏大的革命事业的集体之中了。

结论是简单而明确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记者工作是一种精神的个体劳动。其中的两个要素是万万抹煞不得的：精神的，个体的。

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一个叫赵家坝的村中。

赵家坝山清水秀，物产丰饶，沱江傍村而去，滋养着这方富裕的土地。

范长江出生时，他家已是没落地主，风光不再，与这宁静、祥和的村庄已不协调，这对范长江性格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范长江的爷爷是清末秀才，粗知经史，一生没有功名，在乡间以教书为生。范长江的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无甚专长，年轻时在四川军阀熊克武部队里当兵，也就混到个下级军官。

风光不再的大户人家，没落之后渴望“翻身”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范长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祖父两辈便将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了范长江身上。这就塑造了范长江最初的追求谋事创业、扬名立万、出人头地、名彰天下的独特个性。

范长江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亢奋激烈理想的驱策下度过的。

1923年秋天，范长江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内江中学。从偏远的乡村一步迈进县城，范长江一时还无法适应。内江盛产甘蔗，是四川的糖城，经济格外发达，县城里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在范长江眼中都是新奇无比。范长江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内江中学又是新式学堂，对于在乡村小学里从未接触过的数理化和英语，范长江如听天书。第一学期下来，成绩不但不优异，而只是能刚刚跟上趟罢了。这让范长江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第二学期开始，他发愤苦读，甚至冒着被学监处罚的风险，用自制的小油灯开夜车苦熬。第二学年结束，他考了个全班第三名。

范长江极其张扬的个性、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使他渐渐不容于内江中学的同学们了。范长江也觉得内江的天地小了，信息不够流畅，观念过于保守，他感到了苦闷和压抑。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转到了邻县——资中省立第六中学读书去了。这给范长江那颗骄傲的心些许安慰：他入了省立中学，又比内江中学的同学高了一个头皮。

1925年秋天，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北伐军一路挺进，打到了武汉，遂决定将革命政府迁至武汉。广州的黄埔军校也一同移驻武汉，仍以“黄埔军校”的名义继续招生、办学，培训革命骨干。

黄埔军校在重庆设点招生。各县革命青年学生纷纷报名，招生工作进展顺利。内江中学的部分学生报名应试，不少人被录取。范长江的好同学写信告诉了在资中省立第六中学的范长江。范长江岂能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他立即登船，顺沱江而下，赶赴重庆投考黄埔军校。

命运捉弄人。范长江赶到重庆的时候，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录取的同学已经集结去武汉了。这让范长江焦急万分。他已然决定从军报国，辞别了父老，退学而去，他还怎么回内江、回资中啊！

他在招生处软缠硬磨，打动了他们。他们告诉范长江，黄埔军校去不了，可在重庆就地革命。重庆郊外有一所中法大学分校，校长是吴玉章，也是以宣传

革命理论、培养革命干部为办学宗旨的。

也只好如此了。范长江背着行李，翻山越岭，来到重庆通远门外的大溪沟，在中法大学分校注册入学了。

大溪沟远离尘嚣，环境幽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虽然草创期间，教室、宿舍条件简陋，但学校上下洋溢着开创新事业的革新精神，令人振奋和激动。

1927年春天，因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鼓动起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社会各界打倒列强、扫除军阀、平均地权、民主改革的主张不一而足。这让蒋介石很不舒服。他北伐的目的，的确是要铲除军阀，消灭割据，但要建立的是他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其他什么各种名目的革命政府。而各地的军阀，也仍在拥兵割据，依险扼守，不愿易帜更张、归顺革命。

3月24日，北伐军打到了南京。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炮舰，居然炮轰南京城，制造了死伤千余人的流血事件。

四川的革命力量被激怒了。他们决定3月31日中午召开工农商学各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行径，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四川军阀刘湘秘密下令，镇压这次群众集会。

3月31日上午，范长江同中法大学分校的四百多名同学一起，群情激昂地向会场进发。

上午11时，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四川省委的负责人与各界代表即将登台之际，突然枪声大作，刘湘的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了。会场内外一片混乱，人们东奔西突，相互踩踏，哭喊声响成一片，标语旗帜四处散落。

范长江在奔逃中头部被撞击，昏倒在地，随后中枪死亡的尸体，层层压在了他的身上。

范长江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四周是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之声，那是家长们在现场辨尸认子。不满十八岁的学生娃，哪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范长江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他偷偷四瞄，看到刘湘的部队仍守在会场周围，枪杀、抓捕那些未死的集会人员。范长江咬牙爬出死人堆，佯装收尸人员，急匆匆混出了会场。这一天，刘湘手下共杀死四百多人，打伤一千多人。

返校途中，范长江路遇生还的同学。他们告诉他，学校已被刘湘查封，正张网以待抓捕进步学生，万万回去不得。无奈之下，范长江躲进了重庆一亲戚家暂避一时。

范长江乡下善良、怕事的父亲被重庆“三·三一”事件吓坏了，几次三番来信，劝他返回家乡，安定过活。范长江心高气盛，这种状态，这个样子，他怎能回家被乡人耻笑、丢人现眼。他决心到武汉去，感受大革命的滚滚热潮，去实现一个热血青年的奋斗理想。

重庆的亲戚帮他买了一张船票，范长江悄然离渝，顺江而下，向武汉进发。

盛夏时节，范长江到了武汉。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向中国共产党及其工人组织举起了屠刀。一贯高调革命的汪精卫，也开始转舵，酝酿着镇压各界群众的革命运动。求学已无可能，做工非己所愿。聚集在武汉的重庆中法大学分校的同学们，日渐心灰意冷，大多数人已收拾行李，返回了四川老家。范长江决不退缩，决不善罢甘休。万般无奈之下，7月10日，范长江报名参军。巧的是，他入的是贺龙二十军的学兵营。当天，他便随部队乘船东下，来到鄂城，随即又开拔到黄石，待命行动。这时，学兵营编进了教导团。

范长江入伍仅仅五天后，7月15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了。几天前，他还大喊大叫“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到右边去”。如今，汪精卫的战旗上写着“宁汉合作，反共灭共”。中共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在南昌打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当然，这一切作为普通一兵的范长江是不知道的，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刚刚入伍的学生兵。

7月23日，部队抵达九江。26日，范长江所在的教导团乘火车进驻南昌。一到南昌，部队立即进行紧张的军事操练。有经验的老兵私下嘀咕，一场残酷的战斗就在眼前。

7月31日，教导团又突然移驻到大校场营房。与营房一墙之隔的，就是国民革命军七十九团。当晚点名之时，教导团总队长训话：“部队刚换防移驻到这里，夜里不要大意，要警醒点！”

果然，凌晨1点，紧急集合号骤然响起。面对整齐列队的士兵，总队长庄严宣布：蒋介石叛变革命，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进行武装起义。愿意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离开部队。

已是箭在弦上，骑虎于背。战士们齐声高呼：“一道起义！”学兵们着急了：“我们还没有枪呢，怎么打仗？”总队长说，战斗打响后，你们先在旁边呐喊助威，敌人被歼之后，你们就进入敌人营房收缴武器。

范长江就这样裹进了南昌起义的部队。

战斗打响后，国民革命军不堪一击，七十九团丢盔卸甲，狼狈而逃。范长江这些学兵们，冲进七十九团营房内，将枪支弹药搬出来，堆放在操场上，小山似的。他们每个人，都挑选了一支自己满意的步枪。

南昌起义是突然袭击，是部队的哗变，象征意义大于军事意义，革命武装也没有能力占领整个南昌城。起义胜利不久，队伍便撤出南昌，一路南下，经抚州、广昌、瑞金、寻邬，向广东梅县进发。

至9月底，起义部队已辗转两月，战斗不断，战况惨烈，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队伍走到汕头时，已所剩无几，国民革命军围追堵截，将起义军层层包围了。指挥员让范长江他们这些学生兵上缴武器，就地遣散了他们。

急火攻心，范长江病倒了。他高烧不退，烧得迷迷糊糊。他不知道他是如何在那个溽暑难耐的潮汕地区万幸活下来的。

大病初愈，范长江心意彷徨：下一步往哪里去呢？家是不能回的，“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思忖，只有到大城市去闯荡才有出路。他明白，大城市能给他提供足够的舞台，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

范长江像一个流浪汉和乞丐一样，踽踽独行，一路北上。他两度在部队医院里做义务看护，只是为了解决一日三餐，夜有所宿而已。跌跌撞撞，范长江终于来到了南京。

身无分文，何以谋生？绝望中，范长江看到了中央党务学校第二期招生启事。在从广东北上的路上，范长江从一张破旧的报纸上看到过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招生的消息，知道这个学校食宿、服装、学杂费等均免，学历不限。走投无路的范长江容不得多想，立即前往报名，发榜时发现，他被录取了。

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党务工作人员的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第二期学生，大部分是各省流亡青年，良莠不齐，学识参差。学校规定，党务学校的学生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忠诚于组织和领袖。范长江也不例外，入学之后，他成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党员。

中央党务学校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历史、地理、数学、英语等，这很符合范长江的学习兴趣。1929年下半年，中央党务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由短训班改为了四年制的正规教育，由专门培养国民党党务干部的摇篮，转向了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除外交系外，行政、财经、乡村行政等系，以培养未来的县长、局长为主要目标。

雄心勃勃的范长江，列出了为使自己“思想系统化”而需要重点研究的七个问题：

- 一、国内农业现状之调查及其改造；
- 二、国内经济问题；
- 三、国际经济问题之现状及其研究；
- 四、西北问题；
- 五、东北问题；
- 六、西南问题；
- 七、民族革命运动。

范长江志向高远，学习刻苦。他给自己制定的生活准则是：“我们的态度，光明磊落；我们的心地，真诚坦率；为社会而生存，为社会而求学。”

他给自己提出了严格的交友标准。他交的朋友必须达到“人格——光明磊落，而有勇往迈进、不苟安的精神。体魄——强健好动，能持久作革命工作。能力——无一定的限度。对革命要能始终有相当之贡献。”

他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具体目标是：“助人——尽力为之；养成生活之社会性。诚恳——对人不分亲疏；养成生活之真实性。庄重——保持自己尊严；养成自尊。谦恭——虚己下人；养成无限发展性。”

海阔天空，前程无限。范长江踌躇满志，蓄势待发。

这一切，因“九一八”事变而彻底改变了。

范长江在行将毕业之际弃中央政治学校而去，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冒进躁动、朝秦暮楚、不安现状、百变身心的个性，的确是极其罕见的。

“九一八”之后，为图存救亡，范长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对同学们说，他要离校北上，去北大学哲学。

同学劝他：“马上就毕业了，快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弃之可惜啊。”

范长江答：“欲从政府系统中求出路，是一条绝路……”

有同学问：“你要找寻的是些什么呢？”

范长江答：“是学习。举凡哲学、逻辑、历史、地理、经济等都要学。”

同学说：“这不是泛而不精嘛！没有一个人能学众多学科而成为专门家的。”

范长江答：“我并不希望自己成为专门家，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行

动而学习。由于救亡图存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所以学习上不能不作多方面的准备。”

同学问：“为什么非要去北大呢？”

范长江答：“因为它是文化中心，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高涨。”他还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在北平得到薪津十多元一月的工作，就可以过活了，就可以向无限的知识的海洋去求索了。”

他写信托北平的朋友帮忙，能否找到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或大学文学院中工人的工作。

他写信向家中要钱，希望父母能为他筹措一笔北上的费用。

两个方面都让他失望了。北平的朋友没有回信。父母回信说，筹款困难，无钱汇寄。这也许是父母对范长江不安个性的另一种批评方式。

范长江去意已决。他变卖了书籍，偿还了在校时借同学的债务。他的出走决心感动了几个同窗好友。一个同学借给他五十元钱。一个同学送了他一袭棉袍、长衫。一个同学帮他搞到了一张去北平的免费火车票。

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学生是不能自由退学的，范长江只有秘密出走。一个星期天，在几个同学的掩护下，范长江走出了校门。他脱下校服，由同学带回学校。他换上棉袍，给教务长罗家伦写了一封信，声明退学，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去北平寻找新的前途。范长江只穿走了一双学校的橡胶鞋，到北平后，他折价将鞋钱寄回了学校。

1931年年末，动荡不已、四处漂泊的范长江，告别南京，挥手北上，向北平进发了。

只身闯荡北平的范长江，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除了自谋生路之外，他得不到任何资助。好在范长江颠沛流离了多年，适应环境和艰苦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租了一间小北屋住下，室内仅容一床一桌，没有台灯，没有火炉，只是租金便宜，每月只两元四角，而且距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都很近，这已经让范长江心满意足了。

范长江行李简单，卧具更是简陋，只有一床薄薄的毛毯。北平冬天的夜晚，朔风呼啸，天寒地冻。范长江睡不安神，夜半几次被冻醒。他就起身在室内蹦跳，跳暖了身子后上床再睡。

这一时期，范长江四处求职，大学图书馆、学校勤杂工，他都不计较，只要略有收入，解决温饱即可。可屡次投出的求职信，都如泥牛入海，毫无信息。

工作无着，收入无源，范长江给自己制定了严苛的生活开支计划：“早餐，免去。午餐，买十两饼（当时十六两为一斤），和开水吃。晚餐，买十两饼，加一碗豆腐脑。总计：每日一角三分钱。”

终于有一天，范长江在国语大辞典编纂处找到了一份剪贴辞条的临时工作。他的任务是将辞条分门别类剪贴到白纸上。每贴一千条，可得报酬一角。一天忙下来，可贴四千多条，得钱四角多。而且这活儿按件计酬，无须上班。范长江就半天干活，半天读书学习，在他的小屋里忙了二十天后，范长江贴了四万多份辞条。这天中午，他带着他的劳动成果，兴冲冲地去辞典编纂处交涉、领报酬。活儿都合格，人家留下了，可会计不在，不能结算，也拿不到钱。而此刻，范长江已是身无分文，连晚饭的钱也没有了。素不相识，又不好让编纂处的人暂支暂借，只好怏怏离去。他顶着大北风，步行到宣武门四川会馆，找到了一个同乡求助。同乡给他买了三个大馒头。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范长江狼吞虎咽地吃了两个馒头，留下一个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次日，他从辞典编纂处领到了四元报酬。交了半月房租，又到北平图书馆付一元钱办了图书借阅证，生活费也只剩一元多钱了。

剪贴辞条毕竟不是可以长久干下去的活计，范长江又琢磨着到他住处对面的小饭铺打工，做面包，熬豆浆，然后清晨走街串巷，为学生们送早点……

艰难困苦，范长江坦然面对。他心里是有一个更大的目标的，那就是努力去实现他个人奋斗的雄心壮志。北平仅仅是他的一个跳板，他看重的是北平的精英氛围和文化氛围。他极想在这里成就他的一番事业。

范长江究竟有什么理想，他想成就一番什么事业呢？

应该说，他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行侠天地间、仗笔走天下的新闻记者。

还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时候，范长江就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他喜欢这份报纸的公正、及时，喜欢它的辽阔的视野和独到、深刻的分析及评论。一天，范长江从《大公报》上读到了有关苏联的报道，心情激动，感慨良多。他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读报心得：“读完苏俄视察记，解释了我许多重要的问题。苏俄的消费分配，是按工作能力的大小，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苏俄的党员和官员无特殊的权利，而有特殊的义务。它的经济制度，在现在是

生产方面以公有公营为原则，而消费上则任个人自由。这是很合理的制度。”

范长江在思考和寻找他个人的出路和前途。他知道，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也就是做一个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宣传的是组织的理论和政策，毫无个体和个性可言，而这正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束缚。“我不能不把握着时代的重心，在心灵中预测它的方向，而定个人努力之步骤与处置之方向。”

范长江认为，北平一定会让他实现新闻的梦想。

1932年9月，新学年开始之际，范长江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从一年级的课程开始学起。而几乎与此同时，范长江便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

绥远国军将士在大漠荒原中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深深地感动着范长江。他等不及学校正筹备组织的慰问团，跟着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募集的物资，独自出发劳军去了。这是一次艰难而危险的旅程，途中遇日机轰炸、装甲车扫射、土匪抢劫、以日军奸细之罪被军队扣押等险情，待范长江一个月后返回学校时，清瘦黝黑，同学们几乎认不出他了。

4月，北京大学慰问团出发，范长江又义无反顾地随队出征了。他们赴古北口，登喜峰口，从山海关下又一路西进抵张家口，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着这些年轻的学子。慰问团一路发回了不少报道，刊登在《北平晨报》上。4月7日的报道说：“北京大学学生前线视察慰劳团于5日上午10时，全体出发张垣各主要市街，冒雨作宣传工作，民众抗日情绪表现甚为热烈。当本团在路边街口讲演时，一般民众均面现愤激之色，随本团高呼口号。将到大境门时，遇大批由多伦逃来之难民，约五六千人，鱼贯而行，秩序井然。对于本团之传单，均争先索阅。红十字会领队人员，对于本团宣传车经过时，亦摇旗欢呼。”

4月11日，《北平晨报》刊登的慰问团新闻报道中写道：“据红十字会医士谈，许多伤兵，均因营养不足，不能施行手术。不过沿途民众，对于伤兵甚为同情。即在康庄，民众亦多自愿为伤兵煮粥。一般伤兵表示，为国拼命，乃军人应有之责任，死亦无恨。惟在前方冻死饿死，实令人寒心。”

这类见闻式报道，慰问团走一路写一路，影响颇大。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报道是出自范长江之手，但他参与或是推进了这些报道的产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范长江是从中央政治学校出走入北京大学旁听的，加上他个性鲜明，处

事激昂，许多同学便以为他是信仰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分子，一些左翼学生更误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成员。北师大学生、共产党员涂茅若被宪兵三团抓去，受尽折磨，在狱中不幸染上肺病。涂的堂弟想尽办法将涂茅若保外就医，营救出狱，可财力已尽，无钱诊病。范长江与涂的堂弟是好朋友，便四处借款，并一同将涂茅若送往协和医院入院治疗。在医院门口，涂茅若惊恐不已，他以恐惧与乞求的声音问范长江：“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以为范长江的法西斯信仰，又要把他送到宪兵队刑讯折磨他了。被同学误解到这个程度，让范长江好长时间怅然不已。

这两次东北、西北慰问劳军，让范长江坚定了两个信念：一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新闻事业；二是创造条件去西北考察采访。在北大读书期间，范长江不放弃任何机会，给报纸写新闻稿。他将学生们的动向、活动，学校的新鲜事，写成稿件，寄给报社。他甚至写过北京大学图书馆见闻的连续报道。那段时间，北平的《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国闻周报》都发过范长江的稿件，名字前边署的是本报通讯员。通讯员不是报纸的正式记者，没有薪水，发一篇稿子领一份稿酬。因而，范长江便可以成为多家报纸的“通讯员”。

1934年12月，范长江在《北平晨报》上刊发了一篇通讯，第一次使用了“长江”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叫范希天的。为何取名“长江”，后人众说不一。希望文章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奔流不息，这个含意肯定是有的。这是范长江个性的鲜明展现。

《大公报》慧眼识珠，立即发现了范长江的新闻潜质，指派驻北平办事处的洪大中前去联系范长江，条件只有一个，《大公报》独家聘范长江为通讯员，每月固定津贴十五元，不再按稿计酬，但范长江必须放弃为其他报纸提供稿件。也就是说，条件是排他的。范长江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十五元钱，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安稳而奢侈的收入了。

范长江西部考察的热情之火一刻也没有降温。他认为，未来战争中，西部幅员辽阔，是可以仰仗的大后方。他十分赞同一些专家的观点：“西北高原襟山带河，自古以来是战守自如之地”，当然，亲身体验也使范长江清醒地知道，西部地区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应当促其发展，倘有人去实地考察，发表文章，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范长江就愿意去当这个“探险”之人。

利用暑假，他跑去南方，与几个好朋友谋划，呼吁发起组建西部考察团，

并将计划书发在了《新民报》《新京日报》上，谋求经济资助，结果，毫无声息。范长江只好作罢。

1935年年初，范长江将自己西部考察的想法告诉了《世界日报》采访主任贺逸文。贺逸文听后十分赞赏，立即把范长江的计划书交给了《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没想到成舍我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他认为此行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世界日报》不想刊发此类稿件。

《世界日报》的拒绝，让范长江沮丧不已。但他并不甘心，仍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他的西部之行。不久，他又把计划书交给了《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杨士焯、洪大中两位资深记者。他们也是立马转给了天津的报社总部。

喜讯传来了。《大公报》批准了他的考察计划，决定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并同意范长江自己提出的条件：文责自负，按稿计酬，旅费自筹。闻听此讯，范长江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他在个人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出发前，范长江专程去天津，拜访他景仰的《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胡政之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从事新闻记者几十年，不仅见证了国内无数重大新闻事件，还远赴巴黎采访了举世关注的巴黎和会。胡政之持正公允，论事深刻，不仅是记者中的翘楚，更是难得的报纸经营的行家里手。他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后，一个抓经营，一个主笔政，短短几年，便将《大公报》带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国内新闻界独树一帜。

胡政之对范长江欣赏有加，更对于他敢于孤身一人，深入不毛，考察民情，调研写稿的壮举倍加勉力。胡政之对范长江说：“我认为新闻事业是国家的公器。新闻记者应当为社会服务。”“从前的报纸，往往带政治上的党派色彩，近来的报纸，又太过于商业化，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希望，一方面要发挥精神的权威，一方面要扶植物质的进步。这事言之容易，做起来却真困难。因为新闻是社会的缩影，虽说新闻事业应当诱导社会进步，然而社会是一个整体，别的方面不进步，单责成新闻界进步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人，需要忍耐地、勇敢地站在社会的前面，开动纸笔合作的铁甲车，为公众开道。其间当然会有危险，有困难，招误会，犯口舌。只要我们不求利，不贪名，诚实做社会的无名公仆，迟早是有成效的。我们以为新闻记者的责任重大，所以有志服务报界的人，应当自重自爱，自省自励。做记者须有才、学、识三长，而品格之修养，意志的锻炼，尤为重要。新闻记者如果不讲人格，不对职业尽忠

实的义务，拿着一支笔，滥用权威，不但危害于一般社会，大之可以挑动国际战争，破坏世界和平。如此作报，于国家民族何益？我们以为新闻记者最需要有责任心，不但发表意见，言必由衷，便是报告新闻，也须有真知灼见。否则对职务为不忠，对社会为不信，对报馆为不义。如果不甘为不忠、不信、不义的新闻记者，便须努力于才能学识的修养。有了这种记者，然后理想的新闻事业始可成功。”

这几段经典论述，对于范长江无异于醍醐灌顶。这也是前辈对后生的殷殷之望。

胡政之还为范长江写了不少介绍信，让他熟悉的朋友关照范长江的采访，他还为范长江预支了一笔稿费，让他不至于囊中过于羞涩。北平的新闻界同行也对范长江的壮举心怀感佩。《世界日报》的张万里、贺逸文，《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杨士焯、洪大中等，每人资助他一元大洋，合计七八元钱。钱虽不多，但对一向一贫如洗的范长江来说，也是不无小补。

范长江的西部之行，从成都出发，过雪山，涉大河，穿越藏人区，直抵陕甘；然后奔兰州，越祁连山，踏破贺兰山缺，绕回五原、包头。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而且几乎是靠一人之力完成的。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渴望成功的强烈愿望，是走不下这段艰难旅程的。那时的中国，交通不畅，信息闭塞，西部状况更是糟糕不堪。范长江一路走一路看，发回了见闻报道在《大公报》上连载，开创了中国新闻记者记行式报道的先河。

“记者等一行（最初范长江与一四川商会同行）于七月十四日正式离开成都，乘汽车向江油出发。天下小雨，这条路是川西北大道，过去是田颂尧的防区，由成都到广汉，倒还勉强可以通行。广汉以后，简直就不能叫‘路’。平坦的地方，车轮往往陷入软泥一尺以上，无法开行，要乘客大家下来推车，有时还要雇乡农来推，才能开动。”“名义上我们包了一个车，实际上走路的机会，非常的多。在一段最难走的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发汗，汽车还在后面烂泥路上摆尾摇头，似乎还在希望我们去扶持它。”就在这样的劣等道路旁，范长江看到，居然竖着一块高大的德政碑，是当地“百姓”歌颂田军长为民造福，修路架桥的功德的。范长江抹抹头顶的汗珠，哭笑不得。

范长江西北之行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客观地、准确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和他们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9月2日，范长江穿越藏区，

来到兰州之后，整理自己的采访笔记，完成了一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的报道。《大公报》在刊发时，破例加了“编者按”向读者推荐，称“值得一看”。

范长江在报道中分析了当时双方的形势，“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留守岷江上段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若到冬令，纵全无中央军事压迫，单因寒冷与饥饿，将使他们受非常重大的痛苦与牺牲。即以现在之气候，胡宗南师长守松潘，后方尚有几条道路可以运输接济，然而胡师士兵之因饥寒而病而死者，远比战斗伤亡者为多。则朱、毛、徐向前方面之困难，当十数倍于此。加以东南两面，中央军不停的加以军事的压迫，则朱、毛、徐向前必在冰雪季之前，脱离现住区域，另谋出路，毫无疑义。”

范长江西部之行报道的关于红军的篇章还有《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松潘战争之前后》。那时，《大公报》是独立于各党派之外，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原则的中立报纸，范长江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自由职业者，合法的中央政府是国民革命政府，从社会环境计、从大众普遍的价值取向计、从社会基本舆论指向计、甚或从发表的可能性计，范长江只能做此记述，而不能用其他的任何标准和价值判断。而正是这些宝贵的客观记述，真实地再现了历史。

范长江为西部之行做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他的许多报道，配有简明的地形图，文章中大量的历史沿革、背景介绍让读者获益匪浅，他更是怀着强烈的平民感情，揭露西部许多地区官僚擅权、富豪巧取、民不聊生的社会百态，是一部难得的西部社会实况“素描”。

他告诉我们：“记者此次详细考察河西之后，觉河西之现状，万难再行支持，目前正是春荒时期，农民大都缺乏种籽，而且日食无从，自然整理水渠、采办肥料等事，还根本不能谈到。”

他告诉我们，大年初一，在酒泉，“有几条背风的街道，记者简直在晚间没有勇气经过。这般几乎全身赤裸的孩子，在夜间，他们就在门角墙脚，乃至无水的水沟里藏了起来。你如果用手电去照，这里一堆三个，那里一堆二个，彼此挤得紧紧的睡下了。到了夜间十时以后，气候变为酷寒，这般孩子渐渐忍受不

了，他们于是本于童性的自然，放声哭出他们求救的惨痛哀声：‘妈妈呀！冻得很呀！’‘爸爸呀，救命呀！冻死人呀！’‘老爷太太呀！冻得受不了呀！’……有时天气特别寒冷，一两条街的灾童们一齐号啕大哭起来，哀声震动全城！”

范长江西部之行的精彩报道，为《大公报》增色不少。《大公报》的主政者们也是爱才惜才，将他正式招至《大公报》任记者。西部之行的报道刊发完毕之后，范长江稿件的署名由“本报特约通讯员”改为了“本报记者”。范长江从此有了一个更大的展示他新闻抱负的平台。

西部考察结束后，范长江还有南方之行的打算，《大公报》也想倚重范长江这个名牌记者，进一步扩大《大公报》的影响力。就在此时，西北局势吃紧，日军的异常调动，预示着中日交火不可避免，战争一触即发。《大公报》急令范长江赴西北采访。胡政之郑重地向他说：“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了。”

范长江深知这“最后机会”的宝贵。一个新闻记者，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往往一生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瞬间的“存在”。范长江立即向西北进发。为了穿过日军占领区，他甚至化装成行旅商人。

1936年初冬，绥远抗战拉开了序幕。范长江率领一个记者报道组，就在最前沿采写新闻。那散发着战场硝烟气息的报道在《大公报》上一次次刊出。前线将士浴血杀敌的风采和气概，深深感动着后方人民。

[本报平地泉16日夜11时发专电] 本报记者(11月)16日黎明到平地泉，此间将士与民众皆异常兴奋，坚决而镇定，为“九一八”以来罕见之可喜现象。敌军三千余人，15日午前10时起，向我红格尔图阵地猛攻，并有飞机7架，猛烈向我投弹，激战至午后5时，被我击退。今日敌方号称三师之众，一再猛攻我红格尔图。闻嘉卜寺之特务机关首领亲任指挥，仍被我少数部队击退。我方士气极旺，愉快的战争情绪，充满于每个官兵眉目间。

范长江还用他那细致的笔触，描摹了五位抗日将领的英勇事迹，称他们是：“民族英雄”。其中有彭毓斌师长、董其武旅长、张培勋团长、苏开之团长。

西安事变之后，范长江在《大公报》记者中第一个赶赴现场，最早进入了

戒严的西安城中，发回了现场的第一手报道。在西安的杨虎城公馆，范长江见到了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周恩来与范长江热情握手，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趁机向周恩来提出了赴延安采访的请求。周恩来答，要请示延安方面同意。第二天，延安的复电就传到了西安：中共中央同意范长江访问延安。这是延安方面批准进入苏区的第一个国内记者。

延安对范长江的访问十分重视。范长江不仅见到了毛泽东，还访问了博古、罗瑞卿、吴亮平、廖承志、刘伯承、林祖涵、丁玲、张闻天、徐特立、林彪、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高级干部和各方面代表。

范长江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和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与范长江作“竟夜长谈”，所议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多方面问题。范长江知悉毛泽东“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地和我谈论”。

范长江访问延安的报道在《大公报》上刊出后，蒋介石大光其火，训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认为在当前抗日大趋势下，不应发表这样的文章。而毛泽东读到后十分高兴，亲自给范长江写信表示感谢，语气恭顺而尊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战地报道之中。他同时向国军和八路军提出了随军采访的申请，没想到都获批准。范长江考虑再三，派他的助手邱岗随八路军采访，他去国军抗战一线报道。他知道，日寇的主力部队是部署在国军对面的。

范长江与他的报道小组逆着逃难的人流一路北上，1938年4月4日，来到了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李宗仁的指挥所。没想到的是，大战在即，李宗仁、白崇禧镇定自若，竟在桌前从容对弈。这让范长江有了底气。

5日，范长江北上鲁南，来到了孙连仲将军司令部采访军情。第二天傍晚，炮声隆隆，日机往返穿梭。记者们纷纷猜测，恶战将至。许多人掉头撤回了徐州。

范长江再一次逆向而动。他骑着军马，挥鞭急奔，来到了离台儿庄只一公

里半的一个叫南棠棣铺的小村庄。国军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师长，头发蓬松，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绒线衫，下着一条军裤，几天几夜未合眼，嗓音嘶哑，精神极度疲惫。他诙谐地告诉范长江，这里还有几捆稻草，真诚欢迎你们在这里过夜。谈到战事，池师长立即来了精神，他情绪激动地说：“胜败存亡就看今天晚上！”

果然，晚8时许，炮声震天，大地颤动。我军攻打台儿庄的战役骤然打响。各部队依令行事，冲锋陷阵，毙敌数千之众。日军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至天亮，台儿庄及以北五公里内各重要据点，皆被攻克。台儿庄战役取得辉煌胜利！

攻克台儿庄六小时后，范长江就冒着战火的硝烟进城采访，“战后台儿庄——本报特派员视察报告”当日下午4时发回报社。第一时间，第一感觉，第一手战况，第一份捷报……这为范长江壮丽的记者生涯又添了浓重的一笔。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十分欣赏范长江所具备的记者素养和才华。但他认为，一个出色的新闻人，不仅要有采访、写稿的功力，还要具备编辑、组版的技能。许多新闻人稿子写得准确、精到，而选稿，编稿，制作标题，组织版面的能力却十分欠缺。张季鸾想培养范长江，便调他去做夜班编辑。报社的夜班编辑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天天昼伏夜出，时间紧、稿子多，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一个版的编辑、审阅、校勘工作，的确紧张和劳累。而且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稿子编得精练，标题制作醒目，稿件连缀得当，没人知道是编辑的功劳。读者只记得记者的名字，只晓得记者的风光。范长江上了两个夜班就受不了了，他坚决要求离开夜班编辑室，他说，“我不能在这里出卖我的健康。”这也是范长江的性格使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闯荡天下的大牌记者，而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版面编辑，尽管版面编辑是通向总编辑的捷径和快车道。

张季鸾闻听大怒：“我们上了几十年夜班了，毫无怨言。他才上了两天就受不了了，让他走！”

当然，张季鸾不会为这点小事就赶走范长江的。有知情者说，张季鸾是恶范长江品德不好。其实这也是张季鸾的偏见。“七七”事变后，范长江思想急剧左倾，他相信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会带领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光复大好河山。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有时，他会打着张季鸾的旗号与政界、商界高层交涉，有时他会以《大公报》的名义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所有这一切，令夫子般的张季鸾大为不满，也与他中立的办报立场相抵牾。事到如今，已不是品德高下之别，而是政见不同之争了。1938年10月，范长江无奈离开了《大公报》。他记者生涯中最完美的展示舞台，蓦然坍塌了。

此后，范长江在桂林组建了国际新闻社，极力报道中国的抗战信息。1939年，范长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组织上派往香港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沦陷前撤回内地，进入苏北解放区，担负了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的领导工作。这一时期，范长江的个性在逐渐淡化，党性，即共性在逐渐加强。他那极具个人色彩、个性语言的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不见了，用统一的口径、组织的价值标准阐释的新闻一点点多了起来。1941年，在主笔《华商报》期间，范长江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和口吻，在报纸上连载了《祖国十年》长篇报道，报道共二十篇，数万字之巨。其中第十九节写的是《长征与追击》：

长征！十万人的长征！十万人经过高山大河蛮荒绝域的长征！这不是和平的旅行，这是有二十倍三十倍以上的敌对力量在沿途截击追剿，而且有沿途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和交通便利上用一切方法阻难的战斗行进！

这个历史上无先例的长征，先后共经一年，1935年10月21日长征的先锋部队才达到陕北。这是二万五千里的艰难行程。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军事远征，也是世界历史上惊人的政治事业。

什么力量使这十万人始终坚持战斗下去？他们始终不畏缩，不分散，不灰心，不变节，不投降。什么力量使十万人长期发出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能忍饥，能耐寒，能跑路，能高速度地行军，能果敢地冲锋，能坚决地打败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他们能有如许众多的优秀军事和政治干部，能掌握着这只暴风雨袭击中的危船，能团结十万人成钢铁般的力量，能灵活运用这个不可抵挡的力量，能打破不能想象的困难，能胜利地达到北上的目的？

如果说这是“土匪”，那中国竟有如此众多优秀的土匪，应当是中国的光荣！如果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我们对于消灭他们的计划之未能成功，不能不引为民族之大幸！

这无疑是在毛泽东赞扬长征壮举的另一个版本。

离开《大公报》后，作为个体的范长江，消失了。

范长江新闻生涯的“回光返照”，是他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之时。

1949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调正在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回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此时的《人民日报》，已由原华北局的机关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地位崇高，作用巨大。人民日报社社长，在中央机关序列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

1950年1月，范长江北上履新。他是踌躇满志而来，而且大有“受命于危难之机”的感觉。

《人民日报》由河北平山县进京之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缺少办报经验和人才，更主要的，是无法迅速适应由农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转变，报纸办得不能令中共高层满意，而且差错不断，有些甚至是严重差错。如，开国大典期间，《人民日报》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说成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报纸上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歌词和曲谱居然也有错漏。建国之日最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居然安排在了要闻版的次要位置。

所有这一切，让毛泽东震怒。他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严加批评。要求查出责任人严肃处理，并建立严格规章制度杜绝此类差错。毛泽东发火之后说，你们学学《大公报》嘛。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

范长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他理解领袖的着急之心，更自喜于毛泽东对《大公报》的表扬。他这个《大公报》一手培养出来的记者，认为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这一年范长江四十岁，正是当干之年。他精力充沛，热情高涨，毫不疲倦地投入工作。

他每周组织一次言论写作座谈会，讨论和分工评论的题目和执笔人。他直接指挥一些重要的采访活动，亲手编辑一些记者的稿件。

他多次就改进报纸工作向中央写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请示报告，经常和中共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交换意见。他不仅同编委会成员商议工作，还和普通记者、编辑倾心交谈。

他勤奋学习。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保证两小时看书看文件，以此督促编辑

记者们学理论、学政策。他时常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等机关了解有关财经方针、政策法规和工作部署，并约请有关领导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以提高《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他自己动手写的评论，也时常见诸报端。

当然，范长江性格上的情绪化、易激动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慢慢显露了出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范长江竟满腔热忱地到中南海向中央报名参加志愿军，去朝鲜前线打仗。中央领导狠狠批评了他：你的战斗岗位就在《人民日报》，这任务比上前线艰苦得多！

范长江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他沿用《大公报》的一些做法来管理《人民日报》了。

《人民日报》在过去的办报实践上，培养了一支比较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分布在北京及全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范长江对这支通讯员队伍不太满意，认为他们基础差、文字粗，只能反映一些动态消息，写不出有分量的深度报道。他给全社编辑、记者写信，要求培养出三五百名“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他说，要把“芝麻”和“绿豆”分开，不能拣了“芝麻”，漏光了“绿豆”。他对“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要求甚高。认为应该是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的专家，有专业知识，有宏观思路，了解全局情况，解读政策背景，还要有相当的文字表达能力。这就难住了大多编辑、记者，要培养出“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编辑、记者本人就先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而战争年代从农村走出来的略有文化的战士，怎么能一夜之间就转换成“社会活动家”呢？这种不加区别，不容解释，硬性强推工作部署的做法，引起了一些编辑、记者的抵触和反对。

范长江性格急躁，脾气耿直，又是新闻名家，大牌记者，他对各级干部和编辑记者批评起来非常严厉。尤其是看到错漏百出、毫无新闻要素的稿件更是火冒三丈。他时常采用“飞行集会”的方式指导工作，就是在哪里发现了问题，立即在现场组织有关人员开会，由他主讲评议，严厉斥责，会后立即整改落实。

对于《人民日报》缺少工作计划，时间观念淡漠，没有细致的工作进度表的农村式的拖沓作风，范长江也是屡次指责、批评。他特别不满意疲沓、懈怠、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工作作风，当众批评“老棉袄、老油条”。他批评《人民日报》的有些干部进城后摆老革命的架子，是“猪肉架子”、“狗肉架子”。这些尖刻的语言，使一些老红军、老八路们受不了了。论资格、论辈分，这些战场上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们，比范长江的资本可是大多了。

范长江真以为这是在《大公报》呀！真以为组织上让他把《人民日报》办成《大公报》呀！真以为他可以以专家自居，施行名人办报、同人办报呀！

1952年年初，中央在全国搞起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范长江被抽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范长江政治阅历的肤浅和不成熟再次表现出来。他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多少党内斗争的经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更是参加得很少。他对眼下的“三反”、“五反”运动如何开展，斗争目标是谁，运动该如何发动和推进，毫无经验。他只凭借对领袖和组织的忠诚，想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果显著。结果，引起了人民大学领导和师生们的不满。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范长江在人民大学一心扑在“三反”、“五反”运动上时，他的后院起火了。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地反起他来了。扣在他头上的罪名就是“三反”中的最后一反：官僚主义。

中共中央派黎澍（党内历史学家）去人民日报社调查，没想到群众对范长江意见那么大。胡乔木决定让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做检查，竟然检查了两次才勉强通过。

1952年6月，在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刚刚两年半后，范长江离开了中央机关报，离开了新闻工作，离开了他心爱的记者生涯。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根据组织的安排，范长江再也没有从事新闻工作，甚至连新闻的边也丝毫不沾了。离开《人民日报》后，他只是担任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厅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58年任全国科协副主席。这几乎是一个赋闲之职。“文革”期间受尽折磨，屡遭批斗，他那《中国的西北角》中称红军为“共匪”、“共魁”的文章，让他吃了大苦头，遭长期关押、斗争，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1970年10月23日，不堪凌辱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全国科协“五七”干校自杀身亡，年仅六十一岁。

从四十二岁赋闲到六十一岁去世，范长江最富经验、最有创造性的年龄，竟然是在冷漠、歧视、碌碌无为中度过的。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了一本《范长江纪念文集》，范长江的老同事、老部下何燕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也许是由于急切盼望‘大转

变’早日完全彻底实现，也许是由于他性格中本来就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的因素，也许由于他思想上有某种偏差，也许还由于同志之间因经历不同而有某种误解或不够了解之处，他对人的批评有些话说得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他办事的作风也不是全无可非议之处。”何燕凌说：“当年在报社‘三反’运动中，大家在气头上对他的批评也不尽公平。这些都已是历史的陈迹，而且在长幅的画卷上只不过是微微几道擦痕，曾经身历其境的同志早都可以释然于怀了吧。”

我以为不见得。范长江九泉之下会释然于怀吗？这种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太空洞、太崇高，或者说太可怕了。不错，对于辽远的历史，个人遭际只是几道微微的擦痕，但对于一个活灵灵的个体来说呢，那就几乎是整个生命历程。谁能体会那将近二十年中范长江的苦闷与心酸？专业无施展平台，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腔新闻梦，空怀家国情。

当年曾激烈反对过范长江的老记者晚年感叹：“那时候长江对老同志有些过分，而我们这些老同志对长江也有些过分了。”

苍凉的历史无法重演。

主要参考文献

- 方蒙：《范长江传》，新华出版社，北京，1989年2月第一版。
-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4月第一版。
- 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5月第一版。
-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2004年10月第一版。
- 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 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载于《百年潮》2009年第六期。

储安平

储安平像一股春风袭来，似一缕轻烟化去。谜一样的，他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骨子里，储安平是个非常清高之人。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人。他创办刊物、主持报纸的目的，在于以言论事、文人论政。《客观》和《观察》周刊上的那些时事综述、要闻报道，只不过是他的文章的面子和议论的缘起而已。他的犀利的思想、清新的文笔、条分缕析的沉稳解剖、偶尔显现的义愤填膺，才是他有别于他人的特征，才是他最可宝贵的财富。

储安平出生于1909年，江苏宜兴人，与徐铸成是同乡，小徐两岁。当然，家庭境况和童年遭际，储安平与徐铸成却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储安平来到世间仅仅六天，母亲就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偏偏又是一个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之人，储安平便由他的祖母和伯父抚养。祖母给了他母爱，而伯父则担当了严父的角色。储安平一生对他的伯父储南强心存感激。储南强早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来在家乡兴办教育，兴修水利，关心市政建设。五十岁后，将全部家产投入宜兴的善卷、庚桑两个石灰岩溶洞的建设、开发，是乡间的一开明士绅。据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游览善卷洞时，见储安平聪慧出众，曾大为夸赞。

十四岁的时候，储安平的祖母与父亲相继去世了。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大，但对于从小失慈，过惯了动荡、流浪生活的储安平来说，这倒是他人生最好的成长剂。

1928年，储安平考入了上海的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

著名学府。它的前身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储安平入校时，校长是张寿镛，文学院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学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主任是潘光旦，都是一时之选。担任光华教授的有：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等，都是名动四方的大学问家，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储安平在校时间是1928年至1932年，这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他所学的专业。

戴晴说：“他在光华读的新闻系。”

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

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是我在光华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赵家璧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生。

储安平在光华的专业只好存疑了。但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无论什么专业，都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储安平也不例外。1929年，他就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鲁迅在日记中有过记载。估计是鲁迅主编《奔流》期间，储安平曾经投稿。

后来，储安平成为“新月”社的成员，尝试着写一些散文和小说。1936年，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书名《说谎者》。储安平在这个集子的序言里说道：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的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也许是储安平的自谦之辞。在《新月》社的那帮作家和文学青年当中，储安平的散文算是有功力的，他写得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较少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谢泳说：“《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

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只不过每人选了四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

其实，储安平是在文学和政论两条轨道上并行跑着。胡适、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二十一岁，在光华大学还未毕业的时候，储安平就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书不算厚，十多万字，收录了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二十多位学界名流的政论。此书的编选独具年轻储安平的匠心。只要言之成理，无论多么对立的观点，无论多么偏颇的言论，他兼而收之。那个激进的时代，那样一个激进的年龄，能有如此宽容心胸，也实属不易。储安平居然还斗胆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以他浅浅的阅历和稚嫩之笔推荐、评点大师们的文章了：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光华毕业后，迫于生计，储安平在《中央日报》谋到了一个副刊主笔的差使。这期间，他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成了他第一位考虑的问题。即便如此，出国留学的念头仍强烈地激励着储安平，他渴望着走出国门，去亲炙欧美文明的教诲和真谛。又是伯父帮了他的忙。储南强从江苏教育厅为他申请了两千元的留学官费。当然，这笔钱是不足以完成学业的，储安平必须精打细算。正巧，柏林奥运会开幕在即，《中央日报》穷得连记者都派不出去。储安平提出，只要允许

他免费随代表团前往欧洲，他愿意承担起所有报道任务。就这样，储安平来到柏林。奥运会结束之后，他便前往英国求学去了。

储安平的专业选择，最鲜明地揭诸了他的个性和思想。他不赶时髦，不逐热门，选择了枯燥深奥的政治学。在众多的政治学流派中，他偏偏选择了费边的学说，投身于费边社传人拉斯基门下，孤灯青卷，苦读经年。

费边社的“缓进社会主义”主张，十分契合储安平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知。他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社会公有。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储安平后来的所思所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储安平学成回国。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此时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负责人是当年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廖世承。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蓝田工作。储安平大约也是廖世承揽了去的。

储安平在湘西蓝田教的是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他的讲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规定，每逢周会，教授是要轮流演讲的。储安平的夫人说，轮到安平，“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在这样的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日子里，储安平居然还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采风录》，一本是《英人法人中国人》。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储安平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从中可见储安平的定力和自律。他要保持住自己“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强迫自己在战事纷乱、动荡不安、东奔西迁中静心写作，日有所述，实在是难能可贵。

可是，储安平志不在此。他没有想当一辈子教书匠，更不想以风花雪月的文字粉饰生活、麻醉自己。他要评论国家时事，他要分析政府的利弊得失，他要呼吁民众的觉醒，他要鼓吹民主的意识。一句话，储安平想以言论政。他要以文章报国。在国难当头之际，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发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客观公正的声音，为国家建设的大局献计献策。

很快的，储安平到重庆去主编《客观》周刊了。当时的中国，有三份《客观》。一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是贾开基。一是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一是重庆《客观》周刊，张维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1945年），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未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

储安平主编了十二期《客观》就抽身离开了。重庆《客观》共出了十七期就停刊了。说起停刊的原因，储安平认为，“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贸然放手了。”储安平没有明确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抗战胜利，归心似箭。避难于陪都重庆的各地人士，急于复员。储安平的根在上海，他急于回到上海，去创办一份自己说了算的刊物。

《观察》的筹备是够细致和漫长的。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的维持和接续，储安平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分析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证，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观察》在募集资金方面可以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储安平的学生雷柏龄，一心一意追随老师办《观察》，雷柏龄甚至跑回家动员父亲卖了土地，用卖地的钱入股《观察》。当然，《观察》的股东当中确实没有大资本家、大财主，“这些人是一勺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谢泳评论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

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面世了。储安平对这份刊物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他选定的刊徽是希腊著名雕塑掷铁饼者，寓意只有经过自己的奋力一掷，才能达到足够的距离，凡事全靠自己努力和拼搏。在这个刊徽周围是一圈英文，THE OBSERVER（观察）、INDEPENDENT（独立的）、NONPARTY（无党派的）。在《观察》封面的下方，是期必印的七十八个撰稿人的姓名，这正体现了储安平对撰稿人的尊重，有了一流的撰稿人，才会有一流的刊物。办刊伊始，储安平就给《观察》确定了这样一个严格的要求：“本刊在任何情况下，不刊载不署真实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是与我们今天的思维习惯正好相反的。报纸、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等，一定要署上记者的名字，这是记者的劳动成果，是记者扬名立万的最好形式。而评论性的文章，一般是不署个人之名的，因为它的确也不是个人观点的表露，因而“本报评论员”、“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样的署名，或是类似于“秋实”、“任仲平”、“钟纪轩”这样的笔名便应运而生。近年来，有的报刊加大了言论的刊发力度，“时评”、“论坛”、“议论风生”等评论专栏不断涌现，但这些言论经过严格审查和删削，极少能体现评论者个人的观点和主张，而往往是对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的再次解读。在有些报刊，尤其是党报，明文规定由总编辑签发各类言论，就足以见出对评论类作品的高度关注。

在《观察》的创刊号上，储安平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这实际上是储安平对《观察》的期许和原则：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

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为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挺身而出，各有所献。储安平是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论事”作用的：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的西方政治学的留学背景，在创办《观察》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于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他提出了八个字的处置原则：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对于民主和自由，储安平情有独钟：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储安平对自由的论述，则是充满了英国立宪精神：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进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观察》成功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从创刊之初的期发量四百份迅速成长，很快便达到了十万五千份，如果每份杂志在多人手中传阅的话，那么，《观察》的读者就会有近百万之众。这曾经是上海街头的一景：每到周末，《观察》上市之日，报摊上会排起长队，人们争相购买。

储安平尽管心高气盛，但他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一直是怀有足够的景仰与尊重的。在主编《观察》的两年多中，储安平曾给胡适写了三封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与理解，希望胡适能在《观察》中发表文章，评论时局。储安平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最能代表他的主张与愿望：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敢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僭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

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化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迨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筹，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迨难筹集），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一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于就教中表白立场，于谦恭中张扬个性，这正是储安平的另一类之处。前后三封信，胡适都没有回复，《观察》上也没有见到胡适的文章。也许是胡适对储安平的某些做法和方式不能完全同意，也许是储安平略为激进的言论和对政府的批评，让与国民政府走得很近的胡适不能完全接受。但是，“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在精神层面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储安平是胸怀大志之人，他从来不认为《观察》是他谋生的手段，他不为稻粱计。他把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在这份同人刊物上，就是要让它名扬四海，一纸风行。“我要办得人们以在本刊发文为荣”，这是储安平立下的宏愿。为此，他奉行两条办刊原则：“一要人抬刊物，二要刊物抬人”。因着这两条，储安平在稿件的要求上非常之高，不够标准的文章他从不通融。一次，马寅初推荐了一篇他的身为立法委员的学生的文章，这是篇分析金融形势的稿件。储安平看后认为文章不行，为慎重起见，他拿给金融专家笄移今过目，笄移今也觉得差点。储安平毫不犹豫地就把稿子退了。马寅初想不到一本小刊物、一个年轻人，竟这样对待他，发了不小的脾气：“看不起我，把我的撰稿人从封面上拿下来好了！”当然，最后稿子也未用，名字也没撤下。

储安平的是非标准简单而明确：倡导民主，遵循言论自由。储安平曾对他的好朋友、《观察》股东笄移今说过：“办刊物若想成功，紧要关头要站得起来。”1947年5月24日，储安平和《观察》迎来了第一个“紧要关头”。上海警备司令部以“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的罪名，一口气查封了《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家报纸。

储安平忍无可忍，站出来在《观察》上说话了：

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份量的文字。

储安平的意思，报纸是一种社会“公器”，办得水平高低，那是各有评价，也可以说是众口难调，但是动辄将报纸封门，则是一种专制和霸道了。

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我们站在同业的立场，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

当储安平拿起批判的武器的时候，他不把自己想说的话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鄙视那些讨好政府、见风使舵、无自主原则和主张的媒体。在声援文汇、新民、联合三报的同时，他的批判的“大棒”，也挥向了同行报人：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的惨案说：

“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指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也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由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也不能不出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

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在大公报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此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

《文汇报》里边，仅和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在储安平的直接抨击下，《大公报》后来总算在文汇三报被封问题上发了一个短评。短评中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徐铸成认为，这是《大公报》最恶劣的损招。言下之意，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是不正当舆论，封也就封了，今后政府要保障的是《大公报》这样的“正当”舆论。

至于储安平认为徐铸成“为人傲慢，吝赐一复”，在文汇报被封四十多年的1988年，作家戴晴向年届八十的徐铸成求证，徐铸成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说：“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三报被封后，徐铸成感叹，《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个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l，一个是《观察》的储安平。

储安平办《观察》的目的，是为了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所谓“以言论事”、“文章报国”。可既然是周刊，选登新闻便是《观察》的办刊内容之一。当然，储安平的新闻标准是严格的、挑剔的。他开了一个“观察通讯”专栏，专门刊登国内重大时事新闻和军事新闻。在国共时和时打、政局扑朔迷离的情势下，“观察通讯”深受读者欢迎。

1947年4月26日出版的《观察》第二卷第九期，刊发了一篇迪化特约记者采写的通讯《从迪化暴动看新疆前途》。也许是文中的有些描述不够准确，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写来了信函，对通讯中揭露的违法乱纪之事，要求提供详细事实，以便查处。若为不实传言，要求予以更正。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来函

观察周刊主编先生转贵刊迪化特约记者先生惠鉴：前阅本年4月26日出版之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九期《从迪化暴动看新疆前途》一文载：哈密“某交通人员擅将卡车五十辆出售得价多入私囊云云”。不胜诧异。此奉谕分属第六区公路管理局，驻新供应局及哈密李专员严密澈查以凭究办，兹据先后申复前来，均以多方调查毫无迹象可寻，询诸当地人士，亦云向无所闻，不知先生对该项消息何处得来，甚盼将发生时日地点名称，检举确切事实，详细密告本部，务必尽法严惩。倘为捏拾旁言，或竟出之虚构，不惟淆乱国人听闻，抑且有玷《观察》声誉，应请仍在观察周刊立予更正，以释群疑而正视听，是所盼荷。顺颂撰祺！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办公室启（5月27日）

按：此函同时在5月28日新疆日报刊登

这封信刊于《观察》周刊第二卷第十六期封底。时间是在1947年6月。

1948年4月底5月初,《观察》又刊载了《陕北密云将雨》的通讯,谈及临汾战事,称临汾失守。这又引起了山西省政府的不满,一封信函写给了《观察》:

山西省政府来函

迳启者:顷准太原绥靖公署通知,以《观察》第四卷第九期所载观察通讯《陕北密云将雨》一文,内谈及临汾战事,有谓:“临汾则是经过激烈战斗而失守”等语,阅后不胜骇异,嘱转达更正等由。“查临汾战事自3月7日开始以来,迄今将近两月,城垣始终为国军固守,从未转移阵地”。仅东关一隅,被共区占领。刻下临汾城郊战事,仍在进行中。至守军主力,除西安绥署所派部队外,尚有太原绥署所属XX师,由梁副总司令培璜负责指挥。恐传闻失实,相应函请查照更正为荷。

此致观察社

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启4月29日

这封信刊登在《观察》周刊第四卷第十二期封二。时间是在1948年5月下旬。

《观察》将这两封信“来函照登”,是曲意表明关于迪化和临汾的报道有瑕疵,不准确,带有更正的意味。报道失实,承认错误,并及时更正,这是所有负责的媒体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在这一点上,储安平 and 《观察》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今天的读者诧异的是写信的这两个单位。一个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一个是山西省政府。这两个握有军权和行政管理权的有相当级别的部门,竟然纡尊降贵,认真地写来申诉信,报告调查结果,客客气气地请《观察》再作调查,若确实有误,应予更正。我们是十分不习惯阅读这样的“来函照登”的。我们没有见过由这样的军政单位发出的这样的文字。

谢泳在读到这两封来信时感慨万端。他先评价了《观察》:我们评价一个时代的新闻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闻从业者的精神,有时候会产生很多感慨。对一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评价,以往可能只是过多地注意了它的某一方面,而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政治文化精神没有把握,这样在涉及对一个时代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时,常常会得出一些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上面两封读者来信,一个出自当时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一个出自当时的山西省政府。应

该说,《观察》所发文章确有失实之处,但从那两封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在《观察》编者一面,他们是有错就改。从事言论工作的人,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言论从不出错,但错了就改。《观察》编者没有恐惧心理,没有以为你是“警备司令部”或“山西省政府”,我编杂志的人就要委曲求全,他们的心态都是平和的。

谢泳又评说了这两个实权“衙门”:在“警备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一面,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对一家杂志任意打击。在那样的时代,涉及的又是那样重要的事情,但双方表现出的态度和理性精神,都映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现在失落了的就是这个东西。无论“警备司令部”还是“山西省政府”,都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们编杂志的也是为国家做事,虽然工作的性质有差异,但大家努力的目标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社会进步,为了社会更文明。

谢泳的评论,有他一家之言的独特内涵。

当然,任何统治者的忍耐都是有限度、有底线的。在触动社会基石、动摇统治基础的问题上,掌权者从来都是毫不含糊的,决不可通融的。1948年,国共内战打得激烈的时刻,储安平以“观察特约军事记者”的署名,在《观察》上刊发了大量的前线通讯,如“昌潍失守鲁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等。至于这个“观察特约军事记者”究竟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观察》周刊社内,除了储安平,谁也不知道。那些编辑们,都不晓得储安平是如何弄到这些稿件的。他们只知道从储安平手中拿到稿子,编辑之后,上版刊印。蒋介石对《观察》的军事通讯大光其火,十分不满,1948年12月下旬,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娘希匹,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

12月24日下午4时,三名政府人员闯入了《观察》周刊社,他们自称是受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和警备司令部派遣,前来查封《观察》周刊的。他们出示了查封命令: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巧的是，储安平此刻不在上海，他已潜入北平打探消息，约催稿件。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储安平滞留古城，无法南返了。

《观察》周刊的林元、雷柏龄刚刚将新近出版的一期《观察》打包发完。雷柏龄代储安平签收了停刊命令后，竟向三位军警人员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让我们出一休刊号可以吗？我们应该向读者作个交代。

来人笑了：“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究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

紧要关头，文人的幼稚和天真，总是给历史留下苦涩的微笑。

储安平走“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期望以民主拯救中国只是一厢情愿。国共双方在“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储安平的悲剧便有了更浓厚的历史纵深感。

储安平政治生命的第二个高峰，是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短短六十九天。

1956年4月，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工作方针，思想和舆论环境有所放松。不久之后，中共统战部等部门提出，将解放前的民间和民主党派的报纸，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具体讲，就是将《大公报》还给王芸生，将《文汇报》还给徐铸成，将《光明日报》还给民盟中央。

民盟中央主席章伯钧闻听此言，兴奋异常。夏日的的一个晚上，章伯钧自掏腰包，请家中的厨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将徐铸成、储安平、萧乾三位老朋友，请到家中，把酒言欢。

章伯钧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要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章伯钧言犹未尽：“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章伯钧的这番话，给了三人极深的印象，萧乾则对满桌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等。徐铸成一作了回答。

席散时天已黑透，暑气全消。章伯钧送客人离去。徐铸成、萧乾走在前边。章伯钧拉住储安平悄悄问：“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

《光明日报》，你能从九三过来吗？”那时，储安平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这太出乎储安平的意料了。难以置信的他，怔住了。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替他做了回答。

按章伯钧家的规矩，孩子是不能与长辈同桌待客的。这天晚上，章伯钧十五岁的女儿章诒和，隔着玻璃窗偷瞄了储安平一眼，章诒和用了七个字，便将美男子储安平的气韵写了出来，“面白，身修，美丰仪”。

章伯钧对储安平和他的《观察》赞赏有加：“这是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分。”

储安平走马上任之前，便坦言了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储安平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民盟中央专门向中共统战部做了汇报，以讨要指示，以便有所遵循。中共负责宣传工作的要员胡乔木十分欣赏储安平的才华，力主他出任改组后的《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

为使《光明日报》平稳、华丽地迅速转身，储安平苦口婆心、反复申明。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他直抒胸臆，放胆一言：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走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5月7日，储安平召开了全社职工大会，阐明他的办报主张。他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一条轨道上

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

紧接着，储安平详细谈到了他的改版想法。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告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人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道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道、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道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道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实际工作中，储安平几次谈到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跟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张口便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道是否要权衡利害？”

储安平斩钉截铁地说：“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储安平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

1957年春天，在中共的大力倡导下，全国范围的鸣放开始进行。储安平决

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为此，储安平亲自起草了一封组稿信，发给参加各地座谈会的近百名知识分子。他在信中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这个百名知识分子参加的九城座谈会，整整开了二十天，《光明日报》做了详细报道，大出风头。储安平认为，《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就应当刊登这样的发言。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最具新闻价值。当见报后看到编辑删去了个别尖锐字眼时，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储安平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立马派出“腿快、眼快、手快”的记者前去采访，令其必须当日写出稿件交给编辑部。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

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拿出了他事前准备好的稿子，宣读了他的讲演《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在这篇著名的讲演中，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思想。这不是他的发明。这是罗隆基在解放前向国民党投掷的一枚重磅炸弹。谁也没想到，解放后的1957年，储安平会向中共再论“党天下”的种种危害。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举国震动。

很难确切肯定究竟是哪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言论让毛泽东痛下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决心。但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论是导火索之一，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授意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储安平，一介书生，职业报人，因言罹祸已不是一次。他知道，他在《光明日报》的新闻生涯结束了。早上一上班，在认真读完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后，他立即给民盟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打了个电话：“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章伯钧还想再说上两句，储安平已挂了电话。

下午两点整，储安平准时迈进了章伯钧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匆忙。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上书“呈章社长”，章伯钧打开一看，竟是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辞职信。章伯钧还想挽留，储安平已掉头而去。

此后，经过多轮批斗，储安平成为全国十大右派之一。当然，章伯钧更是没能幸免。

从4月1日到6月8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只干了六十九天。章伯钧后来常常自责，如果不让储安平去《光明日报》，他会不会遭此厄运呢？他会不会在九三学社安稳地生活下去呢？命运不能假设。其实，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命运躲得过，性格藏不住。人的所有行为的基础，都是性格决定的。储安平当然也不例外。

一个报人，在他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倘若有一篇文章轰动四方，青史留名，这报人，就算是立得住了。

储安平就是这样的幸运之人。他不是有一篇文章名动天下，而是两篇。而且这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国民党时代，一篇发表在共产党时代。

1948年的中国，内战日甚，国势凋敝，国民政府无奈之下实行货币改革。改革的人心及基础皆已丧失殆尽，小小的改良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一年的11月6日，《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发表了储安平的文章《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面前低头的一个记录！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象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了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

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痛苦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的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个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10月31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的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太不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仇

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善良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疾于中吗？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

储安平一贯是以冷静的笔触来进行他的时政评论的，《一场烂污》是他少有的激愤之作，他是被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言而无信激怒了。他为老实听话的百姓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而痛心。储安平是冒着刊物被封门的风险写这篇评论的。文章发表后，社会各界一片叫好之声，明眼人也暗自为储安平、为《观察》担心。不知何故，国民政府竟然没有采取行动。政府不得不有所顾虑，因为从储安平的文章中，政府实在找不到动手的理由，被骂为“烂污”，统治者们也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直到《一场烂污》发表七周之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才以“妨碍军事”的名义查封了《观察》周刊。《一场烂污》是那个年代，人人争诵的一篇檄文！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统战部召开的为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做了一次振聋发聩的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

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了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

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之前，他征询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开会的头一天，他认真起草了发言稿，并打印成篇。他知道一些报纸会刊发他的发言内容，为了不让编辑因稿长而随意删节，造成意思的曲解和不完全，储安平以报人的精细掌控着字数。在发言稿的最后，他还注了一行小字：“希用原题，原文勿删”。

储安平明白，他的发言，无疑是整风运动中扔出的一个大炸弹。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当天在会场中听他发言的马寅初，激动万分，用手不断用力拍打着椅子扶手，连称“Very good! Very good!”第二天，不仅《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纸也发了全文。第二天早上，储安平以少有的亲切口吻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全文播发。

也是座谈会第二天，储安平一早按约定来到了章伯钧家。一跨进客厅，章伯钧迎上前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储安平踌躇满志地说。显然，他完全知道他的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储安平太天真了。“大问题”是你该谈的吗？他立即被“打翻在地”，一顶结结实实的右派帽子，狠狠扣在了他的头上。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紧要关头登高一呼，以言论事，尖锐的思想、犀利的文字，流芳百世、震人心魄，也算是功德圆满，死也瞑目了。

其实，储安平是死不瞑目的。有关人员让他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时，储安平气哼哼地说：“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

这种气话，只是说说而已。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储安平失去了他的所有理想和尊严。政治上受歧视，工作上受冷落，思想上受批判，身体上受惩罚。“文革”开始后，这种迫害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储安平想到了死。1966年8月31日，与老舍投太平湖的同一天，储安平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也许是储安平还没有最后下定自杀的决心，他在潮白河边徘徊得太久了，引起了路人的注意。他刚刚从青龙桥上跳下去，便被人救了上来。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行径，造反派是不会放过的，储安平被押回“九三学社”的小院中，关在一间小屋内，遭受了更严厉的批斗。哀莫大于心死，此刻，储安平其实已经“死”了。9月上旬，当储安平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到家中时，看到家里已经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片外，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储安平彻底绝望了。于是他蹣跚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储安平的小儿子储望华多年后回忆：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这次专案调查，也还是没有找到储安平的确切下落。

1982年6月，储望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之际，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了。

谢泳说：“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是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

无论如何，储安平这个人最终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命运似乎是一种宿命，人们只能在感叹声中怀念这位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主要参考文献

-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2005年9月第一版。
- 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4年8月第一版。
-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1989年6月第一版。
-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第一版。
- 李侔：《徐铸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8年7月第一版。

张友鸾

以张友鸾的才情和素养，他应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成就更大的事业。他是中国最年轻的总编辑。二十一二岁，大学还未毕业，就主掌了《世界日报》的编采和笔政。在二十几年的新闻生涯中，张友鸾先后担任过十四家报纸的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这也是一个令后来者无法超越的纪录。

张友鸾的记者才华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懂新闻，会办报，对消息的判断准确精到，对标题的拿捏恰如其分。他做的新闻标题，常常令读者叫绝、叹服。张友鸾还具有典型的作家情怀，办报之余，他写散文，做小说，尤其是对元代戏曲的研究，有相当造诣。对古典小说的校注，又是国内公认的大家。

文人好名。张友鸾早早地在新闻和文学上有了较大的名气。他为名所喜，也为名所累，很难狂飙突进，再上高峰。

文人好玩。张友鸾像是一个“玩票”的，辗转于新闻与文学两个圈子之间，哪一头也舍不得放下。他办报，是兴趣，是对新闻的喜爱，是抓到独家新闻，精心编排、一炮打响、轰动社会的欣慰与快感。倘做了报馆的社长（老板），编、印、发、广告、纸张，工人、勤杂、交际、应酬，这些琐碎之事，会让张友鸾脑袋发胀，很不开心。因此，他热衷于“玩票”，只客串，不下海；只办报，不经营。张友鸾自己便说，他这大半辈子，“只是给别人当伙计”，很少自己亲自动手办一张报纸。即便办了报，也很难持之以恒、长久办下去。

张友鸾，祖籍河北献县。清末，因祖上获封安徽太平县知县，全家移居安庆。张友鸾出生于1904年，待到他中学将要毕业时，已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了，学科学、争民主的现代意识，已深深影响了张友鸾的思想，在他就读的

安徽省立一中，张友鸾已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了学生会的干部。

著名进步作家郁达夫，1921年曾在安徽省立法律专门学校任教。授课之余，郁达夫常徜徉在安庆的书店、报摊之间。这一天，天下着雨，郁达夫撑一把雨伞来到了安徽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门前的书报摊边，正赶上张友鸾作为学生会干部在此值班。张友鸾不认识郁达夫，见郁达夫要买刚创刊的《觉悟》，便极力向郁推荐中短篇小说集《沉沦》。张友鸾说，这本小说批判封建主义，抨击军阀当政，很值得一读。郁达夫淡淡一笑，对张友鸾说：“我就是郁达夫。”这意外的邂逅让张友鸾惊喜不已。自此，这两个率性的激愤之人，便常在一起议论时局，讨论社会变革和国家出路，很快便成了好朋友、“忘年交”。

1922年，张友鸾考上了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来到北京继续求学。不久，郁达夫也来北京执教，两位好朋友又能经常把酒言欢了。邵飘萍此时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兼课，张友鸾应该算是邵飘萍的弟子。

史料表明，张友鸾大学还未毕业时，就担任了《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可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总编辑，是张友鸾骂出来的。或者这样说，张友鸾是骂进《世界日报》的。

1924年，成舍我以自己的二百元大洋为资本，创办了《世界晚报》，一年多后，晚报刚刚有点起色，成舍我便以《世界晚报》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又创办了《世界日报》。这足见成舍我的魄力与胆识。他是想用一张晨报、一张晚报，在北京报业市场上打出一方自己的天地。

创业之初，诸事艰难。最大的难题是资金不足，成舍我只好锱铢必较，攥紧手指缝过日子。那时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几乎就是在成舍我家中办公，吴范寰任经理，龚德柏是晚报总编辑，张恨水是日报总编辑，除此就几乎再没有别人了。成舍我这个社长，也得每日出去采访，为报纸搜罗新闻。虽不至于说是“草台班子”，但“朋友帮忙”、“老乡相助”是肯定的了。

不久之后，张恨水便萌生了去意。办报理念的不同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成舍我常常克扣工资，或不能按时发薪，这让张恨水很不满意。成舍我的夫人杨璠亲自管钱、管账。每到月底，杨璠总是不能足额发放。给一部分工薪，再搭上一张纸条：“兹借到×先生名下××元。”有一次，张恨水弄丢了一张欠条，找杨璠要钱。杨璠却说，没有存底，也不知欠你多少钱，不能给付。

张恨水决意离去，成舍我慌了手脚。他一方面尽力挽留，一方面四处物色替代之人。这时，吴范寰向成舍我推荐了自己的小同乡张友鸾。能够破格任用张友鸾，除了张的个人才能外，成舍我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他知道，一个正在读书的大学生，是不需要支付很高的薪水的。见面之后，成舍我非常满意，便立即让张友鸾到《世界日报》上班。没想到，张友鸾刚干了三天，张恨水在成舍我的一再挽留下，竟答应不走了。成舍我算计得要命，他怎能花钱养闲人？便立即辞退了张友鸾。张友鸾血气方刚，对成舍我出尔反尔，善虑多变的性格十分不满，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将成舍我大骂了一通。信中说他“狐狸之而狐搯之，反复无常，是以无功”。这段话语出《国语·吴语》，是指狐狸生性多疑，刚将东西埋好，又不放心，再挖出来看看。如此反反复复，终将一事无成。

成舍我读了张友鸾的信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欣赏他的胆识和勇气。他对吴范寰说：“此人虽出言不逊，但骂得痛快，切中要害，文章写得漂亮，有才气。”成舍我当即改变了主意：“此人非用不可。”之后，他亲自找到张友鸾，说兼职编社会版的陈大悲要离开，请他留下来接替陈大悲编版。张友鸾为成舍我的真诚打动，入了《世界日报》，将社会版编得有声有色。1926年年初，张恨水终于去职，成舍我便让张友鸾担任了《世界日报》总编辑。此时，张友鸾还不满二十二周岁。

1926年正月初十，张友鸾与同乡、大学同学崔伯莘结婚了。他俩都是安庆人，可在中学时无缘相识，双双考入北京平民大学后，才在大学的安徽同乡会中相见、相知。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崔，而张友鸾又酷爱元曲，朋友们便以“张郎”、“崔娘”戏称二位。结婚这天，周作人模仿元曲唱词，亲撰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构思精巧，出语不凡，很得众人赞赏。

崔伯莘长张友鸾一岁，先期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安庆做了中学教师。张友鸾学业既毕，到邵飘萍的《京报》短期编了一段《文学周刊》后，因思恋新婚不久的夫人，便也回到了安庆家中。

1926年8月7日凌晨1时左右，直奉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在接连枪杀了邵飘萍、林白水之后，又以“赤化通敌”的同样理由，将《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抓获，押上卡车，带往警备司令部。在卡车上，成舍我万念俱灰，只觉得一颗子弹从

后脑打进去，从前脑穿出来。幸亏官场大佬孙宝琦出面营救，成舍我才侥幸躲过一劫。回到报社后，成舍我又恢复了报人本色：“报继续出。现在韬光养晦，避避风。军阀总归要骂的；张宗昌胡作非为，是不会长的。”

成舍我躲到了南京，遥控指挥北京的《世界日报》。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国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平不再是政治重镇，成为文化教育中心。素有新闻敏感的成舍我，设想在南京再办一张报纸，让他的南北两家报纸互通声息、互通有无，必会事半功倍，打开市场。他向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求援，得到了经济上的资助。于是，成舍我电召张友鸾赶赴南京，出任他新创办的《民生报》的总编辑。成舍我还特意将《民生报》的创刊时间定在国民党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复职视事的1928年2月下旬，可见成舍我的良苦用心。

张友鸾的确是一个不安分之人。他不希望生活平淡无奇，如死水一潭。他向往的日子是标新立异、惊喜连连。在《民生报》干了一年之后，1929年，张友鸾与成舍我闹了点小别扭，便毅然甩手而去，另谋高就了。

张友鸾先到了汉口的《中山日报》，该报被封后，又跑到上海《时事新报》南京办事处帮忙编发电讯。后来得了一场伤寒病，回家疗治了一段时间。病好后，帮助他弟弟张友鹤筹划、创办《南京晚报》。《南京晚报》创刊后，交由胞弟张友鹤打理，他倒有了一段空闲时间。1929年底，创刊不久的南京《新民报》亟需办报人才，陈铭德、刘正华找到张友鸾，竭力邀请加盟。这样，张友鸾便来到《新民报》担任了总编辑。这一次，张友鸾倒是难得，竟在《新民报》一直干到1933年。

“喜新厌旧”的个性再次在张友鸾身上死灰复燃。不同的是，此次喜新厌旧居然搀进了新的元素：“伙计做久了，总想自己办一张报，于是我又离开了《新民报》，创办了《南京早报》。”

张友鸾把办报想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采编和报纸管理，又有十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办一张报纸有何难的呢？

可一旦进入具体操作，各种难题便接踵而至。最迈不过去的门槛是资金。“老师没有教我，那些老板也没有告诉我，如何筹措资金。”

张友鸾真是书生办报。他天真地幻想，用小小的积蓄作开办费，只要报纸印出来，卖报和广告收入，就足以支持报纸周转了。可他不知道，这资金链是

一个长长的大链条，而不是一个小小的闭合环。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资金，是支撑不过报纸最初的亏损阶段的。现实给了张友鸾幼稚的设想当头一棒。

“《南京早报》出版后，赔累不堪，我的积蓄完了，我妻崔伯莘变卖首饰支持我。”山穷水尽之时，两个四川朋友找到了张友鸾，表示愿意每月资助他几百元钱，把报纸办下去。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一个要做董事长，一个要做经理。张友鸾觉得，拿这样的钱有些烫手，犹豫不决，彷徨难定。再者，张友鸾是想自己办报的，过一把当老板的瘾。人家拿钱进来，一个董事长，一个经理，他张友鸾不还是“伙计”嘛！既然都是当“伙计”，何苦费这个劲呢！

正在这时，成舍我由北方来到了南京。成舍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地，必定要广泛阅读当地的报纸。读了《南京早报》后，成舍我认为，作为通俗的大众报纸，《南京早报》办得不错。他特别指出，有一天晚上，一颗大陨石坠落，照亮了半边天，百姓都很关心。次日各报，只有《南京早报》刊发了专访天文台专家的新闻，对陨石现象做了科学解释，成舍我对此表示赞赏。张友鸾向他诉苦，大谈经费不足、办报之难。成舍我深表同情，主动表示愿意投资，与张友鸾共同办好《南京早报》。几经磋商，差不多就要达成协议了，张友鸾也回绝了那两位四川朋友。不料，最后关头成舍我却变了卦。他对张友鸾说，《民生报》缺总编辑，我不打算向《南京早报》投资了，你还是回《民生报》吧！张友鸾思前想后，接受了成舍我的建议，“我想自己终于打不开江山，成不了气候，何必焦头烂额自苦乃尔，还不如安闲做个伙计吧。”张友鸾把《南京早报》无偿送给了那两位四川朋友，惟一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南京早报》的原班人马。

张友鸾心情复杂地二进《民生报》。令成舍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友鸾不是来振兴《民生报》的，而是来给《民生报》送终的！

张友鸾再掌《民生报》不久，记者采访到一条重要新闻：国民政府行政院盖办公大楼，建筑商贿赂了工程负责人、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建了一座小洋楼式的私人住宅，因而在行政院办公大楼的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并且屡加预算，以至于建筑费用比原计划多出了一倍以上。张友鸾听说彭学沛是成舍我夫人的亲戚，行政院办公大楼又牵涉到许多国民党高官，稿子发是不发，颇费踌躇。张友鸾拿着稿子去问成舍我，成干脆地回答：“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登？”

稿子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彭学沛当天向法院起诉，控告《民

生报》“妨害名誉”。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因为报纸揭了行政院的丑而恼怒不已。程沧波、端木恺、萧同兹、俞新武等《中央日报》和中央社的旧友同行，纷纷从中调停，劝成舍我登一个更正启事，化解风波，彭学沛也愿意撤回诉讼。没想到成舍我较了真。他说，事实俱在，为了报社的信誉，绝不更正。法院开庭那天，成舍我亲自出庭答辩，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倒是案子的主角彭学沛没敢到庭，委托律师代为诉讼。因为是行政院交办的案子，法院也不得不买账。于是，昧着良心，颠倒事实，判《民生报》败诉，判处成舍我短期徒刑，且缓期执行。成舍我不依不饶，将自己一万多字的答辩书登在报上，寻求公众支持。舆论一片哗然，社会情绪激愤。无奈之下，彭学沛只好撤诉，不了了之。

可怨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汪精卫、彭学沛心中。不久之后，民族通讯社的陈云阁采访到一条新闻，大意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与监察院长于右任因铁道部在向国外购买建筑材料发生的舞弊事件的查处上产生严重分歧，爆发了激烈争吵。蒋介石彼时正率军在江西“剿共”，无力分心，便电告汪、于以大局为重，勿生内讧。张友鸾拿到电讯稿后，安排在《民生报》头版头条发表，并做了个醒目的大标题《蒋电汪于勿走极端》。

彭学沛终于抓住了成舍我的把柄。他立即拿着报纸找汪精卫告小状，说成舍我是借此兴风作浪，扩大事态。蒋介石见电报之事被公开披露，便翻脸不认账，对外宣称是报刊“捏造文电，鼓动政潮”。汪精卫立即下令：“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当然，消息是由民族通讯社发布的，不追究本源，大面上说不过去。于是，民族通讯社社长赵冰谷、总编辑钟贡勋、写稿记者陈云阁也一并抓到了宪兵司令部。

汪精卫也知道报馆的厉害，不愿闹得民情大哗。他是派便衣去《民生报》封门拘人的。当时成舍我不在，张友鸾说，“我是总编辑，责任应该我负，我去。”经理周邦式说：“成先生长期不在南京，我是负责人，我去。”可宪兵队的便衣谁也不拿，定要成舍我的“正身”。傍晚成舍我回到报馆，自知躲不过去了，便同意与便衣们同去。他回到房间，找了一个包，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都装上了。便衣们假装说，何必带这些东西呢！成舍我笑笑，没有作答。

民族通讯社的赵冰谷、钟贡勋、陈云阁三人，以为到宪兵司令部问过头话就可以回去了，没想到被扣了一夜，并还将“依法办理”。一早起来，见成舍我穿上

外衣，已经在天井里刷牙了。三人暗自诧异，成舍我怎么会料到这就是逮捕呢？成舍我事后对他们说，办报这么些年，多次下狱，拘捕扣押，早已有了经验。

最终，成舍我被判入狱四十天。坐满四十天大牢后，张友鸾去接他出狱。在回家的路上，成舍我就忿忿地说，汪精卫托人给他捎话，只要他低头认错，《民生报》便可复刊。成舍我不为所动，“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他汪精卫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成舍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张友鸾就这样把《民生报》送上了不归路。当然，所有的过程，成舍我都参与了；所有的报道决策，都是成舍我首肯的。送走《民生报》，张友鸾再次回到《新民报》做总编辑。

1936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筹备之时，写信约张友鸾去做《立报》总编辑。

从《民生报》被封、张友鸾重回《新民报》做总编辑，已经两年多了。以成舍我对张友鸾性格的了解，张又该动了“挪挪地方”的心思了。

成舍我的判断相当准确。

张友鸾先是推辞：“《世界日报》人才济济，你随便调个人来就行，何必要我。”

成舍我给张友鸾戴“高帽”：“我要你给《立报》打响第一炮哩！”

张友鸾果然经不住吹捧，同意过去帮忙几个月，把报纸办起来。

《立报》是南京、上海的一些新闻记者合资兴办的，他们想尝试办一张真正的“同人报纸”。总股本是十万元，成舍我占了十分之三。若论经济实力，成舍我完全可以独资经营《立报》，但此时的成舍我，办《立报》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赚钱了，他想多联合一些朋友和同人，形成一股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期望对舆论有所影响。成舍我知道张友鸾没有钱，便从自己的股份中划出一部分，无偿记在了张友鸾名下。这样，张友鸾便也成了《立报》的合伙人之一了。

张友鸾将《立报》的创刊时间定在1936年9月21日。因为此前一天，上海法院将开庭审理帮会头子、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杀人案。凭张友鸾的新闻敏感，他知道这一定会是轰动上海滩的热点新闻。

上海的帮会现象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各帮会划分势力范围“统治”着上海。这些黑社会势力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老百姓侧目而

视，极为痛恨。可这些帮会头子们，都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在租界外触犯了法律，便躲到租界内避风头，中国的法律时常奈何不了他们。报纸也不敢对他们说三道四，《申报》《新闻报》这些数一数二的大报的地方版编辑、记者，也得拜这些帮会头子认“师父”，否则就不能安于其位。一般的报纸就更不敢碰帮会的一根毫毛了。

顾竹轩也是上海滩出了名的大亨，地位跟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不相上下。头一年，他让人暗杀了一个叫唐嘉鹏的仇人。他雇用的杀手因犯别的案子，被抓进了监狱，为减刑赎罪，供出了此事。顾竹轩本就住在租界之内，若在平时，本可逃之夭夭。那一阵子顾竹轩做生意发了笔大财，但对巡捕房分钱不均，巡捕们心怀怨恨，便突袭逮捕，将顾竹轩送交了地方法院。

张友鸾提前安排记者做了充分采访，到法院、看守所、巡捕房，甚至到顾竹轩家中采到许多独家新闻，他还派出记者打听顾竹轩的手下会如何活动，律师将怎样为他辩护、老百姓的街谈巷议等，只等开庭之日、创刊之时一并报出。

人算不如天算。

9月20日，法庭突然宣布顾竹轩案侦查还未结束，庭审延期。可报纸创刊的广告和启事已经发出，张友鸾只好舍弃顾案，仓促出版。当然，功夫不会白费。9月27日，顾案正式庭审。28日，《立报》头版头条醒目报道：

顾竹轩案昨开庭

庭外大叫囂

旁听奔逃秩序乱

看守所闹监

除了文字报道外，《立报》还刊登了顾竹轩受审时的照片。三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刊载了审讯详记。其他报纸遮遮掩掩一报而过，而《立报》详细的独家新闻，一下子就引起了社会轰动，当天的报纸加印到七万份。此后一个多月，随着庭审的持续，《立报》搞了大约有十次追踪报道，直到法院判处顾竹轩十五年徒刑、全文发表了判决书为止。

张友鸾以他的胆识和才干，打了一场漂亮的新闻仗，组织了一次完美的连续报道。

揭露帮会，读者痛快；报纸畅销，股东高兴。可是那几天里，《立报》社的气氛也相当紧张。有人传言，帮会不会善罢甘休，要找成舍我和张友鸾算账。果不其然，张友鸾接连收到了几封要他“吃生活”的匿名信。张友鸾将此事告诉了成舍我，成说：“在上海滩上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张友鸾知道成舍我也一定接到了匿名信，只是他一声不响罢了。为安全起见，那段时间，晚上编完报回家，张友鸾都坐出租车。而成舍我若无其事，一切如故。张友鸾不由得从心里佩服成舍我的镇定沉着。

张友鸾在《新民报》前后工作了十二年，尽管其中两进两出，但《新民报》却是他服务最久的一张报纸。这正印证了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两句传言：成舍我有识人之眼，有用人之心，却无容人之量；陈铭德无识人之眼，有用人之心，也有容人之量。率性随意的张友鸾能在《新民报》中呆上十二年之久，且兢兢业业，全副精力扑在办报上，陈铭德的“用人之心”、“容人之量”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循往常的惯例，张友鸾跨入《新民报》大门不久，便成了这张报纸的总编辑。这一点，还真得任张友鸾“自吹自擂”，晚年，他曾对自己的后人说：“一到报纸工作，我就是总编辑级的。”

《新民报》的编辑模式，就是在张友鸾手中奠定的，并在抗日战争期间趋向成熟。

张友鸾设计的《新民报》的总体风格是：新闻和文章以短小精悍取胜；编辑组版以生动活泼见长；读者对象以城市市民——偏重中下层公教人员为重；内容以社会新闻为主，适当增加副刊分量。

作为总编辑，张友鸾为这张民间报纸开了一个为人称道的好头。当记者，他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善于捕捉重大新闻；当编辑，他能画龙点睛拟出令人叫绝的标题。从版面安排到撰写评论，从编副刊到创作小说、诗词，他几乎无所不能。张友鸾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新民报》的经理，制定了广告、发行、会计、印刷部门的工作计划，使报纸管理规范化。

张友鸾最大的过人之处，是他始终对文字工作怀有一种炽热之情，对写新闻、编报纸的冲动经久不衰。他在《新民报》《大时代》副刊“见面的话”里写道：“冲上去！多少人此时正在火线上怒吼；坐下来！又有多少人此时却在后方的安乐椅上。动荡的世界，正是一阵狂飙，在这狂飙之下，不允许荒堕骄逸，也

不允许徒作愤慨的空谈。”铮铮真情，掷地有声。

“张氏标题”以及由张友鸾倡导的视角独特的社会新闻，一直是《新民报》吸引读者的最大亮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青年学生到南京请愿，希望政府坚决抗日，救亡图存。学生们在政府门前挂了口钟，不断地敲打，钟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张友鸾做了一个非常感情化的标题：“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

有一年，南京阴雨绵绵，张友鸾根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制作了这样一则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

《新民报》的记者采写了一条为前线将士募集寒衣的新闻，张友鸾的标题为这则消息画龙点睛：“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这标题，颇有宋词小令的韵致。

为精彩的新闻配上漂亮的标题，是张友鸾的一大乐趣，也是他刻意追求的办报境界。有时看似举手之劳，实则是张友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的书面体现。张友鸾从来不会放过为好新闻制作好标题的机会。报人都明白，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抗战期间，林语堂到成都活动，记者跟踪采访报道。这一组动态新闻，让张友鸾过足了标题瘾。

山河破碎，举步维艰，林语堂是搭邮车到成都的，张友鸾便在标题中注明：邮车寄到林语堂。

林语堂对美食颇有兴趣。在成都吃了名菜豌豆烧肥肠后，赞不绝口。张友鸾大笔一挥，标题便是：“林语堂九转回肠。”

林语堂看后亦大笑不已。后来林语堂用英语发表了演讲，张友鸾依然用最尖锐的对立之词制作出奇不意的标题：“中国林语堂作英语讲演。”

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历来是编辑的刻意为之。圈上花边，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或者是编辑有意强调某些事实或观点。花边新闻一般不会占据报纸上最重要的位置，却是有着蕴意特别的强调作用。张友鸾总是要求《新民报》的花边新闻，做出独特的标题，表现出韵味和格调。

1945年初，号称“中国汤因比”的历史学教授黎东方在重庆公开演说，竭力推崇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缺点只在好君主身后不容易有适当继承人，所以秦皇汉武求长生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农民虽苦，却不知造反，有文人煽动，才会天下大乱。《新民报》的“本报特写”记录了这位教授的“奇怪怪

论”，加上大标题曰：“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幽默辛辣，贴切工整，一针见血。这自然是张友鸾的杰作。

抗战胜利后，传来了郁达夫南洋遇害的消息，又风闻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已与某轮船公司总经理结婚。当时交通困难，出川不易，轮船公司是大家羡慕的部门，于是，《新民报》将两条消息并在一起，做了个双行标题：“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令人唏嘘，令人感慨。

程大千是张友鸾的得意弟子。当时重庆物价飞涨，程大千给一则反映市场供应的新闻做了这样的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成为当时的报坛经典。

郑拾风也是张友鸾亲手培养起来的办报行家。当时国民党的粮食部长徐堪平抑米价然而米价不降反升，郑拾风便做了个标题讽刺他：“徐堪何堪。”

当年《新民报》的气象新闻的标题生动传神，或借天喻物，或状物抒情。如一则立春特写的标题是：“锦城春依旧，物价催人瘦。”

成都的深秋阴冷而多雾，《新民报》的一个标题是：“秋深矣，霜雾日多，菊花黄，梧桐叶落。”

还有一则标题借天气变化抒发对前线将士的关心：“秋雨连绵两日，山城突转奇凉，重庆如此，前方可知。”

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后，重庆《新民报》的一篇通讯是这样作标题的：“民主潮里人民泪，巴山冷月悼英魂——各界追悼李闻两先生。”

在张友鸾长期而精心的打造下，《新民报》各地版的编辑，都十分注重标题的炼字和炼意，力求鲜明、准确、生动、精炼，又富有汉字的韵味、动感和节奏。抗战胜利后，北平《新民报》访问重返北京大学主政的胡适校长，就读者关心的和谈、政协会议、联合政府等诸多问题向他讨教。胡适却顾左右而言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学术研究。记者满腹狐疑，编辑更是毫不客气地揶揄、讽刺：“伟哉胡博士，君等嚷和平，我讲水经注。”俊杰应识时务。任何不合时宜的高谈阔论，无论多么深奥、精彩，都是言不及义，南辕北辙。而重庆《新民报》以人民渴望复员、重建国家的愿望和心情，做了一个喻意深刻、生动传神的标题：“咬牙重建碎山河。”让人过目不忘，心旌震荡。

张友鸾自己就是文章高手，人称“新闻奇才”。他的新闻小品，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以小见大，随手拈来，借题发挥，喻古讽今，无深厚古文与国学

功力，还真是不好把握。张友鸾当年的这些小品文，很得读者称道。1940年8月16日，重庆《新民报》发表了张友鸾的《杨将军不写九宫格》一文，记述了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后的一段囚禁生活：

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谏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

后人谓之：“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日寇投降之后，避难重庆的各界人士纷纷东来，全力恢复战前的生活和事业。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更是雄心勃勃，不仅想复刊上海等地的《新民报》，还想打造一张新的北平《新民报》。而此时的张友鸾，“伙计”又当够了，盘算着去南京恢复早年他与张恨水合办的报纸《南京人报》。

《南京人报》早年由张恨水出资，创办于1936年4月。张恨水与张友鸾都是那个时代世人皆知的俊杰才子。他们二人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素为好友。张友鸾完成了对成舍我的承诺，成功创办了《立报》，并相助维持了几个月后，便从上海回到南京，加入了张恨水的阵营，担任了《南京人报》总编辑。

张友鸾文人气重，名士做派。张恨水又是著名言情小说家，风花雪月，英雄气短。他们二人办的《南京人报》，是一张四开小报，坚持了他俩一贯的“超政治”主张，全力打造一张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平民报纸。可国运废颓，民族多舛，你不找“政治”，“政治”会自己找到你头上来。“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一天，《南京人报》编发了中央社的一条消息，标题却是张友鸾亲自所拟。这标题抓人眼球，震撼人心：《南京只剩一口兵》。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恼羞成怒，亲自下令抓人封门，《南京人报》两名记者被捕下狱，报纸也被迫停刊数日。1937年11月，南京沦陷之前十几天，《南京人报》终致无法

维持，暂别读者。张友鸾返回了《新民报》。陈铭德借此机会，生拉苦劝，将张恨水揽入了《新民报》之中。

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咬牙重建碎山河”，政府允诺恢复战前格局。张友鸾撺掇张恨水复刊《南京人报》。两人怀念那段自己创业的日子，加之投入的资金又不想白白打了水漂，便联袂返回南京，重打锣鼓另开张了。

与此同时，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在全国各地五社八版的格局已经形成。陈铭德用人心迫、爱才心切，想让张恨水去主持北平新民报社，出版北平版的《新民报》。这让张恨水进退维谷，难以抉择。

陈铭德知道张恨水是个大孝子，抗战以来，张恨水的母亲滞留北平，母子已经八年多未见面了。陈铭德指示先期去北平筹办《新民报》的邓季惺，亲自上门看望张老太太，并在北平城中买下了一处大四合院，供张恨水一大家子居住、生活。闻听陈铭德夫妇的这些做法，张恨水感动不已，痛快地接受了陈铭德的邀请，离京北上，主持北平《新民报》。张恨水将自己名下的《南京人报》的股份，一并送给了张友鸾。此时，《南京人报》便为张友鸾一人所有了。

抗战胜利后的南京，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建国主张五花八门，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走到台前，倡言和平，争取民主，共谋建国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办报，是断然守不住“超政治”的底线的。张友鸾的《南京人报》，也迎合民众心愿，反映社会呼声，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几次遭到当局惩处，特务们也屡次打砸报社，破坏报纸的正常出版。

在南京，最早被封门的是《新民报》。1948年7月8日，经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研究决定，责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此举一出，中外舆论一片声讨之音，各地民怨沸腾。一向好脾气的陈铭德也忍不住怨天尤人了，他冲南京《新民报》主笔宣统之和地方版编辑蒋文杰大光其火：“我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你蒋文杰，一个是你宣统之。我有两间房子，让你们来开店，一个开面馆，一个开饭馆。结果呢？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气头上的话不足为训。宅心仁厚的陈铭德也许会想，若是张友鸾、张恨水仍在《新民报》，就不会如此莽撞了！陈铭德错了。文人一旦气冲斗牛、血气方刚起来，那也是相当怕人的。正是大义凛然的张友鸾，连夜派记者赶往《新民报》编辑部，以细腻的笔触，悲愤的情怀，采访了《新民报》编辑部被封之夜的情形，控诉了当局的专制

与粗暴。这篇题为《沉痛的一天》的通讯，刊发在7月9日的《南京人报》上。

《沉痛的一天》中写道：

9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问。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绝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惫，一位报社同事偷愉地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先生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命令中有两句话：“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这命令援引的是北洋政府留下的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10时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心弦也发生叩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

……

感谢张友鸾，感谢《南京人报》，为我们存留了一份宝贵的记录，让我们能够永远记住中国新闻史上那黑暗的一幕。

当然，发表这样的通讯需要气魄，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久之后，《南京人报》也遭到了停刊处分。

陈铭德是不必为选择了宣统之、蒋文杰而后悔的。即便是张友鸾继续主持《新民报》，恐怕也难逃被封门的厄运。那年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都是燃烧着一团和平救国之火的。

全国解放后，1950年《南京人报》再度复刊。可共产党、新中国不允许私人办报的政策，让这张旧时代过来的同人报纸水土不服，难以为继。张友鸾是个明白人，在没有路的绝壁前，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1952年，《南京人报》遣散了人员和股本，彻底停刊了。

又是一次因缘际会。此刻，张友鸾的老朋友，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的聂绀弩，到江苏调查《水浒传》作者的有关情况，来到南京。见张友鸾不再办报了，聂绀弩便力邀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中的稗官小说的研究、编辑、校订工作。聂绀弩明白，张友鸾是这个领域中难得的人才。张友鸾对此也有些兴趣，便举家北上，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古典文学编辑的位子上坐了仅仅几年，张友鸾便成绩斐然。他注释校订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张友鸾的注释，被誉为“为新的注释文学安放第一块基石”。张友鸾特别钟情于元代戏曲的研究，他曾说过：“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我国元朝的戏曲，其辉煌价值绝对不在莎剧之下，其难懂程度也比莎剧过之甚多。我们应该赶快做些元戏曲的普及工作。否则，不要多久，能懂元戏曲的人只剩下极少数专家，元戏曲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会逐渐消亡了。”那段时间，张友鸾静下心来，潜心揣摩，利用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改编了《十五贯》《蝴蝶梦》

《清风楼》等八九个传统戏曲，出了六本戏曲集，还创作了大量的章回小说和随笔、杂文等。

1957年春天，也许是张友鸾那颗热爱新闻的心又勃勃躁动了，张友鸾又想重操旧业。经他多方联系，北京的某新闻单位同意他归队。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也正在此时蓬勃展开，张友鸾想，我是个就要调离文学出版界的人了，“鸣放”之事敬而远之吧！可北京新闻界闻听张友鸾即将重返新闻岗位，便盛情邀请他参加新闻界的座谈会，人来了，又力劝他讲几句话，发表“高见”。张友鸾经不住这样的左劝右请，便在北京新闻界的大鸣大放座谈会上敞开了心扉：

从最近一些被揭发的事实看来，新闻工作者的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许多人对新闻工作者不信任，而更多的人却是对新闻工作者不尊重。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工作中，常常得到的是阻力而不是支持。

如果新闻工作者本身存在着“特权思想”，要求“见官大一级”，这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错误。但是，事实所告诉我们的却并非如此，事实只是某一些人对新闻工作者加以轻视，硬要看作是“逢人低三等”。

有人说，走到什么地方，都遇到新闻记者，讨厌得好像嗡嗡的一群苍蝇。这些话，早二十年，早三十年，旧社会里的新闻记者是不断听到的；没有想到，今天还听到这样的说话。

这句话也有一半是对的，新闻记者走到哪里诚然都是嗡嗡的一群。如果缺少这嗡嗡的一群，我们会感到缺少很多东西，我们必然诧异这个社会的无声无息。

但是，另一半的话却不对。新闻记者在今天，应该不是苍蝇，而是蜜蜂。尽管苍蝇和蜜蜂同样的是嗡嗡的一群，所发生的作用却大不相同。蜜蜂不仅为人类酿造蜜和蜡，而且在百花齐放之时，还要它传花授粉。用讨厌苍蝇的态度来讨厌蜜蜂，我们应该怜悯这些人的无知。也还另有一些人，他们之讨厌蜜蜂，并非不知道蜜蜂有哪些好处，只是因为蜜蜂有刺。

据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回忆，张友鸾觉得，自己作为新中国的一员，有责任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坦陈自己的观点。于是，他更加大胆提出：我们有理由、有必要，让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正视新闻工作应有的社会地位，对新闻工作者加以信任和尊重。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一般说来，都是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人在从事劳动，是一个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谁要对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加以阻挠，就是破坏劳动，妨碍公务。我们需要时常用这些道理教育那些糊涂的人。张友鸾甚至敢于肯定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认为报纸应该有益和有趣。他认为现在报纸上每天刊登的新闻稿件，写得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编辑也不重视标题，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刻板单调，缺乏刺激性。

张友鸾的发言，立意虽然严肃，但他谈得风趣幽默，参加座谈会的新闻界的朋友拍手称道，而一些领导和官员却明显地面露不快。

5月28日，《光明日报》以《是蜜蜂，不是苍蝇》的标题，全文刊发了张友鸾的发言。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张友鸾新闻界的老熟人、老朋友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们知道，埋头于故纸堆好几年的张友鸾，又要畅快淋漓地说话了。

时也，命也。这一天，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6月8日只差十几天。如果张友鸾不去参加那个座谈会，如果他能坚辞主持人的邀请，不开口发言，如果……厄运也许就不会降临到张友鸾的头顶，中国现代新闻史，或者至少张友鸾个人的遭际，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当然，这一切，仅仅是“如果”而已。“右派分子”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张友鸾头上。

多年之后，张友鸾六十寿辰之际，聂绀弩题诗祝贺，其中两句云：“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意思是说，我不该邀请你来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让你这个半生从事新闻的无冕之王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张友鸾对此付之一笑，说：“在劫难逃，与卿何干？”足见他的气量和大度。

张友鸾又回去钻他的故纸堆了，照样又是成绩斐然。20世纪60年代，他编选的《中国寓言选》《古译佛经寓言选》《中国古代寓言二百篇》，曾获好评。他选译的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更是风靡一时。当然，所有这些出版物，都不会出现“张友鸾”这三个字。他还有一个宏大的设想，想把关汉卿等人的元代戏曲改编为白话小说，注释出版。他说：“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是同时代的人，英国人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部改写成故事，广为流传，我们也应将元曲故事全部译出，以流传后世。”

“文革”期间，张友鸾被罚劳动改造，扫大街，搞卫生。他蓄须以示抗议，每天怀抱扫帚，按时清扫。一天，扫到胡同口时，忽遇一群外国游客路过，他不想被外国人拍去照片，“揭丑”于世界，便急忙转过身去，将苍白、飘逸的胡须塞入怀中，背身持帚，等这帮外国人过去之后，才继续扫街。

那年月，《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每年进京开一次人代会。每逢会期，赵超构便代表《新民报》的老人们去看望张友鸾。回来后赵超构总是安慰大家：

“好在友鸾是个性格旷达的散淡之人，看上去也并不觉得很颓丧愁苦，每天二两酒一本书，比我的日子好过。”

拨乱反正之后，张友鸾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他像聊发少年狂的老夫，心

情愉快，笔耕不辍，进入了又一个写作高潮。除了香港《文汇报》的“燕山新话”专栏、香港《新晚报》的“掀髯谈”专栏之外，他还为《新民晚报》《南京日报》《北京晚报》《旅游》《百科知识》《新闻研究资料》等多家报刊撰写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广，体裁多样，既有读书所得、历史掌故，又有亲身经历的政坛、文坛、报坛逸事趣闻；既有感今怀昔的散文随笔，又有的人物、事件的新闻特写。无论什么样的内容，在张友鸾笔下都是那么幽默轻松，引人入胜。

1985年秋天，张友鸾脑血管病加重，从此辍笔；1986年新年刚过，他又突然中风失语。摇了一辈子笔杆，说了大半辈子新闻的一代才子张友鸾，就这样一下子跌入了痛苦的寂静世界。

1987年，缙绅于病榻的张友鸾，嗫嚅地反复说着“南京……南京……”家人们明白，张友鸾是想回到南京，回到他辉煌事业的源头，回到母亲的入土之地。次女将他从北京接了过去，趁他精神和身体尚好之际，拉着他重游夫子庙、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秦淮河等风景名胜。在文德桥上凭栏远眺时，朋友想起了张友鸾早年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便问他：“您还记不记得您写的《魂断文德桥》了？”张友鸾口不能言，但心里明白，他微微一笑，一副颇为自得的样子。

1989年，南京《新民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健在的《新民报》历任总编辑和旧时同人，汇聚南京，搞了一次庆祝聚会。张友鸾重病缠身，不能前往，由女儿张钰代为出席，并代他做了发言。当年，张友鸾曾表示要为《新民报》写下最后一个字。此次发言的标题，便是“写下最后一个字”。张友鸾说：

解放前我以编报为业，最喜欢办新报。我前前后后经过十来家报社，少则几个月，多也不过三四年，只有《新民报》，我不仅是它初创时期的成员，而且两进两出，工作达十二年之久。

我后来离开《新民报》，是因为自己办《南京人报》。那是1946年，《新民报》已发展到五社八版，成为旧中国影响最大的民间报。《南京人报》底子薄，规模小，它和《新民报》始终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在白色恐怖下，它们相互支持；它们都得到共产党的关怀，也都遭到反动派封门的厄运。南京数十家报纸解放后获得复刊的，只有它们两家。

以后我转业到出版社，可心中总装着《新民报》。《新民报》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我为它高兴；《新民报》在“四人帮”时期被迫停刊，我为它难过。1982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我曾兴奋得彻夜难眠，顾不得年迈多病，连续为晚报写了一些文字。我想，我虽不能与《新民报》长相随，但愿做到“有始有终”。始者，为《新民报》的开创出了一份力；终者，为《新民报》写下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字。事实上，从那以后，我便因脑血栓再也提不起笔了。

我现在视力锐减，看报十分吃力。不过，每天的《新民晚报》我总要浏览一遍，尽管有时眼前一片模糊，但只要看出一个轮廓，看见几条标题，就觉得心安。

……

纪念聚会之后，赵超构扶杖专程去张友鸾家探望。其时，张友鸾病重失语，赵超构则两耳失聪。赵超构就坐在张友鸾病榻前，两人双手紧握，热泪双流。坐着、望着；望着、坐着。张友鸾的夫人崔伯莘看在眼里，禁不住叹息道：“你们两个，真是天聋对地哑啊！”在座的人听了，不由得心头一阵酸楚。

1990年，银须飘洒的张友鸾离开了人世。他的次女张锦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描绘了父亲最后的时日：“父亲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是把他热爱的南京城作为归宿的。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南京的怀抱之中。”

《新民报》当年鼎盛时期，人才荟萃，素有“三张一赵”之说。“三张”是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一赵”是赵超构。据说张友鸾、张慧剑共同选定了南京牛首山作为身后墓地。张慧剑终生未娶，未有子嗣。“文革”期间的1970年5月14日猝逝于南京，时年六十四岁，死后葬于牛首山下。

张友鸾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生前愿望，将其归葬于牛首山。三座圆圆的坟墓中，长眠着张友鸾的祖母、张友鸾的父母，以及张友鸾和他的夫人崔伯莘。

距张友鸾墓地百步之遥，便是张慧剑的安息之地。

这对情同手足的患难兄弟，生前为好友，死后比邻居。这种没齿犹存的情谊，世间少见。

主要参考文献

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重庆，1982年12月第一版。

杨雪梅：《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4年8月第一版。

刘子清、刘晓滇：《中国百年报业掌故》，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0年1月第一版。

穆青

英国天才少年阿兰·德波顿说过，“超越黑格尔，也许会有好哲学，但绕过黑格尔，肯定没有好哲学。”黑格尔是一个里程碑。他静静地立在那里，对所有的后来者相视无言。他静默着，把思考和思辨留给景仰者。

德波顿想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承上启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牵扯着当下与未来。搞通了这些关键节点上的历史人物，便会打通那个时代，认识那个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上，穆青，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穆青原名穆亚才，河南杞县人，是家中的长子。穆青活了八十二岁，可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履历却简而又简。除了参加革命之初，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做过短期文化干事，在延安“鲁艺”读过两年书外，他一直从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华社做记者。被组织生生拉进《解放日报》后，完成了穆青由文学青年到新闻记者的转变，彻底打碎了他的文学之梦。抗战胜利后派往《东北日报》，天冷心热，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找到了生活中的另一半——夫人续磊（爱国将领续范亭之女）。当然，新华社才是他几乎奋斗了一生的新闻媒体。他从新华社记者做起，到地方分社社长、总社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直到七十二岁由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仍是笔耕不辍，不时有新闻作品散见于各类报章。晚年的穆青曾经充满激情地写道：

在四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与人民群众一道经历过时代的波澜，迎接过

斗争的胜利，多少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的思想感情教育着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像一团不灭的火在我心头燃烧。我始终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通过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用他们身上的革命火花，点燃千百万人心灵的火把，用他们的精神力量，用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去推动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这是穆青在《我的记者生涯》中的真情告白。这段肺腑之言，道出了穆青的“天机”：他要揭示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用这些革命的火花，点燃千百万人的心灵火把。这让我们明白了，穆青所从事的是革命的“鼓动家”、“宣传家”的工作。应当说，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记者。

现代新闻学告诉我们，新闻是对社会生活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记者依据采访到的大量的新闻事实，把一个绝对真实的过程再现于读者面前。新闻可以风趣，可以幽默，可以打动人心，可以激情万丈，但它的前提必须是绝对真实。高明的记者从来不是直接站到读者面前喋喋不休，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巧妙地隐藏在对新闻事实的取舍和运用当中。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这里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无论富人穷人，只要家境许可，总要想尽办法供一个儿子读书，期待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穆青就是这样被家里供着，在家乡杞县读完了初小、高小，又考到了开封去读高中。那年月，家里出了一个到开封读书的高中生，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足以让父母在乡邻面前扬眉吐气。

河南人心眼实，河南话讲起来又硬又拙，不拐弯，直来直去，硬碰硬，实打实。可就是这样一种不够委婉的语言表达方法，却被河南人运用到了极致，绝大多数河南人能言善辩，逻辑思维极强，论起一事件，前因后果，左征右引，层层递进，严丝合缝，非把你说得心服口服不可。穆青大约是河南人的特例。他不善言辞，羞于表达，但内心热情如火，激情万丈。这样的个性，往往是认死理、做大事，决定的事情，多少头牛也拉不回来。

1937年夏秋之交，河南大水，黄河泛滥，豫东大地一片泽国。“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一路南下，开封的学校里已是人心惶惶。穆青在一进步老师的鼓动下，联络了几个同学北上山西，要去参加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一路上，面对汹涌的逃难人群，穆青等人艰难地北上。好心的大伯大妈劝他们：

傻孩子，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往北走呢？穆青心中充满着悲壮之感：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去打日本鬼子！

穆青是做着文学梦走进革命队伍的。入伍不久，他就幸运地被送往延安学习，在鲁迅艺术学院旁听了几个月之后，他成了鲁艺的正式学员。延安那时也汇集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茅盾、周扬、周立波、何其芳为他上过课，马烽、西戎、贺敬之、冯牧等是他的同学。他开始了稚嫩的文学创作。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搜索》。穆青并没有真刀真枪地打过仗。他参加过一次打扫战场的行动。他用自己的见闻、用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用书本上读到的俄罗斯小说、用自己的合理而大胆想象，描写了一个伪军士兵的悲惨遭遇。这伪军眼看战争天平倾斜，大势已去，想弃暗投明。他怀揣着八路军散发的通行证和传单随时准备逃跑。在他真的迈出那一步的时候，被日本鬼子发现，乱枪穿身，奄奄一息。小说中的“我”与这个垂死的伪军相遇。通过垂死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万状痛苦，穆青意在揭露背叛民族、背叛人民的人绝无好下场，意在昭示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无情：

……在临终的痛苦里，他恳求我给他一个干脆的死亡。然而，望着他那善良而悲惨的眼睛和起伏的胸膛，我是发不出那致命的枪弹的。这样，我痛苦着，来回地走动；许久，许久，我沉浸在深沉的悲哀里，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使我的内心得到安静；几次我举起了手枪，又慢慢放下去，那是因为我的心和手都抖得那样厉害的缘故。最后我甚至不敢再去看他了。我不顾一切地从这里走开……

那欧化的语言，那冗长的倒装句，留下了明显的俄国小说的印痕。穆青写得很苦。或者说他编得很苦。他没有那样的经历，他不知道战场上举起步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生存法则是如何左右着每一个士兵的。他一段段写，一段段抠。写完一段朗读一段，修改、调整，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有人说，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风格。《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他真实描写了俄罗斯农民的日常生活，泥泞的村庄，雨中狩猎，山花开满原野，朋友在驿站对酌……屠格涅夫扎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生花妙笔，让《猎人笔记》流芳百世。

1942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改版，急需大批的编辑、记者。《解放日报》向“鲁艺”救援，选调了一批骨干学员进入报社。此刻，穆青正在基层连队教战士们学文化，他为战士们学习热情所鼓舞，写了一篇稿子《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投到了《解放日报》。这不是“自投罗网”嘛。《解放日报》立即在调入人员的名单上加上了穆青的名字。

穆青想不通。他的文学梦是那样的强烈。他不愿意他在向文学殿堂的攀登刚刚起步之时，被硬拉去作记者。而他内向的个性，尤其不适合搞新闻采访。无奈之下，周扬出面做工作了。在延河边上，周扬语重心长地对穆青说：“记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作家都有当记者的经历，比如爱伦堡、高尔基。至于性格，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攻克不了的城堡！”

“以组织的名义”，这便是最高的命令，穆青只有服从的份儿。1942年8月，穆青便由鲁艺学员变成了《解放日报》的记者。次年，穆青在延安采访了来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同志，写出了《雁翎队》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一篇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篇幅不长，抄录如下：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每年三千万元的勒索，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渔网和雁袋，划着渔船掂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集起来了。一个月，两个月……

无数的渔船和猎枪，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为着咱们的白洋淀，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的誓言声里，组织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硬排子”，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

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缜密的埋伏网，猎枪从每一片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伺

鸭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幽美的采菱歌。

秋天，数十里深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苍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和野鸭，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射击，依仗着芦苇和水藻的保护，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硬排，到处分散活动，袭击敌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声呼啸，几发信号枪，周围所有的雁翎船，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有时为着某种必要，他们也曾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上，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趁着月色，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物，安然行进。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橘色的黎明，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给以猛烈的袭击。

冬天，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像一支支的飞箭，在湖上穿过。

一九三九年的初秋，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他们以十几只硬排，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那里是一条长十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去，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了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不久，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哑了的运输艇，近来了。突然在芦苇的边缘，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

这样，他们安然地割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最使他们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支三八式，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

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勇气，继续着这样的战斗……

不久，敌人高叫着“平靖湖面”，向雁翎队复仇，砍倒了芦苇，刈割了蒲草，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同时在每一只船上，高高地竖起了梯凳，设立了瞭望哨，依仗着他们优越的火力，使二百米以外的大小船只不能靠近一步。这时，我们的雁翎队，便不得不转变他们的战斗方式，采取更分散的行

动，实行村庄伏击。就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像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雁翎队的队员们，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或是悠闲的垂钓者，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默默地工作着。一遇到了单独的敌船，或其他可乘的时机，呼啸一声，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拔出自己的枪支和马刀，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泅水前进，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有时候，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秆透换空气的方法，带着武器，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以待机颠翻敌船。虽然他们的血，也常和敌人的血一同染红着白洋淀的湖水，但这样自发的群众自卫战争，更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憎恨，使他们对敌斗争更加坚决。

一九四〇年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模范的农村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把这些勇敢的雁翎队员们集中起来了。经过许多次船上座谈会，和八路军的一些教育和训练，雁翎队开始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队伍，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有计划地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了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配合着我八路军水上部队，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不仅使我们的首脑机关得到屏障，而且在一旦发生敌情时，更可使我们的部队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在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从年轻的采菱者，到白发苍苍的打雁人，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大批能漂浮于水面的“葫芦水雷”，把它们普遍的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人不知鬼不觉地爆炸了无数只往来于天津保定间横行无忌的敌船。

这样，在保卫白洋淀的战斗中，雁翎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白洋淀周围的群众，在整个夏季和秋季，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已长期的生活在船上，配合着雁翎船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向敌人战斗。

四五年来，我们勇敢的雁翎队兄弟，就是这样灵活的与敌人战斗着，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因此在这个长长的时间内，白洋淀始终是冀中最坚强的堡垒之一，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让我们遥向雁翎队的兄弟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解放之后，这篇文章作为范文选入了中学课本。今天读起来，我们轻易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巨大的先天不足。它散文不像散文，新闻不像新闻。作为文学作品，除却语言和结构不谈，它缺少最起码的情节和人物。作为新闻，它更是没有事实，没有数字，没有背景，没有引语。这倒是一份难得的“备忘录”，从中折射出了穆青年青时的幼稚。

为穆青暴得大名的新闻作品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采访于1965年12月中下旬，发表于1966年2月初的大通讯，无异于一颗巨大的精神原子弹，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和影响。

此时的穆青，已经是新华社的副社长，主抓新闻宣传。来自基层的信息和记者的报道，使他明白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人民才会逐步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而“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又在全国范围内吹起了更大的“斗争”之风，“四清”运动已是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势。穆青在苦恼和矛盾中挣扎着。他尝试着在“阶级斗争”和“战胜自然灾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965年12月初，穆青去西安召开新华社分社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的报道计划。他专门绕道郑州，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领导给记者周原捎话，让周原先到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色几个报道线索，十天后他回来听汇报。

穆青欣赏周原。此人有个性，肯吃苦，文字功力扎实，激情四射，才华横溢。但这种人往往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因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厄运总是围绕着这样的知识分子打转转，周原自然不能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接受批判和改造。周原一时性起，为表赤诚之心，竟然举刀断指，生生剁掉了自己的一节手指。也是新华社的领导爱才心切，1962年周原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继续留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当记者。

周原在穆青走后立即就去了豫东灾区。他乘长途汽车先到了杞县。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说晚上要看戏，没空，派了个水利局长来应付。周原一无所获，耐着性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到了汽车站，在路边小吃摊刚吃了一碗元宵，看到一辆汽车正要启动，周原便“蹭”地跳了上去。

车开了好大一会儿了，周原才问：“这车去哪儿？”

售票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去兰考。”

兰考就兰考吧。只要在豫东就行。周原知道，豫东这几个县，灾情都差不多。这里盛行三害：内涝、风沙、盐碱。不治住“三害”，生产就根本无法搞上去。

到了兰考，周原径直去了县委大院，迎面碰上了县委的新闻干事刘俊生。

周原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来探探路，摸摸线索……”

刘俊生立即回答：“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

周原一愣，忙问：“谁？”

“焦裕禄。”

刘俊生说着从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袜子、破衣服，旁边还有一张破藤椅。这些都是焦裕禄的遗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焦裕禄临终前没有写完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刘俊生孩子般地呜呜哭诉，县长张钦礼抹着泪回忆。周原痛断肝肠。他想不到自己的这次意外之行竟有如此巨大的收获。

十二天之后，周原回到郑州等穆青。穆青一行从西安回来。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知道：豫东有戏！

可有一个难点周原绕不过去。待他这次下去摸线索时，焦裕禄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半年前，《河南日报》已经刊发了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并配发了评论。河南省委也已经做出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决定。新闻没有首发，是否炒别人的冷饭，周原拿不定主意。

穆青毕竟位高权重，眼界更加开阔。他不慌不忙地让周原找来了刊发焦裕禄事迹的《河南日报》，仔细阅读之后，穆青抬起头来，坚定地说：“我们的计划不变，去兰考！”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了兰考县委大院。

说是大院，其实就是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渍上墙角、窗台，红砖墙被盐碱蚀咬得斑驳陆离。县委会议室里是一张破旧的长方形木桌，两面对摆着几张由长长的木条钉起来的连椅。穆青感觉到了一种熟悉而遥远的气息。

县长张钦礼、焦裕禄生前的秘书李忠修先谈。起初，他们有些紧张，不知从何说起。周原说：“你们第一次怎么跟我讲的，就怎么跟他们讲。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那天，刘俊生正在乡下。大队来人通知他说，张钦礼县长来电话找他。刘俊生赶到大队部，只听张县长说，新华社来人了，你立即赶回县里。

刘俊生来到县委会议室的时候，张钦礼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张钦礼把刘俊生介绍给穆青和冯健之后，就让刘俊生接着说。

刘俊生从焦裕禄下雪天起草“六条”指示谈起，说他怎样带领群众治沙、治水、治碱，说他访贫问苦、冒着大雨查看水路，说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在沙丘上，要看着兰考改变面貌……讲着讲着，刘俊生已是泪流满面。他告诉穆青，兰考的群众自发地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贫下中农们呼唤：焦书记你出来吧，让俺们看看你，你也看看俺们吧……

穆青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步，不时用手绢擦着自己的眼泪。

周原、冯健边记边流泪。

张钦礼索性趴在桌子上痛哭失声。

日头正午了，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大家去吃饭。

穆青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二十八年了，没这样流过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动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他报道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当天晚上，穆青又找了一部分熟悉焦裕禄的人座谈。

第二天，12月18日，穆青一行在县直机关采访、座谈。

第三天，12月19日，张钦礼陪同穆青等人去了韩庄，找到焦裕禄最先走访的饲养员肖位芬。老肖正在吃饭，刚咬了一口馍，听说有人要听焦书记的故事，这口馍就怎么也咽不下去了，流着泪不停地说明说呀。他指着屋前的大片泡桐林：“焦书记要是活着，看到这些林子，他该多高兴哩……”穆青再次被感动得泪流双颊。从韩庄出来，穆青一行又去了秦寨、张庄，昔日滚滚的沙丘上，已种上了泡桐，风沙得到了有效治理。

第四天，12月20日，穆青一行到开封住下研究稿子。

周原悄悄推开穆青的房门。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写！立即写出来！”

“谁写？”周原问。

“你写！马上写！”

“怎么写？”周原又问。

“就原原本本地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再笨也要把他写出来。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周原领命，伏案奋笔疾书。穆青像一个督战的指挥官，不时到周原房间查看写作进度。看到初稿中的这样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不禁击掌叫绝：“好！这样的话多来几句！”

一天一夜过去了，一万二千字的大通讯一气呵成。穆青、冯健带着这份初稿回北京汇报。

总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那天很忙。他对穆青说：“今天没空。”

“只要半个小时。”穆青坚持汇报。

半个小时后，吴冷西被深深打动了。他站起来，连声说：“写！发！”吴冷西指示，稿子先由冯健修改，再由穆青修改，务必精益求精。

改到第七稿的时候，吴冷西通过了。那些经典的感人场面，惟妙惟肖、如影如画地再现于笔端：

……那晚下大雪，我看见焦书记房间里的灯光亮了一夜。大清早他挨门把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九个村子。在许楼村一间低矮的茅屋内，一个无儿无女的瞎眼老大娘问他，“你是谁？”焦书记答：“我是你的儿子！”

……那次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焦书记一刻不停，打着伞在大水里奔来奔去，亲自测绘洪水的流向图。到了吃饭的时候，村干部张罗着要给他派饭。焦书记吃过灾民讨来的“百家饭”，喝过社员家里的野菜汤，可这会儿他说啥也不吃。为啥，他说下雨天，群众缺烧了。

……焦书记家里也困难，没条像样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我们县里补助他三斤棉花票，他就是不要，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他后来被查出肝癌，人都不行了，还在病床上念叨，张庄的沙丘，赵垛楼的庄稼，老韩陵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焦书记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四方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不可。县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刚走，西庄的又来了。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喊：回来呀回来……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娘，听说焦书记去世了，大黑天摸到县城，看见宣传栏里有焦书记的遗像，不走了，就坐在马路上，呆呆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那时，天上正下着雪……

穆青让人将稿子打了份清样，寄给周原，请周原去征求兰考县委的意见。

周原知道，焦裕禄要作为全国的重大典型推出来了。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据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通过此稿开的是县委常委会议。一开始是县长张钦礼念，他念一段就问大家有啥说的，没有人说话就算过去了。张钦礼念不下去了，就由周原念。这时的周原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不像是征求意见的样子。你说一点不同意见，他马上就给你驳回去。我听着有不少地方是大瞎话，可那个气氛……我又想焦裕禄是好班长、好同志，只要把他宣传出去就得了，其他的我也就不说了。

刘呈明说，对于通讯的结尾部分，县委书记周化民谨慎地提了一点意见：最后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的现实写得这样好。实事求是说，兰考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啊！周原听了很不耐烦，反驳周化民说，还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的面貌改变得就是不错嘛！

穆青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人物通讯不可有任何虚构。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

但是，在采写焦裕禄的过程中，主题和时代的需要，让穆青他们没有遵循必须“绝对真实”的原则。文学的表现手法代替了新闻的事实依据。为塑造焦裕禄这个完美高大的形象，一些时间和事件发生了位移，一些故事和过程有了一点点的嫁接，一些没发生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合理想象而生造了进去……

1966年2月6日晚上，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用他那独特而激越的声音，声情并茂地将这篇通讯演绎到了极致。在这一瞬间，焦裕禄的名字响彻华夏大地。在古老中国的上空，似乎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穆青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分水岭。从焦裕禄的通讯诞生的那一天起，穆青大步迈进了中国著名记者的行列。他的生命和新闻生涯当中，他的名字已经同焦裕禄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了。

“文革”十年，白白浪费了穆青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大好时光。在这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新华社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穆青受到了冲击、批判、斗争，好长一个时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文革”后期被“解放”，重新工作之后，也是左右掣肘，动辄得咎。

1976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之时，穆青的喜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本来就对“文革”心有抵触，对左派理论家们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心存疑虑，“文革”的彻底结束让他有了重获自由之感，他恨不能立即否定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所谓的革命。但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要求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家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既懂得进攻的关键节点，更要学会妥协的高超技巧。可穆青有点等不及了。

1978年年初，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廖由滨，给总社发来一篇人物通讯，题目是《棒打不回头的种棉模范吴吉昌》，写的是山西闻喜县一个叫吴吉昌的老人坚持在“文革”中进行科学实验，努力攻克棉花种植过程中的落蕾、落桃等难题的事迹。可稿子写得逻辑不清，语焉不详，许多细节和过程没有交待清楚。

稿子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转了一圈，放到了记者陆拂为的案头上。众人的感觉是，基础不错，人物也有个性，就是写得“太幼稚了”。也算廖由滨运气好。穆青有闲来无事到编辑部各办公室转转的习惯。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随便与编辑记者聊聊天，谈谈稿子。这天，穆青信步踱进了国内部农村组，陆拂为正拿不定主意呢，便把稿子放到了穆青手中。穆青看完稿子，立即指示把廖由滨叫来总社，详细介绍吴吉昌的情况。

说廖由滨采访得不深不细，那可真是冤枉了他。来到北京后，他连夜向穆

青等人做了汇报，谈到了吴吉昌在“文革”中如何受到了残酷迫害，被打致残，仍然坚持棉花种植试验的感人事迹。穆青听着听着又坐不住了，他劈头问廖由滨：为什么不把这些如实写出来呢？

廖由滨心有余悸地说：“我怕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

穆青明白了。他的面前横亘着一座险山。不翻过去，永远无路可走。攀登、翻越，就有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穆青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要超越历史的禁锢，打破时代的“魔咒”，让中国人民尽快从那场恶梦中醒来。他派陆拂为与廖由滨再赴山西闻喜采访，真实地反映吴吉昌的遭遇和精神。

吴吉昌的事迹的确感人，陆拂为、廖由滨抓到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究竟该怎样串起来，陆拂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那时，徐迟刚刚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名噪一时。陆拂为专门去听了徐迟创作谈的报告，仍是不得要领。无奈之下，陆拂为去找了他的好朋友、作家林斤澜。林斤澜的一番话，让陆拂为茅塞顿开：“事迹很感人，作家虚构都虚构不出来，事实和形象已拥有足够的力量把读者打动，不宜添加主观的抒情和议论。”林斤澜好酒，谈文章写作，仍忘不了拿酒打比喻：“玫瑰香酒酿制原料差，需要加香料；茅台酒原料好，不需要加香料。喝酒讲究品原味，我建议你用白描笔法去写。”

陆拂为对写好吴吉昌充满了信心。他精心布局，精心炼字，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白描”通讯拉出了初稿：

1966年1月。寒风呼啸，中南海的湖面上披着冰甲。周恩来总理刚在全国第五次棉花生产会议上作完报告，又立即请几十位植棉劳模来国务院会议室座谈。

当头裹白毛巾，身穿黑棉袄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进门时，总理指指自己右侧的座位说：“老吴同志，坐这里来。”

总理对大家说：“毛主席又给咱们任务了。主席指示：要粮棉并举，学会两条腿走路；要继续研究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主席把任务交给我，我依靠大家。”

总理和大家亲切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握住吴吉昌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吴吉昌说：“我把解决落桃的任务交给你了，你把它担起来！”吴吉昌迟疑地说：“中，可我是个大老粗，一没文化，二来岁数也大了……”总理打断他的话问：“你多大了？”吴吉昌答：“五十七。”总理说：“你五十七，

我六十七，毛主席比我们都大得多。我跟你讲，再过二十年，我八十七，你七十七，咱们一起用二十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热血涌上吴吉昌的脸，他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响亮地回答：“行！”

文章便围绕着“周总理的嘱托”，展开了跌宕起伏的命运描写。已经见过吴吉昌两次，并且有过深入交谈的穆青，特别嘱咐陆拂为，一定要抓住细节，注重细节的运用和描写。陆拂为心领神会，在“细节”上精抠细磨，写得栩栩如生，纤毫毕现。“文革”中吴吉昌遭批斗时，造反派勒令他每天给队里割草。

一天，吴吉昌离村走了五六里，来到北街大队。眼前是一大片棉田，绿油油的棉苗正在疯长，他多么想去提醒社员注意呵。但他想，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人们会不会听他的话，会不会因此招来新的祸害呢？一连两天，他围着棉田看了又看，转了又转，内心斗争非常激烈。

直到第三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围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晌，吴吉昌好象自言自语似地说着：“棉苗长得不错呵。”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女社员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里明白……”

春天的一个晚上，穆青决定最后一次修改定稿。他们三人关在办公室里，一段一段地捋，一部分一部分地过，当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老高的时候，当窗外已是曙光初现的时刻穆青才说：“行了。”不过，他还是嘱咐陆拂为，稿子打出清样后，“找几个年轻人看一下，如果他们都感动了，就是定稿了。要不行，我们再来磨。”

陆拂为把稿子分别送给了几个年轻人读，包括他的女儿和邻居家的中学生。他们读着读着都哭了。穆青得知后说：“好了，就这样发吧！”

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由穆青、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又一次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这篇八千多字的通讯，入选了中学课本，获得了当年的优秀报告文学奖。

任何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局限在所难免。在写吴吉昌这个人物时，穆青过分夸大了精神的力量。以为精神可以改变一切，精神能够转化为物质。只要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天下就没有攻不克的难关。其实，种棉花是一门科学，解决脱蕾落桃这个棉花种植当中的头号难题，更是科学。这绝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仅凭实践经验就能完成的重大科研课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学科，需要长时间的联合、协调、培育、筛选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时至今日，棉花落桃问题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家们的努力还在摸索阶段，《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也只能还是象征意义的豪言壮语而已。思想大于形象，精神高过物质，这似乎是穆青所有英模通讯中的通病。

穆青始终没有走出“宣传家”这个角色怪圈。他一辈子都坚信，新闻具有极大的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谁若说新闻作品只是一种客观、公正的事实反映，穆青是断然想不通的。他理解的新闻，就是典型人物的深入开掘，主题思想的反复提炼，激励作用的充分显现。

恩格斯热衷于理论争辩。他说过，论战是幸福的。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像炸弹一样在对方营垒中爆炸的时候，你会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在这一点上，穆青与恩格斯是相通的。

穆青始终不渝地认为，人物通讯要表现时代精神。“人物通讯，是无产阶级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新闻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人物的活动，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也是无产阶级新闻区别于资产阶级新闻的特征之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必须‘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始终不渝地去体察和反映人民群众的那种不可遏止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极其忠实地报道他们听到的人民呼声’（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全国解放后，我国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作用，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人翁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

穆青毫不隐讳他的“主题先行”。他坚持认为，选择报道对象、取舍采访素材、设计矛盾冲突、安排文章结构等诸多方面，都要符合时代主题，服务于中心工作，表现精神风貌。他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类人物通讯，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比起过去战争年代的人物通讯，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区别，就是这些人物通讯更深入地揭示了先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更鲜明、更深刻地体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加上适当运用了文学的、政论的表现手法，因此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成为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宝库中一种有着特殊战斗作用的武器。”

“无产阶级新闻”、“时代精神”、“精神世界”、“主题”、“文学的、政论的表现手法”、“武器”……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和火药味的词句，绝不是现代新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它深深地烙印着穆青那个时代的痕迹。

“主题确定以后，要着力地选择典型材料来充分地、深刻地表现它。凡是有利于突出主题的材料，都要有效地加以利用；一切游离于主题的材料，不管它多么生动，则要毫不可惜地予以割爱。”读着这样的判断句，恍如隔世。更何况，新闻报道中怎能允许有“文学的、政论的表现手法”呢？这会让一切现代新闻学的讲义避之唯恐不及。

穆青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他发现新闻、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多元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已经使新闻传播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记者和媒体只是提供事实，最终判断要靠受众自己做出。记者的天职只是客观公正地追踪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本源，表现最本质的真相。今天，可以有记者每天追踪发表几条甚至十几条新闻事件的连续报道，但绝少有记者花费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采写一篇长篇通讯。读者宁愿去浏览事实清楚、言简意赅、报道事件的新闻快餐，而不愿去拜读“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的崇高事迹。生活的多元带来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带来信息渠道的多元。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不会有了。那种围着收音机边听边哭，捧着报纸边读边泣的景象，大约从我们的生活中永远地消逝了。

穆青的“歌德派”身份，在他生前就遭到了质疑。21世纪的第一年，有记者访问穆青时问他：“您写的人物通讯，为什么都是一些先进人物，好的典型，

怎么没写一些阴暗面呢？”记者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是，一个好的合格的新闻记者，他的“批判”功能应该远远大于他的“歌颂”功能。

穆青还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阐发他的一贯主张，“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先进人物的活动，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我们要通过典型人物通讯，表现时代精神，多揭示、表现美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当然，我在下面也发现了不少落后的东西，一般是请分社的同志写内参。”

他只一味地歌颂，一味地宣传，一味地鼓动。他始终把自己看做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他认为，新闻工作应该服务、服从于党的工作的大局。

穆青晚年，将他与同事们合写的十个先进模范人物的通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十个共产党员》，包括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植棉模范吴吉昌，植树老英雄潘从正，修建人间天河红旗渠的县委书记任羊成等。

其实，穆青心中永远化不开的情结还是他的文学梦。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私下里曾对人说过，当代许多知名作家，都是当年延安鲁艺中他的同学。他特别提到，在鲁艺学习时，刘白羽的基础比他差，写得并不比他好。几十年下来，居然也成就斐然，成了大作家。“比起鲁艺的同学，我这一辈子，其实什么也没有做成。”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以游记、回忆为主要题材的散文集《穆青散文选》，才算了却了他的心头之愿。

穆青有记日记的习惯。晚年闲来无事，他的日记写得更精心，更抒情，更优美了。有些篇章，他就是当散文来写的：

这几天，我的小院里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杏花和迎春花刚刚落去，玉兰、榆叶梅就陆续开放，紧接着丁香花开了，海棠花开了，葡萄和爬墙虎都吐出了鲜嫩的绿叶，而最令人陶醉的是几百棵郁金香次第开放，那鲜艳的色彩真让人睁不开眼睛。特别是每个早晨以至整个上午，小院阳光充足，那些红色的、黄色的、粉红的、淡紫的酒杯似的花朵映着阳光通体透明，真像盛满了美酒的玉杯一样。

我每天都要在花前观赏几回，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高，一天天开大，真有说不出的欣慰。

另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晨在院子里散步，忽然发现去年地里未挖出来的郁金香又拱出了新芽。……

看到这些嫩芽，就有一种春天的感觉，心情就似乎要好一些，冬天实在是太长了，天寒，风大，万物凋零，到哪儿都有一种压抑感，几个月的漫长冬天，几乎要把人困死。所以一闻到春天的气息，人就好像要解放了一样，精神也为之一振！

但愿今年的春天能给我带来一点灵感，一点还未凝固的激情……

穆青这些随手写下的率性文字，透着清新，透着自然，有几分温馨，也有几许感动。比起他端着架子写下的那些描写先进模范人物的句子，高下立判、泾渭分明。只有真话，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穆青对新闻的误解是全方位的和本源性的。无论他的身子怎样地深入了基层，怎样地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与农民促膝交谈、把手言欢，他在思想上从来就没有与他的报道对象平等过。他总是居高临下。他总是来发掘、提炼、总结这些先进人物的闪光思想和英雄事迹的。穆青心里十分明白，他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流高手。无论多么平凡的农民，无论多么庸碌无为的平头百姓，只要经他那支生花妙笔张扬出来，一定就是轰动全国、家喻户晓的时代风云人物。基层百姓和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其量只是一些散落在生活中的“珍珠”，需要有一根“红线”，把它们串成价值不菲的“项链”。穆青知道，他就是那个手持红线的人。

穆青设想过“新闻改革”，1982年初，即将全面主掌新华社工作的穆青，在有关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改革”设想：“我想，我们能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新闻报道要注意文采。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内容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且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也是新颖的，也是美的。我们的报刊和新闻报道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不仅要直接引导读者，指导工作，而且对一代人的成长，对一代文风的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不少的新闻报道像公文，像总结报告，而不少读者又跟着学习和套用这种文体，逐渐变成一种广大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报

刊,我们的记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改革新闻报道,开创一种新文风,开创一个与我们奔腾前进的时代风貌相适应的新的报道局面,是摆在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穆青晚年,迷上了摄影。说起摄影,穆青总是兴致盎然。他自嘲地谈起:“我的摄影作品比文学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几万张。”

1989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穆青的《彩色的世界》。这是由四十一篇游记和一百九十五幅精美风光照片组合而成的精装画册,穆青爱不释手,广送朋友。

1996年10月,穆青摄影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千年更替之际,穆青来到青岛。他想拍一张海滨日出的照片。在创作摄影作品方面,他有着同样的固执和追求完美的一贯作风。每天4点多起床,带着一干陪同,赶到郊外的海边,选好角度,支起三角架,固定好照相机,静待那冉冉的太阳跃出水面的一瞬间。已经拍了好几天了,穆青一直不满意,不是天气不好、雾气太重,就是云彩的位置不够理想……穆青坚持说,还要早起,还要去拍。不十分满意决不罢手。

笔者正是在这次拍摄间隙见到穆青的。那天言谈甚欢,不过主要话题都集中在摄影上,听他介绍他那些得意之作的拍摄经历和过程……

六十六岁的时候,穆青在日记中发了一通感慨:

明年如果让我退出第一线,也许可以多写点东西,出点成果。否则,工作更多更艰苦,恐怕不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从事写作。我一生都在这种矛盾中挣扎,但为了党的事业,我一直把自己的爱好放在时间的夹缝里。现在的问题是夹缝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老,真有点令人不安。

还是在这一年的日记中,穆青写道:

看了半天文件,开了半天会,机械化的生活又照常运转起来了。说不上是喜爱还是厌倦,几十年都是如此,早已习惯了。

2003年10月11日凌晨3时20分,八十二岁的穆青因肺癌在北京医院去世。

弃世前的十几个小时，当他呼吸急促、已不能说话、即将昏迷的时刻，他用眼神向守护在病床前的秘书要了纸和笔，但他颤抖的手却仅仅在纸上留下轻轻的一划……

写了一辈子文章的穆青，没有留下一个字，就这样无言地走了……

主要参考文献

张严平：《穆青传》，新华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一版。

刘建国：《当代名记者与代表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1989年4月第一版。

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北京，1996年9月第一版。

任彦芳：《焦裕禄身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9年1月第一版。

后记

历史学——或者通俗一点说，对已经过去的事件、人物的反省重新定义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畅，已然有十几年了。

当然，时下最为时髦的“历史学”，是那种材料为结论服务，自说自话的历史学；是正名、翻案，标新立异的历史学；是不惜孤证、尽采野史的演绎历史学……

范文澜、翦伯赞、张传玺、罗尔纲当年不是这样治史学的。他们只认史料。搜集材料、去伪存真、扎实考证之后，才敢在史书上写下一个个沉稳而准确的文字。倘若把现今出版的种种话本、评说、札记、新解，送给这些老先生们阅读，非把他们吓傻了不可。

这种“乱象”，不是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思想多元的必然结果。更为准确地说，这不是“混乱”，而是繁荣。只用一种观点评价历史，只有一个声音叙述往昔，这才是最可怕，最单调的事情。

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其实都因袭着两个绕不过去的对生命本源的思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

一个不知道自己既往的民族，当然也不会知道向哪里去。同样，一个不明白自己该向哪里进发的民族，也没有兴趣去揣摩已经走过的历史印记。对历史的探究与溯源，正是对未来的追寻与叩问。历史，从来都是人类选择正确路径的罗盘和校正器。

自由撰稿人余世存，近几年来将审视的目光由“现世”转向了“历史”。他最近出版的新作《中国男》，就是一本用话语涂抹的中国历史人物的肖像画册。朱大可在给《中国男》写的序言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

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为了记忆而写下这一组人物的。

喻国明曾经热切地寄望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要有“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彻大悟的智慧”，可以肯定地说，从本书记载的这些令人尊敬的中国报人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喻国明的思索和期待。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以智慧、慈爱、勇敢之心，做弘扬正见、培育人才、福利社会、净化人心之事